

资本主义是怎样在苏联复辟的

这对全世界斗争具有什么意义

（美）革命联盟
上海外国语学院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译者的话

《资本主义是怎样在苏联复辟的》一书，全文刊载在美国革命联盟一九七四年十月出版的《红色文件》第七期。本书从若干方面分析了苏联复辟资本主义的原因和过程，引证的材料比较丰富，特将全文译出，略有删节，供读者参考。

在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过程中，结合研究苏联复辟资本主义的历史教训，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为此，有分析地读一点外国人写的这一方面文章，也能启发思想，有助于我们了解苏联变修的一些情况。

再版说明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全球共运经历了从高潮到低谷的演变。而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作为曾经的社会主义国家，走过了复辟资本主义的道路，最终成为了帝国主义国家，积极参与全球霸权的争夺。这一历史变迁，不仅是中国国内政治经济结构变化的结果，更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矛盾深化的表现。

《资本主义是怎样在苏联复辟的》一书，以详尽的分析揭示了苏联从社会主义蜕变为资本主义国家的过程，为我们理解今天中国乃至全球的政治经济现实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今天，当中国以帝国主义国家的身份参与全球争霸时，我们更应重温苏联的教训，反思中国走上资本主义复辟道路的原因与后果。

本书的再版，正是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提醒读者：资本主义复辟绝非必然，更不是无可逆转的历史进程。无产阶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必须重新认识自己的历史使命，积极投入到全球反帝反修的斗争中去。只有通过不断的革命斗争，我们才能真正实现无产阶级的解放，避免重蹈复辟的覆辙。

希望本书的再版，能够为所有致力于反抗帝国主义、追求自由、平等的战士们提供思想上的武器，帮助他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前行。

如果你在阅读过程中发现排版问题，请随时告知！

邮箱：caiyun@duck.com

目录

前言	1
第一章 几个理论问题	6
一、社会主义是什么意思?	6
二、工人阶级是怎样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	12
三、资本主义怎么能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复辟?	17
第二章 资本主义复辟的根源和赫鲁晓夫的上台	24
第三章 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统治下的苏联经济	57
一、赫鲁晓夫的下台	57
二、“回到列宁主义的立场”	61
三、农业方面的资本主义复辟，一个新的富农阶级的形成	64
四、利别尔曼辩论：利润动力原则的出笼	73
五、测验水性：资本主义制度的试验	85
六、经济“改革”：利润挂帅	91
七、对工人阶级的剥削	109
八、请真正的资产阶级站起来好吗?	118
九、综述：作为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苏联经济	125
第四章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在全世界	135
一、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和第三世界	135
二、苏联的卫星国	143
三、苏联和中东	153
四、苏联掠夺第三世界国家的其他事例	161
五、社会帝国主义怎样从第三世界国家榨取剩余价值 ..	166
六、苏联和它的东欧殖民地	175
七、西方资本剥削苏联工人	185

第五章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统治下的日常生活	191
一、生活水平在提高吗?	191
二、不平等现象的增长	193
三、再一次成为“各民族的监狱”	199
四、劳动妇女的“双重负担”	220
五、酗酒和犯罪：社会帝国主义的祸患	225
六、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文艺	234
第六章 苏联人民的回击	242
一、苏联：一个法西斯国家	243
二、反抗的各种形式	248
三、冒牌的“持不同政见者”	258
四、走向新的十月	269
第七章 文化革命和社会主义阶段中的阶级斗争	271
一、教育	281
二、城乡关系	284
三、文学和艺术	286
四、“抓革命，促生产”——生产方式进一步革命化 ..	288
五、综述	294
第八章 结论——社会帝国主义 在苏联出现的意义 ..	297
一、世界大战的危险	299
二、反霸统一战线	304
三、对修正主义的党如何看法	307

前言

第一个使用“社会帝国主义”这个名称的是列宁，意思是“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帝国主义，即机会主义变成了帝国主义”。

列宁运用这个短语，刻画当时的那么一批“社会主义者”，他们的政治上的机会主义已经发展到了恬不知耻的地步：公开拥护欧洲帝国主义列强，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跑到他们自己的帝国主义统治阶级一边去了。马列主义者今天把同样的名称用来称呼那么一些“共产党人”，他们的政治上的机会主义已经把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改变为一个新的帝国主义国家。

今日的苏联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它在当今的世界上扮演着什么角色？有一些人，包括所谓美国“共产党”在内，仍然竭力把苏联描绘成是世界革命的大后方，民族解放斗争的中坚力量，社会主义阵营的领袖和“全体进步人类的灯塔”，仿佛是跟列宁和斯大林领导之下的四十年间的情况毫无区别。但是，全世界真正的马列主义者以及为数日益增多的进步人民业已看清，苏联是两个帝国主义超级大国之一，这两个超级大国即使是在争夺世界霸权而火拼得不可开交之时，也能相互勾结来压迫世界各国人民。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只有美国站在帝国主义狗屎堆的顶端。古老的欧洲强国和日本都已被战争耗尽元气，一蹶不振了。“美国世纪”似乎已经翩然光临。美帝仅有的劲敌是苏联，它承担过对纳粹作战的最艰巨的重任。虽然遭到沉重

的打击，但仍然是兵强马壮、豪情满怀的苏联人民，把社会主义的大旗高高举起。哪怕是美国充当了世界警察总头目的新角色，苏联人民也还是继续面对着帝国主义，巍然屹立。但是随着赫鲁晓夫和他的一伙在一九五六年篡夺了苏联共产党，苏联就开始走上另一条道路了；它对美国的挑战的性质也就迥然不同了。

今天，美帝在印度支那已遭败北，又正受到全世界人民的谴责，还面临着一场来势汹汹的经济危机，它也不再是独踞粪堆顶上的凶狗了。“美国治下的和平”时期已经演变而为帝国主义重新角逐的时期。但是，美国这一次遇到的主要帝国主义敌手不是英国，不是法国，不是德国，也不是日本，而是苏联。尽管美国的实力已经衰落，美国的政策已遭揭露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却在上升，迅速地在全球扩展其霸权和势力。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就是美国湖泊的地中海，今日已是庞大的苏联舰队的巡弋场所。不仅如此，苏联舰只还在一九七三年首次驶过台湾海峡，明目张胆地侮辱中国人民，同时也公然向日见衰微的美国在亚洲的势力挑战。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在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比美帝更加危险。美帝连同他们无耻而伪善的“自由”、“民主”的言词，已经日益为人们所识破。但是，新上台的苏联统治者却是“和平”和“社会主义”的词令不绝于口，尽管干的是对俄国革命的反攻倒算和在世界上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复辟资本主义，却又恬不知耻地利用苏联的光荣历史来掩盖他们的叛卖行径和帝国主义丑行。

但是，正如列宁说的，我们必须听其言而察其行。

口头上，苏联赞成“和平”和“国际缓和”。行动上，苏联集结了世界上最大的火箭力量，并且跟美帝一起，在军备竞赛中掀起了新的、更为危险的一章。

口头上，苏联表示支持民族解放斗争。行动上，苏联竭力压制并破坏这种运动。举一个例子，苏联有三年之久拒不承认以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为首的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但是他们却承认了朗诺傀儡集团。苏联的国家保险机构等甚至还承揽了给朗诺集团运送军火的海运保险业务。

口头上，苏联赞成在它境内的一切少数民族和各共和国的平等。行动上，近十五年来却是和先前的平等化背道而驰。在目前，跟大俄罗斯地区对比起来，一切的进步都受到阻挠。

口头上，苏联赞成在它自己的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行动上，他们复辟了资本主义。

口头上，苏联支持巴勒斯坦和其他阿拉伯人民反抗美国支持的犹太复国主义的斗争。行动上，苏联正在跟美帝进行疯狂的角逐，争夺中东的霸权；同时，这两个超级大国又互相勾结，企图扑灭巴勒斯坦和其他阿拉伯人民的真正的革命运动。两个超级大国不断地进行幕后交易，旨在把中东的“不战不和”的状态永远保持下去。它们的用心就是防止真正的革命，以免有碍超级大国的帝国主义争夺。

口头上，苏联支持各民族的自决权利和尊重别国的主权，然而，苏联在一九六八年进攻了主权国家捷克斯洛伐克，又在一九七一年炮制了印度对巴基斯坦的肢解，这些行动的后果只能有利于镇压捷、巴两个国家的革命运动。

口头上，苏联赞成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然而在一九六〇

年，苏联阴险地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撤走全部技术人员和顾问，还带走了全部未竣工的工程项目的图纸。与此同时，它也对阿尔巴尼亚施展了同样的阴谋破坏伎俩。今天，一百二十万苏联大军在中国边界摆开进攻的阵势，其中的三十万人正在对只有一百二十万人口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实行军事占领。

口头上，苏联维护工人阶级的权利和利益，维护社会的绝大多数人的真正民主。行动上，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却已对苏联人民群众强行实施法西斯统治，成千上万的苏联公民因为反对这种统治而被投入狱中。

最后，苏联口头上支持全世界各国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但是行动上却跟美帝国主义勾结在一起，阴谋扑灭革命并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与此同时，它又同美帝国主义展开剧烈的争夺，妄图独霸世界。为此目的，它甚至企图对解放运动和其他革命斗争实行垄断，加以操纵。

凡此种种，都已被世界人民看作是苏联统治集团腐朽的社会主义的直接产物。勃列日涅夫、柯西金之流和美帝的头子完全一样。

然而，就在我们美国，有些人还不理解为什么要不厌其烦地把这个道理说清楚。他们说，在我们这里，只有美帝国主义才是我们的主要敌人，因为我们不是捷克斯洛伐克人。

确实如此。为了在美国建立社会主义并对世界革命作出最大的贡献，对美国人民说来，美帝国主义是我们能够也必须加以推翻的制度。这是一个残暴的、罪恶的制度，它使我们、也使全世界的人民生活在苦难之中。但是，美帝国主义并非生存在真空之中。要打败美帝国主义，我们美国人民必须重视在世

界上发挥作用的一切力量，同时，也必须提供援助去打败世界各地的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我们的最后目标必须是完全清除在一切地方存在的一切形式的帝国主义。

在美国的人民运动内部，甚至在那些反对美国“共产党”的人们中间，修正主义思想的影响是革命斗争的重大障碍。社会和平主义，信赖资产阶级的“进步”政客，信赖工会的领导人和其他的资产阶级代理人，正是这种种思想挡住了人民的视线，使他们看不到有必要动员人民群众，在工人阶级和一个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党的领导下，起来革命。凡是要在美国干革命的人，都不能不懂得阶级斗争中的修正主义的根源，不能不认清修正主义是一种国际现象。跟修正主义斗，跟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斗，这是在我国干革命的必不可少的内容，也是工人阶级打败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势力，建成社会主义的国际斗争的一个部分。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在中国的伟大革命斗争中，毛泽东为中国人民提出了、也解决了这个重要问题。我们也必须正确地解决这个问题。还有那么一些人，他们把苏联敬奉为美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真正朋友。他们竭力要我们信服，苏联的利益也就是我们的利益，苏联正在领导一场世界规模的、反对美帝国主义、争取和平和社会主义的斗争。果真就是这样吗？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在这一本《红色文件》中，我们将把它搞个清楚。

第一章 几个理论问题

一、社会主义是什么意思？

只有社会主义革命能够消除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无政府状态及其带来的破坏和苦难。社会主义取消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取消了私人占有劳动群众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的现象，从而解决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利润不再是生产的目的地了。生产是为了使用，是为了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而不是为了一小撮游手好闲的特权阶级的发财致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资料不再具有资本的性质（就是说，它已不受资产阶级的控制，已不能成为那些家伙残酷地剥削工人阶级以扩张他们的财富和权力的手段）。虽然工人继续领取工资，他们的劳动力不再是商品了。他们不再在市场上把劳动力出售给剥削者，让资本家去榨取最大限度的利润。

社会主义使人民能够解决那些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法解决的问题，使人民能够做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做不到的事情。举例来说，造价低廉的住房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无利可图”的投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却成了优先的项目。保健事业是资本主义制药公司和医院的大买卖，是人民的灾难；在社会主义社会，则是资金充裕的公共福利事业。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公共交通无需像资本主义社会那样，为了保持“自给”而必须收取高昂的票价（如旧金山的公共汽车和电车公司以及纽约的交通管理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工人创造的全部财富可以合在一起，不妨说是放在“一口锅里”，然后根据社会总的需要

和发展加以分配，尽可能地不受某项投资在当前是否有利可图的影响。

社会主义把工人阶级的需要和利益放在第一位；整个社会的方向就是为劳动人民服务。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根本的规律却是你死我活的竞争。

但是，正如列宁所说：“无产阶级若不在国家内占统治地位，社会主义也是无从设想的”。工人阶级夺取国家政权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是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首要条件，也是最有决定意义的一步，然后，只有工人阶级统治的国家才能占有生产资料并废除利润制度；工人创造的财富才能通过国家而受社会的集体控制和利用，而不会作为资本落入资产阶级的腰包。

但是，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说法，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并不单是生产资料的社会公有制。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的意思远远不止这一点。他们给社会主义下的定义是一种建立在废除了雇佣劳动基础之上的制度。

在一个没有雇佣劳动的社会里，生产关系必须反映出直接从事生产的人们对于一切生产力的全面的掌握。此外，这里面包含了这么一个内容，劳动的产品不再是商品，生产和消费丝毫不受盲目的价值规律的支配，而是由社会自觉地决定的。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一书中告诉我们，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需要生产的产品的总量和种类，可以根据各种产品对社会的效用以及生产它们所需的劳动时间这两方面的估计而直接作出决定，“而不需要著名的‘价值’插手其间”。工人控制国家，从而占有生产资料，这是获得当家作主权利的最根本、最必要的前提条件。

列宁指出过，国有化并不等于社会化。为了建成一个更加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社会，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及时改变整个生产的组织和目的，借以使人民的物质和文化水平不断提高，使工人阶级的作用和社会主义原则得以加强。通过计划，无产阶级国家必须着手消除工人和他们对生产力直接行使支配权相脱离的现象，这种脱离是一切商品生产的特征。它也必须消除生产者之间彼此相对地隔绝的情况。

所以，社会主义确实是一个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长期的过渡阶段。前者是商品生产和阶级社会的发展的最高阶段，后者则表明彻底克服了商品生产的一切痕迹和一切阶级差别。在过渡时期中当然有不同的阶段。

在整个过渡过程中，工人自己必须开始在组织并指挥工厂一级的生产过程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而在全国范围内，工人必须逐步参与并领导整个的计划工作。只有这样，才能不仅是在形式上或法律名义上结束工人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支配权相脱离的现象（这种现象正是雇佣劳动的实质所在）。

在日常语言中，我们说的“社会主义”就是指的那些已经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并实现了生产资料国有化和计划经济的社会。我们是照着列宁的话这么说的，他说：“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这个名称是表明苏维埃政权有决心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而决不是表明承认新的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的制度。”

在列宁和斯大林领导之下的苏联，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决心是共产党的政治路线的核心，也是国家推行的各项政策的核心。在今天，象中国这样一些国家，正是把这种决心继续作为国家的指导方针。但是在这些国家中，还没有一个国家

已经达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所描述的那么一个充分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地步。其原因，至少部分是因为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时候，在这些国家中还十分广泛地存在着小商品生产。实际情况表明，要把小商品生产改造成为大规模的社会化的生产，必然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过程。这个过程要分成几个阶段，而每一阶段都充满着激烈的阶级斗争！

在所有已经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货币继续充当计算产品的价值和分配产品的主要手段，而不是按社会劳动时间直接计算。国家的计划制订者用价值和实物单位（如重量、长度等）来分配资源和计量生产。不但工人仍旧领取货币工资，国家也以货币信贷的方式，给企业分配生产资料。例如，钢铁厂所用的铁矿石、煤或高炉都不是送上门来的实物；它是用收到的一笔一定数量的货币信贷或拨款来购买这些东西，同时它也接到了关于要购买的货物的数量和品种的指示。

此外，虽然所有主要的工业生产单位都属于国家，用法律的眼光看来，它们又各具“法人”的身份。与此同时，我们在上面已经表明，它们又有一定程度的财政自主权，并且一般地都要求它们以销售所得抵偿成本，甚至还要赢得利润。

这一切表明，在实际生活中，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在我们把它叫做社会主义的社会，价值规律仍然在受到某种限制的情况下发挥作用。我们应该由此得出什么结论呢？

资产阶级说这就证明马克思主义是胡说八道，社会主义是白日做梦。他们声称现代工业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才行得通。

在某些唯心主义“激进派”的眼中，任何形式的市场的存

在就是不折不扣的资本主义的标志，他们全然不顾剥削是在生产的环节上而不是在市场上实现的。他们的结论是革命已经失败，要不然就是被出卖了。

正如大家可以预料到的，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分子基本上同美国和别国的资产阶级走的是同一条路线，只不过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辞藻把自己装扮起来罢了。看看《真理报》的版面，我们所见的是，“‘商品’、‘货币’、‘价格’、‘利润’……都是同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与生俱来，不可分割地连在一起的。”

他们还告诫我们，必须分清：“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规律，跟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具有完全不同的社会内容和职能，历史上不曾存在过类似这样的价值规律和商品关系。”这一番话是苏联修正主义经济学家С·И·别尔乌辛说的。他还说：“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共产主义的时期的标志，是扩大了而不是缩小了价值范畴在国内和国际关系中发挥作用的领域。”

然而，马克思说得很清楚：“经济范畴只是这些现实关系的抽象，它们仅仅在这些关系存在的时候才是真实的。”因此，一个把自己叫做社会主义的社会仍然借助于市场范畴来安排自己的经济，这就表明它还没有完全摆脱旧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

事实上，市场本身确实不过是一个远为广泛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体系的一个方面。这个体系还包括从几千年的商品生产承袭来的劳动分工。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讲到，一定的分工在一切社会生产中都是必要的。但是把一部分人推上凌驾于他人之上的权威、指挥和控制的地位，却是一种社会特定的分工；

从长远的观点看来，这是不必要的。它只能是阶级社会的产物。社会主义从资本主义继承了这种分工，但是要设法消灭它。

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描述的新的社会主义关系是不能靠摇一下笔杆子所能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关系的最后胜利要有一个过程，要耗费时间，也要进行自觉的斗争，即阶级斗争。它要经历一个长久的不断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过程，一个不断地逐步加强工人自身管理社会权力的过程。它不是随着生产力发展而自行出现的副产品。毛泽东说过：“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

人剥削人的现象从来就是以私人对生产资料的占有为基础。通过真正的社会化，通过有效地废除雇佣劳动并不断加强工人阶级的政治和社会权力(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社会是能够最终消灭剥削的。但是只有到了共产主义，当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工人和农民之间、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差别已告消失，当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已被按需分配取代的时候，一切的社会的不平等(作为个体的差别的对立面，个体的差别是永远存在的)才会消失。

总而言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继续存在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恢复资本主义提供了客观的基础，但是这并不表明，它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社会。我们可以说，凡是工人阶级实际上掌握着国家政权的地方，凡是价值规律起作用的范围被缩减到经济的和政治的现实所许可的最大程度的地方，凡是党和国家积极鼓励工人阶级的首创精神去发展新的生产关系、包括新的分工的地方，以及凡是在工人阶级及其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大力实现社会各方面的革命改造的地方，那里就存在着社会主义。

二、工人阶级是怎样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

在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同在今天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一样，市场范畴起不了调节国家经济的中心作用。在有关生产和投资的决定中，价格只起最小的作用，规定的价格本身也是反映政治上的优先次序而不是实际的成本（例如，从一九四七年到一九五〇年，基本消费品的价格降低了大约百分之四十）。同样地，企业完成它的计划任务的业绩的主要指标是实际的产量（用产品数量而不是用货币价值计算的企业的产量），而不是利润。

工人知道他们是为自己做工。一九三六年的苏联宪法规定了“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它使不劳动者，使依赖别人劳动过活成为非法。它保障每一个公民有工作的权利。经济计划通过空前规模的工业发展把这一诺言变为现实，并且由于规定了劳动力的总额和每一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应该达到的水平，从而继续保证了充分就业。到了一九三〇年，苏联已经关闭了最后一家劳动介绍所。

当然，在一项建设工程完工的时候，或者在技术的进步许可的情况下，也可解雇工人。不过那些工人总归是由计划重新安排工作的。计划是由中央机关在党的领导之下制定的。

我们考察一下今天的苏联工人的生活情况，呈现的景象就大不一样了。突出的现象之一是重新出现了劳动力的自由市场：在八十个城市里建立了挂着“劳动力利用局”这样美妙招牌的劳动介绍所兼失业人员事务所。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推行的所谓计划工作和管理工作的改革，已经使苏联宪法上关于人人有工做的保证成了笑柄。可是，那倒不要紧，宪法本身就是

预定了也要加以“修正”的。

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苏联劳动人民的地位决不仅仅是更加安定。由于工人们开始认识到他们自己是社会的主人，就出现了新的劳动态度，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群众运动开始自发地涌现。在列宁和斯大林领导下，这些运动为共产党所推广和普及。

在革命以后的内战时期和二十年代初期，列宁称之为共产主义的“嫩弱的幼芽”以共产主义星期六的形式出现。这是莫斯科一喀山铁路的工人的创举，和他们一起的还有党员和党的同情者，他们放弃休息日而进行无偿劳动。许多不同生产部门的非党工人立即起来响应他们。虽然许多人对于所做的工作是陌生的，组织工作也做得很差，但是，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的工人劳动生产率，却比正常的情况高出一到两倍！这个运动从莫斯科扩展到全俄罗斯。

在三十年代，掀起了第二个工人群众的自发运动——著名的斯达汉诺夫运动。尽管资产阶级（他们在这方面是老手）声称，斯达汉诺夫工作法是用无产阶级的漂亮词句伪装起来的迫使工人加快生产的手法，这是完全不符事实的。它不是从上面发动的，也没有借助于工时研究员和“效率专家”，而是由顿涅茨盆地的一个普通煤矿工人亚历克赛·斯达汉诺夫首创的。斯达汉诺夫科学地分析了他自己的工作，重新组织了采煤的程序，丝毫不用增加体力强度，就使他的产量增加了十四倍。几乎是在他的成就公布之前，许多工业部门的工人们就已开始跟他竞赛，常常是结合成小组研究改进有关的工作。斯达汉诺夫工作者普遍都很热心地把他们的先进技术教给别的工人。

斯达汉诺夫运动不只是一场生产斗争，同时也是一场阶级

斗争。斯大林在运动的初期说过：“这个运动在某种程度上是在违反我们各企业行政的意志的情况下，甚至是在和他们作斗争的过程中产生和开展起来的。”企业行政的作用“不是为了帮助它，而是为了阻碍它”。

反对的原因是害怕小船要摇晃——经理们不仅想要保持生产的低指标(这样容易达到)，而且还要保留老的资本主义的分工，即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组织和执行的分工。他们坚持说，生产工程师规定的方法是唯一正确的操作方法，直至他们在无数的事实面前无力抗辩为止。他们不愿承认这个事实：依靠普通的工人，而不是依靠专家，生产可以组织得更好，社会主义可以发展得更快更全面。

所以，“斯达汉诺夫运动是从下面产生和开展起来的运动。”这个运动之所以具有如此巨大的意义，原因就在这里。它之所以成为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步骤，道理也在这里。不过，运动中也有某些缺点。首先，运动也许太着重于对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给予物质刺激。他们有时发到了奖金，或者还因为增加了生产面得到更高的工资。这不仅会在斯达汉诺夫工作者中间助长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思想，并且还会产生使比较先进的斯达汉诺夫工作者脱离工人群众的不良后果。在个别情况下，这种做法甚至在工人群众中造成对斯达汉诺夫运动的敌视。

其次，斯达汉诺夫工作者本人常常被选拔出来，脱离生产，进入技术学院或大学去受训或深造。这确实表现了某种对才能和能力的合理使用，但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又会产生跟运动的目的背道而驰的倾向，因为运动的目的就是要开始打破专家和群众之间的界线。限于当时的条件，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

的，但是把斯达汉诺夫工作者推上了负责的岗位就改变了他们的客观社会地位，看不到这一点则是严重的错误。

这些缺点丝毫也不改变斯达汉诺夫运动的积极意义是居于压倒地位的性质，这个运动表现了阶级斗争中的一大进展，而丝毫不象帝国主义、托洛茨基派和修正主义的谰言所竭力污蔑的那样是“死逼工人快干”或“物质收买。”

在苏联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时期，工人的首创精神和阶级斗争也具有一些不那么引人注目的形式。当时工厂里的纪律严格，然而厂里当权的人员也常常会在全厂范围的生产会议上受到一些指责。在党的积极分子的领导下，工人们揭露懈怠腐化、隐瞒设备和虚报产量等现象。厂长们害怕这些高度政治性的群众大会。

有关这种生产会议，下面一份材料可以说明问题。这是一次讨论工厂生产计划指标的会议，这份材料是美国的“苏联问题专家”约瑟夫·伯利纳从一位前苏联商法和工业管理教授那里拿到的，后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就走资本主义道路并流亡德国。（如果他再在苏联坚持数年，也许就可以成为一个大亨了！）

“所有的工人全都出席会议。接着就开始乱七八糟地搞所谓赶超计划，它很快就在一片混乱之中草草收场。他们宣读了计划。这里面我们的行政首长给我们提供了这样那样的情况，这样那样的指标，当然，我们必须完成它们，我们全都知道这是必须做到的。鼓动工作就是这样地进行下去。我们必须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完成和超额完成。‘我希望工人当中有人提出赶超建议’，这是一个工程师或者一个党组织的代表说的。于是，人人都要表现他的‘积极性’，一个俏姑娘，一个送牛

奶女工在座位上站起来说，‘我认为我们应该向斯大林同志保证超额完成百分之一百。’她不考虑原料，不考虑供应。接着第二个人站起来说，‘我们应该全体保证超额百分之一百，我个人保证超额百分之一百五十！’一句话，越抬越高，工程师和经济学家只好抓头皮。不管怎样，这还是叫做‘赶超计划’，它是新的社会主义道德和更高的社会主义激情的表现。直到最上头也是这一套，你知道，在那里情况也是一团糟，无法形容的糟。”

在这一段话里，很难分得清楚，究竟是什么东西更加显得突出：是这些劳动人民表现的对社会主义的热情，他们要挑重担的积极性呢，还是这个叛徒“专家”对于他们的轻蔑。

不过，这里面也确实暴露了苏联社会主义的某些基本的矛盾。从某种观点看来，这个混蛋也是言之成理的。对于像原料供应这一类技术的和物质的因素不加认真考虑，苏联的经济就无法进展。并且，超额完成的数量如此巨大(即使是可能达到的话)，也许事实上对整个社会也不是件好事(当然，它对于管理人员和计划执行人员的墨守成规的保守思想倒是一剂对症的良药)。

简而言之，单靠工人的热情是不够的。管理复杂的工业经济要有一套适当的技术和形式，在工人们能够自己集体地掌握住这些技术和发展这些形式之前(不管那些最高贵的资产阶级嘲笑派说些什么，这都是工人们在过去和现在所能做到的)，就得依靠这样的专家。

有一种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是，从工人队伍中训练一批新的、更有政治觉悟的专家。这当然是好的。但是，甚至这些“无产阶级专家”也仍然是处在一种客观上和工人阶级不同并且是

在工人阶级之上的地位——实质上是跟老的专家们同样的小资产阶级的地位，那怕是这些新的“无产阶级专家”确实有主观上为人民服务愿望，也无法改变这一事实。当然，这一矛盾，总的说来就是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矛盾，在一个长时间内是无法消除的，但是必须采取措施来逐步做到这一点，而在各个阶段上，都要开展思想斗争和通过群众对专家监督来处理这个问题。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苏联社会，旧的分工尚未完全克服，新的分工尚未充分地发展起来（存在着这些生产会议本身就说明它至少是已经开始了）。当时对于限制价值和市场规律的作用范围是非常强调的，事实上特别是在三十年代，计划当局还有一种似乎可以完全不顾价值规律而行使的倾向，后来斯大林批评过这种过“左”的错误。与此同时，对于发展一种新的分工则相对地不够重视。换一句话说，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继续在苏联存在。我们马上就要重新详细谈论这个问题。

三、资本主义怎么能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复辟？

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一个在共产党领导下、工人阶级已经取得了政权的国家，资本主义为什么还会复辟呢？

答案是复杂的，但是存在于这样一个事实中，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是通过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产生的。但是，正像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写的那样，“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

社会主义国家存在于一个资本家并没有放弃追求财富和权力的世界。不能指望老的剥削阶级会甘心情愿地失去他们的

政权和财产。他们将试图通过武装反革命再次获得它们。为此，他们也必然要和外国帝国主义政府结成联盟。

历史表明，为了保卫社会主义国家，就必须挫败阶级敌人用暴力推翻社会主义国家的各种阴谋。对于这样重大的事情，决不能掉以轻心。在苏维埃政权的最初三年中，几乎所有过去在旧俄投资并获得很大好处的帝国主义国家，包括美国在内，都出动了军队，同前沙皇的将军们勾结起来，在农村大肆杀掠。他们在被打败以后，又实行了恶毒的经济封锁，同时还始终存在着再次发生军事干涉的可能性。果然，二十年以后，苏联不得不奋起击退纳粹的倾巢进攻。

经验表明，资产阶级手中不是只有枪炮这一种武器。在一九四九年，当中国人民的持久战争接近最后胜利的时候，毛泽东曾告诫说：“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但是，“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敌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

旧的资产阶级观念，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的那个“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信条，在社会主义社会是决不会立即销声匿迹的。资产阶级教育和文化从我们幼年起就向我们灌输，并在我们每天为生存而挣扎的过程中得到加强。它不仅在资产阶级中存在，而且也毒害和影响到一切阶级，包括工人阶级在内。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思想意识仍然是复辟资本主义的有力武器。因此，必须发动和教育群众不断地同它进行斗争。

但是，这一斗争主要不是一场抽象发生于人们头脑中的“斗私”。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具体表现，在教育上是理论脱离实际，在艺术上是以前剥削阶级为中心，并不知不觉地或甚至公开地支持他们，歌颂过去的反动道德标准，而不是表现劳动人民的斗争、成就和传播社会主义的道德观。资产阶级思想意识也表现在行政和经济管理中压制群众创造性的官僚主义方法。“专家决定一切”的口号只能是加强资产阶级的地位。

反对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斗争是在社会的一切领域中进行的，它是用无产阶级思想和方法去代替旧的和思想和方法。

规模巨大的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是这样的一场斗争。在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早年也进行过这类斗争；但是由于对它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因而群众性的斗争形式还没有发展起来。在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开辟全新的天地，而所有解决问题的方法却是从资产阶级那里继承下来的。这些方法，在其不受限制、不加改变地执行过程中，慢慢地就会削弱国家的无产阶级的特性和经济基础的社会主义性质。这就多多少少为资本主义和平演变创造了主观条件。

一九三八年，在斯大林直接主持下发行的《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中曾指出，“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我们将在下一章内说明，这句话的含意没有被斯大林所充分掌握，但是它指出了正确理解资本主义何以在苏联复辟的途径。

什么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客观条件呢？

我们已经提到过这样的事实，就是在任何已经建立了无产

阶级专政的国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还没有完全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所取代。这就意味着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继续存在，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说：“在产品的价值形式中，已经包含着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形式、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对立、产业后备军和危机的萌芽。”

资产阶级思想意识不能在真空中存在，而生产关系也不是形而上学的概念，它们都是存在于人们之间或阶级之间的实际关系。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着复辟资本主义的主客观条件，这说明资产阶级或潜在的资产阶级集团也是继续存在的。

在苏联，我们能够辨认出一些充当资本主义复辟主要基础的集团：

第一，富农。在农业集体化之前，富农能够将没有土地的农民作为佃户或雇工来剥削。他们设法利用自己对粮食生产的控制权，向城市无产阶级进行讹诈，以取得后者愈来愈多的让步，借以加强私有财产和私营商业。在苏联无产阶级专政年代的初期，列宁曾将富农（农村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者并列为促成资本主义复辟的主要力量。他指出，当农业还处在很落后的状态，并以个体农民生产为特征时，必将继续为资本主义提供土壤，因为“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而且即使在二十年代末期，富农阶级已经解体之后，许多人还是想方设法爬上了集体农庄中的权势地位，干着那种使私人利益凌驾于社会利益之上、使集体同国家相对抗的勾当。

第二，经理、技术人员、其他“专业人员”、知识分子和脑力劳动者。这些人虽然名义上是为这个工人国家所聘用的，但是，却逐渐把他们领导的企业看作是自己的私产，并且高踞

于工人之上。同样，技术人员和其他相似地位的人，甚至许多出身于工人阶级家庭的人（如勃列日涅夫），也认为他们的专长使他们有资格享受特殊照顾和特权。正如我们已经看到过的，他们常常拒绝吸取工人的经验来解决技术问题。

这些集团构成了资本主义复辟的主要社会基础。没有这样一个社会基础，复辟绝不可能由几个人，即使是职位最重要、最有影响的领导人所能实现。这些集团一方面可能形成一种社会基础——那就是，他们的客观地位使这些阶层最易接受资产阶级的影响；但是，还必须将他们同党和国家机器的高级官僚区分开来。只有后者才能把社会拉回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并实际上按照资本主义路线去组织生产。正是一些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采取了资产阶级立场、世界观的党和国家干部，利用这一较低级的“中间阶层”作为他们的社会基础，发展他们的特权和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倾向，并驱使他们压制工人阶级的首创精神。

在党和国家领导人中，那些坚信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无产阶级立场和世界观的真正的共产党员，同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保持着紧密联系，并依赖他们作为自己的社会基础，作为唯一能沿着社会主义道路的、将这一斗争推向前进的力量。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领导人，从这样一个立场出发，鼓励群众起来监督、批评并争取团结中间阶层，对他们的资产阶级倾向作斗争，逐步消除他们的特权，促使他们走社会主义道路。

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在党的领导机构中间，不断进行着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激烈斗争。这是社会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全面斗争的一部分，也是这个斗争最尖锐的焦点。毛泽东从苏联和中国（以及其他当代的社

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中得出结论:社会主义社会中阶级斗争的主要焦点是在党内,特别是在党的最高领导机构中,而无产阶级在这场斗争中的主要对象是“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且他们又将是反复出现的。

这种高高在上的资产阶级野心家,由于他们处于特别有利的地位(生产资料已归国有,党控制着国家和企业的工作),就可以采取相对地不流血的方式,复辟资本主义。他们中的一些人是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者。另一些人开始时也有为人民服务的愿望,但一旦上升到了领导岗位时,就变得脱离群众了。他们陶醉于过去的业绩,并且感染上了过去他们曾与之斗争的那些观念。

我们从这些情况可以看出: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哪个阶级将进行统治”的问题还没有最后解决。资产阶级势力必然要起来,不是图谋恢复私有财产,就是企图将工人阶级的社会财产改变为一个新的国家资产阶级的集团财产;但是他们的成功却不是必然的。

毛泽东已作出总结:“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我们的专政工具不能削弱,还应当加强。

无产阶级要保持国家政权并彻底改变生产关系,就不仅要反对资产阶级集团,也要对人民群众中的资产阶级思想进行最坚决的斗争。

而且,在这个“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中,

党和群众的关系是决定性的。如果党员脱离群众去进行工作，他们就不可能完成社会主义时期的任务。“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党必须用马克思主义武装群众，使他们自觉地认清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并努力为之奋斗。

在苏联和其他修正主义国家，正是由于“从内部攻取堡垒”，资本主义才得以复辟，因此，党的关键作用就越发明显了。事实证明，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并使自己成为新的国家资产阶级的，正是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柯西金以及在他们领导下的党的官吏。

第二章 资本主义复辟的根源 和赫鲁晓夫的上台

苏联由社会主义国家蜕变为资本主义国家，并不是通过逐步蜕化而自发形成的，认识这一点非常重要。这种资本主义复辟，是历经好几个不同阶段的尖锐阶级斗争的产物。

资本主义复辟实际过程的第一阶段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党内斗争时期，这一时期到一九五三年斯大林逝世为止。在这些年内，工人阶级牢牢地掌握着政权，无产阶级的政策在大多数领域也得到贯彻。然而，阶级斗争仍在继续，在此期间，许多资产阶级分子跳出来同无产阶级进行了较量。

苏联的社会主义从一开始就是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发展的。苏联作为历史上第一个开始建设工人自己的国家，对完成这一巨大任务在好些方面都是准备不足的。苏联工人从沙皇、地主和资本家那里所继承的是一个在工业化的道路上几乎还没有迈步的落后的经济。这一落后状况，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三年流血内战和帝国主义的干涉所造成的破坏而变得更为严重。苏联工人阶级虽然主要集中于大型工业并且是第一个推翻资本主义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工人阶级，但是在人数上却是很少，还不到总人口的百分之十。具有革命精神的农民阶级，在经济上和文化上都还很落后。此外，我们在上面已经指出过，苏联是在敌人包围之中发展社会主义的。

面对这一艰难情况，苏联工人决心尽快地按社会主义体制建设国家并使其工业化，虽然他们知道，这样做必须作出许多牺牲。但是，单靠这种献身精神和热情是不够的，还必须同叛

徒、“专家”作斗争。由于在旧社会工人被剥夺了甚至是最基本的受教育的权利（一九一七年时大多数工人是文盲），因此，就必须由技术方面和管理方面的专家来解决当时建设中所面临的各种问题，而这些专家当然就不得不从原来的剥削阶级队伍中去招募。这些人当中有许多是和我们的叛徒一样，公开敌视革命，而且，也像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他们是构成资本主义复辟的社会基础的主要成分。

必须把他们争取过来，但同时也必须把他们置于严格的政治控制之下。于是采取了在列宁领导下所提出的、又由斯大林予以发展的政策。

一方面，当不得不依靠资产阶级专家来担负管理上和技术上的权力岗位时，就以高薪和较好的生活待遇，对资产阶级专家进行“赎买”。这就意味着，旧社会的代表们被授予了处理日常行政和技术工作的广泛权力，资产阶级的管理人员甚至被授予了维持劳动纪律过程中惩罚违抗命令的工人的权力。这样，原来的剥削阶级在某种程度上就处于能够从内部破坏社会主义建设并能继续对工人发号施令的地位。

在另一方面，则把这些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严格地同政治权力隔离开来。这就首先意味着，共产党仍然是工人阶级的党。从中央政府直至工厂各级负责的专家都在富有战斗性的党员的监督之下，这些党员能够发动工人揭露贪污和破坏行为，并且确实是这么做的。

更为重要的是，中央计划机构和其他中央权力机构是由党牢牢地控制着，这些机构在制订经济计划 and 政治目标时牢记着群众的长远利益。由于执行计划的职责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中央计划当局在制订生产指标时就非常谨慎，务求准确详尽。

这样，虽然工人阶级不得不承认这些专家在行政管理和技术上的权力，同时，这些专家也不得不服从于工人阶级的集体意志，这一意志自上而下表现于计划，又自下而上由千百万党员和战斗的工人加以实现。

这种办法是一种必要的妥协，它没有、也不可能造成资产阶级的最终失败。正如斯大林所不断强调的，资产阶级还远没有被消灭。资产阶级的目标仍然是既从外部也从内部进攻并消灭共产党。

资产阶级的专家和管理人员曾几次试图从党外破坏社会主义建设。最有名的几次尝试中就有个叫做沙赫特事件。这一事件于一九二八年发生在顿涅茨煤炭盆地的沙赫特地区。沙赫特破坏者“用不正确的方法进行采矿工作，以便减少煤炭产量。他们实行损坏机器和通风机，设法使矿井崩陷，爆炸和放火焚烧矿井、工厂和电站”。这些破坏者不顾工人的安全和工作条件，蓄意无视劳动保护法。在这些破坏者被揭露以后，斯大林把这次事件总结为“阶级斗争的尖锐化”的一个反映。他指出，“资产阶级的暗害活动毫无疑问地证明：资本主义分子还远没有放下武器，……”他又指出：“不大力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不把我们各个组织的工作置于群众的监督之下”，共产党员就不能全面地制止这种破坏活动。

但是，这些破坏者实际上还不是当时的主要危险。当苏联共产党人就今后前进的方向进行辩论和斗争的时候，在党内出现的反对派同这些破坏者结成了紧密的联盟。资产阶级势力把希望寄托在这些反对派身上，并怂恿他们为分裂和腐化党而努力。

这时党必须决定的问题是，继续前进并同农民阶级结成联

盟建设社会主义，还是停滞不前被资本主义的自发势力所压倒。托洛茨基分子认为，要在一个多数人口是农民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他们认为，苏维埃国家必须进行“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牺牲农民阶级的利益来实行工业化。这一“左”的路线实质上是右的路线，因为它破坏了列宁称之为苏联无产阶级政权基础的无产阶级和贫农之间的联盟。托洛茨基分子鼓吹“工人阶级与农民必然会发生‘无法解决的冲突’”这一理论，其实是把他们的“希望寄托于农村中的‘文明租佃人’，即寄托于富农的农庄”。

布哈林分子则公开表示了这一希望。作为党的一个领导成员的布哈林，由于对苏联工人建设社会主义的能力同样缺乏信心，主张对农村资本主义的自发势力采取投降政策。他反对农业集体化，相反却号召少数富农“发财吧！”

布哈林理论的实质是否认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他认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阶级斗争将逐渐消失，富农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然而，正如斯大林及时指出的，这一理论忽视了这样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无产阶级专政是阶级斗争最尖锐的形式。”或者，正如列宁所阐明的：“消灭阶级要经过长期的、艰难的、顽强的阶级斗争。在推翻资产阶级政权以后，在破坏资产阶级国家以后，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后，阶级斗争并不是消失（如旧社会主义和旧社会民主党中的庸人所想象的那样），而只是改变它的形式，在许多方面变得更加残酷。”

托洛茨基分子、布哈林分子、还有其他叛徒和破坏者都遭到了失败。战斗的工人群众和党的干部毫不动摇地团结在斯大林和党中央委员会的周围。三十年代的清洗尽管有其缺点和过

分之处，但它标志着无产阶级路线的一次甚至更加伟大的胜利。到一九三九年时，情况已经变得非常明显，所有公开的分裂和派别活动都已无法容忍，也不会得到容忍。关于这一重要时期的更加详细的情况，建议参阅一九三八年出版的《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以及斯大林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的著述，特别是他的《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

但是资产阶级势力必然要披着新的外衣再度出现。党的领导懂得，这种对资产阶级专家的“赎买”政策只能是一种暂时的解决办法，必须使生产关系进一步革命化。因此，苏联开始培养来自工人和农民队伍中的自己的专家和管理人员。三十年代中期，一个新的技术管理阶层出现了。这些人对革命具有更大程度的忠诚，但是训练这些新管理人员、新技术人员、新干部和新知识分子的，正是那些他们将取而代之的资产阶级专家；因此这些新专家不仅继承了资产阶级专家的专长，而且也往往接受了他们的世界观。更值得注意的是，正如我们前面已经指出的，这些新的专家依然是处在严格说来是小资产阶级的阶级地位。这样，尽管这些新专家的阶级出身很好，其中大多数也是真心诚意地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工作的，但却表现出一种脱离群众的倾向。许多人开始指望得到他们以前老师的那些特权，而且也倾向于以同样的态度对待工作，也就是以个人主义的态度而不是以集体主义的态度对待工作。他们主要是从地位比自己高的人那里寻求指导和批评，而且让技术凌驾于政治之上。

这一新的集团的出现，正是在三十年代中期和后期重新出现了帝国主义进攻的威胁的时候。由于这一威胁，就有必要实行所有阶级的最广泛的团结，也就是说，各个非无产阶级阶层，

其中包括管理人员和专家，都必须被吸收到广泛的民族爱国战线中来。要实现这一点，仅仅宣布这样一个战线是不够的，党还要亲自巩固这一团结，对所有爱国的阶级具体地给予真正是每日每时的政治领导。

当中国处于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时，有许多来自非无产阶级阶层的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之也带来了他们阶级的偏见。同中国的这种情况一样，苏联共产党为了继续领导斗争，也必须向那些非无产阶级集团的人进一步开放，吸收他们入党。早在一九三六年，当吸收新党员的工作在间断了几年之后重新恢复的时候，特别是一九三八年以后，当战争的危險不断加剧的时候，大批的技术专家和其他知识分子被接收到党内来*。

这些新党员中的大多数人出身于工人阶级，而且，为了建立一种能打败纳粹侵略所必需的民族团结，这一新政策无疑也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将技术权力同政治权力分开的政策却受到了严重的干扰，来自非无产阶级的新党员的个人主义观点和工作方法不可避免地向党内渗透。原来总是以怀疑态度看待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其他类型小资产阶级分子的共产党员，现在发现自己正同他们肩并肩地在同一事业中工作，有些人划不清团结和斗争的界限，也就不足为奇了。

事实上，在战争期间，一种新型的党的领导人已在某些地

* 虽然全党的新党员统计数字并未公布过，但一九三九年第十八次党代会上发表的两个共和国的新党员人数表明，属于“知识分子”和“机关工作者”范畴的占百分之四十二点八到四十四点五，而一九二九年时仅占百分之一点七。据已掌握的数字表明，在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一年间将近百分之七十的新党员来自技术和管理阶层。

方形成了，这些人的作风是注重实务，“讲求实际”，强调发展技术和专业，但却有些轻视理论原则，贬低政治作用的倾向。虽然这还并不标志着这群人已是一个新的资产阶级的核心，但是这种情绪却是引起麻烦的一个征兆。

这种情况也来自党的某些干部中间普遍滋长的自满情绪。苏联共产党人当然有许多值得骄傲的功劳，但是，战后有许多人开始感到他们现在可以躺在过去的荣誉上休息一会儿了。有些人认为，他们曾为革命效劳，现在理应受到一些特殊照顾和赞扬。他们开始逐渐脱离群众，对工人阶级改造社会的能力也开始失去信心。

事实上，斯大林早在一九三七年就对这种倾向提出过警告。斯大林懂得，政治挂帅是马列主义的根本原则，他批评了以下这种现象：有些“党的同志……完全埋头于经济工作……而对于像苏联的国际环境、资本主义包围、加强党的政治工作……等等这样一些工作，根本不注意了”。中国共产党在其一九七三年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也对各级党委中出现的情况提出了警告，指出这样埋头于琐碎事务必然要导致修正主义。斯大林曾经指出，胜利也有其“阴暗面”，他警告说：“节节胜利，步步成功，一再超额完成计划的胜利环境，会使政治经验少和见识不很多的人产生漠不关心和自满情绪，会造成一种使人不知分寸和政治嗅觉迟钝而一味庆祝胜利、互相祝贺的气氛，会使人们松劲，使他们高枕无忧。”不幸的是，这些话正描绘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许多党员和党的领导人的状况。

这时候党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但在执行中却常常偏离无产阶级的立场和方法。政策越来越是自上而下地贯彻，却没

有发挥人民的积极性。例如，在工厂里，党对企业管理的控制越来越少。有些党员认为，计划能够解决社会主义建设中产生的任何问题，但是，当经济发展的时候，计划机构本身变得越来越官僚化。出于不得已而采用的行政管理办法已经变成了经济发展的障碍，变成了发挥群众积极性的绊脚石。

无产阶级对于官僚主义的回答是恢复党的活力，发动工人，尽量吸收群众参加制订计划的工作。但是，那些越来越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党的高级官员的社会基础（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的回答却完全不同。这些势力要求实行更加能够“自动调节”、更加“合理”的经济，一种受资本主义价值规律支配而不是受劳动人民的集体意志支配的经济。

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尼古拉·沃兹涅先斯基就是这种观点的一个最直率、最大胆的鼓吹者。苏联经济虽然仍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市场需求的支配，但在根据工人阶级的利益自觉地组织生产方面已取得了很大进展。某些产品，如日用必需品和基础工业产品的机器等，其售价远远低于本身的生产成本。其他商品，如伏特加酒或奢侈品，则以高于生产成本的价格出售，以使用后的收益去“贴补”前一类产品的亏损。但是，沃兹涅先斯基认为，计划机构和为贯彻这种政策所必需的严格的政治控制，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官僚主义，并造成浪费。这是因为他不相信工人阶级有能力控制生产，并由自己来调节生产。

沃兹涅先斯基主张实行一种“价值平衡”政策，以便使商品的分配和生产能以一种更加“自然的”方式来决定。他认为，价格应该反映生产的成本，这样价值规律就可以自然而然地调节生产。他认为，商品、其中包括重型机器和其他生产工具，

如能按成本来制定价格，那么中央的政治和行政管理就不会如此臃肿庞大，也就能够消灭官僚主义的基础，各个企业也就能够由纯粹的经济杠杆来支配。这一论点在三十年以前就预示了柯西金在一九六五年实行的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改革”。这也说明，新的修正主义分子和老叛徒有着共同的观点，都认为无产阶级专政能够不要自觉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就能自发地长入共产主义。

沃兹涅先斯基认为，社会主义仅仅是通过计划对经济进行最合理、最有秩序的组织。他并不认为计划必须根据工人阶级的利益来制订，并且必须在政治上受到工人阶级的控制。当一个持反对意见的经济学家提出他的看法，认为战后的资本主义可以通过计划的办法得到稳定时，沃兹涅先斯基批评他这是暗示资本主义能够和平地转变为社会主义，完全抹煞了计划本身并不是区分这两种不同制度的标志这一事实。值得注意的是，沃兹涅先斯基采取这种表面上“左”的立场是企图为自己建立“正统”的名声，从而使他的一些有关苏联经济的修正主义主张更加易于被接受。

在一九四七年到一九四九年期间，沃兹涅先斯基曾设法将自己的一些主张付诸实践。他的第一个步骤是实行财政改革，其中包括急剧提高许多消费必需品的零售价格，继之又改组了一些中央计划机构，将大部分（根据实际需要的）数量计划交由地方一级制订，中央的国家计划委员会仅仅保留规定产值指标的权力。然后在一九四九年，沃兹涅先斯基又建议，重型机器等生产资料的生产应根据以其生产价格（即其“价值”）出售的情况来调节。

对于这种建议，斯大林认为它会削弱苏联经济的发展。在

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资料是可以由资本家买卖的商品，这意味着它们的价格是由价值规律调节的，结果是，只有那些有利可图的生产资料才有人买。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由于价值规律的作用受到限制，生产资料的价格可以低于其价值，这种生产虽然“无利可图”但却符合经济的长远利益。斯大林曾于几年之后指出，如果沃兹涅先斯基所主张的那种路线是正确的话，“那就能理解，为什么在我国，不关闭那些暂时还不能赢利而且工人的劳动在其中不能产生‘应有效果’的重工业企业，也不开设确实能赢利、而且工人的劳动在其中能产生‘巨大效果’的轻工业的新企业。

“假如这是正确的，那就不能理解，为什么在我国，不依据仿佛调节着各个生产部门间劳动分配的‘比例’的价值规律，把工人从那些对国民经济很需要但赢利很少的企业，调到更能赢利的企业中去。”

沃兹涅先斯基的主张不仅会削弱经济的发展，而且会向资本主义复辟迈进一大步。由于生产资料的价格根据“价值”来制订，有意识的调节和计划即使不是不可能，至少也会变得越来越困难。那时，生产资料对于工人来说，就会变成一种根据资本市场的需要进行买卖的东西，也就是说，生产资料将重新带有资本的特征。

同年晚一些时候，沃兹涅先斯基所建议的五年计划，为恢复各个企业的自主权和削弱中央计划机构提供了进一步的措施。据说，斯大林此时曾对沃兹涅先斯基说，“你是在俄国谋

求资本主义的复辟。”*

沃兹涅先斯基的主张并不是孤立地提出来的。他是代表相当一部分经济学家、计划制订者和管理人员讲话的。他的最忠实的信徒之一就是当时的财政部长、现在的苏联总理柯西金！事实上，甚至可以说，一九五六年篡夺国家的修正主义集团来自两个方面：赫鲁晓夫在乌克兰的政治机构（今天主要以勃列日涅夫为代表，他当时是赫鲁晓夫在第聂伯河流域的一个部下）和沃兹涅先斯基在计划和管理方面的信徒。今天，列宁格勒财经学院为了纪念沃兹涅先斯基已经以他的名字命名。

斯大林把沃兹涅先斯基撤职也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苏联共产党人并非不知道战争年代里又重新出现了资产阶级倾向。他们知道，在紧张的高潮时期有可能产生“左倾”冒险倾向，同样，当工人阶级处于防御地位并同资产阶级势力结成联盟时，就会出现共产党人犯右倾错误的倾向。为了恢复党的思想力量和政治力量，苏联共产党人在斯大林的领导下开展了一系列类似于“整风运动”的运动。

在对德战争中，共产党的队伍受到了严重的削弱。三百五十万以上的最忠诚、最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党员在抗击法西斯的战争中献出了他们的生命。在一九四六年一月，只有三分之一的正式党员和预备党员是在德国入侵前入党的。新党员中的大多数都是最忠诚、最无私的抗击纳粹的战士——当时入党需

* 沃兹涅先斯基不久就被解除一切职务，并被逮捕处决。我们虽然并不象今天的社会帝国主义头目那样惋惜他的死亡，但我们认为，公开揭露他的路线的阶级实质，同时对它开展群众性的批判和斗争，会是一种更加有效的处理他的办法。

要有很大的勇敢精神，因为德国人专门要挑被俘的共产党员给予特别残酷的对待。但是，单纯是热忱并不能弥补马列主义教育方面的真正不足。

因此，在战争快要结束时，决定进一步严格限制吸收新党员，把重点放在现有党员的教育和政治整顿上。一九四六年七月，中央委员会的一项重要决定对此作了正式规定。根据马林科夫所说，作出“吸收新党员时进行更仔细的挑选，对申请人的条件进行更严格的审查”的这一决定，是为了消除“党在数量上的增大同党员和预备党员的政治觉悟之间的”差距。

在实行吸收党员的新方针的同时，又重新对国家机构和行政机构中的党员进行“清洗”，同时还进一步强调思想上的提高。著名的“日丹诺夫运动”（主要是由列宁格勒党的领导人安德烈-日丹诺夫提出的一种在文学艺术方面严格实行无产阶级标准的政策），就是这一政策的一个方面。

另一个不太著名的运动，是以改进马列主义经济学的教学为中心的。早在一九四三年，当理论性杂志《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登载了一篇有关这个问题的未署名的文章之后，这一运动就开始了。在斯大林逝世之前的整个战后时期，这方面的努力一直没有间断过。在此期间，共产党和斯大林一直在寻找一种能最有效地对修正主义进行斗争的正确形式。

在这一时期内，还有一个应该提到的运动就是反对“世界主义”的运动，其目的是抵制战争期间从西方渗入党内和苏联社会的许多资产阶级影响。虽然这一运动的总的目的是改造干部和知识分子，但也表现出了一种不幸的反犹太人的倾向。与此运动有关的这种或那种错误的根源，我们并不了解，但我们从上文已经可以看出，这是一个斗争非常复杂的时期，这一斗

争受到许多因素的制约，而对于这些因素，即使是在今天，也只是部分地有所认识。我们不能断定反“世界主义”运动是否起了有益的作用，但是，这一运动毕竟是党为了对资产阶级思想影响进行斗争而作出的一种努力，这种努力可能曾经遭到各级机会主义分子的歪曲和破坏。

斯大林最重要的一个步骤是对新修正主义分子的错误作出了直接的回击。一九五二年，他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发表，对修正主义，特别是对类似沃兹涅先斯基的思想作了详尽的驳斥。这本书透彻地总结了苏联在经济战线上的经验，立刻成了当时进行斗争的一个强大武器，并对后代作出了宝贵的理论上的贡献。

今天，资本主义在苏联复辟的具体经验，以及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特别是在中国）开展阶级斗争的具体经验，使在中国的同志和阿尔巴尼亚的同志领导下的马列主义者得以进一步发展并丰富斯大林在其著作中所作的分析。在整个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阶级和阶级斗争继续存在，这一主要论点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仅仅是有所暗示，而现在则被更加透彻地总结出来了，并且可以被看作是真正认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的一把钥匙。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是斯大林对一本新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未定稿所作的几点评论。在战争后期，根据中央委员会的委托，这一教科书是作为整个提高政治觉悟运动的一个部分而编写的。斯大林在其评论中指出，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仍然起作用，但其应用范围受到了限制。他认为，虽然计划经济必须考虑到价值规律和商品生产的继续存在，但是“价值规律在我国制度下不能起生产调节者的作用”。相

反，社会主义应该向着完全消灭商品生产并建立纯粹以人的需要而不是以货币交换为基础的产品交换的方向前进。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发表于一九五二年第十九次党代会之前不久，并被应用于一次非常广泛的群众教育运动。这一著作成为当时正在计划中的政治斗争的思想基础。斯大林已经深信，虽然在思想整风方面已经采取了一些步骤，但资产阶级分子仍在各级组织中处于掌权地位。一些像沃兹涅先斯基那样的人比较公开，因此还容易对付，还有些人则更为狡猾，在许多问题上看上去摇摆不定。这些人是手段极为圆滑的政治投机商——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从当时的印度大使梅农所说的一段故事里，便可看出斯大林在清洗这些人物时所遇到的困难。梅农曾在一九五三年二月十七日——斯大林逝世前不久——访问了斯大林。梅农回忆说，他们谈话时，斯大林像他平时习惯的那样漫不经心地在一张纸上画画。梅农注意到斯大林画来画去都是画的狼。然后斯大林就谈起了狼。他说，俄国的农民知道怎样对付狼。这些狼必须给消灭掉，但是斯大林又说，狼也知道这一点，因此它们就想各种办法避免给消灭掉。

要揭露真正的狼，就必须发动群众，开展大规模的批判运动和斗争运动，然而当时并没有这么做。斯大林在逝世前不久，曾计划过一次矛头针对资产阶级分子的“清洗”运动。广泛发行和运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似乎表明这一运动将会具有某种程度的群众性，但是并没有出现运动。在整个战后时期，斗争基本上停留在党的上层领导之内。当斯大林于一九五三年三月逝世时，那些狼仍然逍遥自在。

我们想在此停一停，来评价一下斯大林在这整个斗争过程中的作用。许多人，包括许多认真研究并试图掌握马列主义的

真正的反帝人士，都认为斯大林本人应该为修正主义的篡权承担很大的责任。他们说，如果仅仅在斯大林逝世三年之后他的许多同僚就变得腐化起来，而且整个国家都落到了修正主义者的手中，那么，他的工作不能说是很出色的。这些人一方面承认苏联已经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并且承认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五七年间的的事件标志着这一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但他们仍然强调他们所认为的斯大林时代和明显的资本主义统治新时期之间的连续性。

让我们把这一问题阐述明白。我们认为，斯大林问题同苏联修正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问题是两个不同的问题，这两个问题对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都很重要。我们承认，这两个问题是有内在联系的，要清楚地了解苏联的修正主义，特别是关于它的根源和它是怎样上台的，也就需要对斯大林问题有所了解。但是我们并不认为这种内在的联系是绝对地决定性的，斯大林时代并没有造成修正主义的篡权。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产生于斯大林时代的土壤，产生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存在的许多特殊的矛盾和斗争，而这些矛盾和斗争又具有我们已经阐述的斯大林所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种种形式。但是还有更多的东西也产生于这一土壤，有些是好的，有些则不是。要知道工业化、计划经济、集体农业等等这些工人阶级政权的美丽花朵是在何处被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野草所淹没的，这是当前的一项非常艰难的任务。

我们在《红色文件》第一期中写道：“在理论上、实践上和组织上，斯大林是列宁和毛泽东之间的桥梁。世界无产阶级和世界人民的各项运动的胜利是我们历史的一部分，这些胜利是我们的胜利，这些胜利是我们阶级的胜利。错误和过失也应

该是我们的错误和过失。我们承认我们阶级及其领导所犯的错误，我们要努力改正这些错误，如果不能，那么就避免重犯。但是，我们不会像许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空想的‘革命家’那样，以机会主义的态度推卸这些错误。”

我们仍然坚持这一立场。

斯大林确实犯了一些错误。任何阶级、任何国家或任何运动的领袖都不能说没有犯过错误。这些错误中有许多是超过任何个人力量的历史条件的产物，是苏联社会的整个落后状况的产物，是残酷凶恶的帝国主义包围和野蛮的纳粹侵略的产物。这些因素迫使所有的苏联共产党人，而不仅仅是斯大林，作出一个严酷的选择：不是以将来需付出沉重代价的方式前进，就是根本不前进。值得骄傲的是，苏联的共产党人、工人、农民和革命的知识分子在斯大林的领导下，从未在这一选择面前犹豫或动摇。

其他的错误显然是可以避免的，因此也是斯大林个人责任的一部分。产生所有其他错误的一个主要错误是，斯大林在理论上未能认识到阶级斗争是怎样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继续进行的。一九三九年，斯大林在向联共（布）第十八次党代会作报告时这样说道：“与任何资本主义社会不同，现在的苏联社会的特点就在于，在苏联社会中再也没有对抗的敌对阶级了，……摆脱了剥削羁绊的苏联社会却没有这样的矛盾，没有阶级冲突，呈现出一幅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友爱合作的图景。”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但是在这整个期间，斯大林不断反对“这种腐朽的理论，随着我们的每一进展，我们这里的阶级斗争似乎就会日益停止了，随着我们的胜利，阶级敌人似乎就会日益驯服了。”斯大

林在驳斥这一理论时指出，工人阶级越是接近共产主义，他们的敌人也就越是要作垂死的挣扎，敌人的反抗事实上也就变得更加激烈。但是斯大林没有认识到，这种反抗正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而是把“已被击溃了的阶级残余”看作是这种反抗的根源。这些阶级残余分子仅能作一些虚弱无力的尝试来损害和破坏社会主义建设，沙赫特事件就是一个例子。但是，“如果阶级斗争的一端在苏联境内有所行动，那末它的另一端却延伸到包围我们的资产阶级国家的境内去了。关于这一点，被击溃了的阶级残余不会不知道。”

这样，斯大林指出了，资本主义的继续包围是这种反抗的另一个根源，从而他把外国代理人、间谍和个别的叛徒看作是主要的敌人。这些势力确实存在，再加上原来的地主和资本家，他们确实造成了相当大的危害。但是这些人并不是主要的敌人，而把他们说成是主要敌人会使工人阶级丧失警惕，使许多人把这种斗争的责任交给被认为是更有条件进行这种斗争的公安机关。

虽然斯大林事实上从未放弃过阶级斗争，但是由于他对敌人的性质缺乏鲜明、准确的认识，因而也就削弱了无产阶级的力量。而且，虽然斯大林曾强调地（也是正确地）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价值规律仍然起作用，但他并没有由此得出正确的结论——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就必然（常常）以某种隐蔽的形式存在着。同时，由于这些原因，一个在共产党内部有其代理人的完整的、现实的资产阶级也就必然存在。

与此相关联的是，斯大林倾向于过分重视生产力的发展，而没有足够强调生产关系的革命。斯大林虽然领导了反对沃兹涅先斯基之流的机会主义方针的斗争，他却仍然相信，社会主

义社会的改造将主要是通过生产的迅速发展来实现。

斯大林在他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部经典著作中提出了这样一种错误的论点：在苏联，“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状况完全适合”。这一论点导致了放弃自觉革命并促使群众把单纯的生产发展看作是解决所有困难的办法。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也提出了同样的路线，但在这本书中，他也警告说，“如果以此自满，以为在我国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不存在任何矛盾，那就不正确了。”这一警告表明，斯大林确实认识到这一问题，但却没有充分理解阶级斗争的关键作用。因此，斯大林在一九三八年甚至说道：“生产力不仅是生产中最活动、最革命的因素，而且是生产发展的决定因素。”确实，社会的前进不可能超越生产力发展所造成的限制，但同时，这一发展本身也并不能把生产关系推向前进。阶级斗争和自觉革命是必需的，也是根本的。虽然斯大林认为，这个道理适用于以往所有社会，但他并没有充分理解这对社会主义社会也同样适用。

由于这些错误，斯大林几乎从一开始就没有能够创造出一些方法和形式，使工人越来越多地亲自参与讨论和制订计划工作，而不仅仅是完成计划所规定的任务。我们已经指出过，苏联共产党人在努力克服从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劳动分工方面，是有些疏忽大意的。之所以会这样，党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迫于客观条件，工人阶级出于政治原因不得不对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作出让步，因而也就不可能为夺取经济控制权而斗争。但是，将所有经济部门的行政管理职权置于一些个人手中的“一长制”，肯定是一个错误。这种制度使工人处于被动的地位，并导致不问政治和涣散群众的积极性。

马列主义者不主张任何的“工人自治”，因为它不是以首先牢固地建立无产阶级中央政治权威为基础，不是以粉碎资产阶级国家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为基础。工厂一级的生产关系中的革命，必须是长时期的自觉革命的产物。然而，我们仍然认为，在集中的国家计划的指导之下，为了使工人参与他们自己工厂的管理和计划工作，就必须发展反映正在上升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新形式。在中国文化大革命中创造出来的，技术人员、普通工人和革命干部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制度，就是发展此种形式过程中的一个进步，同时也是对于“一长制”的经验的一个总结。

最后一点，斯大林有时候确实也没有能够认识到人民内部矛盾和人民同阶级敌人之间的矛盾的区别。虽然斯大林在理论上认为，对抗性的阶级在苏联已经不再存在，但是，他的坚定的阶级立场和长期的革命经验，使他在还有老鼠的时候便能嗅得出老鼠。但是，如果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些老鼠的出现，正是存在于苏联内部的阶级斗争的一部分，也就不可能把工人阶级的自觉的阶级斗争和群众性的斗争这一正确方法，当作粉碎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政治思想路线的方法加以充分发展。

与此同时，把不自觉的受骗者当作肇祸主犯并严加处理的倾向也有了发展。“治病救人”的方针常常没有被遵循。结果是，失去了本来可以争取过来的人。在发生这种情况的同时，还产生了另一种倾向，使得人们不敢公开提出自己的政治观点，不敢大胆地提出自己的建议，唯恐一有错误就可能招致灾难性的后果。

但是，总的说来，斯大林的成就以及苏联工人和人民在他领导下所取得的具体成绩，特别是通过党内外一系列非常复杂

的斗争而实现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加强，农业逐步集体化这一史无前例的宏伟任务的胜利完成，战胜纳粹这一英勇的业绩以及对于世界革命事业所作的许多贡献等等，远比这些错误重要。

我们必须区分两种不同的错误政策。有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之流的旨在破坏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政策，也有像斯大林那样的真正属于一个同前者相反的阵营的政策，这种政策的目的是不在于复辟资本主义而是在于保卫无产阶级专政和建设社会主义，只不过是没能最有效地进行阶级斗争罢了。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复辟决不可能单纯是某一个人的错误的产物，而是阶级斗争的产物。

斯大林的错误虽然是意味着无产阶级反对走资派的斗争，没有能够像中国（它有着吸取苏联经验的有利条件）那样胜利地进行，但是也必须强调指出，在每一个阶段，特别是在一九四五年到一九五三年这一关键时期，正是斯大林自己领导了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斗争。斯大林没有找到在斗争中发动群众打败走资派的正确方式，这是可悲的，但这不能成为谴责他的根据。因此，总而言之，我们认为，在促进社会主义革命和反对苏联的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斗争中，斯大林显然是起了极为积极的作用。

随着斯大林的逝世，开始了苏联资本主义复辟的第二阶段，即在所谓的“集体领导”之下的激烈的阶级斗争时期。在这一时期，修正主义者的头目尼基塔·谢·赫鲁晓夫爬上了无可争辩的领导地位。赫鲁晓夫以前几乎一直是专门做党的工作的官员，这就使他最适合于领导这次资本主义的政变。他是个乌克兰矿工的儿子，一九一八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内战时期

参加过短期的战斗，后来进了基辅的“工人大学”。一九二九年，他被派往莫斯科的“工业学院”学习，后来当上了该院的党的书记。

一九三一年，赫鲁晓夫升任州委书记，一九三五年三月初，被任命为莫斯科州和市的党委第一书记。一九三七年一月三十日，当宣布对托洛茨基分子审讯后的判决时，赫鲁晓夫，这个后来把斯大林叫作“二十世纪的伊凡雷帝”的赫鲁晓夫，在一次红场群众大会上对二十万人说：“这些卑鄙的小人想分裂党和苏维埃政权的团结……他们对斯大林举起了杀气腾腾的手……”他的结束语是：“斯大林——我们的希望，斯大林——我们的理想，斯大林——人类进步的灯塔，斯大林——我们的旗帜，斯大林我们的意志，斯大林——我们的胜利。”一九三八年一月，赫鲁晓夫成了乌克兰党委第一书记，第十八次党代会时，当上了政治局正式委员。

在乌克兰，赫鲁晓夫变成了所谓的农业“专家”。战前，由于他成功地推行了一些旨在加强物质刺激和加强个人对于集体劳动的责任、吸收更多的专家进入中央农业机构以及给予农业技术人员某些独立性等措施，已经表现出了一种“实用主义”和经验主义的观点。

战后，农业成了经济方面问题很多的部门，这是由几种因素造成的。第一个因素是从沙皇制度遗留下来的原始的农业经济。第二个因素是农业生产资料（房屋、耕犁、拖拉机、马匹等等）受到的巨大破坏——先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革命和内战期间，后是在富农反抗集体化期间，最后是在纳粹侵略期间。第三个原因是由于需要军事物资和工业生产物资而造成的农业投资的不足（占总投资额的百分之十二到百分之十四）。即

使是这样，拖拉机（以马力计算）在一九四〇年到一九五〇年期间仍增长了百分之三十六，这一期间当然也包括了受到侵略的那几年。

然而，农业生产仍然很明显地必须迎头赶上。对于如何实现这一点，出现了两条不同的路线。一条是斯大林的无产阶级路线，提出进一步强调集体劳动、政治鼓动和政治教育，并在条件许可的地方把集体农庄改变为更先进的国营农场。另一条路线则是提倡更多的物质刺激，同时进一步强调发展私有财产，提高担任负责职务的技术人员的薪金和自主权，从而鼓励雇用那些能够向农民“更好地解释”如何改进他们世代一直沿用的方法的资产阶级专家。

这些主张首先是由沃兹涅先斯基提出的，但不久就得到了赫鲁晓夫的支持，他当时已经在乌克兰试验着同样的主张了。斯大林反对这些主张，但现有的资料不足，我们还无法解释他为什么没有能阻止这些主张的实施。不管怎样，这些主张开始得到了贯彻，常常是由一家一户组成的更小的劳动小组，成了集体劳动的主要单位。富农在当时仍然是一股相当大的势力，并仍然是资本主义复辟的社会基础，他们这时便乘机谋利。战争期间，他们曾经构成了乌克兰反苏维埃亲纳粹的傀儡组织的主要支持力量。在入侵和反攻的混乱期间，他们设法攫取了更多的私有土地。

揭露沃兹涅先斯基以后，斯大林撤销了对于个人主义倾向的让步，回到了自己原来的立场。沃兹涅先斯基的同盟者赫鲁晓夫被召回莫斯科。但他在乌克兰搞的私人“机器”并未拆除。而他在莫斯科担任的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的职务，更增加了他在党内的权势。他一方面继续暗中坚持自己的资产阶级观点，同

时又建立自己个人的控制网。因此，他虽被解除了农业方面的职权，却又通过利用党内新的职务谋得影响和威望，反而得到了好处。

赫鲁晓夫当时处于一种有利的地位。无论是在感情上、观点上或是作风上，他都同官僚主义分子、上层管理人员和党内腐化官员中的资产阶级势力有着紧密的联系。但是作为一个精明干练的党的工作者，比较说来，他没有狭隘的派别利益。总之，他当时是在合适的时候和在合适的地位上的一个合适的人。所有各种各样的资产阶级势力和许多动摇不定的势力都以闪电般的速度集合起来，尾随在他的后面。一个敌对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于是出现了。而随着斗争的发展，证明赫鲁晓夫是主张资产阶级篡权的最猖狂最顽固的倡导者。

到一九五六年时，赫鲁晓夫争取到了中央委员会的多数支持他的观点。在一九五六年第二十次党代会上，他对斯大林发起了恶毒的攻击，把斯大林叫作“懦夫、白痴、独裁者”。他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达到两个目的：首先是发动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进攻，从而在正直的共产党人队伍中制造混乱；其次是向他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同伙和他的资产阶级社会基础发出信号：潮流已经改变，他们可以安全地从掩蔽所里爬出来了。

但是，这种对斯大林的攻击也引起了反对。一九五七年春出现了一次摊牌。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集合了政治局中的多数反对赫鲁晓夫。事实上，这一多数本来是可以占绝对优势的。但是，赫鲁晓夫这个一贯狡猾的狐狸手里却隐藏着一张牌，这就是那个臭名昭著的图谋私利和个人主义的国防部长朱可夫对他的支持。当朱可夫明确表示他将以武装力量反对政治局的多数时，一些比较动摇的同盟者开始要求妥协。不久，赫鲁晓

夫得到了多数，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和谢皮洛夫被当作“反党集团”开除了出去。布尔加宁和伏罗希洛夫也在不久之后遭到了同样的下场。至于朱可夫，赫鲁晓夫因为看出他以后会成为竞争对手，也把他扔进了垃圾堆。

所谓的“反党集团”的成员没有能把斗争引向政治局范围以外的群众中去。当斯大林在世时，他的受到公认的、受之无愧的威望是反对修正主义者的一个强有力的武器；但是没有把反修斗争发展成为群众性的形式，这一缺点也确实显而易见的。对于当时妨碍无产阶级将斗争公开化并采取群众性行动的种种情况，我们并不完全清楚。对于到底谁是无产阶级路线的代表，我们也不十分清楚。但是，可以说，上述的缺点是促成修正主义篡权的一个主要因素。

即使如此，许多工人还是能够感觉到有些事情不对头，发生了好几起工人自动罢工要求对这些开除作出解释的事件。这些事件，特别是库尔斯克一家电器厂的罢工事件，都已经见之于文字记载。在斯大林的诞生地格鲁吉亚，发生了一些骚乱。在其他地方，有些工人则公开侮辱新的领导人。

赫鲁晓夫领导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在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五七年的篡权，标志着复辟过程中一个关键的转折点。正是在这个关键时刻，政权从无产阶级手中转到了资产阶级手中。在苏联，重新建立彻底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是不可避免的了，因为一条资产阶级的政治路线只会把社会引向资本主义方向，而不可能是任何其他方向。但是，首先必须摧毁精心建设了四十年的社会主义。于是便开始了复辟的第三阶段。这一时期便是破坏社会主义的时期，这一时期一直延续到赫鲁晓夫在一九六四年下台时为止。

当然，摧毁社会主义的第一步，便是赫鲁晓夫对无产阶级政权的政治基础——马列主义所进行的思想上的进攻。这一进攻有三种形式。首先是对斯大林的恶毒的谴责。这种谴责，从根本上说来，就是对三十年来的工人阶级的统治的进攻。因为，白痴是不可能领导大家白手起家建成一个强大的工业的，懦夫是不可能领导一场打败希特勒的战争的，一个暴君也是不可能领导贫农搞农业集体化的。

其次，这一进攻表现为三“和”理论：即所谓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据赫鲁晓夫看来，世界现在已经改变，核武器的存在意味着任何事情的发生都必须排除暴力，其中特别包括人民的革命。列宁关于不同社会制度和平共处的原则，本来是作为受资本主义世界包围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一种正确的策略而提出的，但现在却被解释为外交政策中的战略关键。

苏联现在不但不援助或鼓励世界革命运动，相反却要求世界革命人民在它和美国进行和平竞赛的时候，坐在一旁静心等待。通过这种竞赛，苏联制度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明显的优越性，就会奇迹般地保证其他国家的人民到了某一天都能获得自由。这种已经破产的政策意味着放弃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放弃争取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的斗争，意味着全世界的共产党都要变成修正主义的党，以前是世界革命大后方的苏联将变成世界帝国主义最大的勾结者和全球性的竞争者。

但是，赫鲁晓夫自夸为“对马列主义的最伟大的创造性的发展”是他的“全民国家”和“全民党”的理论。赫鲁晓夫声称，无产阶级专政在苏联已经不再需要。这同马列主义关于国家问题的结论是完全背道而驰的。只要社会仍然划分为阶级，

国家就仍然是一个阶级将其意志强加于其他阶级的工具，就是进行现实阶级斗争的工具。当然，只要还存在着剥削阶级，他们就会竭力利用关于“君权神授”或是议会民主这一套骗人的鬼话来掩盖这一事实。因为工人阶级代表了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因此，只有工人阶级才能开诚布公，宣称自己的统治是无产阶级专政。其实，“全民国家”的理论既掩盖也暴露了资产阶级的这个阶层也就是一小撮走资派已经从工人阶级手里篡夺了政权的事实。

这种思想上的进攻一经发动，赫鲁晓夫也就能够对社会主义结构本身发起进攻。赫鲁晓夫作为一个农业“专家”，他的第一个成就便是对集体农业的全面破坏。他把进攻的重点放在这个方面是并不奇怪的——因为，正如列宁所一再指出的，工农联盟实际上是苏联无产阶级统治的根本基础。同时，由于集体农业是社会主义所有制中一种比较低级的形式（同国有财产比较），它也成了最薄弱的方面。

赫鲁晓夫于是着手破坏在农业中占统治地位的集体农庄制度。这些集体农庄是一种比国营农场低级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集体农庄所包括的是大批以合作形式占有和耕种土地并把自己的产品出售给国家的农民。国家的目标始终是要把这些集体农庄日益吸引过来，在条件许可的地方将它们改变为国营农场。国家用以实现这个目的的主要工具，是向集体农庄提供现代化农业机械和农艺技术指导以及政治指导的国营机器拖拉机站网。斯大林在他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特别驳斥了沃兹涅先斯基的一些追随者所提出的解散这些拖拉机站的企图。

但是，赫鲁晓夫在一九五七年决定废除这一重要机构。他

命令将拖拉机站的所有财产统统以最低廉的价格卖给集体农庄。这一措施当然是有利于较富的集体农庄，但却有损于较穷的集体农庄，同时也破坏了在技术上提供长期和平衡发展的基础。这一措施也切断了中央计划部门对于集体农庄的控制，因而也就加强了经济上资本主义的无政府状态的成分，同时，也加强了每个集体农庄中资产阶级专家和管理人员的势力。

赫鲁晓夫否认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之间存在着差别。一九五八年前，为数不多的国营农场代表着经济上、政治上最先进的单位。但在拖拉机站解散以后，赫鲁晓夫决定，那些无力为自己购置机器的最薄弱、最落后的集体农庄必须变成国营农场。这些国营农场实际上被置于一种类似领取福利补助者的地位。由于无法“独立生存”，它们只得处于依靠国家救济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它们只能慢慢地但却肯定无疑地破落下去。

与此同时，赫鲁晓夫鼓励富裕集体农庄的发展，并在这些农庄里采取措施，加强集体农庄主席和其他官员的地位。结果是正像赫鲁晓夫所计划的那样，人们离开国营农场，流入城市。这样，国营农场制度便遭到破坏，而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却在较强的、较为发展的集体农庄大肆泛滥。赫鲁晓夫的政策，实际上只不过是沙皇的大臣斯托雷平早在一九〇八年以及叛徒布哈林在二十年代末所提出的“赌注押在强者身上”这一主张的一种新的变种罢了。斯托雷平和布哈林是依靠少数富农、牺牲贫农群众利益来发展农业的，而赫鲁晓夫则企图依靠少数富裕集体农庄。

而且，好像这还嫌不足似的，在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九年间，又大大放松了对于自留地、自留牲畜数量和集体大田产品交售额的限制，使农村资本主义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据苏联

的辩护士波默罗伊统计，到一九六六年时，仅占全部耕地百分之三的私人土地就生产了马铃薯产量的百分之六十，肉类和蔬菜产量的百分之四十，牛奶产量的百分之三十九，蛋类产量的百分之六十八。

赫鲁晓夫在削弱了社会主义农业之后，又向中央计划工作开刀。他一下子就关闭了所有的中央计划部门，将其职权交给一百多个分散的但同样是官僚主义的、叫作地区国民经济委员会的部门。这当然是在反对官僚主义和加强地方管理的幌子下做的，但结果却是地方本位利益取代了周密、协调的中央计划工作，专业技术取代了政治方向。这就为“拯救”整个经济，使其免于混乱而重新采用利润这个伟大的“调节器”打开了大门。

但是，如果赫鲁晓夫及其一伙没有设法夺取并摧毁共产党，所有这些进攻也就不可能得以顺利完成。他们清洗忠诚的无产阶级领袖只不过是大规模清洗各级正直共产党员的一个前奏。一九五二年第十九次党代会上选出的中央委员，到一九六一年第二十二次党代会时，几乎有百分之七十的人已被开除，而在一九五六年当选的中央委员，到一九六六年时，又减少了百分之六十。这反映着在较低的各级，特别是在工厂，发生了更大规模的清洗。例如，在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六五年间，有十万名共产党员被开除党籍，而仅在一九六六年一年之中就有六万二千八百多名共产党员从党内被踢了出去。

与此同时，赫鲁晓夫又进而把党的大门向那些并不是无产阶级先锋队，而是一些口头上的社会主义者和事实上的资本主义复辟的社会基础的人敞开。斯大林从党内清洗了那些资本主义分子，吸收了一些无产阶级的忠诚代表，而赫鲁晓夫的政策

却是完全与此相反。

在斯大林逝世后不久，赫鲁晓夫便取消了党自战后以来一直遵循的限制发展新党员的方针。在一九五三年到一九六五年之间，党员人数增加了百分之七十，这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最大的增长。虽然这一大规模的发展运动从数量上说来主要发展对象是工人和农民，但其含义却具有深刻的反动性。

在列宁和斯大林领导之下，只有最先进的工人，那些在阶级斗争中表现出色，并在实践中表现出对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有所了解的人才能成为党员。由于党对技术工作和管理工作实行监督，很大一部分党的战斗分子（许多人以前是工人）在党和政府的机构中担负一定的职务。斯大林也常常谈到党在这方面的人力消耗。

然而，赫鲁晓夫却开始彻底破坏在列宁和斯大林领导下发展起来的政治权力和技术权力分离的制度。在行政人员和党的领导人当中，技术专长代替了政治方向，技术专长成了入党的主要标准。正如一位密切注意党的发展方式的人所指出的，出现了“一种明显的注重受过专业训练的专家而排斥执行路线的干部和职员倾向”。

不仅是发展新党员的人数，而且党的许多文件都充分证明了这种倾向。在赫鲁晓夫篡政期间，发动了一场部署周密的运动，起用新型的“专家”以代替党的领导人物。有些地方明文规定，“只有持有技术员或工程师证书的人才能当选为党支部书记。”《真理报》还以赞许的口吻指出，其他一些地方，“越来越多的工程师和设计师当了党委书记。”一九五六年时，全体“白领”新党员中仅有百分之三十八点九的人是技术专家、科学家、工程师、教育工作者或医生，但到一九六七年时，却

有百分之五十八点五的新党员属于这一类的人如果注意一下另一个估计数字——每三个工程技术人员中便有一个党员，而每十七或十八个工人中才有一个党员，那么上述的统计就更具有重要性了。

这就是说，赫鲁晓夫已经决定，党必须成为讲求实际的专家的党。因此，他把所有斯大林式的“官僚主义者”、“煽动者”和鼓动家统统踢出党外。过去，党一直是从外部监督技术工作和管理工作的，而现在却是要求党本身担负起这些工作，要求党抛弃政治，发展专业。为了实现这一点，地方一级又在“工业”和“农业”的职责之间进行了人为的分工干部身上给压上了过多的行政和技术的琐碎事务。党从根本上处于瘫痪状态，并被割断了同群众的联系。党变成了由技术人员、经理和官僚所领导并为这些人服务的党，这些人组成了一个特权阶层，成为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得力代表。

但是，所有这一切当然是在反对官僚主义的名义下完成的。工农新党员人数的增加在这里起了重要的作用，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以“进一步发展同群众的联系”这个幌子来掩盖政治路线的改变。但事实上，在吸收这些工人入党时，根本没有考虑他们的政治立场和思想上的进步，这样就使党在其政治历史的重要转折关头充斥了思想上并没有准备的党员。结果是，反对派的核心被瓦解了，使其思想混乱，斗志涣散，党由一个无产阶级的战斗先锋队转变成为一个资产阶级的组织者，它所依靠的不是争取人们获得先进的政治觉悟，而是依靠高压和同化相结合的办法。

同时，在这些新发展的工人党员中，许多人是因为技术方面的成绩被吸收的。这些人几乎立即被提拔到管理职位上去

（党员身份现在已成了担任这些职位的一项条件），或是被送到技术学院深造。此外，这些作为“工人”被发展入党的人中，很大一部分其实是工头。

在集体农庄，一种戏剧性的变化也很明显。“直接参加生产”的党员的百分比从一九五六年的百分之六十六点七增加到一九六五年的百分之八十二点七，虽然这些数字由于不能表明管理人员和真正生产人员之间的比例而稍有歪曲。推行这种政策和其他方面情况一样，绝非无产阶级性质，尽管表面看来正好相反。新的发展方式表明，党已经有意识地放弃了它在农村的无产阶级政治领导者的作用。相反，赋予这些新党员的任务是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集体农庄主席*和资产阶级专家（这些人那时候正从解散的拖拉机站涌入农庄）的领导之下组织生产。

赫鲁晓夫在剥夺了工人阶级的先锋作用以后，便着手在工人之中推行工联主义。马列主义的一条最根本的原则就是，无产阶级如果没有一个政治组织，没有一个自己的党，便不能把自己从被剥削和被压迫的地位中解放出来。工会主要是从事经济斗争的防卫性质的组织，它不能领导工人阶级进行为争取自身彻底解放的斗争，因为工会并不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根本的权力分配提出挑战：它为增加工资而斗争，而不是为消灭雇佣劳动而斗争；为改善工作条件而斗争，而不是为彻底改变生产关系而斗争；为增加工人阶级政治上的发言权而斗争，而不是

* 在一九五三年，百分之八十的集体农庄主席是共产党员。一九五六年，增加到百分之九十一，一九五九年增加到百分之九十四。到一九六五年时，集体农庄主席基本上都是共产党员。

为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列宁在《怎么办？》一书中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自发的工联主义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代表无产阶级全面利益的党必须既在管理经济的工作中，又在提高群众政治觉悟的工作中继续发挥领导作用，其原因就在于此。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工会还继续存在，其任务不仅是捍卫工人的利益，使其免受官僚主义的损害，而且也如列宁所说，它“是学习管理的学校，是学习主持经济的学校，是共产主义的学校”，从而把大批的工人团结在党的领导之下。当苏联还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时候，工会的主要工作是在提高生产方面。今天，中国人已经认识到，工会也能成为有效的马列主义学校，工会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主要任务应该是对工人阶级进行政治上的教育。

生产是重要的，但是正如中国人所说的那样，只有根据“抓革命，促生产”这一口号，采取社会主义的方式，才能完成生产。在社会主义时期的苏联，企业和工会之间签订集体合同的谈判不是进行讨价还价，而是一种教育工人明确计划指标并动员他们完成这些指标的方式。其间也并不是没有阶级斗争，但其形式跟典型的资本主义劳资关系有很大的不同。

赫鲁晓夫上台以后，便要求工会将其注意力集中在更加传统的保护性的职能上：提倡改善工作条件、居住条件等等。在改组党组织并按照地方性路线改变国民经济结构的同时，一九六一年的第二十二次党代会宣布，“工会在决定所有有关劳动人民的生活利益的问题方面，权力和职能已经大大地扩大。”一九六七年纪念十月革命的一些论文中宣称，“工会的进一步巩固，和它在苏维埃社会生活中所起的作用的提高，成为发展

共产主义建设的一个重要条件。”

这实际上意味着，工人阶级在政治方面的活动领域和范围已经大大缩小。在工会得到“加强”以后所出现的对工作条件的普遍不满，表明工人已经越来越感觉到，他们基本上已经失去了对于生产资料和对于国家的控制——这些不满也表明他们同党之间已经完全疏远了。鉴于工人为反对日益恶化的状况而进行的自发的斗争，修正主义分子们便竭力将这一斗争引入并限制在狭隘的经济范围内。今天，工会的作用就是把工人的注意力集中在“生产的基本问题”上，从而努力发展“组织生产和劳动的先进方法。”这也就是说，工会一方面使工人脱离政治斗争，一方面又为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对工人进行训练。

第三章 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

统治下的苏联经济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全面复辟

一、赫鲁晓夫的下台

赫鲁晓夫是破坏社会主义的能手，但他的随心所欲用皮鞋敲桌子的作风，对于建立一个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却还有点用不上劲。

以他的计划改革为例，这种计划改革使地区国民经济委员会掌握了指导经济的很大权力。一般来说，这些委员会都把“它们自己地区”、自己企业的利益放在国家经济需要之上。它们囤积原料和本地区生产的工业品。

一九六三年六月六日《真理报》登载了两个足以说明这种情况的突出事例。文章报道说，乌兹别克化工机械厂没有完成国家计划规定的对一百六十二个单位的定货任务。这是什么原因呢？原因是这个厂在忙于生产该地区国民经济委员会所交下的非计划定货。同样，下塔吉尔冶金联合企业在一九六二年向该共和国主管供应机关提供了三万三千吨超计划生产的各种金属，却完全不考虑计划内的其他定货任务。很明显，这类事情造成了生产的混乱，并使得某些地区和某些工业部门的生产几乎都被搞垮了。

很明显，这是资产阶级“我字当头”的原则占了上风，也

是资本主义势力“大肆泛滥”的一个反映，然而，赫鲁晓夫的“改革”走得还不够远呢！尽管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和集中统一计划都已被抛弃得一干二净，但作为通过交换获得利润而生产的资本主义原则，还没有在改头换面后的苏联经济中得到巩固。

随着资本主义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地区国民经济委员会总是先下手为强，力图确保它们自己的市场，而且还要渗入和垄断其他地区的市场。在这种情况下，将会因商品充斥市场而引起经济危机。

赫鲁晓夫的农业政策，也由于前后矛盾百出而困难重重。众所周知，在一九五三到一九五九年间，他在农业方面复辟资本主义有了非常明显的开端。但在七年计划（从一九五九年开始，由于勃列日涅夫-柯西金发动的宫廷政变而宣告中断）实施后的一年左右，赫鲁晓夫完全改变了自己的政策。由于粮食严重缺乏，赫鲁晓夫削减分配给私人的土地数量，并对农民施加压力，要他们把牲畜卖给集体农庄。他还大大削减了农业投资，而农民上缴的农产品定额却大大增加了。

既然赫鲁晓夫早期的农业政策已叛变了社会主义原则，沉重地打击了工农联盟，那末，他的新的“紧缩裤带”的做法，必然会遭到集体农庄方面的抵抗，也就不足为奇了。生产（特别是肉类和乳类产品）严重下降。一系列旨在缓和农业危机的“迅速致富”方法（如将在下文谈到的开垦中亚处女地以及用美国玉米来代替传统的粮食作物），只有使情况更为恶化。

到一九六三年，由于农业危机非常严重，赫鲁晓夫被迫从美国和加拿大买进了大量粮食。勃列日涅夫（在执行开垦处女地计划初期，他是赫鲁晓夫的得力助手）在一年后踢开他的老

板赫鲁晓夫时，就谴责赫鲁晓夫的农业政策是“轻率的”。向资本主义市场求助粮食这件事，成了勃列日涅夫攻击赫鲁晓夫的无能和把苏联经济搞得一团糟的重要方面。

在以后近十年的时间内，勃列日涅夫发现自己也几乎处于同样的困境之中，在一九七二年他不得不购入当年美国粮食产量的四分之一。但他和赫鲁晓夫不同，他能通过精明的买卖把苏联农业方面的失败转变为商业方面的赢利。“一九七二年的粮食大抢购”使世界粮价直线上升。第二年，苏联的收成转好时，又立即利用了这一时机，马上以新的猛涨了的价格大量抛售粮食。这就使许多人大开眼界，看清了他们正在和哪种人打交道。正如美国农业部的商品出口专家乔治·S·香克林对《纽约时报》所说的那样，“我十分钦佩他们这些高明的资本家”。

在国际关系方面也是如此。苏联向第三世界输出资本虽然是由赫鲁晓夫首创的，但新兴的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者，对早先和印度以及其他国家交易所获得的经济和政治控制的程度并不满意（更不要谈赢利率了）。而赫鲁晓夫那种先挑起和美帝国主义的面对面冲突，后来又退缩的做法（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的那种做法作了最富有戏剧性的表演），使党内其他头头和苏联高级军官们大为惊慌。

总之，就苏联社会中的资产阶级势力来说，他们认为赫鲁晓夫在复辟资本主义方面走得还不够远，但对苏联工人阶级来说，却已经是够远的了！

尽管赫鲁晓夫一直答应增加消费品的生产并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一再谈论“土豆加牛肉的共产主义”，但生活水平实际上却是下降了。尽管他一直篡改马列主义，但绝大多数苏联工人仍然记得共产主义应该意味着什么：并非单纯是丰富物

质生活，而是要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工人和农民之间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差别；并不是一个“全民的国家”，而是要使国家逐渐消亡。工人们知道“土豆加牛肉”是什么滋味，也知道就连这种“土豆加牛肉”，他们也不会得到多少。

当然，赫鲁晓夫从来也没有打算要让工人们多吃几顿“土豆加牛肉”。在他的七年计划中，消费品工业的增长率，实际上要比一九五二到一九五八年的水平低。随着国家统一计划的瓦解，在实践中导致了一场灾祸。

地区国民经济委员会疯狂地追求私利。为了满足地区性的需要，它们既是拼命囤积，又对生产资料生产部门进行大量投资，以保证地区性的自给自足。这样，使生产资料生产部门的增长率超过消费品生产部门的增长率达百分之二十二，而不是七年计划中所规定的百分之十四。

于是，全国工资基金总额迅速地、无计划地增加。这不仅是由于出现了许多新的职业，还由于生产资料生产部门的工资要比消费品生产部门的工资高得多。新的购买力产生了，但是没有东西可买。由于投资的转移，消费品的实际产量比原来的计划数还低。物资缺乏，通货膨胀成为常事。凡是按计划价格出售东西的地方，就必然有购买者的长蛇队形；非法的“黑市”，也就随之而繁荣起来。

统计资料表明，一九五九到一九六五年，苏联的面粉、棉布、鞋类等十五种主要消费品的零售价格上涨了百分之四十二。而一九五九到一九六四年的职工工资只提高了百分之十八点九。新兴的苏联资产阶级采用了一切手段，来迫使工人们为社会主义遭到破坏而造成的恶果付出代价。

情况非常糟糕，许多工业城市都发生了暴乱。其中一次记录得最详细的是一九六二年六月在诺沃切尔卡斯克所发生的暴乱。这是一个生产机床、机车和采矿设备的工业中心。当工厂强制实行提高劳动强度并降低百分之十的计件单价后，没有几天，肉类和乳制品就宣布涨价。这就引起了一场大罢工。像一九七一年波兰工人的抗议那样，成千上万的工人、家庭主妇和学生聚集在当地党委会前面，要求得到一个解释，但他们却遭到了枪击，一些儿童被杀害。义愤填膺的群众捣毁了市委会和其他几座公共建筑物。暴乱持续了好几天，当局不得不从外地召来军队以恢复秩序。同年，类似的情况在哈萨克的捷米尔塔乌和西伯利亚工业区的克麦罗沃也有发生。

赫鲁晓夫复辟资本主义的企图已处于各种内部矛盾之中，并遭到苏联无产阶级的日益增强的反抗。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又遭到中国共产党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揭露和批判。很明显，事情再也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了。果然，在一九六四年十月，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两个董事长类型的人物）把赫鲁晓夫一斧头砍掉了。

二、“回到列宁主义的立场”

这种换马，被那些几个月前还在称赞赫鲁晓夫“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的御用文人们欢呼为回到了列宁主义原则的大事。官方正式宣布，主观主义、唯意志论和冒险主义的时期已经过去，无产阶级统治已重新行使职权。一九六五年秋季撤销了地区国民经济委员会后，又重新建立起集中的国家经济计划和管理制度。而赫鲁晓夫那种人为的、极不得人心的把党分成工业党和农业党的做法几乎马上被废除了。

当然，回复到原来的政策的实际原因，并不是考虑到马列主义原则和建设社会主义的需要。要避免全面混乱，就必须集中管理经济。何况，集中管理经济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或资产阶级专政也并非绝对不能共存，正如纳粹经济以及西欧各国的战后经验所表明的那样。

同样地，把工业党和农业党合并起来也并不是为了要使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柯西金和勃列日涅夫之所以力图恢复列宁所提倡的“新型的党”，其用意是以此作为一块遮羞布，来掩盖它作为一个新型垄断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和组织者的实质。

在大肆宣传“回到列宁主义的立场”以欺骗苏联劳动群众的同时，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向他们的真正的社会基础（集体农庄的主席、工厂的厂长、技术专家以及腐败的党的官员们）保证资本主义复辟将继续进行。不过，这次将要在“专业”和有系统的基础上来进行。

在这里，“列宁主义”不过是作为一种烟幕罢了。一九五六年以来，修正主义经济学家们从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中到处去剽窃语句。这些语句经过他们斩头去尾后，似乎就成了他们把资本主义经济关系重新引入苏联经济的根据。他们从列宁在一九二一年关于新经济政策的一些著作中似乎找到了什么了不起的发现。

在这些著作中，列宁谈到了利用贸易和商品关系的必要性，谈到加强工厂中经理和专家们的权威，谈到用物质刺激来促进生产，最后然而也是重要的，甚至还谈到可以允许外国资本家在苏联开发资源中进行投资。他说，国家必须把国有化的工业企业办成独立自主的赢利单位（“赢利”这个名词来自一九二三年四月十日的《托拉斯法令》）。我们将会看到，所有

这些新经济政策的特点都是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经济改革”的关键所在。

修正主义者通过精心挑选和删剪这些引语，企图把列宁在新经济政策时期推行的各项政策当作是列宁关于如何组织社会主义经济的最后决定来加以兜售。例如，在一九六七年《苏共中央纪念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五十周年论文集》中，就有不少是专门谈论有关新经济政策的，说什么“构成新经济政策基础的一些基本原则都是具有国际意义的，并且正在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加以运用。”

列宁并没有为新经济政策提出过这种要求。在几个世纪以来的落后状态和由于内战破坏而在俄国造成的史无前例的困难面前，列宁把新经济政策看成是无产阶级专政被迫作出的一种暂时的后退。列宁在这一时期的著作中非常坦率地写道，新经济政策是“退而采用了国家资本主义的活动手段、方式和方法”。

看上去似乎是自相矛盾的，但只有后退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工人国家的监督下，由国家继续控制信贷和贸易，从而体现工人阶级的政治权力），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得到存在和巩固。在城市里，大规模的工业生产遭到破坏，迫使无产阶级不得不依靠小资产阶级投机活动而活下来。用列宁的话来说，这是无产阶级在丧失阶级性并处于失去其发挥政治权力的危险之中。

作为无产阶级事业的物质基础的工业生产必须恢复，即使这意味着得由资产阶级分子来管理工厂。在农村中，由于国家强制性征粮使工农联盟关系紧张到濒于破裂。列宁清楚地看到：“如果不在工业和农业之间实行系统的商品交换或产品交

换，无产阶级和农民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就不可能建立正确的关系，就不可能建立十分巩固的经济联盟。”

同时，他还清楚地指出，“商品交换和贸易自由意味着资本家和资本主义关系必然出现。”

苏联经济学家 B·莫洛佐夫在他的《农村中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一文中声称：“从列宁专门论述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经济问题的著作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发展社会主义的社会关系的过程中，最具决定性的因素是利用贸易、货币和商品经济的其他工具。列宁在理论上的阐述在新经济政策中得到了实际的体现。”类似这种说法是对列宁所提出的理论和实践要求的最卑劣的歪曲，这一点应该是非常清楚的。

新经济政策对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效果问题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但它却和社会主义的根本前提（工人阶级的政治领导）有着极大的关系。如果说新经济政策有什么“国际意义”的话，那末，它就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政治统帅经济的一个典范。

三、农业方面的资本主义复辟， 一个新的富农阶级的形成

勃列日涅夫、柯西金及其同伙的“回到列宁主义的立场”，是要抽掉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的精髓。但不能责备他们没有向列宁学习。列宁抓住了农村作为俄国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决定性的一环，而勃列日涅夫、柯西金像那些苏共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老祖宗们（托洛茨基、布哈林以及后来的沃兹涅先斯基和赫鲁晓夫）一样，也把注意力转向农村经济问题。

勃列日涅夫一上台，就重新恢复鼓励农业中私人部分的增长。所有赫鲁晓夫对自留地和私有牲畜所作的一些限制又重新取消了。和那些措施相适应的是，在一九六五年还取消了对自由市场制定的最高限价（原是为防止农民在自由市场上高价出售自留地上的产品以获取暴利）。这就使得那些实际依靠自由市场而获得全部新鲜农产品和乳品的城市消费者大为沮丧。

这样即使这些市场上的价格飞涨，也使市场的销售量和商品种类大为增加。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被授权可以在自由市场上任意处理它们比重日益增加的“计划外”的产品，甚至还被允许在自由市场上出售“剩余”的种籽、饲料和设备。

在当前的苏联农业中，巨大的私人经济继续存在，并且起着主要的作用。根据苏联官方数字，在一九七二年，土豆（它是苏联的主要农作物）的百分之六十二产自自留地并由私人在市场上出售。尽管苏联人因按人口平均的蛋类消费量超过美国而沾沾自喜，但半数的蛋类生产是由私人经营的。肉类的三分之一和乳品的百分之四十四都是由私人生产的。从一九六五年一月到一九六七年一月，私人拥有猪的头数增加了百分之十三点七，奶牛增加了百分之五点六，绵羊和山羊增加了百分之四点二。同这种鼓励私人生产和贸易的做法相一致的是，实行“包工小组”制（这是得到苏联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越来越欣赏的一种试验性的生产体制）使社会化生产遭到破坏。现在的“小组”是赫鲁晓夫在四十年代后期所推行的那种以小组作为集体农庄劳动的基本单位的一种更为高级的形式。

在这种制度下，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土地被划分成许多小块，分别由五、六个农民组成的“小组”（他们一般都是亲戚或邻居）无限期地使用。农庄和农场对“小组”提供种籽和

设备并给予指示应种什么，“小组”成员还照样领取月薪。“小组”可以随心所欲地决定何时工作以及怎样工作。然后“小组”把它的产品出售给集体农庄或国营农场以换取现金。据估计，“小组”成员的收入，比一般农业工人多一倍。而且“小组”成员既然有权决定如何分配他们出售农作物所得的收入，那末，在那些各行其事的“小组”中也会出现不平等的情况。

“小组”的这种做法，虽然迄今还没有在整个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系统中全面推广，但得来不易的、相对来说还比较脆弱的苏联农村中的社会主义关系，却遭到了一系列沉重的打击。很明显，它在占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成员绝大部分的非熟练工人和半熟练工人之间，造成了不平等和不团结的现象。这只能是加强农业中真正的资产阶级分子（农场经理们）的统治。

它也表现为，成熟的商品关系已渗入到据说是已社会主义化或集体化了的农业生产的中心。讲到这里，我们应该回忆一下，斯大林早就看到，由于集体农业和国营企业之间进行商品交换，价值规律还会在苏联继续存在。但“小组”制的出现却使集体化了的农业内部扩大了商品交换！这个问题性质不同，也就更为严重了。

虽然列宁曾经指出过，土地的私有对资本主义来说并不是必要的，而资本主义也可以在土地国有化的基础上存在，但“包工小组”无限期地占用国有化的土地，可以说是在土地方面恢复私有财产的一个步骤。可是，一些苏联评论家竟然亲自出场建议“小组”有权永远占有所耕种的土地。有一个热心人给《文学报》写文章，说什么失去了个人对土地的所有权会使农民丧失对土地的爱，这正道出了苏联农业的要害所在！

“个人负责”和劳动生产率这一类题材，在 H·列勃林和

A·斯特列诺夫合写的一篇重要文章中得到了进一步的阐述。它刊登在一本叫《新世界》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杂志之上。文章的作者指责说，在有上千公顷和成百工人的农场中，人及其劳动之间的热情的个人关系已被计划和国家定额所替代，因而造成漠不关心和劳动生产率低下的情况。当然，作者们所议论的热情的个人关系，实际上就是马克思所说的金钱关系。尽管这篇文章用了抽象推理的语言，实际上它已触及到“小组”制的要害——“小组”制是农村中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

农业集体化是苏维埃人的迫切任务，这倒并不是因为它是从农民那里榨取更多的东西来为工业化提供资金的方法（这是受到许多资产阶级学者附和的托洛茨基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理论）。它之所以最重要，既不在于它比小规模耕种制度效率更高（虽然它的确是那样），甚至也不在于它是一个把陷于破产的贫农从富农手里解放出来的方法。”最重要的还在于，集体化是向消灭城乡矛盾、消灭阶级这个共产主义目标迈出的第一步。

在集体的队伍里，参加根据科学方法组织的、机械化的农业劳动，使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的农民们首次尝到了社会化劳动的滋味。集体化既涉及到土地所有权问题，同样也涉及到劳动过程问题，从而为农民的逐步“集体化”思想意识铺平道路——用无产阶级合作、团结的品质来代替小生产者的个人主义和自私性。“小组”制冲击了农村中的社会化劳动，这是倒退了一大步。

即使不说这会损害农民在思想意识上的无产阶级化，它也会进一步从经济上使农民变成一个被新富农阶级剥削的、农村雇佣劳动者阶级。如果说“小组”制是一种个体化了的基本生

产单位，它还不是一个政治和经济的管理部门，而政治和经济的控制仍旧掌握在农场经理的手中。

“小组”制必须从下列的角度来加以检验，即勃列日涅夫经济政策的要点并不是去鼓励无足轻重的私人生产者（虽然，对资本主义势力解除束缚后，小规模生产确实迅速地扩大了），而是把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转变为自立的、以利润为目标的农业公司，它们和国家的联系不是通过计划或义务交售，而更多地是依靠银行信贷关系（若是国营农场的话，则由银行信贷代替预算拨款），据说这两种单位都要在内部成本核算*的基础

*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成本核算”是指企业按计划采取最有效的措施以收入来抵偿支出的做法。然而，今天它是和“经济核算”同时被用来表明企业力图削减成本以最大限度增加利润的做法。苏联经济学家指的努力“加强成本核算”，就是指更进一步最大限度地扩大利润。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成本核算”的仍然存在，反映了商品生产规律虽然受到限制，但仍在起作用这样一个事实。在修正主义统治下，加强成本核算不仅意味着强调有效地利用资金，而是说明了把价值规律恢复到起调节作用的地位（这一点在以后再作详述）。

还可以作另一个令人信服的比较，即把“小组”看作是瑞典沃尔沃汽车公司最近所作的试验。他们由小组工人“个人负责”装配整部汽车来代替自动生产线。这种做法的真正目的并不是要使工人感到好受一点，或使它们能真正掌握汽车生产的技术，而是要使它们为资本家加倍地卖命工作。所谓“使工作内容丰富”，仅仅是使资本更加丰富的另一个手段而已。

同样，“小组”尽管具有私有制和小生产的一切性质，它主要是使农业劳动者加强强度、加快工作速度的极为有效的办法。“小组”成员负责耕作的土地面积比一般农庄庄员所耕作的约多三倍。由于在赫鲁晓夫时期，农庄中的青年蜂涌外流，“小组”制在对农村资本家来说是更加有用了。

这些农村资本家究竟是谁呢？主要不是那些拥有最大自留地或最多奶牛的人，更不是那些“小组”成员，而是那些集体和国营农业机构的主席、经理和技术专家们。他们中间许多人甚至不是农民出身。苏联修正主义者从农业领导岗位上撤换了许多富有经验的农民干部，而代之以一群脑子里充满了资本主义思想的“专家”。

上进行经营活动。这种由农场付钱买进“小组”的农作物的做法同那种“卢布监督”的做法完全一致。这可以和西方的所谓“转让价格”相媲美，那就是在西方垄断工业中，一个大型企业的各个工厂或者是同一公司的不同部门之间，有时也可以相互索取费用。

在斯大林时期，农业专家由国家雇用并被安排在机器拖拉机站。这种安排，确因专家不能就地发挥作用而使效率难以提高。然而这种做法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把这些资产阶级专家置于无产阶级的监督之下，把他们分散隔离在机器拖拉机站中，使他们不能在较为富裕的农民中形成一个资产阶级的政治基础。但赫鲁晓夫取消机器拖拉机站后，这些资产阶级专家就直接进入了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的行政管理机构。甚至在很多情况下，他们还占据了党的负责岗位。

一九六五年三月二十四日，勃列日涅夫在他向党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所作的《进一步发展苏联农业的紧急措施》的报告中说得很清楚，在农村中，党打算以谁为基础，采用这些紧急措施对谁有利：“党把这些专家看作是在发展农业中的合格、可靠的支柱。我们对由共产党培养起来的自己的专家寄予信任。农业专家有了企业领导、党和苏维埃组织领导的支持，就能发展他们的潜在创造力并保证农畜生产的持续增长。”

在赫鲁晓夫统治下，大多数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都获得了极大程度的独立性。但这一情况同时也不断受到任意增加国家收购指标的干扰。现在勃列日涅夫答应在农业方面不会再有大规模的运动，党也“不会再发布专横的命令和官僚主义的指示，也不会把集体农庄、国营农场的领导和专家置于细微末节的监护下从而削弱他们的职责。”

作为补救，还发布了一项《有关进一步发挥苏联农业部对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生产领导的作用》的法令。这个法令规定了国家和集体农庄、国营农场之间的关系。它决定农场经理作为国家资产阶级的代理人，按照以利润为动力的原则来经营农场。根据这些原则，农场也进一步专业化了。交售产品的指标是早就制订好的，国家不能任意改变。农场和中央国营采购机关的关系也建筑在商品交换的基础上（国家的一切分配和征购现在都由合同来决定）。

为了鼓励农场经理在以赢利为目的的基础上发展农业，农场官员的报酬在一九六六年改为按照资本主义方式计算。这些官员可以得到额外的份额，在许多方面很像一九六五年经济“改革”（参见第七节）对待工厂经理的情况那样。

过去，集体农庄官员的工资是以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为基础的。开始是根据农庄播种面积的大小和牲畜的多少，后来以总产值为基础。现在是按照农庄的生产财务计划所规定的货币收入总额水平为基础来决定的。那些经理们在基本工资（视集体的穷富而定）外，还可拿到最高达他们年收入百分之五十的奖金；农庄每获利百分之一，他们还可拿到占他们月薪百分之五的奖金；每超额完成计划百分之一，他们又可拿到年薪的百分之二；国家还另有奖金，用来奖励种植有高利可图的亚麻等经济作物（这种奖金实际上是很大的！）；还有企业自行规定的“节约原材料和劳动支出”的奖金。

对许多经理来说，特别是对那些庞大而且富有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经理来说，这种报酬制度还不过瘾。一九六九年斯摩棱斯克州基洛夫集体农庄主席的一篇刊登在有学术地位和影响的《经济问题》杂志上的文章中提出：经理的工资不应

以总收入为基础，而应以农业生产投资的回收率为基础。

不管分配的基础是什么，新富农们搜刮到的总是精华。社会学家 K·A 夏别柯夫在他写的名为《集体农庄的法定报酬》（请注意题中的“法定”一词）一书中说，在哈萨克，经过调查的二十七个集体农庄中，有十一个农庄主席领取的工资要比庄员高十五倍甚至十九倍。在一九六五年，阿塞拜疆的“巴库工人”集体农庄主席平均每月工资收入为一千零七十六卢布，总会计收入为七百五十六卢布，而在同一农庄中，一般庄员的辛勤劳动所得平均每月还不到三十八卢布。

这种收入中有些是来自所谓“农村副业”，即许多新富农“在宅边”经营的私人农业。这虽不是资本主义在苏联农业中采用的主要形式，但它确实为富农势力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基地，并反映了放弃无产阶级专政使资本主义生产的自发势力泛滥到何等程度。例如，大部分新富农都从事大规模的畜牧生产，他们雇用农庄庄员来照料私人的畜群或耕种私人的土地。

一九六七年，勃列日涅夫实行了《关于进一步发展农业中副业的法令》。这一法令显然是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给进一步剥削农民大开方便之门，也为把管理人员的高收入有利地转变为私人资本大开方便之门。农场被允许建立制造性的生产企业，特别是农产品加工（如罐头工厂）、建筑材料和消费品的生产企业，只要不影响农业生产就行。

资金来自农场利润的保留部分或国家银行的贷款。这些企业可以自行制订生产计划，不必经上级批准，并且可以和消费合作社、国营零售商业网协商价格，也可以直接售给工业企业或在自由市场上出售。他们是苏联农业企业的先驱，也就是使新富农（作为农业生产者和加工者）和国家财政资本家（起银

行家的作用)融为一体了。

另一个使新富农成为一个固定阶级的重要步骤是在一九六九年采取的。那时成立了集体农庄委员会，它把集体农庄主席和国家农业机构中的官员们集合在一起，委员会变成为农村资产阶级左右国策的“院外”机构。

很明显，苏联农业的总趋势是生产单位对国家的独立自主程度越来越大。不过，我们且慢责备勃列日涅夫先生把农村阵地交给当地的资产阶级分子而放任不管，我们应该先提一下为数不少的一些建议。这些建议提出，苏联国家作为土地的法定所有者，应再一次担负起它在农业方面的责任，即向集体农庄、国营农场征收使用土地的货币地租。根据西方专家亚历克·诺夫报道，现正在考虑建立地籍图，即由官方登记土地数量、质量和所有权等。这足以成为国家向农场征收级差地租的基础。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一种地租形式。它考虑到有些土地比另一些土地更富饶，而相应地把那部分超额剩余价值交给地主（即苏维埃国家）。

总之，关于在农业方面复辟资本主义，凡是赫鲁晓夫剩下来所没有做到的，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全都拣起来做到了。赫鲁晓夫的政策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政策，它一方面大力鼓励小型的私人企业生产，把它搞得乌烟瘴气；另一方面，国家又通过提高交售额来任意干扰。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抛弃了这一做法。他们要巩固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经理及技术人员的集体，把他们作为新的农村资产阶级。通过推行“小组”制，正在有计划地提高劳动强度，以便最后破坏社会化的生产关系。

同时，国家资产阶级通过其作为财政资本家的作用，使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实际上成为依附于它的独立公司。最后，集

体农庄委员会的建立，也是为农村资产阶级在中央政府中提供了代理人。此外，共产党（在农村中，现在主要是以新富农及其仆从作为基础）也提供了重要的政治渠道，使农村资产阶级依附于中央国家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权。

四、利别尔曼辩论：利润动力原则的出笼

所有这一切在农村中的资本主义现状，给人们以相当深刻的印象，足以表明苏联在朝着哪一个方向走。即使如此，我们还得记住，经过了几十年的无产阶级统治和社会化生产，苏联已是一个工业国。因此，完全按照资本主义路线来改组和巩固工业生产，对全面复辟资本主义来说就更具有关键性的意义了。

一九六五年，柯西金总理宣布了一项声势浩大的“经济改革”。这项“改革”是根据新经济政策和他的第一位启蒙导师沃兹涅先斯基的建议而制订的。这一改革使牟取利润成为苏联经济的指导力量，并开辟了一个新的时期，即有意识地建立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时期。

这种经济制度虽然仍在演变过程中，但现在确已有相当水平。它不是以满足苏联广大工人群众的需要为出发点的，也决不是由他们所支配的。这是一种以人剥削人的原则为基础的经济制度，是一个由国家垄断资产阶级所组成的新的统治阶级榨取工人群众剩余价值的经济制度。

这些改革的基本纲领，是在六十年代初期苏联经济学家中一场声誉颇著的辩论中提出来的。这一场辩论的发起人是利别尔曼，赞助者正是赫鲁晓夫本人。这场辩论得到如此特别的青睐，应该使我们加以警惕：辩论的意图在于为各种资产阶级经

济思想提供讲坛。它的口号，事实上是毛泽东的著名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号召的颠倒，只消把“花”字代之以“毒草”就行了。

然而这次辩论还有其他方面。赫鲁晓夫的各项经济政策的失败使所辩论的问题超出了学术上的意义，即对苏联的经济必须想个办法，而且越快越好。旧的计划管理制度急待改革。工厂经理拒不采纳技术革新以免给企业造成更高的计划指标。产品的质量远不能令人满意。由中央统一调配的供应制度由于拖拉的文牍主义和工作效率低而陷于停顿。有一家汽车制造厂需要的滚珠轴承必须经过十四个不同的单位加工，要有总加起来重达四百三十磅的文件才能生产。这正是有关供应制度的一件最为杰出的事例！

结果是，企业经理囤积原材料和机械设备，虚报定货并通过“开后门”（这一名称包罗从拉拉扯扯的小动作到公开行贿的各种手法），以保证企业不因原材料供应不足而影响生产。这种种做法当然是绝对不合法的，发现了要受到极为严重的惩罚。

以总产值指标作为衡量一个企业是否完成计划的总尺度，会产生某些十分奇特的副作用。鞑靼国民经济委员会主任Φ·塔别耶夫所写的一篇载于《消息报》的文章就这方面提供了极为典型的报道，说明事态是在向什么方向发展。报道说，在一个儿童服装厂内，主要的计划指标是总产值。为了完成和超额完成计划，工厂在儿童冬季穿的外套上缝上精致的丝绣衣领和皮领，这样就人为地提高了每一件外套的价格。

用实物单位来计量总产量，也不能解决什么问题。苏联的幽默杂志经常刊有大量漫画。在有些漫画中，制钉厂的全年产

量就是一枚重达好几百吨的庞然大钉。

在这些问题中，尽管某些同旧体制有关的问题（尤其是某些供应方面的问题）确实是属于技术性的问题，但其中大多数的问题是政治性的。例如那家童装厂的问题，对那种为了“完成计划”而采用的弄虚作假、铺张浪费的手法，以及促成这些手法的资产阶级思想，本来是可以由工人阶级行使其社会主人翁的权利，展开全面的政治斗争来加以解决的。

但在利别尔曼辩论中，从来没有涉及到这一类问题。辩论几乎完全是从“实用的”和技术的角度来展开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受到了包括赫鲁晓夫本人在内的主要政治领导的有意识的操纵。事实上，在讨论开始后不久，赫鲁晓夫就在一九六二年十一月的苏共中央全会上作了发言，他同意下列主张：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个别企业中，……利润作为衡量企业工作成果的经济指标具有重大的意义。”这样的发言就只能使利别尔曼的对手们把批评局限于实用主义方面的问题了。

这样一来，就是那些原先反对把资本主义的种种标准和种种生产关系全部照搬过来的经济学家，也受到了修正主义的影响。他们为苏联经济问题提供的解决办法就是寻找分配资源、衡量成败的各种万无一失的伎俩，设计种种连最最狡诈的、诡计多端的经理们都无法歪曲、无法胜过的骗人玩意儿。他们为整顿苏联经济所提供的各种解决办法，归结为一点，就是号召技术挂帅。

有些极端主义者鼓吹一种完全不假人手的计划程序。利用大型计算机组来记录每个企业、每户家庭在经济方面的实物需要量，拟订一个全国性的平衡计划，其中包括生产的发展和消费扩大之间的平衡，资源和生产的平衡，然后再分析和估计这

一计划的执行情况。如何利用计算机给经济问题作出最恰当的政治方面的解决办法，这就是，完全排斥了对社会主义时期种种错综复杂的阶级关系的考虑。

当然，并非所有的保守派经济学家，都像那些想入非非的计算机迷做得那么过头。我们已提到过的那位塔别耶夫曾制订了一种新的指标来取代总产值指标，并在鞑靼国民经济委员会中实施过。这种称之为“定额加工价值”的方法，是根据劳动、燃料的消耗额再加上企业一般管理费用中的一小部分支出而计算出各个生产线的标准价值。

根据“定额加工价值”法，在计算时排除了大量的物质消耗因素，最重要的是排除了利润，以避免我们在上面所列举过的各种弊端。塔别耶夫声称，经过使用这一方法后，“服装业者就不再在儿童的大衣上缀上价格昂贵的衣领了”。然而，这是一个极为复杂的数值，实际上工人无法掌握它所依据的原则，也无法监督其实施。并且这种方法比起过去那种控制生产的方法更要变成一项官僚主义的事务，因为这种计算需要由数学家、经理等人员参加，而不是生产工人所能解决的。

像塔别耶夫那样的保守派经济学家，他们主要关心的是使集中统一计划制度（尤其是供应方面的问题）合理化，以及消灭企业中的浪费现象和欺诈手法。但在一九五六年篡夺了政权的走资派及其在学术界的走卒们却另有打算。他们关心的是苏联同西方帝国主义在所谓“和平竞赛”中的力量对比，关心的是加紧对苏联工人阶级的剥削，和使新兴资产阶级借以把无产阶级创造的剩余价值占为己有的国家机器更趋完善。

资产阶级专政复辟时期和赫鲁晓夫经济试验时期，也就是苏联经济倒退的时期。在整个五十年代中期，增长率是高的：

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率为百分之七，而工业产量每年增加百分之十以上。但到了一九五九年，这些百分比就逐步下降，虽然它仍高于西方可比较的统计数字。根据美国经济学家的估计，一九六〇到一九六七年苏联国民生产总值每年仅增长百分之五点五，而工业生产则下降到每年只增百分之七点五。这对苏联企图统治整个世界经济是一个不利的征兆。

生产既下降，支出又急剧上升。这一事实使走资派更为惊慌。在过去，苏联之所以能达到并保持其惊人的增长率，并非通过增加劳动强度（加快工作速度）的途径，而是把产值的巨大百分比用于新的投资。这就意味着更多的机器、更多的工厂和更多的就业。

到了五十年代末期，投资要占苏联总产值的三分之一，但其效果（即其赢利率）却跟不上去。在一九五〇到一九五八年期间，每增加一个卢布的投资额可取得半个卢布的新产值，但在一九五九到一九六六年期间，每一个卢布的投资额只能获得三分之一卢布的产值。

对于资产阶级来说，经济活动的目的就在于从他所投资的每一个便士（或戈比）中获得最大破度的利润。因此，在利别尔曼辩论中，由打上各种各样烙印的更为自觉的走资派所组成的另一阵营，就把极大的注意力集中于“增加投资效果”这一问题上，这在我们看来并不感到奇怪。

有关经济政策各种问题的资产阶级基本观，是在一九六一年的“二十二大”上得到党的签署同意的，这就更壮了他们的胆。当时通过的苏共新纲领宣称：“为了建立共产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必须经常完善经济的领导和计划工作。在计划工作和经济领导的一切环节中，应该把主要的注意力集中在最合理

和最有效地利用物力、人力、财力、天然财富和集中在杜绝浪费和损失方面。为了社会的利益，以最少的费用取得最大的效果，这是经济建设的确定不移的规律。”

诚然，共产主义不可能建筑在浪费和不合理的经济体制上。但是我们只须把赫鲁晓夫一伙就“向共产主义过渡”、浪费等等问题上的观点同列宁在四十年前就同一问题所发表的意见作一比较，就可看出这伙人在资本主义道路上已滑得多远了。列宁在《伟大的创举》中写道：“普通工人起来克服极大的困难，奋不顾身地设法提高劳动生产率，设法保护每一普特粮食、煤、铁及其他产品，这些产品不归劳动者本人及其‘近亲’所有，而归他们的‘远亲’即归全社会所有，归起初联合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然后联合为苏维埃共和国联盟的千百万人所有，——这也就是共产主义的开始。”

这两段话之间的区别不在于风格，不在于新纲领的拟订者用词不当。两者的区别归结到一点，就是他们各自代表了相互对立的阶级的观点：列宁的发言代表了无产阶级的愿望，赫鲁晓夫则是为资产阶级说话。

如果说对苏共纲领为苏联指定的方向还有丝毫怀疑的话，那末，这种怀疑也就为后来在一九六一年苏共纲领中下述的几句话一扫而光了，走资派就是在这个时候泄露天机的。“党认为有头等意义的，是提高基本建设投资的效果，选择最有利的和最经济的基本建设方向，保证基本建设投资中支出的每一个卢布都能使产量得到最大限度的增长，缩短收回这些投资的期限。”就是象戴维·洛克菲勒这样的人，也未见得能把一个资产阶级投资者的要求，归纳得如此简明扼要。

苏联经济究竟该怎样按照资本主义路线重新进行组织，这

在走资派之间也是一个引起激烈争议的题目。他们分为温和派和极端分子，分为改革派和为复辟资本主义具有整套严密理论作为蓝图的强硬派。

以这一场大辩论而闻名的 E·利别尔曼可以算在温和派之列。他在苏联政界、学术界都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事实上，因为他较为默默无闻，某些观察家把他看成是另一些人的马前卒，这些人名声更大，但又小心谨慎，他们不愿出头露面地因提倡资本主义种种措施而使自己处于危险的境地。

这是有道理的，但是我们认为，利别尔曼从哈尔科夫经济学院（它相当于美国的工商管理学院）的阴暗角落里崭露头角是另有原因的。第一个原因是（这和“马前卒”理论并不矛盾），哈尔科夫地处乌克兰境内。很可能是在乌克兰的政治机器中，利别尔曼及其同伙和赫鲁晓夫之间早就有了联系。这就不难说明为什么像《共产党人》这一权威性刊物早在一九五六年和一九五九年就为利别尔曼的资产阶级观点的论文大开方便之门，而赫鲁晓夫本人也就是在这个期间俨然以党政的当然领导者的身份出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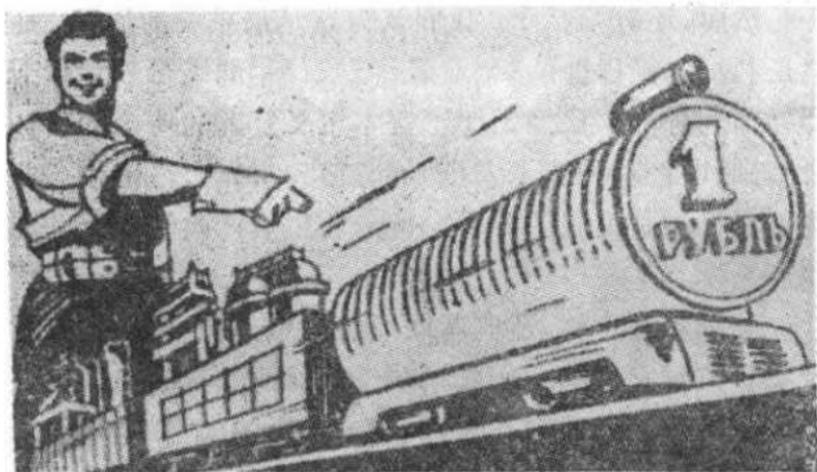
然而，还有第二个、我们认为这是最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利别尔曼以他的“企业经济学家”和训练行政管理干部导师的身份，已经掌握了资本主义复辟的一个主要社会基础（即经理和技术人员）的脉搏。事实上，他的一些改革倡议正是反映了苏联一部分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的愿望和要求。

利别尔曼声称，造成苏联经济困难的根本原因，在于企业单位对它们的工作成果缺乏足够的“兴趣”。这种“兴趣”，当然不是上面引述的列宁在《伟大的创举》的那段话中所生动描绘的那种政治觉悟。利别尔曼所指的“兴趣”，可以用下述

这样一句问话来表达：“这里对我有什么好处呢？”也就是用金钱来衡量一切的资产阶级利己主义。

利别尔曼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就是要国家计划委员会除了对企业下达一些最根本性的有约束力的指示和指标以外，其他全部都加以否定，并把赢利率恢复到它原先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作为衡量经济成败的基本标准的那种传统地位。他还给赢利率下了一个定义，即利润同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投资（即对机器、原材料等的投资，也包括工资在内）之间的比率，这正像马克思给利润率定下的公式 $(S/C+V)^*$ 那样。（利别尔曼和大多数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样，提到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时用的是固定基金和流动基金。）利别尔曼还主张国家应允许企业保留所获利润的一个相当大的百分比，用之于物质奖励、企业管理人员的奖金（红利），以便经理们能占有工人所创造的一部分剩余价值。

* 即：剩余价值 / 不变资本 + 可变资本。——译者



“强有力的火车头”——苏联杂志上的一幅宣传画。画中的火车头是由一枚枚的卢布组成，公开鼓吹金钱是苏联社会的动力。

利别尔曼在一系列鼓吹他的主张的演说和文章中大显身手。苏共中央的《经济报》周刊组织了一个讨论会。他在讨论会上说：“首先，大家必须弄清楚这一点：新体制不是简单地用一个指标来替代另一个指标，即以赢利率代替总产值。”把赢利率作为首要的计划指标，其要害就在于“改革了企业同国民经济之间的关系。”与此相一致的，集中统一计划必须以“凡是对社会有利的也必须对每一个企业有利”这一原则为出发点。换句话说，国家必须着眼于使经理既能获得最大限度的利润，也能享有极大限度的经营管理权和其他特权。企业在牟取最大限度利润的制度下经营业务，就它跟国家的关系来说，必须在计划管理方面具有相对的独立自主权，他们还必须有能力把企业生产的部分剩余产品划为已有。

有人对利别尔曼的主张正确地提出了批评，指出在企业中搞利润挂帅是向资本主义倒退。为了对付这种批评，利别尔曼

竟然对马克思主义作了连赫鲁晓夫也感到脸红的篡改。在一篇刊于《苏联生活》（英文版）题为《我们在和资本主义调情吗？利润，还是“利润”》的文章中，利别尔曼给我们透露了一个小小的秘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利润，其实质和来源是同私人企业的利润仅在表面上近似，而就其性质，就其所证明的实质而言，却同资本主义利润有着根本的区别”。他解释道，“在苏联利润的背后，除了节约工作时数、成吨的原材料以及其他物资、燃料和电力的度数等以外，别无他物，”而“在私人企业制度下的利润，与其说是来自生产，倒不如说是来自商品交换过程”。

这番话要是让卡尔·马克思听到的话，可真是天大的奇闻了，因为马克思反复强调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则是，利润不论以何种形式出现（不论是像利别尔曼所声称“现在”实际上是社会主义独有的工业利润也好，商业利润也好，利息和地租也好），它有一个来源，也只有一个来源：即在生产过程中榨取的剩余劳动。这番话也会给列宁打开眼界，因为列宁和马克思同样地强调：“剩余价值不可能来自商品流通，因为商品流通只说明等价交换。”

然而，要是我们听信利别尔曼的话，因为在苏联“既没有生产资料私有（即指个人，原编者注）制，又没有股本，当然也没有股票市场”，那末，在生产中也就不可能会有资本主义剥削。生产中的利润挂帅经过这一番拙劣的手法竟变成了社会主义的精髓！

话又得说回来，并非所有的走资派都像利别尔曼那样如此厚颜无耻地漠视马克思。Л·瓦格和С·札哈罗夫（唯利润学派的两个极端分子）在《生产基金的补偿和企业利润》一文中，

提出了一个经济管理中的“自行调节”的建议。这一建议，正好和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所概述的资本主义经济模式逐点针锋相对。

他们提出要对价格制度进行改革，以“生产价格”（连这一名称都是从马克思那里剽窃来的）取代旧的从政治角度来决定的价格。“生产价格”中包括向国家缴纳固定基金的百分之二十的统一租金。（这两位作者估计，如果消费品价格保持在现有的水平上，那末，就会使生产资料的价格增加百分之八十！）人们可以从这里想见，这对广泛发展生产会造成怎么样的后果——要提高产量，唯一最节约的办法就是提高劳动强度，因为企业无力购置为发展生产所需要的新机器等物资设备。

瓦格与札哈罗夫还随声附和利别尔曼，叫嚷要给企业更多的计划自主权，并按利润给予管理领导人员奖金。但是他们这一建议的真正目的（且不说这一建议的原始由来及其说理的严密性），在于主张国家可把生产资料作为资本，从而向企业索取使用资本应带来的利息，并把它拨给那些不从事生产的少数人。

当然，由于瓦格和札哈罗夫等人强调由国家而不是由企业获取剩余价值，他们就更为冠冕堂皇地来对付任何说他们企图复辟资本主义的指责。利别尔曼仿效赫鲁晓夫，对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进行彻头彻尾的歪曲，而瓦格和札哈罗夫却预示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将要“回到列宁主义的立场”了：“在布哈林著作中就曾出现过这种对利润的轻视态度。大家知道，列宁对这种态度给予了尖锐的批评。布哈林的公式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生产，是剩余价值的生产，是为利润进行的生产。在

无产阶级统治条件下的生产，是为了满足社会的需要。’列宁在反对对利润的意义所作的这种估价的时候写道：‘那不行。利润也是满足“社会”需要的。应该说：在这种条件下，剩余产品不归私有者阶级，而归全体劳动者，而且只归他们。’”

这种手法相当高明，不幸的是我们的走资派只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列宁对于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的批评，其要害就在于该书对待社会主义经济政策的态度同瓦格和札哈罗夫文章的态度一模一样，即在使用词藻，侈谈无产阶级专政，把经济和政治完全割裂开来，把经济只看成是生产力的最合理、最有效地利用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

当列宁提醒布哈林说，“利润也是满足‘社会’需要的”时候，他指的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使用价值是为利润而进行产生的，而利润也的确对提高经济效果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起过促进作用。如果资本主义剥削的各范畴不能起到经济的职能；如果资本主义制度不能始终保证工人阶级最起码的生活的话（这里是指作为一个阶级，因为个别工人的挨饿穷极潦倒是经常的），那末，利润制度早就在地球上消失了。

问题的实质无疑是：哪一个阶级占有生产资料，组织对生产资料的使用并分配剩余价值。当生产资料收归国有之后，我们还得追问一下，是哪个阶级统治国家？国家在组织生产方面所采取的政策方针，可为这个问题提供部分答案。瓦格和札哈罗夫对利润挂帅的说法，即把国家和生产资料的关系完全等同于资产阶级和生产资料的关系的说法，就是一个信号，它说明资产阶级势力已经篡夺了政权。对这些问题，在我们讨论苏联经济的实际“改革”时，将作更进一步的探讨。

瓦格和札哈罗夫关于恢复生产价格的建议，赤裸裸地表明

了其资本主义的性质，因此就连修正主义阵营中的成员也对之进行攻击。可以认为，这种攻击是为那些少露骨一点的建议打开了方便之门。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大多数的批评意见，并没有针对着他们所勾画的国家、企业和工人之间的关系。然而，随着辩论的深入，至少有些参与者对这一建议的阶级性提出了反对意见。苏联经济学家沙胡林公开说参与讨论的有些人固执地想建立一个自动化的、由工程师、技术人员和经济领导人员来管理的体制。”

不管是出于真心反对这些赤裸裸的属于资本主义性质的建议，还是出于保守思想，大多数参与利别尔曼辩论的经济学家都不同意按照多少是资本主义竞争的基础来处理苏联经济的各种建议。相反，他们提出全面推广“定额加工价值”法。然而，赫鲁晓夫公开出场为利别尔曼建议评功摆好。一九六四年五月，《经济报》宣布，中央委员会将主持一项试验，把利别尔曼建议在两家服装工厂（一家是莫斯科的女布尔什维克服装厂，另一家是高尔基城的梅耶克服装厂）付诸实施。

五、测验水性：资本主义制度的试验

隐藏在女布尔什维克-梅耶克试验后面的主导思想，是让计划中仅剩的那一点纪律性由市场的纪律性所取代。根据旧体制，向服装业的定货是要通过国营零售服装商业公司这一渠道的，公司既负责安排市场批发，还负责把由中央制订的生产计划最后肯定下来并对其执行情况加以检查。根据这个试验的条文，女布尔什维克服装厂和梅耶克服装厂就越过了服装公司，直接同苏联各地的几家规模宏大的高级零售商店建立了合同关系。

工厂和商店之间订立合同，规定定货的数量、质量（颜色、式样等都订得极为详细）、价格和交货日期。根据这些定货，企业就自行制订生产计划。凡是在中学读过政治经济学的人们，都很熟悉这背后的理论基础——据说按照销售的情况，零售商店要比党和国家更加了解苏联人民缺少什么和需要什么。制造商和销售商之间的合同关系，是作为行使资本主义模式的“消费者权力”的一种工具。

正如利别尔曼已推崇过的，参加试验的企业都享有空前的独立自主权。劳动生产率、生产需要的原材料职工人数、产品成本、工资基金、支付工人工资的办法（计件制或计时制）等等，都由企业经理决定。女布尔什维克和梅耶克两家服装厂有权决定各自的库存量。如果超出了预定的流动资金额，他们还保证能得到国家银行的贷款。

唯一由中央规定的指标是实际销售额（以卢布计）和总利润额（仍按老办法表示，即按产品成本及其批发价格之间的差额来计算，而不是象利别尔曼所建议的按生产基金计算的百分比）。货物的售价也是按计划确定的。然而，允许进行试验的企业有权对新产品进行直接议价，并且还有权在服装上附加一些花色点缀而标高价目，而这只要企业经理决定就行。

先在零售服装商业提出试验，是由一个突出的问题所决定的。五十年代期间，在计划制订者们中间的修正主义倾向大为滋长，因而出现了一种使服装生产远离人民需要的情况。一些企业由于受到他们在计划部门的上司的指使，一味着眼于增产并尽可能“方便地”完成计划，而生产出数百万件苏联人民根本不愿意买的服装。结果是，这些不能脱手的、次等的或因其他原因没有人要的服装大量积压，其价值从一九五九年一月一

日的十四亿八千五百万卢布竟戏剧性地上涨到一九六四年一月一日的四十一亿三千三百万卢布。

在解决这个问题方面，试验最初似乎是成功的。例如在女布尔什维克工厂，据有人估计，要是仍旧保持原先那样由上级来制订计划，那末，约将有百分之三十的定货没有人购买。此外，无法销售的成品库存量也不能大幅度下降——在女布尔什维克工厂两年内就下降了百分之五十以上，而和进行试验厂商订有合同的那些零售商店也有同等幅度的下降。

就减少库存积压量这一主要方面所取得的进展来说，这次试验可以认为是成功的。一九六四年十月（甚至在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迫使赫鲁晓夫下台之际），有人提出把这些新规定推广到高尔基、列宁格勒、莫斯科以及其他地区的百分之三十一的服装厂、百分之十七的纺织厂、百分之三十三的皮鞋厂和百分之十八的皮革厂中去。一九六五年第二季度初，约有四百个企业单位在按照女布尔什维克-梅耶克体制进行试验。随着这一试验在服装行业的广泛推广，在运输、机器制造、木材和采矿等部门也采用了类似的做法，但规模要小得多。

当这项试验扩展到“市场计划”之后，它的真正缺点也就全部暴露出来了。服装业一九六五年的销售总额比前一年增加百分之四点五。然而，这主要是由于丝绸奢侈品跃升了百分之八点九。相反，棉织品的销售量却下降了百分之零点九，毛织品下降了百分之八点五，鞋类下降了百分之二点五。

这些数字表明，新体制虽然在表面上好像是在为消费者着想，不使他们吃专横的官僚主义的计划制订者的一时兴致的亏，但实际上却是直接违反苏联工人群众利益的一个阴谋。进行试验的企业和协作零售商店之间建立的“直接联系”，是依

据“金钱万能”这一原则的。换句话说，商店只对能多赚卢布的货物订合同，而且，正像任何资本主义经济那样，那个人卢布多，就有更大的权力来决定该卖出什么，该生产什么。结果是，奢侈品的产量渐趋增加，而便宜的大众化的服装却供应不上。

这个问题由于价格制度而被弄得更为糟糕。为了提高销售额和利润指标，企业经理照例在各种服装上加上些花哨的边饰，从而获得提高价格的权利。再说，规定的价格制度多少还是从政治、社会等方面的考虑来制订的。这样，群众迫切需要的恰恰就是价格低廉、对生产企业和零售商店无多大利润的一些服装。举例说，童装是最无利可图的，而高级时髦的女式服装却很昂贵，获利也多。

这一情况出现了一个实际利润减少的新问题。因为讲究的服装只有为数很少的人才有能力购买，因此，一般说来，成交的定货数量要比过去在计划生产时少得多。小额定货使生产成本急剧增加，而效果和总的产量都要下降。

对工厂的工人来说，就得加足马力干活，就得开展“生产”竞赛，借以弥补由于小额定货的不断打乱生产而造成的各种困难。经理们利用其获得不久的支配工资的权力，建立了名目繁多的奖金制度，使工人为获取金钱报酬而相互竞争。举例说，在一九六五年第三季度，棉布服装业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超过工资增长的百分之三点八，丝绸服装业为百分之三点二有一个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总结这一情况时说，经过试验，“大量生产的大型企业已经转变为小额定制的成衣铺了”，这种说法是最恰当不过了。

着手进行此类试验，只是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

一个步骤，并非全过程，但是只要沿着这条既定的政治路线走下去，那末，这样的过渡就是不可避免的。

社会主义经济可能面临的各种困难问题，只能靠进一步巩固提高已取得的成就、总结经验教训来解决；只有广泛发动人民群众自觉地、科学地从整个工人阶级的利益出发来解决；从而逐步走向共产主义来解决。只要苏联经济朝着资本主义方向复辟倒退（即使是试验性的），如果不通过激烈的阶级斗争来扭转这种复辟倒退行为，那末，它就会顺着这条路子继续滑下去。

当四百家试验企业和其他的经济企业建立这种经济关系时，这一点已是非常明显的了。虽然这时候新兴的资产阶级已牢固地掌了权，大部分经济在名义上仍是按照社会主义原则进行组织的（尽管其经营方法不是这样）。这样，当一家服装厂同一家商店订立合同生产一定数量的的确凉女裤时，它不得不从一个化工厂取得它所需要的的确凉原料，而这一化工厂又不属于进行此项试验的范围，并且它的产量已由上级部门计划规定好了。因此，供应方面就产生了严重困难，许多定货合同就根本无法履行。

此外，在全面计划经济的内部有这样一小块的试验市场，就会引起制订计划的上级部门和企业经理之间的不断争吵。格鲁什霍夫棉纺联合公司就是个典型的例子。这家企业在一九六五年的第二季度开始加入试验。在拟订一九六六年的计划时，它在一九六五年八月举行的加盟国纺织商品展览会上，已经和许多供应企业和批发商店直接签订了合同。然而到了十一月，莫斯科国民经济委员会通过行政手段取消了这些合同，责令该企业把全部产品运交莫斯科棉纺中心储存站。具体的定单内容

同原先合同所规定的几乎毫无相同之处。

这一类的事例表明，即使在这一个阶段，在究竟应该由谁来控制生产的问题上，仍然存在着激烈斗争。计划制订者们脱离了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这种领导权力来自群众的支持和批评），就无法把经济引向前进。但是凭借他们素有训练并富有经验的这一条件，这些势力中的很多人仍在进行斗争，那怕是取得形式上的集中计划也好。这样他们就不仅和企业经理发生了冲突，而且最关重大的是，他们和上一级的党政领导也发生了冲突。这就是隐藏在“官僚主义破坏”背后的政治内容。这种“破坏”一直到现在都使苏联的所有经济“改革”成为灾难。

这些试验的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方面是，对有关企业在收入分配上所产生的影响。几乎在所有的企业中，试验的结果普遍提高了工资，这主要是由于进行试验的工厂享有特殊待遇。但由于经理有全权支配工资基金，所以增加额的最大部分并不是归工人所有。

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五家卡车运输公司的经验，是最能说明问题了。在一九六五年第二季度，这五家企业基本上是按照女布尔什维克-梅耶克体制相类似的基础上进行试验的。在莫斯科的三个企业中，工资总额在一九六五年比一九六四年分别增加了百分之十五点六百分之二十三点六和百分之二十三点四。驾驶员工资增加的百分数为十三点六、十八点三和二十四点九，而管理人员（包括最高级管理领导人员）工资增加的百分数却为二十六点二、三十八点三和一个惊人的数字，即六十一一点九。

在列宁格勒，有专家治国论者参加最高级的管理领导，这就比莫斯科更进一步了。高级管理领导人员是和工程师并列

的。这两家公司中驾驶员的工资增加百分数分别为十九和三十，维修人员增加百分数分别为十三和二十五，辅助工人的工资在一个公司中增加百分之三十三，但在另一个公司却降低了百分之九。可是，这两个公司的工程技术人员（包括最高级管理领导人员）工资增加的百分数却为四十八和四十。

这些数字表明，这项试验的一个政治目的就是，要在企业经理人员中巩固社会帝国主义的基地。我们将会看到，这也是柯西金的一九六五年经济总“改革”的一个主要目标。

女布尔什维克-梅耶克以及类似的试验开始于赫鲁晓夫时期，而在勃列日涅夫-柯西金时代完成，这是合乎时宜的。因为这些试验实际上标志着由赫鲁晓夫执政时期的破坏社会主义这样的一个特点，过渡到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的有计划地重建资本主义。不过，我们应注意到，没有一堵墙把这两个时期截然分开，一个时期的“任务”是和另一时期的“任务”密切关联的。

社会帝国主义者已经牢固地建立起资产阶级专政，已经造成了这样的局面，即真正的经济问题已不可能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计划来加以解决。出于他们政治路线的需要和内在必然性，他们不得不乞灵于各种各样的资本主义方法。通过女布尔什维克-梅耶克试验，新兴资产阶级在“利润湖”中只是沾湿了双脚。只有到了一九六五年秋，那时他们已经略为掌握水性，才最后一头栽进水里去了。

六、经济“改革”：利润挂帅

一九六五年九月二十七日，柯西金总理在苏共中央全会上讲话。他讲话的目的是要宣布一项全面的经济“改革”计划，

把企业放到一个更为独立自主的基础上，并把利润和其他“经济调节器”恢复到经济上的统帅地位。

柯西金首先概述了苏联经济所面临的某些问题。他特别指出了每一卢布固定资产的工业产量的下降，劳动生产率的令人失望的增长率和农业发展上的落后状况。

照他看来，这些问题和其他的一些问题都是由于没有充分发展管理技能和技术而造成的。他认为要使经济运转情况良好，就必须有效地管理经济，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在各个工厂和整个经济领域内都采用物质鼓励来刺激管理的积极性。

按照柯西金的话说：“最大的注意力应当集中于改进工业管理的形式和方法。现有的工业管理形式、计划形式和刺激形式，都不再符合当代的技术-经济状况和目前的生产力水平。

“各企业在经济方面的主动性和权力太狭窄，它们的职责范围也不足。成本核算制度在许多方面只是一种形式。目前对工业人员的物质鼓励制度几乎无法吸引他们去改进他们本企业的工作，而且在实施中还经常和整个国民经济利益发生矛盾。”

苏联一九六六年发行的宣传画，画上一个工人手里拿着一叠钞票，钞票上大书特书「利润」一词。他强调在苏联资本主义新制度下，利润所起的中心作用。



据此，柯西金提出了几种建议来刺激经济。首先，但不是最重要的，是呼吁进一步努力改进科学技术标准：“在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的情况下，计划的任务应该是提供条件，以便工业能够迅速采用科学技术方面的最新成就。”这实质上是号召进一步依靠专家和广泛应用自动化技术。

更为重要的是计划权力下放的建议，柯西金建议，“扩大企业和公司的经济独立自主权，并提高作为我们整个经济中的主要经济单位的企业的重要性……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就必须废除对企业经济活动的过分限制，就必须为它们提供发展生产

的必要手段，并对扩大企业权力制订可靠的法律保证。”

在这方面，柯西金还答应：“加强并发展成本核算制度，用价格、利润、奖金、信贷等手段来帮助加强对生产的经济刺激。”

这实际上是“改革”的关键所在。柯西金建议将一九六四年到一九六五年期间试验中运用过的一些方法，在整个经济中加以推广。过去，国家管理经济用政治-行政办法，现在他建议广泛使用“经济杠杆”。特别是，过去总产值指标是衡量企业成败的重要标准，现在却代之以销售额，就像在女布尔什维克-梅耶克试验中已经实行的那样。不但如此，柯西金还指出，“为了使企业朝着提高效果的方向前进，最好使用利润指标。”这里，他还提醒大家，不应把利润单纯地看作一种会计科目，而应把“固定资产的每一个卢布的利润额”（即利润率）同时加以考虑。

在计划工作上，过去所有由上级机关确定的指标，现在除了五种以外，都由企业自行确定。根据这个“改革”，只有销售额、产品的基本类别、工资基金总额、利润额和赢利率（同生产基金的比例）以及对预算的缴款和预算拨款仍由中央决定。所有其他指标，包括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职工人数和平均工资水平等，现在都由企业管理部门根据自己的需要来确定。不过，为扩大工厂生产能力而进行的重要投资或重要的技术改造工程仍然由中央来计划或批准。

在这种新体制下，较大部分的利润将留归企业所有。在过去，这种利润几乎全部直接纳入国家预算之中，然后按照计划在社会中进行分配。柯西金现在建议，“留给企业的利润应同该企业利用分配给它的固定资产的有效性、扩大商品销售的数

量、改善商品质量和增加赢利率的情况成正比例。”

利润留成会对整个企业、特别是对企业经理人员产生一种物质刺激作用。利润将纳入一种生产发展基金。企业管理部门就可以利用这一基金，制订推行物质刺激和发展技术的方案。

但是并没有作出任何努力以使各企业能为自己提供足够的资金，从而做到真正的“独立”。说到底，这将是一种向竞争性资本主义倒退的一个空想的步骤。在新体制下，资金还是要大量地来自国家。不过，柯西金又根据地地道道的银行传统宣布，资金的调拨将开始带上一个价格标签：“投资的资金目前是通过国家预算的无偿拨款来提供的。企业经理们对企业改建扩建所需的费用或追加投资资金的有效与否很不关心，因为他们的企业并无义务偿还拨给它们的款额……解决这个问题一个办法是，将基本建设的无偿配给改变为对企业提供长期信贷……现在已经提出建议，废除从国家预算中向企业流动资金提供无偿补充的办法，代之以根据需要而给予信贷的办法。”

除了赞成更多利用国家银行的信贷以外，柯西金还宣布实行对生产基金收费的制度。根据这一制度，企业单位需付给国家一笔规定的款额，用苏联第一流的经济学家涅姆钦诺夫所使用的术语来说，这实质上相当于“政府对固定基金征收的租税”。显而易见，这是“改革”中的最重要的规定之一。简单地说，它的政治经济效果是，恢复生产资料中的资本的特征（即国家现在将以基金收费的形式，利用生产资料来抽取最大限度的利润），这就把国家作为金融资本家而同企业相对立。

最后，作为以上措施的一个直接结果，柯西金宣布，对苏联的价格结构进行一次全面的修订，以便有助于将尽可能多的工厂置于严格的成本核算（关于对“成本核算”的更完整的解

释，参见本章第三节）基础之上，亦即赚取最大利润的基础之上。这里，他在某种程度上接近了生产价格学派经济学家（如瓦格和札哈罗夫之流）的观点。

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他说：“价格必须不断反映出劳动的社会必要费用，同时价格还必须包括生产和流通的费用，并为正常经营的每个企业赚得利润。”此外，“目前存在的忽视计划和管理国民经济方面的经济方法的现象以及成本核算制度上的薄弱情况，在很大程度上都和制订价格制度上相当严重的缺点有关。如果价格没有根据，那末，经济核算就会失去可靠性，而这反过来又会助长主观武断的决定。”我们不久将有机会探讨在这些深奥论述下所掩盖的实质。

这种“改革”的实施非常缓慢。原来的日程设想，所有的工业企业将在一九六九年年末前实施新规章，所有其他国营企业（国营农场除外）将在一九七〇年全部实施新规章。但是在一九六六年，苏联将近四万五千个工业企业中，仅有略微超过百分之一的企业改行了新体制。其中在一月一日改行新体制的是从十七种工业部门中精选出来的拥有三十万职工的四十三个工业企业的试点组，以后，四月一日第二批有二百家，八月份第三批有四百三十家改行新体制。此外，有些交通运输业到这一年年终时也在新规定下进行活动。

在以后的几年中，改造的步伐一直很缓慢，附表可以说明这一点：

工业企业“改革”的情况

到……年底	已改革数	在全部工业中的比重(%)			
		企业总数	总产值	职工总数	利润
1966	704	1	8	8	16
1967	7248	15	37	32	50
1968	26850	54	72	71	81
1969	36049	72	84	81	91
1970	44300	90	92	(?)	95

来源：格特鲁德·施罗德著：《苏联经济改革陷于绝境》。

在评论第一批七百零四个企业在一九六六年所取得的成就时，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巴楚林报告说，同一九六五年计划相比，销售额增加了百分之十一，利润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四以上，劳动生产率提高了百分之八。这些都大大超过未经改造的各个经济部门的增长率。

不过，正如上表所示，这些数字是虚假的。那些实行“改革”的企业都是苏联经济的“精华”。因此，到一九六七年年底时，所有按新体制经营的企业中的百分之十五就赚得了工业利润的百分之五十，并雇佣了全部职工的百分之三十二。在一九六六年上半年改行新体制的二百四十二个企业中，有一半以上以前的利润率就高达百分之四十以上。

很清楚，为了更正确地估计改革的“成就”我们就必需了解参加改革的企业在一九六四年和一九六五年的统计数字。但是得不到这种材料，这一事实甚至连修正主义经济学家也为之悲叹。所能知道的就是，这种“改革”越是普遍，它的“成就”也越是不那么显著。

价格制度的修订也进行得缓慢。制订了从一九六六年十月一日起开始实行的轻工业和食品工业产品的新价目表，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又制订了一九六七年七月一日开始生效的重工业产品的价目表。这样全面修订价格，造成批发价普遍上涨百分之八，重工业产品价格上涨百分之十五。一九六九年一月一日和一九七〇年一月一日再次修订后就使得批发价进一步上涨。

柯西金的“改革”的关键是，把扩大利润作为经济的调节器。据苏联财政部长 B·加尔布佐夫说：“利润的刺激作用在新体制下有了很大的增强，……利润将和其他计划指标一起，成为评价企业工作的一个主要经济标准。利润的大小及其增长率将表示这些企业的工人对国民收入、对扩大生产和改善人民福利所作贡献的大小。”

把利润作为衡量企业成就的主要尺度，这一决定显然标志着是倒退到用盲目的价值规律来调节经济。正像我们在第二章中所指出的，斯大林曾经强调过，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仍然起作用。事实确实如此，因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仍有商品生产，价值规律仍是调节所有商品生产的规律。社会主义标志着一个从资本主义这个商品生产最高、最发达的形式到完全消灭商品生产的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

因此，斯大林认为，苏联的计划制订者必须考虑到价值规律继续发挥着的作用。这意味着“利润”之类的指示器是重要的，而且必须遵循严格的成本核算程序。但是斯大林主张，必须对利润的作用范围和价值规律不断地加以限制。这是可以实现的，因为工人们越来越多地控制了经济，打破了遗留下来的商品制度。

但是对修正主义经济学家来说，价值规律必须处于支配“行政控制”的地位。苏联经济学家 A·毕尔曼在其一九六七年《今天的利润》一文中所提出的论点就是一个例子。他写道：“最近几十年的经验已经令人信服地表明，如果不废除计划机构对经济组织之间千丝万缕关系中每一种关系的调节作用，并把这些关系置于经济责任的基础之上，那就不可能达到经济计划的真正集中统一。计划越是想要做到‘具体’周到、包括各种细节，要保持整个国民经济真正有计划的发展就越是困难。”

毕尔曼在这里所要说的是一个很简单的事实，即要对一个复杂的经济制订计划，就需要作出大量的行政上和政治上的决定。如果计划制订者只依靠他们自己，他们就将陷入这些决定之中，结果必然产生混乱不堪的官僚主义。据他看来，这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他建议把价值规律（“经济责任”）作为一种摆脱烦琐的行政工作的一种手段。

当然他所没有看到的是，社会主义不是依靠少数几个专家和经理来管理经济的，而是依靠工人群众来管理的。

确实，集中统一计划需要每天作出成百万的自觉的决定。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些决定是在市场上“自发地”作出的。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却有成百万的更多的自觉的工人来协助作出这些决定。集中的计划只能是，而且必须是一个群众性的过程，原因就在于此。如果不实行一条正确的无产阶级政治路线，就必然会导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复辟，原因也在于此。

毕尔曼既然不是以这一条决定性的政治原则作为自己的基础，他也就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没有理由否认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所起的无可置疑的调节作用。”他认为，“特别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不是价值规律本身，而是它的作用

形式和表现形式，……所以问题不在于一般的‘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而是在于这种调节的不可控制的性质，即它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产生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后果以及生产资料的私有制。”

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愚蠢的倒退的论点。正是价值规律本身才是“私人商品交换的调节器”，这种私人商品交换的最高形式就是私人占有生产资料本身，其特征是直接的生产者和生产资料之间的完全分离。说是“问题”在于这种调节的不可控制的性质，就是承认这种调节，并因此也就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承认私人商品生产继续存在下去。

这和马克思的革命论点没有丝毫共同之处，因为马克思是预见到商品生产将会彻底消灭的。这种论点倒是和 J·M·凯恩斯的改良主义立场更为相似。凯恩斯所追求的便是，通过资产阶级政府的干预以控制无政府状态所造成的后果，来更好地“调节”资本主义生产。

据修正主义者看来，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利润的一个主要作用是“作为评价一个企业的成本核算活动的一个重要的综合指标”。他们的意思是说，衡量企业在整个经济中的成就的最有效的方法便是利润指标，这是因为，“利润指标的主要优点就在于它的客观性”。

这就深入到事情的根源了。“客观性”！这是什么意思呢？说得确切一点，这就意味着客观实际（自然界）对人的支配权，而不是人对客观世界的支配权。可是，社会主义的实质不是这个“客观性”，它是人类对其社会及其生存条件的有意识支配的不断发展。

这和修正主义的看法恰恰相反。修正主义者是不相信人类对社会和自然的不断发展的支配能力的，因为，作为一个阶级来说，他们不代表整个人类的利益。只有工人阶级才能高举解放全人类的大旗，因为工人阶级在解放自己的时候，必须使每个人都成为无产者从而消灭一切阶级。社会帝国主义者对商品生产的“客观”规律热诚地顶礼膜拜，这是因为这些规律正是以人类对自然的永远的屈服，更加重要的，是以人民群众对少数剥削者的屈服为其基础的。

把利润当作生产效果的指标，把利润当作生产本身的中心，这两种观念之间并没有多大的距离。因此，我们在毕尔曼的文章中可以看到这样的话：“利润既是某一个特定的企业，也是整个社会的扩大再生产的源泉”。显然，这就是说，经济增长（扩大再生产，即不仅是消耗了的生产力的补偿，而且是它们的扩充）的基础，不是活劳动的继续努力，而是用劳动积累即资本来雇用活劳动。

修正主义者现在给利润所下的定义是，投资资本的一部分。根据这一定义，资本必须优先于劳动，利润才能作为扩大再生产的源泉的标志，而这就意味着，利润必须既代表剩余产品，也代表剩余价值。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在本章第七节讨论苏联提高劳动生产率运动时，将作进一步说明。

关于价格的改革问题，毕尔曼中肯地阐明了产生这一问题的根源。他说：“把利润在实际上变为主要经济指标之一，就必然地突出了改进价格的制订这一问题了。”

这是因为在过去，价格并未规定来反映价值规律的要求，虽然这些要求也必须加以考虑。过去的价格是尽量根据有意识的、政治决定的标准来规定的，也就是说，规定价格时是考虑

到群众的最大利益的。但是，如果价格不决定于一个平均利润率；也就是说，如果价格不反映“价值”（社会必要的劳动时间），那末，利润就是一个毫无意义的指示器了。因此，根据加尔布佐夫所说：“价格必须尽量接近社会必要的劳动耗费；它们必须创造条件以便企业的经营能得到正常的利润”。

这等于是否认以社会主义计划为其特征的无产阶级国家对于经济有意识的集体控制，而代之以表现为国家资本主义的那种“受到调节的无政府状态”的“计划”。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各个企业的利益和整个经济的利益之间的最重要的协调力量是政治路线。这就是说，生产发展越来越受到工人阶级的自觉意志的支配；工人们通过计划来组织经济，并在实行的过程中，由工人阶级自己的共产党在马列主义的基础上总结所得的教训。党的政治路线代表了 this 总结，这种总结然后又被回复到工人中去，这样整个过程就能得到加强、深化并上升到一个更高的水平。

但是，在“改革”的情况下，“价格是在经济上决定企业方向的关键”并且是“国民经济利益和各个企业利益之间最重要的协调工具……”这就是说，政治挂帅这一经验的自觉的总结已被抛弃了。因此，在实行“改革”后不久，我们就发现H·费多连科之类有影响的经济学家要求说：“只有最主要产品的价格才应由中央当局来规定……，应授予企业更广泛的权力来规定合同价格。”

重新把利润作为经济的中心调节器，虽然这标志着重新建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一个有决定性的步骤，但其实际作用主要是调节下放地方经济的决定权。然而，正如我们将要在第八节中详细阐明的，“改革”所突出强调的权力下放掩盖着它的

真正资本主义实质。

因为柯西金并不打算在苏联复活市场经济。他更加感兴趣的倒是，控制自发的市场力量（商品关系）来更好地为集中的国家金融资本家利益服务。因此，他一方面把企业利润的范畴置于中心地位，同时他又制订了许多措施，将这种利润（而且，更重要的是把生产这种利润的劳动力）控制在国家手里。

实现这一点的最明显的办法是建立信贷关系。过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苏维埃国家把它所控制的资金，看作是全体人民的财源。因此，当一个企业为了扩充而需要更多的资金时，它可以通过无偿拨款形式而得到。这种拨款的分配，由最高计划当局（在党的指导下）根据经济和工人阶级的全面需要来决定。这和资本主义从“投资”中追求最高“报酬”的方法是很不相同的。由于“改革”，按计划分配资金的制度被废除了。企业现在要为自己的生产扩充而取得资金，不是用自己的利润，就是向国家付利息取得贷款。很明显，根据后一种办法，国家代表金融资本家，企业领导人则扮演了工业资本家的角色。不仅如此，在这种制度下，生产资料已被当作“产生收入”的资本了。

重新实行银行信贷，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恢复国家垄断范围内的资本“市场”。我们这里并不是说，修正主义者已经重新采取了证券交易那种公开地、明目张胆地进行资本交易（因此也是进行剩余价值交易）的形式。情况还并不如此。

但是，把资本当作一种商品，并不见得一定要在市场上出卖它。把资本转让给别人，希望收到预定的报酬（一般是以利息为形式），也是一种商品交换的形式。

美国的资本家在货币市场上进行“选购”，向不同的银行借款，这种情况很显然就是上述的那种商品交换。他竭力设法为自己所需的资本付最低的利息。他希望银行尽量少地分享工人所生产的剩余价值。一些大的厂商和某个单独的银行集团保持着一种固定的垄断关系，也属这种情况。当苏联的一家厂商和国家谈判谋求信贷时，这种程序不论其用意和目的如何，其经济上的实质也就是这种情况的翻版。在这两种情况中，工业资本家所要“谈判”的就是商品（即资本，也就是剥削和控制雇佣劳动者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权力）的价格（即利息率）。因此，随着这种经济“改革”，资本又作为一种可以买卖的商品而重新出现，它不过是采取了一种新的“隐蔽”的形式而已。

但是我们也必须注意到，信贷机构的建立，在特有的条件下（其中，首先并且最重要的是无产阶级统治）能够起到某些有益的作用。而修正主义者在为“改革”的这一方面进行辩解时，也正是利用了这一点。因为在旧制度下，一个腐化的或无能的经理有可能浪费或不恰当地使用这种拨款。而事实上，这在苏联工业中确是司空见惯的。

经理们玩弄手法，得到多于实际需要的资金，因此他们也就无需注意效果和节约。这些资金毕竟是企业不费代价而得来的！对这种弊端进行斗争的最有效办法是，动员工人的警惕性，并对这种潜藏在背后的“我字当头”的思想进行有力的、耐心的思想斗争。然而，很明显，规定对资金付以利息也能有所帮助。

正因为这样，所以中国人是很少随便给予拨款的。在他们的经济里，国家和企业之间的信贷关系是普遍存在的。不过，我们必须指出，这里信贷所起的作用和今天苏联的信贷是完全

不同的。

当两个超级大国的侵略计划，迫使中国把重要生产转移到加强国防时，它并没有像苏联被帝国主义包围时那样把同样的负担放在经济上。中国工业化的步伐之所以看来并不那么勉强吃力，而且经济发展也要比苏联更加平衡，这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因为，中国人在农业和轻工业方面的投资，相对说来，要比苏联多，中国经济中集体经济的比重也要比苏联大得多。中国人口仍有百分之八十是农民，而苏联今天只有百分之四十一的农村人口。这就意味着，在中国，商品关系的顽固性比在苏联还要强。此外，中国可投资的资源也比今天的苏联少得多，节约地使用这些资源就成为一个更加迫切的问题了。

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的那样，中国人在总结他们自己经验和苏联过去教训时，有意识地比斯大林时代的苏联更加强调整步地解决体脑之间和城乡之间的矛盾。在这方面，他们倾向于对价值规律的作用范围逐渐加以限制。

虽然如此，中国人从一开始就为逐步消灭一切商品关系，其中包括国营企业的信贷关系，作了努力。由于在这方面所取得的进展，信贷在经济中的作用已逐步减少。确定利息率是为了确保国营和集体企业都能始终有效地、节约地使用投资基金。上述利息率的规定并不是为了确保投资所得到的有效报酬。在某些情况下，资金也可能是无偿拨付的。

在中国，国家信贷的利息率对企业管理起了辅助的抑制作用，是对工人阶级的思想动员和政治动员的一种补充。今天这些利息率是很低的，并不起调节作用。然而，国家和企业之间

的信贷关系的继续存在，还是代表着一种从资本主义继承下来的遗产。这一遗产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必须而且也正在加以消除。

但是在苏联，按社会帝国主义代言人的说法：“利息对于确保有计划按比例实行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体系的作用正在不断加强。”换句话说，利润，包括国家金融资本家以利息形式表现的利润，在决定何处（在哪个生产地区）需要投资问题上是一个统帅一切的经济原则。在国家无偿提供资金已有好几十年的现阶段，这种新的信贷政策显然是向资本主义的倒退。

根据一九七一年《苏联财政》的一篇文章，绝大多数苏联经济学家“坚持认为，在确定利息率的经济论证中，银行贷款的有效性应放在首要地位。”这意味着，利息率将不是根据如何才能有效调节企业管理对投资的充分使用来’确定，而是根据贷款如何才能产生财政的报酬来确定。一个叫 C·施泰因施莱格的经济学家坦率地说出了事情的实质，他宣称，“利息是一种增加银行贷款额价值的有计划的措施。”对于借贷资本所赚取的收入，难道还能有什么更简单明了的解释吗？

根据苏联的一个资料，“在商业中，有超过百分之六十五的流动资金是借来的并为这些资金的使用付了利息。”在“改革”的情况下，企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并不单纯是厂商和银行家之间的关系。这里还有垄断资产阶级集团及其附属公司之间的关系的性质。尽管权力下放，国家仍然是企业的合法的和实际的所有者。

所以，又另外创造了一个财政联系来反映这种情况。这就叫作基金收费，也就是根据一个复杂的制度，每个厂商必须为其生产基金每年向国家缴付一笔费用。为了论证这个新的范

畴，苏联经济学家也就被迫作了一些发人深思的解释。研究一下有关这个问题的辩论过程是有帮助的。

苏联经济学家中有一派认为，基金收费的基本作用是一种节约性的刺激。因此，它们“作为一种经济范畴的内容就在于，看来是能更好使用生产基金的一种经济刺激。”这是负责苏联价格政策的 B·谢特涅恩的观点。但是，另一个经济学家却简单明了地指出：“把基金收费的刺激作用作为决定收费实质的一个因素，这种提法等于是混淆了因果关系。基金收费只有在反映了一定的客观经济内容时，才对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的使用状况发生刺激作用。把基金收费单纯解释为节约性刺激是表面的，因为它既不能说明为什么基金需要储存，也不能对计算收费多少提供任何实质性的原则。”换句话说，基金收费可以部分采用，因为它们起着节约性的刺激作用。但这并不足以说明这种特殊的刺激形式，究竟在客观上对经济有什么意义。

为了回避这个问题，利别尔曼和其他的一些人曾建议将这种收费作为政府对生产基金征收的赋税。但对此也必须加以否定，因为“任何赋税都是以某种特定的收入为其基础的。赋税并不产生收入，而只是收入的再分配。”既然，企业都是属于国家所有，那末，把这种支付当作赋税的观点就是很荒唐的。因为国家怎么能对自己征税呢？

生产价格学派的成员倒是万变不离其宗，他们建议将基金收费看成是实质上代表投资损耗的企业生产成本的一部分。这一建议不同于上述两种定义，它倒不是企图用簿记方法的技巧而对此项收费的真实经济内容胡说一通。但是，这个定义的先决条件是，企业从国家管理中独立出来，暗示所有权和支配权都要属于厂商自己所有。

这完全是和生产价格学派的明显目的唱的一个调子。其目的就是要使苏联的计划在国家的关怀备至的监督之下，变成马克思所描述的竞争性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十足的翻版。但这不符合社会帝国主义头子的意图，也不符合苏联经济发展阶段的现实情况。厂商仍由国家控制，而且这种控制并不只是纸面上的东西。

如果这种基金收费真是代表了成本的损耗费（而不是在生产中新创造的部分剩余价值），那末，这些损耗费最终就必须作为生产所需的一些具体东西的报酬而被支付出去。换句话说，如果基金收费真的是成本损耗费，那就意味着企业实际上已从国家那儿买下了那些损耗的厂房和机器了。

苏联经济学家所能提供的最后一种解释是：“基金收费是租用设备和其他形式的生产基金的估价。”这终于触及到了问题的核心。因为这里争论的焦点正是使用基金从而牟取财政报酬这一问题。这里所说的报酬，就是国家垄断资产阶级投入资本的报酬。这就意味着，生产的目的现在已变成创造剩余价值和国家垄断资产阶级瓜分剩余价值。要国家收入反映这种改变，要国家垄断资产阶级在赃物中得到这一份额，从而反映他们作为生产资料占有者的统治地位，就必须将国家收入置于基金投资的基础之上，而且也只能置于这一基础之上。

因此，苏联经济学家们不得不承认，“这种支付迟早将成为对国家预算的基本支付形式！”过去，国家预算当然主要是由国有生产企业所得的收入而提供资金的。但这种收入并不采用资本家的利润形式，因为它并不根据基金如何投资而改变的。

基金收费实质上等于剩余价值的一种租金类型的分配形

式，目的主要是把在工业中所创造的一部分剩余价值交给国家。其次，这种基金收费想通过一种复杂的公式，在不同工业部门中平衡其利润率，而在垄断的条件下这是不可能成功的。

我们发现基金收费的规定至少是启发了一个叫 Б·拉基茨基的经济学家，他提议对人力资源同样采用收取租税的方式，这时基金收费的性质也就沿着这些路线进一步暴露无遗了。国家作为一切基金的主人，当然有权向其所属企业征收它所提供的经费的“租金”，从这一前提出发，拉基茨基建议，国家也可以出租工人！据说这会保证更加“合理地”调配人力。如果说采用基金收费标志着复辟资本主义的一个决定性的步骤，那末，拉基茨基的建议就表明朝着“国家封建主义”或者甚至奴隶主义方向进展，因为这种建议实际上甚至会剥夺工人对自己劳动力的所有权。

拉基茨基的建议现在还没有得到社会帝国主义分子的认真考虑。但是它的确大体上反映了“改革”的根本特点。这就是有系统地重新实行并显著地加紧对工人阶级的剥削，也就是窃取工人们所创造的剩余价值来为一个异己阶级使用。为了更好地了解这个事实：我们必须分析社会帝国主义者所大肆宣扬的提高“生产率”的运动。

七、对工人阶级的剥削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苏联经济主要是在“广度的”，而不是在“强度的”投资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区别。当然，任何社会都力求最大限度地发展生产，并且把全部产品总额中的一部分（剩余）用于再投资，以保证生产的增长。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这种再投资还能起到减轻工人劳

动强度的作用。象这种社会主义的投资就叫做“广度的”投资，因为它是在以往的生产成就的基础上来扩充生产，而不是以牺牲工人阶级的利益来扩充生产的。

“强度的”投资，却是相反地以强化劳动过程本身为基础的。这里再投资的产品是采取剩余价值的形式，它并不起着减轻工人劳动强度的作用，而是增加工人的劳动强度。这就是说，在日益增长着的生产中，有很大一个部分是来自加快工作速度的措施和相类似的强化劳动措施。对工人来说，采用新的投资不是意味增加收入，而是恶化被资本奴役的悲惨处境。广泛的发展意味着建造新厂房和机器设备。纵深的发展也许同样意味着改进机器设备，但它只限于能促使建成有一个较快速度的生产线。

资本主义制度是建立在资本剥削活劳动以榨取其剩余价值的基础之上的，这就很明显，在这个制度下，纵深的发展必然是首要的。当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绝不是不主张最有成效地使用生产劳动。但是，在这个制度下，这种效果不是由于需要榨取最大限度的剩余价值而产生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既然，劳动成果是由工人通过他们自己的无产阶级国家来控制的，生产是为人民服务的，促进劳动生产率增长就成为一种社会的义务。

社会主义解放了工人的创造性和积极性，因此能够发明出大量的新方法和新技术。在我们讨论斯达汉诺夫运动时，已经看到了这种情况。虽然这种情况能够起到刺激经济增长的作用，但是它却不能用来作为这种增长的基础，广度的投资一旦缩小，其结果将只会使工人们丧失提高生产效率的动力。因此，广泛的发展生产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本

原则。

由于实行了“改革”，社会帝国主义者把广泛的发展经济变为纵深的发展。据毕尔曼看来，“社会生产的增长，不应该从广泛发展的基础上，而应当从纵深发展的基础上来着手。这也就是说，应当以这样的方式进行：每个单位产量的社会劳动支出要不断减少，而从劳动使用中所获得的追加报酬则应不断增加。”勃列日涅夫在宣布一九七一到一九七五年的五年计划时透露，整个工业部门增长的百分之八十以上是由于提高劳动生产率而来的。

我们已经看到了，在农业中“小组”制这项权力下放的措施，是怎样掩饰了农业劳动的不断强化（参见本章第三节）。同样，在工业“改革”中强调权力下放，也起了加强对工业工人的剥削作用。特别是，工资和奖金制度就是达到这一目的的主要手段。

“改革”前，所有工资都是按计划确定的。但是，根据“改革”，只有企业工资基金总额是预先决定的。经理们还被授予了可以随心所欲任意确定工资等级制度的权力。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总的原则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虽然确实有过工资平均化的现象，但完全平均仍是不可能。这是因为，经济的技术基础仍然有限，各种职业的生产并非都是相同的。例如，一个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冶金联合工厂的钢铁工人生产的实际价值，就可能大大超过一个纺织工人在单独一架机器上缝制服装的价值。

但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工资，并不完全反映这种差别。因为无产阶级政策是要尽可能地在各个方面促使更进一步的

团结和平等。因此，虽然存在着差别（有时还相当大），但总的说来，对技术性强、生产价值高的工作，工资实际没有付足；而对生产价值较低的工作，其工资则有所增补。同样，有些技术性强的职位，工资较多，以便刺激前进，但同时也使用政治动力。

将工资决定权下放给企业管理当局，就改变了所有这种情况。现在，经理们出于争取更高利润的需要，在工资政策中放弃了一切政治上的考虑。新的办法是对生产价值高、技术性强的工作规定较高的工资；对非技术性、生产价值低的工作则规定较低的工资。这就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劳动力又像过去在资本主义社会下那样，变成了一种可以按其价值进行买卖的商品了。

甚至比决定工资变化更加重要的是，根据“改革”所采取的刺激制度。其目的是要使工人工作得更加卖力一些，从而使劳动生产率提高。

在理论上，这个制度同公司“分红制”计划相似。来自企业的利润首先交由企业经理来支配。其中要调拨出很大一部分，通过一种由企业管理当局所控制的“生产发展”基金的形式，重新成为生产性投资（因此是代表毫无计划的生长）。但是，另一部分（经常是比较大的）则是放在奖励基金名下，旨在用奖金来奖赏生产有成效的工人、技术员以及管理当局。这些主要是取决于完成和超额完成利润计划的情况。到一九七〇年，这种奖励基金平均达到苏联全部工资基金总额的百分之十。

我们无意对刺激制度的全部作用进行分析，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不属本书的研究范围。据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学

格特鲁特·施罗德说，“各工业部根据一套复杂的公式对这些基金的组成确立定额。虽然各部理应为各种不同类型的企业制订标准定额和稳定的定额，但其实主要是对各个企业分别制订定额并至少每年修改一次。此外，例如在一九六八年，至少有三十个特别的追加奖金计划用来补充基本的刺激计划。

这样的复杂性并非偶然，其目的就是为了掩盖刺激制度旨在欺骗工人越发卖命工作这一事实。正像一篇关于这一制度在基辅实行情况的研究文章所揭露的（它的一个更重要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改善工程技术人员和白领职员收入。”

社会帝国主义者要把利润作为生产目的，就必须笼络企业经理们来共同行动。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使经理人员收入的增长有赖于企业盈利的成功。像其他许多事情一样，“改革”的目的是，要在中下级的经济管理人员中散布社会帝国主义头子的资本主义观点。

这个刺激制度事实上只是使国家及其管理人员能分享到利润。例如，利佩茨克工业建筑托拉斯的经理在一个月度内所得到的七次奖金就达一千三百个卢布，比一个普通工两年的工资还多。在一九六六年开始实行新体制的企业中，白领管理职员的工资增加了百分之十点三，工程技术人员增加了百分之八点二，但是工人只增加了百分之四点一。从一九六七年第四季度利润中支付的奖金达到这两种特权集团平均工资的百分之二十以上，但付给工人的奖金只相当于工人的平均工资的百分之三点三。

基辅的三个企业在实行“改革”后，奖金在工人收入中的百分比从四点七提高到六点四。但在工程师和技术员收入中的百分比却从二十点三增加到二十八点一，白领职员从百分之二

十点八增加到百分之二十三。用这篇文章的话来说：“从物质奖励基金中采用奖金形式付给工人的是不太多的。”

但是，这不应用来表明刺激制度仅仅是一种管理人员进行偷盗的花招。当然也确实如此。但其目的同时在于解决在强度投资的基础上提高生产率的问题。而在解决这一问题时，主要的目标是把经理们束缚在这个体制里，在他们中间造成一种最大限度地提高生产率，也就是最大限度地增加利润和奖金的“需要”。工人的一份奖金只不过是一种伪装。这个体制的真正手法是迫使工人们更加拼命努力地干活，是鼓励管理人员强迫工人去这么干。

这一切都意味着，实行“改革”以后，厂里的情况变得更糟。由于最大限度利润成了生产目的，纵深发展便占据了突出的地位。国家依靠它的资本投资，通过利息和基金收费来榨取资本所产生出来的那一部分剩余价值。经理和技术人员则按照他们完成利润计划的成绩领取奖金（他们也可以通过发展生产基金中的再投资的利润控制，本身成为低级的独立的资本家）。对于创造一切财富的工人们来说，这个“改革”，除了给他们烦恼以外别无其他。

我们曾经简单地谈过“加快工作速度”。它现在已成为苏联工业的特征，并且同美国工业所实行的完全一个模样。此外，许多工厂出于剥削廉价劳动力的需要，已经开始雇用儿童，进行时间长、工资低的劳动。如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金属工人”工厂和曙光国营农场就有这种情况。

但是，在提高生产率、增加劳动强度从而提高利润的最重要方法中，还有一种就是干脆开除所谓“多余”的工人，同时又要留下的工人拼命加快工作速度。据苏联经济学家 E·马涅

维奇说，“许多企业经常雇用许多并不需要的人。他们的工作量不足，并且经常执行一些和生产毫不相关的任务。工业企业中的剩余工人无助于加强劳动纪律和合理使用劳动时间。”

这个“改革”起了“解决”这个问题的作用。正像H·费多连科所说：“改进人力的使用是取得高利润的其他许多因素之一……这在许多方面是由这样一个事实所促成的，即企业可以不根据上级指示来计划工人人数和分配职务。在多年的经营活动中，第一次在那些按新体制工作的企业中，实际录用人数低于计划数字的百分之零点八。有些企业中，绝对数实际上也已减少，虽然到一九六六年止还常有增加。多余的工人在那些仍按旧制度进行活动的企业中找到了工作。”

我们在此只能试问一下，现在，已经没有企业“根据旧体制”行事了，情况又该怎样了呢？当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有时也有必要“解雇”工人，今天苏联企业有许多超定额的多余职工，这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事实。考虑到自一九五六年以来就一直怂恿企业管理人员追求投机取巧办法，上述后一种情况也就不足为奇了。但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对这些弊端要进行思想上的斗争，而且经理们知道，虚报工资单要受严厉惩罚。不但如此，某个企业或建设工程不再需要的工人，必须有计划地被调到因广泛发展而产生的新的工作岗位。因此，“解雇”就其资本主义的意义而言（工人被辞退以后没有重新就业的保障，他们只有在能向别的资本家出卖劳动力，为他创造利润的情况下，才可能找到工作），它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是根本不存在的。

在“改革”之下，苏联工人确实实沦落到了向资产阶级剥削者出卖劳动力的地位。日益增多的可供投资的盈余来自对

工人的沉重的剥削。正如费多连科所描写的，这意味着劳动大军的减少。因此，例如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五家卡车和汽车公司，为了增加利润率，五个月中共解雇了二百三十九名工人，占全体职工百分之四。再如“红十月”钢铁厂，为了实行“改革”，关闭了老的车间，把七百三十名工人赶到街头。

但是在“改革”机器中很快就发现一个障碍。奖励基金的数额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于工资基金额，而工资基金额又决定于职工人数。问题是解雇工人时对增加生产率并无刺激作用，因为这只会减少管理当局从奖励基金中所能得到的资金。而且，事实上，“夸大计划的工资基金的倾向会导致雇佣过多的人力”。

于是发现了一个“聪明的”解决办法，其实根本不是什么新发明，而是一个已经试行过并且是道道地地的资本主义的解决办法。一九六九年谢基诺化学联合公司管理当局提出了一个要为留用的工人增加奖励基金的方案，办法是把通过解雇其他工人而结余下来的钱转移到奖励基金项下。这是因为工资基金和奖励基金不同，工资基金是由中央计划在几年前就预先规定好了的。这个方案在开始时受到了很大的阻力，主要来自该厂工人。有几个工人抗议被解雇，并向国家最高法院上诉。工人有一句话概括了全部真相：“什么？！我的同志们给解雇了，因此我可以得到较高的工资？！！”

虽然如此，一九六九年十月，党的中央委员会批准了这个方案。一九七〇年下半年，这个“谢基诺试验”在部长会议为此而颁布一项法令后就正式化了。这项法令还包括了要求各地都系统地实行这一方案的许多详细规定。到一九七一年一月，据报道劳动力总数约为七十五万工人的一百二十一家企业都

已在试行这个方案，计划在两三年内把这些企业的劳动力减少六万五千人左右。

这种试验在整个经济中进行一年以后，整个经济的平均劳动生产率增加了一倍。“在产量大大增加的同时，这些企业的人员减少了二万三千名……”

社会帝国主义者捧出谢基诺计划作为范例，要所有经济部门都来模仿，他们到处鼓吹它的成绩。И·拉扎连科写的一本小册子《劳动报酬、劳动奖励基金和苏联工会》吹嘘说：“谢基诺化学联合公司的三年经验已经产生良好效果。”结果是，劳动生产率增加了百分之一百零八点一，而平均工资只增加了百分之三十点七（对那些运气好，还有工作的人）。

谢基诺联合公司本身，到目前为止那里工人人数已经削减了一千名，管理当局还在试图想出一些对付那些不幸被“技术进步所替代”的人的办法。在《真理报》和《消息报》的读者来信中，已经流露出了一种“对失业前景的普遍不安”

这种不安确实是有根据的，因为当这个计划推行到所有企业时，唯一可能的结果就是失业。甚至苏联经济学家也承认，“随着采用此项新制度的企业数量的增加，解雇劳动力的范围也将扩大……”，其结果是不得不设立八十所失业人员介绍所，担负起安置解雇工人的任务。（我们将在第五章进一步讨论失业问题及其对苏联工人阶级的影响。）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失业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以及资本家从工人身上榨取越来越多的剩余价值的需要。苏联今天的情况，也完全是这样。自从一九五六年资产阶级政治路线占上风以来，苏联的许多经济问题，只能在“自动调节”、利

润挂帅的基础之上得到解决。这就迫使以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为首的社会帝国主义者不得不采用经济“改革”。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种“改革”把利润推到了舞台的中心地位，并使生产资料重新具有资本的性质。这又反过来意味着劳动力再次沦为商品，由资本家来买卖。

这就使经济的强度发展成为必不可少，因为资本的利润只能来自劳动人民的劳动。当这些工人并不集体地通过无产阶级政权管理他们的劳动产品时，他们所生产的产品中除了维持本身生活和繁殖后代所必需的部分之外，多出来的那部分在他们看来就是资本家手里的剩余价值。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规律，也就是社会帝国主义的基本规律。

八、请真正的资产阶级站起来好吗？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广泛地谈论了厂长、经理和技术人员在“改革”中所起的日益增加的作用。虽则他们一向是，而且今天也仍然是苏联资产阶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他们并不是真正掌权的人。真正的国家金融资本家是那些身居高位的官僚和党的官员，他们控制着中央国家机器。为了清楚明白起见，不妨把较低级的厂长、经理们看作是隶属于国家官僚和党的高级官员的工业资本家；高级官僚和党的官员，则是高踞在苏联统治阶级顶端的肥狗，其权力的基础是对经济的国家垄断控制。

采用竞争性的市场经济并不是达到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的手段。经过“改革”，中央计划还是保留在党和国家领导人手里，控制经济的大权也继续在他们的手中，归根结蒂，还是他们这些人主持计划过程。当然，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种

“改革”的确对厂长的管理权和企业的独立性作了某些让步，而在金钱上，厂长经理则属于最受这些“改革”之惠的人们之列。但是我们不能不着重指出，“改革”中的若干“权力分散”，只是为了加强中央的国家资产阶级和他们手下人之间的联盟。这一切在柯西金宣布“改革”的讲话中都已经和盘托出了。他是这么说的：“提请全会考虑的各项建议，其出发点就是集中的计划管理在发展我们的经济中所起的领导作用。偏离了这个原则，就会不可避免地导致丧失掉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所提供的各种优越性。”柯西金的意思就是给予各个个别企业的任何独立性，都是仅仅为了全面加强国家的地位。虽然在许多方面形式上“解除”了计划的限制改革了的企业仍然继续隶属于中央当局。

一九六八年，在权威的经济刊物《计划经济》的一篇文章里，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头子A·巴楚林也强调了这一点。他说：“现在的问题是要建立一种计划性和积极性之间的最佳关系，一旦建立了这种关系？每一个企业的集体利益就可以和整个社会的利益达到最大限度的协调。这是改革的主要任务之一，这决不意味着把计划经济的方法丢掉，转而采用自由市场的机制的各种技术，作为主要的经济调节器。”

少数厂长经理，原来还心存幻想，以为权力已经移到他们手里，他们很快就察觉到了这一点。自从“改革”条例颁布以来，厂长经理们对于中央各部“管得太细”的抱怨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了。一九七〇年对二百四十一个西伯利亚和远东的企业主管人作了调查，被征询的人中有百分之五十六表示，就扩大企业的独立性和厂长的权力而言，改革是微不足道的；百分之三十四的人抱怨，他们的企业在“改革”的条件下面临的主要

困难是企业的独立性不够。

因此，必须再一次强调，苏联不是处于竞争性的资本主义，而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并且，竞争性的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就是不受控制的市场经济的发展。也不像有些人希望的那样，标志着进一步的倒退到资本主义。事实上，今日的苏联经济的这种“计划的”国家资本主义特征，比起纯粹的市场竞争来，乃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更高阶段。

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对于在“改革”中引进市场因素的某些方面，并未特别予以重视，尽管有些分析家把这些方面看作是苏联重新建立完全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关键环节。例如，我们并不着重有关生产发展基金的规定，根据这项规定，企业可以不受计划的约束以它的利润进行投资。尽管不可小看，这笔基金在大多数企业中只占固定资本总值的百分之二到百分之五。这还不足以使企业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任何重大的投资。一九六九年由企业留作投资和奖励支付之用的利润平均只达百分之十五。

在一定的程度上，“改革”也规定了生产资料的自由买卖，实质上这就意味着建立了生产资料的批发市场。有人把这一点看作是资本主义复辟和生产的无政府状态重现的关键。然而，实际上这是一个相对地无足轻重的发展。在一九六九年的末期，开设的小型批发商店只有四百六十家，总营业额八亿卢布。这个数字在生产资料的成交总额中只占百分之一弱。其余的百分之九十九仍是由中央政府根据计划调拨和支付的。

我们认为，“改革”的关键所在是我们在本章第六节中所讨论的那些方面。其中包括有：把利润扩大到最大限度作为生产目的，随后按照价值规律支配而重新改组经济，以及规定基

金收费，从而把生产资料当作资本。这些措施无疑地会使市场范畴恢复到一个统治的地位，但是它们并不取决于或者表明对于计划和中央政府控制的摒弃。它们只是表明，就工人阶级为广泛群众的利益掌管经济并且经营经济这一点而言，已经不复存在这样“自觉的”控制了。

因此，认为“加强市场就是加强资本主义”的说法，实际上是没有看到问题的实质。作为一个社会帝国主义国家的苏联自有它的国家垄断经济。在这个经济的内部，占统治地位的是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因为产品的生产要服从利润的生产。这种现象反过来，又是无产阶级丧失政权而直接造成的。无论如何，举例来说，这种经济跟所谓“市场社会主义”相比，又是属于一种不同类型的经济，后者是南斯拉夫经济的特征。

铁托的“共产主义者联盟”夺取政权之后，南斯拉夫几乎立即就放弃了社会主义建设。因此，真正的社会主义经济没有可能在那里发展。南斯拉夫人所建立的是一个竞争性的资本主义经济，这也许是现存的这一类型的经济的最后几个样本之一。在国家监督之下，国外垄断和国内垄断，都受到国家的控制，无数的中小企业，据说是在“工人自治”之下来进行经营的，在公开市场上进行相对地（和绝对地无政府的）自由竞争。国家和党的调节作用微乎其微，计划也几乎不起什么作用。

比起出现在苏联的那种集中的国家垄断来，这并不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更具资本主义性质。这是另一种资本主义的形式，它表明南斯拉夫处于比苏联远为低级的发展阶段。南斯拉夫人之所以能“成功”，纯粹是因为他们面对着两个超级大国的情况下，到现在为止还能够设法巧妙地保持一定程度的独立。

事实上，苏联经济和纳粹德国的法西斯经济倒要更加相似得多。这就是马列主义者如中国人和阿尔巴尼亚人经常称苏联为“社会法西斯”的原因。在纳粹统治下，所有德帝国主义的各个经济部门都隶属于纳粹党所管理的国家官僚机器。为了报答它们放弃掉的某些“独立性”，各大公司又在若干方面受到酬谢。当然，首要的一条就是对工人阶级和其他群众运动的凶恶镇压。但是，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所谓经济“公司化”，它使成千上万家的较小的竞争性企业惨遭灭顶。

在纳粹经济中，垄断企业之间的竞争是由国家运用它对军事开支的控制，作为决定性的权力和势力来加以限制的。这种经济当然完全是资本主义的，但国家起着领导作用。

但是这种局面充满了矛盾，并且在十二年中把德帝国主义引向了毁灭。同样是这些矛盾，今天使苏联的经济走上绝路，没有任何“改革”能够改变这个局面。

在任何资本主义经济中，基本的矛盾都是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的私人之间的矛盾。这必然要引起离心力（分散化）向心力（集中化）之间的“紧张状态”：一方面是，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市场的自发性；另一方面，则是集中和垄断。这两种倾向同时并存，这一方面的发展并不意味着另一方面的消灭。实际上，正如列宁所说的，垄断的发展加剧了竞争，两者共同存在。

社会帝国主义者和所有的资本家一样都面临着这种矛盾。为了追求利润，他们日益加深地成为价值规律的奴隶。这说明他们的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无政府的，经济领域里各个不同集团之间的竞争是不可避免的。苏联统治者既不能也不愿依靠群众，必须乞灵于价值规律来调节生产。但是这就意味着市

场力量的不受约束，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又使逐个的企业恢复其“独立性”。在这个意义上，一九六五年的“改革”标志着对离心倾向的要求作出了让步。

但是，另一方面存在着国家政权的集中化的力量，即经济和政治权力集中在资产阶级国家和垄断一切的党的手里。这个向心力是垄断的力量，但它是比“老牌”帝国主义更为高度发展的垄断，因为它继承了社会主义的国有制。国家垄断所包含的高度集中化是同恢复了的资本主义直接相矛盾的，因为生产的自发性、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最后还有市场对后者都有“自然的”引力。

社会帝国主义者之所以被迫一会儿采取分散的措施，一会儿采取集中的措施，永远处于顾此失彼的状态，根源也就在于这个矛盾。如果一九六五年的“改革”，可以看成是对离心力量的局部让步，那末，从那个时候起的政策，就标志着中央的控制已经重新强加于那些现在理应是“独立的”企业之上。

随着一九七三年的工业改组，问题就变得更明显了。这个最新措施标志着社会帝国主义者企图从组织上来考虑这个问题。他们的解决办法是使“生产联合公司”成为基本的经济单位。这个机构基本上和传统的资本主义公司相类似。这就更加清楚地暴露出苏联经济的真正资本主义性质。

苏联在一九六一年开始试验把几个企业合并为联合大企业。首先是在西乌克兰的里沃夫的制鞋和皮革工业中出现的两个联合大企业，它们是根据参加合并的企业的主动倡议而组成的。到一九六五年，全国共有五百九十二个联合大企业。由于一九六五年后企业向“改革”的过渡，企业的兼并运动因而放慢了进度，到一九七一年，约有六百五十个生产联合公司已在

进行日常活动，被合并了的企业有二千七万个，相当于工业企业总数的百分之五点五。

生产联合公司所取得的经验，很快就使得苏修头头们看清这些合并起来的公司在新的条件下是更加易于管理的。他们发现通过合并减少了中小企业的数目以后，就可以更加有力地实行控制，而同时又能在利润挂帅的基础上进行经营管理。例如，早在一九六七年，费多连科就已声言：“大的合并企业比小企业处于更能适应全国需要的地位，可以集中基金来设立新的车间、新的企业和新的工业部门，可为生产新产品而重新分配费用，在联合公司的范围内总结先进技能、工艺技术和引进新技术，调节物资储备，规定内部（转让）价格，集中部分供销业务。”

这确实是十分合乎逻辑的，并且还反映了这么一个事实，即以竞争性的资本主义的“单个企业为基础”的概念不过是表面文章，它同目前的实际情况以及苏联经济的发展水平是不适应的，而且也是行不通的。正如英国经济学家亚历克·诺夫所指出的：“指望在单个的相当于西方的一家工厂的企业一级作出必要的决定，那是荒谬的。一个杜邦公司，美国钢铁公司或通用电器公司附属工厂厂长能够作得出什么决定呢？这些巨型公司要比苏联的不少工业部还要大得多，而集中的程度也不见得低。”

社会帝国主义者一旦认识到这个情况，就很快抓住这个决定性的问题不放。一九七三年四月二日，他们宣布所有工业企业都将合并成为生产联合公司。一九六五年“改革”所给予企业的权力现在都移交给联合公司了。根据不同情况，合并将在全国范围内各地区和地方来进行。根据这次宣布，新方案将在

一九七五年底生效。

这项花招对苏联的经济活动将会发生怎样的影响，还须拭目以待。但它清楚地表明，社会帝国主义者未能解决他们面临的矛盾。当然，他们永远做不到这一点。正像中国人强调指出的，“社会帝国主义的经济基础是垄断资本主义”，它受“同样的帝国主义的客观规律的支配”。

九、综述：作为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苏联经济

概括一下直到现在为止我们所描述的情况，苏联的资本主义复辟的根源，在于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所进行的阶级斗争。随着赫鲁晓夫的上台，资产阶级设法控制了共产党这个工人阶级的政治先锋队，并从这里开始将这个国家变成了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开始了资本主义复辟，这就是复辟过程中关键性的转折点。

在赫鲁晓夫的统治下，苏联资产阶级首先通过分裂工人阶级的集中统治和破坏社会主义制度来否定社会主义的成就。当赫鲁晓夫将机器拖拉机站出售给集体农庄时，集体农业的集中指导遭到了破坏。工业部门的计划管理被分割为一系列地区国民经济委员会。围绕着恢复以利润为动力的原则以及根据商品生产基本规律（即价值规律）重新组织经济的问题展开了讨论，这种讨论得到了共产党领导的公开鼓励，朝着这个方向的试验也已着手进行。

政治上也是如此，赫鲁晓夫竭力破坏无产阶级国家的集中权力。他对马列主义最根本的原则发动了系统性的攻击，他对斯大林的谩骂不过是用作对无产阶级专政进行攻击的烟幕。在他的统治下，资产阶级自由势力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大肆泛

滥。

赫鲁晓夫将大批经过考验的无产阶级战士开除出共产党，从而进一步削弱了工人阶级。这些战士在各级领导中由资产阶级分子及小资产阶级分子所代替。赫鲁晓夫最后发展到将党分成“工业党”和“农业党”，把一些行政琐事加在一些正直的党的干部身上，从而实际上限制了他们的政治作用，致使这些人处于被动局面而丧失斗志。

赫鲁晓夫的作用就是对无产阶级发起进攻，破坏社会主义，从而让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纷纷出笼。

但是，赫鲁晓夫对社会主义的否定反过来又产生其辩证的反面——否定之否定。这一点从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统治下按照国家资本主义路线对经济进行的彻底改组中可以看出。

这也有其政治和经济两方面。政治方面，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重新坚持了党政的集中领导——但这一次是在新的基础上，即在巩固由党政高级官员组成的新的国家金融资本家的政治权力的基础之上。这里，所谓“回到列宁主义的立场”提供了实用主义的掩护。党被拼凑起来，甚至得到了加强而成为新的统治阶级在组织上的代表。

至于经济，分散经营的情况由于经济“改革”，给予各单个企业很大的回旋余地看来仍然存在。然而，“改革”的真正目的是，由国家垄断集团根据已经安排就绪的资本主义路线实行系统化的控制。实际上，“改革”只是加强了中央的国家资产阶级的实权。这一点从下列事实中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在赫鲁晓夫时代，国家行政机关的任用人数基本稳定，到了一九六四至一九七〇年期间，国家行政机关任用人数逐年增加，共

增加了五十一万六千人，达百分之三十八点三随着一九七三年生产联合公司的出现，分散经营也就进一步加强了。

如果说赫鲁晓夫对社会主义的否定给经济带来的只是一片混乱，那末，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的系统性“改革”，根据垄断资本主义始终如一的原则，在稳定和改组经济方面倒是取得了成功（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取得了尽可能多的成功）。

这一否定之否定必须牢牢掌握。第一个否定：在赫鲁晓夫统治下，资产阶级攻击马列主义，着手破坏社会主义，经济上一片混乱，政治上自由主义占据了统治地位。但接着出现了第二个否定：在某种意义上是以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的上台为标志（虽然他们的统治同赫鲁晓夫的统治之间在政治上没有一堵墙可以截然分开），赫鲁晓夫和赫鲁晓夫主义遭到了攻击，“纪律”和“控制”作为当代的口号又出现了，经济被系统地恢复到正常的资本主义秩序。

但是，这一切都发生在崭新的基础上，在完全变化了的条件下。否定对社会主义的否定，并没有使我们再次回到社会主义，却相反地标志着一个正在作用着的资本主义社会，一个建立在迄今为止史无前例的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系统改组。

“合二而一”，不认识复辟过程中的两个阶段，看不到这一辩证过程不只是对社会主义的否定，而是否定之否定，那末至少会导致两个严重的错误。一个错误就是，误将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的集权主义的表现，当作是回到了社会主义原则。持有这种看法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评论家所提出来的。他们给那些目前的苏联统治者带上“斯大林主义分子”的帽子。

第二个错误是将赫鲁晓夫主义看作资本主义复辟过程的

全部内容。从这一观点出发，资本主义复辟成了仅仅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瓦解，而不同时又是资本主义的重建。这种分析认为市场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关键因素，而没有看到资本主义也可能同集权主义同时并存（过去纳粹德国即是一例）。

按照这个观点，就要把南斯拉夫那样的国家说成是比苏联更加资本主义，也意味着在杜布切克的“市场社会主义”下，捷克斯洛伐克当时正在企图摆脱苏联的统治正是为了要向资本主义更快地前进。按照这个逻辑作出结论，这种观点将资本主义在苏联的出现看作是历史行程简单的倒退。人们还尽可以说苏联不过是在历史上向后转，现正在从社会主义通过垄断资本主义退到竞争性资本主义，因而还可以再退到封建主义。尽管这正可能是苏联一些唯心主义的“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所要求的，但这种推理的荒谬却是显而易见的。

我们怎样来释苏联的资本主义复辟呢？

让某一个无阶级的“官僚”集团以无产阶级的名义来统治社会是不可能的，因为要维持这种统治，这些“官僚”必须组织产品和劳务的生产和分配。如果这种官僚主义方法占上风，并变成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计划过程的政治特征；如果是一个脱离和不依靠群众的官僚集团来决定如何进行这一过程；那末，这一切将必然是按照资本主义路线来行事的。

归根到底，修正主义者只能依靠价值规律，把它作为组织生产的“杠杆”。他们必须使工人沦为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工人为了生存，不得不出卖他们唯一的商品，即劳动力。修正主义者也必须求助于工人在竞争中所表现的狭隘的自身利益，同时以政权作为高高在上的、压迫工人的力量，作为生产资料占有者手中的武器来加以支持。他们必须这样做，因为他们必

须找到某种组织生产的方式，而他们自己是不能有计划地、自觉地进行这种生产的，他们别无抉择，只得成为新的资产阶级（价值规律受到修改，意味着垄断者可以将他们的商品价格提高到实际价值之上，但这并没有消灭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而事实上却加深了资本主义的矛盾）。

一旦采取了这条道路，那末，各个经济部门之间的计划关系也必须由价值规律来进行调节。这也就意味着必须利润挂帅。

一旦生产不再由真正的以工人群众的需要为基础，不由社会主义计划（和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革命的马列主义政党所制定的）来调节时，那末，它就只能由资本主义市场来调节，即由能带来最大利润的东西来调节。即使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计划”存在时，包括旨在保证主要垄断工业的赢利率的国家“计划”在内，甚至在这时，商品生产和交换规律，其中特别是价值规律（市场的盲目力量）将仍然起支配作用。这就意味着，那些控制了不同经济部门和不同数量剩余产品的资本家之间的竞争，也必然将发展。

今天苏联所发生的情况就是这样。竞争主要不是发生在工业资本家之间（企业和农庄的经理主席等等，虽然在这一级也确实有竞争），而是主要发生在控制不同部门、地区和工业部门等的党政高级官员之间。

正如我们已看到的，苏联经济在很多方面可以和纳粹德国相比较，在纳粹时期，钢、煤等各经济部门是在国家的控制下组织成托拉斯和辛迪加，而国家则用信贷作为主要调节器。但是激烈的竞争也存在于各个托拉斯和辛迪加内互相争夺的资本家之间，存在于那些财富和权力集中在一个或几个不同的托

拉斯和辛迪加的资本家之间。激烈的竞争还存在于控制这些不同的托拉斯和辛迪加的信贷机构各部门的资本家之间。

苏联内部正在发生着基本上类似的情况，尽管其所采取的具体形式以及牵涉到的具体人和公司尚未十分清楚地暴露出来。但一旦利润用来调节各个经济部门之间以及这些部门和国家信贷机构之间的关系的话，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这种情况，比如说，在那些主要从钢铁生产中牟取利润的部门同那些为钢铁生产提供生产资料（煤、石油、铁矿）的部门以及购买钢铁产品的那些部门之间发生激烈的矛盾和冲突。

大规模的生产联合公司的创立，揭露了这种情况在苏联发展相当迅速。这些生产联合公司将必然为追求利润而相互竞争。比如说，一个专营钢铁生产的联合公司想把手伸到采煤上去。不久，生产联合公司将不仅是根据工业部门来建立，而是（在某种程度上毫无疑问他们已经这样做了）代表互相竞争着的资本家集团，这些资本家集团的利益是非常不相同的，好比相当于美国的摩根和洛克菲勒集团，这些竞争着的集团到时又为夺取在共产党里的政治势力和控制权而斗争。

要使这些竞争的资本家心平气和地分配财富是不可能的。他们也试着这样做，但他们对更大利润的无穷尽的追逐总会给他们带来新的矛盾。不管他们之间达成什么协议都将被撕得粉碎。这是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基本矛盾，即财富的私人占有和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的直接结果。

正是这一矛盾已经严重破坏了苏联经济。在利润挂帅下，苏联资产阶级，正如各地的资产阶级一样，不可能有效地、迅速地并以平衡和全面的方式来发展苏联经济。有一个事例是很说明问题的：一九七二年，由于计划性差以及气候条件不利这

两个原因凑在一起，使苏联出现了一场历史上最严重的农业灾害，那时苏联迫切需要大量的收割机、卡车和干燥机来完成突击收割任务，然而，许多机器却因为缺乏零部件而无法使用，这是因为生产零部件不如生产机器那样有利可图。

同样的问题在一九七三年又出现了。当时苏联当局大肆宣传一个高达二亿二千二百五十万吨粮食产量的“空前大丰收”。在一九七三年十二月的中央全会上，勃列日涅夫承认，由于农业设备的缺乏造成了大量这种“丰收庄稼”烂在田里，某些西方观察家估计，到手的庄稼仅达到一亿六千五百万吨左右。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无法完全考虑到经济的全面需要的，因此这种混乱的状态是不可避免的。不仅如此，资本主义（特别当它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时）不可能最大限度地发展生产力。这种对剩余产品的无政府主义的竞争性的占用和按照利润原则进行的再投资，不但降低了产品的质量，而且也影响了产品的数量。马克思主义者说，资本成了生产发展的桎梏，指的就是这个意思。

从一九二八年以来，包括当前的一九七一到一九七五年计划在内，苏联已经进行了发展经济的九个五年计划。到第五个五年计划为止，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率达百分之十三以上，为世界上最高增长率。然而，在一九六六到一九七〇年间，总产值仅增加了百分之八点四，比一九六一到一九六五年的百分之八点六的增长率略微下降。不仅如此，根据美国政府的估计，非军事生产方面曾出现过更为迅速下降的现象。在一九六六到一九六九年期间，非军事生产增长率同一九六一到一九六五年的百分之点八及五十年代的将近百分之十相比，仅达百分之六点二。根据苏联中央统计局发表的统计数字，在第九个五

年计划头三年，工业总产值的增长率已进一步下降到仅为一九七一年的百分之七点八，一九七二年的百分之六点五和一九七三年的百分之七点四。

由于苏联是个国家资本主义社会，所以资本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状态的影响可以在某种程度上通过制订统一的国家计划而得到改善。制订这种计划是为了使各种工业的需要得到平衡，保证每种工业获得“公平的”利润。但这一计划不能解决这一制度的矛盾，而事实上，这些矛盾必然在制订计划时表现为恶劣的内部斗争。结果，计划本身就越来越脱离现实的经济生活。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苏联的计划指标几乎经常是完成甚至超额完成的，而今天在计划执行期间则经常要修改定额；降低指标。即使如此，许多重要的经济部门甚至还不能达到修改过的指标。下列统计数字十分清楚地说明了今天苏联经济的这种可悲的、危机笼罩的状态，统计数字记述了以一九七〇年为最后一年的第八个五年计划的执行结果（参见下表）。

第八个五年计划（1966—1970）执行情况

品类	最初指标	修正指标	实际产量
电力（10 亿度）	830-850	807	740
天然气（10 亿立方公尺）	225-240	215	200
煤（百万吨）	665-675	—	624
钢材（百万吨）	124-129	124	116
钢管（百万吨）	95-99	96	92
化肥（百万吨）	62-65	62	55.4
合成纤维（千吨）	780-830	707	623
汽车（千辆）	1360-1510	1360	916
农业机械（十亿户布）	2.5	—	2.1

水泥（百万吨）	100-105	—	95.2
纸张（百万吨）	5.0-5.3	5.0	4.2
纺织品（十亿平方公尺）	9.5-9.8	—	8.6
合成树脂塑料（百万吨）	2.1-2.3	1.8	1.7

摘自《亚非杂志》1974年第2期。

这种停滞不前的经济反映了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和一切帝国主义气息奄奄的垂死的本质。帝国主义不可能充分发展生产力，因为随着工人阶级被掠夺了越来越多的剩余价值，这些剩余价值又进一步成为压迫和剥削工人的资本，这样，使帝国主义在他们自己的市场上牟取最大限度利润就越来越困难了。利润必须通过出售所生产的商品而获得，而商品的主要市场就是工人阶级，因为穷困的工人占人口的大多数。不仅如此，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发展的无政府状态，意味着某些产品实际上经常生产过剩，而另一些产品却供应不足。这些因素不仅产生了资本主义周期性的危机，也使利润率不断下降，使经济发展停滞不前。因此，一切帝国主义者都在其内在必然性（他们制度的基本规律）的驱使下寻找新的商品市场，更重要的是投资的新市场。

追逐最高利润这一动力，迫使竞争着的苏联资本家在能获得最高收益（利润率）的地方投资越来越多的过剩资本。换言之，社会帝国主义，像其他的帝国主义一样，必须将资本输出到其他国家，并随之在国外驻扎军队，干其他坏事以“保证”这些投资攫取有利的收益。他们不得不同帝国主义对手进行竞争，为重新瓜分世界和资本市场而进行争夺。

这样一来，帝国主义的矛盾“四溢”，在一种实实在在地、深刻的意义上变成了世界性的矛盾。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为什

么苏联确实是个帝国主义国家，它是在社会主义外衣的掩盖下活动，但像其他一切帝国主义国家一样，受着同样客观规律的支配。

第四章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 在全世界

一、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和第三世界

苏联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根本不是建立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的，这是不需要仔细观察就能使人痛心而明显地看到的。在印度，每天早上依然有大车沿着加尔各答的大街收集在夜间冻饿而死的人的尸体，而印度正是苏联在亚洲的主要盟国，它接受了好几十亿的苏联“援助”。在最近几次联合国的会议上，苏联伙同美帝以及一小撮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反对第三世界国家拥有支配本国自然资源的权利，从而在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面前把自己孤立起来。

苏联在世界各地不断地干涉别国的事务：有时是通过秘密活动扶植亲苏集团上台，有时则进行经济讹诈。苏联部队仍然驻扎在捷克斯洛伐克国内，这就不断地提醒人们：苏联是多么热衷于赤裸裸的侵略。无论在哪一方面，苏联都暴露出它是一个恣意践踏第三世界各国人民利益的超级大国。

以我们在第三章的论述为基础，在本章中，我们要阐明的是：支配苏联的根本不是使第三世界国家走上所谓“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的愿望，而事实上却是它的帝国主义的本性，即在全球凡其触角能够到的地方都进行抢劫掠夺。

在第三章里，我们看到苏联经济的发展是如何受到盲目的价值规律的支配，看到苏联统治阶级只愿意在那些最为有利可图的工业部门中投资，而且我们也看到这种最高利润只能是在

从事剥削的基础上产生，因此，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者不得不日益加紧对苏联工人阶级进行剥削。

然而社会帝国主义者拼命寻求最为有利可图的投资时，他们像所有的帝国主义者一样最终也碰了壁。用列宁的话来说：“其所以有输出资本的必要，是因为资本主义在少数国家中已经‘成熟过度了’，‘有利可图的’投资场所已经不够了（在农业不发达和群众贫困的条件下）。”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苏联过去能够把它的全部剩余产品都用于国内的生产。虽然它出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精神，也确实将这些剩余产品的一部分用于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真正的援助。可是，现在它的生产目的并不是为了通过全面的经济发展来改善苏联人民的生活，而是盲目地增加资本积累。为了追求更多的资本，苏联步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后尘，进行资本输出，在国外利润率高的地方投资。

对此，列宁曾作过如下的总结：“只要资本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过剩的资本就不会用来提高本国民众的生活水平（因为这样会降低资本家的利润），而会输出国外，输出到落后的国家去，以提高利润。在这些落后的国家里，利润通常都是很高的，因为那里资本少，地价比较贱，工资低，原料也便宜。”

苏联需要在世界各地输出资本，它就必须设法把凡是它能够找到的资源都垄断起来，于是，就不得不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争夺“势力范围”。作为一个“新”崛起的帝国主义国家，今天，苏联就要力争以对它更为有利的方式重新瓜分世界。

在力图达到这一目的时，苏联同美帝的既得权益发生了正面冲突。当前，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正日益陷入严重危机（既影

响到美国，也影响到苏联），然而同日趋衰落的美国力量相比较，一般说来苏联还是处于上升的趋势。因而在亚非拉发展中国家里，以及在两个超级大国进行争夺的主要场所欧洲，美帝到处都发现自己正处于力图保住其帝国的地位，而苏联却试图对美帝的控制进行挑战。

当前天下大乱的形势，主要是由于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争夺而引起的。这个大乱为世界各族人民争取民族解放、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然而美苏之间的争夺也充满了危险，因为正是帝国主义之间的争夺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也正是帝国主义之间的争夺给世界人民以可能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威胁。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将在以后的章节中详细加以论述。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是世界上一个新崛起的帝国主义势力，它企图取代美国来统治别国。正像过去英国赶走了荷兰和葡萄牙，也正像过去美国赶走了英国和法国，如今苏联也正在赶走别人。正像过去英国有时会站在西印度群岛“土人”一边反对葡萄牙和西班牙，作出“反帝”的姿态；也正像过去美国在印度把英国从那里赶出时装成“进步”的姿态；苏联在印度、拉美、中东等地同美帝争夺时，也想装出“进步”和“反帝”的样子。然而，正像列宁在六十年前就描述的那样，绝不能允许他们用侈谈民主、独立、发展，甚至用社会主义的反帝的外衣来掩饰帝国主义之间的竞争和不断重新瓜分世界的现实。

没有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会自动承认自己的本性。甚至早已在全世界面前暴露无遗的美帝，也还在企图给自己戴上“民主国家”的假面具。苏联也企图给自己戴上一副假面具。社会帝国主义者雇佣了一大批擅长于歪曲马列主义著作的“理论家”，

妄图把苏联帝国主义描绘成“社会主义”，把苏联的对外政策描绘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苏联是十月革命的故乡，是第一个工人国家。在列宁和斯大林的领导下，苏联曾经始终不渝地支持过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因而享有崇高的威望。今天的苏联统治者妄图利用赫鲁晓夫政变前苏联的国际主义立场来掩饰他们的侵略和掠夺政策。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撕掉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丑恶面貌的伪装是很重要的。

苏联是在这样一个历史条件下变成帝国主义国家的，即第三世界民族解放斗争正在蓬勃发展，而美国作为一个无可争议的超级大国正在日益衰落。这两种情况决定了社会帝国主义者试图控制第三世界国家所采用的方式和方法。因此，看一看美帝是如何爬上“顶峰”的，可以使我们更清楚地了解苏联近年来的所作所为。

自从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以来，美国一直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但它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才能暂时控制着几乎整个的资本主义世界。就帝国主义国家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本质上是决定哪些国家能得到原料、廉价劳动力和资本输出市场等等这些世界资源的最大份额的一场斗争。战争的发展主要是以英、法、美帝国主义为一方；而以德、意、日帝国主义为另一方。在整个十九世纪中，英国曾是最主要的帝国主义国家。但是帝国主义的发展是不平衡的，通过帝国主义内部的竞争，有些帝国主义国家变得越来越强，有些则越来越弱。德国很快就处于有能力向英国的霸权进行挑战的地位。这个挑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挫败了，这样一来，就给德国套上了债务和战争赔偿的沉重锁链。

为了设法把德国约束在这样一个虚弱的地位，英、法帝国主义同它们日益强大的盟友美国一起，准备再进行一次较量。纳粹领导下的德帝国主义伙同当时日益强盛起来而同样未能得到满足的东方日本帝国主义，对他们的对手千方百计地设法保持固有的世界瓜分局面的企图进行了气势汹汹的挑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局是众所周知的。法西斯国家遭到了惨败，英、法两国在战后也大为削弱，显然无法继续保持它们庞大的殖民地了。在帝国主义国家中，只有美国依然保持着它未遭破坏的生产力，它正准备填补其对手们完蛋后所遗留下来的真空。

与此同时，第二次世界大战也促进了世界人民，特别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人民，争取社会主义和民族解放的斗争蓬勃高涨地发展。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包括美帝在内，能够拯救过去那种赤裸裸的殖民主义制度。大战结束不久，中国人民就赢得了解放，这是对帝国主义制度的一个沉重打击。在一个相当短的时期内，大多数从前的殖民地都已取得了至少是形式上的政治独立，然而我们知道，政治独立本身并不意味着帝国主义掠夺的终止。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列宁写道：“金融资本是一种在一切经济关系和一切国际关系中的巨大力量，可以说是起决定作用的力量，它甚至能够支配而且实际上已经支配了一些政治上完全独立的国家；……对于金融资本最‘方便’最有利的当然是使从属的国家和民族丧失政治上的独立这样的支配。”

美帝没有足够的力量建立起老牌形式的殖民地，没有足够的力量在刚刚赢得独立的亚非国家的国会上空升起星条旗。相反，美帝不得不使自己适应于政治现实，寻求能同世界形势的变化相适应的剥削形式。事实上，美国有时还支持从前的殖民

地国家的独立，因为它不愿意让这些殖民地宗主国的特权，限制住美国金融资本涌入这些国家。（然而，像越南这样的一些殖民地又当另作别论，那里的独立运动是共产主义者领导的，他们决心不仅要获得单纯的政治独立，还要把所有帝国主义统治赶出国土。）

美帝的策略是，指望在第三世界国家中通过代表反动阶级的傀儡来进行间接的统治。这些傀儡一方面使工农群众受到镇压，另一方面又给美国的渗入大开方便之门。这种渗入有多种多样的形式：例如给反动政权以直接贷款，贩卖军火，而最重要的还是美国垄断资本的直接投资。这样一来，尽管美国对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控制，在形式上同过去英、法的明目张胆的殖民主义大不相同，然而其内容，如资本输出、攫取原料等等，却依然如故。要看到苏联是如何使自己的帝国主义掠夺，适应于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政治现实，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区别这种形式和内容的不同之处。

在第三世界国家，由于美国垄断资本的公开掠夺，落后的社会制度没有得到改革，阻碍了这些国家生产力的发展，这一切都使人民群众陷入了忍饥挨饿的境地。被剥削国家的人民再也不能容忍这种情况长期存在下去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几十年时间里，第三世界人民的斗争不断高涨。到处都在高呼“美国佬滚回去！”在许多国家里，人民发动了武装革命，抗拒美帝对他们国家的掠夺。在被压迫的国家里，不仅是工人农民反对美帝，甚至不发达国家的一部分剥削阶级也被迫起来反对美帝。

由于无法同垄断资本竞争，由于帝国主义统治维护了农村的封建和半封建的生产关系，从而阻碍了国内市场的发展，因

此，这些国家中的一部分资产阶级也反对帝国主义。这一部分人被称之为民族资产阶级，以区别于另一部分资产阶级，即买办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和旧的生产关系（即封建主义）有着联系，因此是帝国主义的盟友和支柱。

在整个第三世界中，由于帝国主义的压迫，民族资产阶级发育不良，虚弱瘦小。民族解放运动的历史表明，民族资产阶级没有能力领导人民群众，把第三世界国家从外国控制中完全解放出来。这是因为民族资产阶级缺乏充分的发展和经济上的虚弱无力，也是因为民族资产阶级虽然反对帝国主义，但它也害怕工农群众，因为工农群众所关心的是消灭一切形式的剥削。

民族资产阶级通常采用的斗争方式就是军事政变，以及与此相类似的其他既不要依靠也不要发动工农力量的形式。民族资产阶级一旦掌了权，就陷入了相当严重的困境。一方面，它面临着妄图卷土重来的帝国主义的破坏和经济讹诈；另一方面，它又缺乏足够的资本用来按资本主义的方式充分发展生产力，而且由于其剥削阶级的本性，民族资产阶级不能动员工农群众充分实行自力更生，并把国家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而这一切，只能在工人阶级掌权的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得以实现。

虽然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在帝国主义和被压迫人民群众之间摇摆不定的阶级，可是，它还是能够发挥进步的反帝作用的。在无产阶级领导的民族解放斗争中，可以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参加反帝的新民主主义的统一战线。在这样一个统一战线内，民族资产阶级能够为革命发挥重要的作用。

在民族资产阶级独自获取政权的地方，它通常还是继续反

帝的——它赢得了一些让步，这些让步有时甚至对被压迫的人民群众也是有利的，这种让步给了帝国主义势力以沉重的打击。当某一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确实是反帝的，它就能从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和鼓励中以及第三世界人民之间日益增强的团结中获得力量。

然而历史也表明，民族资产阶级一旦掌了权，往往会受这个或那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支配，它的一部分也会转变成依附于帝国主义的买办资产阶级。甚至那些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民族资产阶级曾经发挥过独立的反帝作用的地方，也会发生这种情况。只有工人阶级领导的革命以及社会主义的建立，才能最终把第三世界国家从外国帝国主义的控制下彻底解放出来。

详细论述一下民族资产阶级的作用是很重要的，因为它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和美国争夺对第三世界的控制权所采用策略的形式。掌权的民族资产阶级往往企图通过建立“国营部分”，即国营工业等，来缩小外国垄断资本对国家的控制。社会帝国主义的策略是鼓励发展这种国营部分，同时设法使第三世界国家依赖苏联贷款和军火供应等等。苏联人妄图粉饰他们这种帝国主义的政策，说他们只不过帮助第三世界国家走上“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

社会帝国主义者写道：“（国有化）在某些情况下，是加速过渡到直接建设社会主义基础的强有力的手段，因为国营部分本身是反资本主义的，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然而事实上“国营部分”并非一定是“反资本主义的”，任何一个邮政局的职工都能轻而易举地证明这一点。我们在分析苏联本身时曾看到，如果是资产阶级掌了权，那末，国家所有制同社会主义并没有丝毫的联系。

仔细观察一下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花费过一番心血的几个国家，会有助于阐明这一论点。

二、苏联的卫星国

印度拥有四亿人口，是世界上人口占第二位的国家。然而几个世纪以来，在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重压之下，印度人民所遭受的苦难是令人难以相信的。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英国征服了印度。在英国发展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资本主义主要强国的过程中，印度的征服是决定性的一步。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英国资本家利用印度为他们提供原料，而更为重要的是把它作为工业品（主要是布匹）的出口市场。

美国黑奴和印度本国农民种出来的浸透血汗的棉花，在曼彻斯特的血汗工厂里纺成纱，织成廉价的布匹，然后再倾销到印度，给印度带来了浩劫，破坏了手工业制度，使好几百万人民丧失了生计。印度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制度，农民被迫用货币缴付地租，而不是像以前那样交付实物地租，即以收成的一部分缴租，这样就加剧了他们所遭受的剥削。

随着资本主义发展到垂死的垄断阶段，即帝国主义时期，对印度人民的剥削又进一步加剧了。资本输出作为主要的剥削形式，取代了商品（制成品）的输出。英国人建造了铁路工厂及其他企业。其中没有一样是用来给印度人民“减轻劳动”的，它们只能使好几百万的印度工人埋葬在外商工厂里。

然而随着帝国主义的发展和资本的输出，印度现代无产阶级有了值得注意的发展，同时也产生了印度资产阶级的萌芽。伴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所产生的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发展，在印度人民中引起了声势浩大的民族解放运动。罢工频起，

有些地方甚至爆发了武装斗争。共产党成立了，可是共产党人从未推行过适用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正确路线。他们没有领导印度人民进行人民战争（依靠农民为主力军，工人为先锋队，以农村包围城市，等等）。

能够领导人民抗击英帝的还是印度资产阶级，具体地说就是甘地和尼赫鲁。他们通过国大党要使人们相信，“独立”并不意味着解放，印度仍将是帝国主义掠夺的牺牲品。国大党的成员来自印度人民中各个截然不同的阶层，可是党的领导始终是代表资产阶级的，既代表资产阶级中那些同英帝国主义有着直接联系的阶层，即买办，也代表那些谋求印度独立以便能从印度群众身上榨取利润的资本家。国大党一直在设法束缚住人民的斗争，它从未认真反对过帝国主义，也从未认真反对过农村中的半封建制度。甘地的“非暴力”哲学是屈从于帝国主义的、反革命的哲学。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英国无力继续维持其在印度的殖民统治。印度“独立”了，被分裂成两个国家（即今日的印度和巴基斯坦）。在印度，政权落到了国大党的手中，迄今仍在国大党手中。美帝当时就开始通过美国垄断资本的大规模投资以及美国官方和非官方给印度政府的贷款，慢慢地把英国的利益排挤掉。这时，美帝正处于全盛时期，成了印度的太上皇。

国大党从未作过任何尝试使印度从帝国主义的控制中解脱出来。印度前任驻华盛顿大使 B·K·尼赫鲁的下面这段话十分清楚地说明了他们是代表谁的：“为了达到经济建设的目的，印度不愿采纳一种显而易见的方法来积聚必要的资本。这种方法就是通过限制个人的自由和民主来改变印度社会的制度结

构……印度选择了另一种做法，即暂时接受更多的外援。”换句话说，印度资本家和地主“不愿”采取任何步骤来削减他们剥削印度人民的“民主”权利。

尼赫鲁和其他政府领袖总是含糊不清地谈论“社会主义”，借以掩饰其对帝国主义的屈从。在国际事务中，他们曾妄图把自己装扮成和平、中立和独立的拥护者，既独立于帝国主义，也独立于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

从独立之日起到五十年代中期，印度几乎完全是同西方进行贸易和财政交往的。当时美帝控制着世界金融市场，这一点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世界银行实现的。这些帝国主义者给第三世界国家以贷款时，都毫无例外地进行敲诈勒索，利息率高达百分之六九五。

赫鲁晓夫集团在苏联掌权以后，便开始想方设法和美帝争夺对印度的控制。他们开始进行贸易，在为数不多的几年内，实际上给了印度一些优惠条件。

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〇年发生的事件，给苏联人提供了进一步渗透进印度的机会，但是这些事件也在世界人民面前暴露了苏联修正主义者的真面目。一九五九年，当印度开始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挑起边界事端时，赫鲁晓夫集团迫不及待地为印度辩护，并施加压力企图使中国把一大片领土割让给印度，就这样开始形成了苏印反华联盟。

印度同时又由于非法占据克什米尔而卷入了一场同邻国巴基斯坦的战争。克什米尔是英属印度分割后的一部分，是穆斯林区域，照理它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加入印巴任何一国。印度反动派一直反对克什米尔人民自决。在这场侵略战争中，苏

联仍然支持印度，并开始向印度提供武器。

修正主义者在苏联篡夺了政权，并开始把他们的国家转变成一个羽毛丰满的帝国主义国家。与此同时，苏联在印度的渗透日益加剧。特别是苏联开始向印度政府提供长期贷款用来建立印度经济的“国营部分”。在此以前，美帝曾拒绝贷款给印度用来发展国营企业。在肯尼迪总统领导下成立的克莱委员会，曾建议美国试用讹诈的方式，使印度放弃其建立并加强国营部分的计划，其理由是，给国营企业贷款实际等于支援社会主义。

当然美帝国主义者还不至于天真到会相信这一点。如果当时在印度尚未站稳脚跟的那部分美国资产阶级，在美国政府中更为有势力的话，今天将会是另外一种不同的情况了。然而看来当时美国统治阶级中最强大的、在政治上最有权势的、却是那些在印度的私营经济中已经牢固扎下根的人，他们认为要在这个国家进行剥削，还是扎根于私营部分最为有利可图。

看来这股势力担心的是，印度国营经济的发展会给同它竞争的公司以插进手来的机会。美国不愿干的，苏联却太想干了。表面上看来，苏联贷款似乎同西方帝国主义提出的条件大不一样。苏联贷款的利息率为百分之二点五，是比较低的，可以在十二年内偿付。况且苏联同意接受印度货币卢比，并不坚持要美元或类似的“硬”通货。当然苏联的援助可以用来发展国营企业。

然而，不久人们就看到，苏“援”背后大有文章。首先，不同于西方贷款，苏“援”是“有限制的”，就是说，印度必须将贷款的全部用以购买苏联的商品。而进口商品的价格不是根据市价确定，而是由贸易协定来规定的。因而苏联人在出售

过时的机器时竟然能够漫天讨价，这样就掩盖了贷款的真实利息率。随着苏联加紧对印度经济的控制，苏联对工业品的索价同市价的差距就變得越来越大。印度杂志《经济评论》一语道破了它的实质：“虽然苏联贷款的利率看来只有百分之二点五，但其真实利率是相当高的，它被苏联供应商品的高价所掩盖了。”

从一九五五年到一九六六年的十年间，苏联给印度的贷款多达十二亿美元。但百分之七十的苏联商品的售价几乎比世界市场的价格高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三十。有些商品的差价更是大得不象话。一九六九年苏联卖给印度的拖拉机零部件价格，比它卖给东欧国家同样零部件价格要高出两倍以上。同年，苏联卖给印度的镍每吨是三万卢比，而在欧洲市场上仅为一万五千卢比。

苏联人出口商品的讨价只不过说明了一半的情况。印度还必须向苏联出口大量商品作为购买苏联商品的付款和支付贷款的利息。这时价格的差异又是对社会帝国主义者有利的。据估计，根据贸易协定规定，苏联从印度进口货物的价格，在大多数情况下比世界市场价格要低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三十。简言之，苏联既从它所要求的百分之二点五的利率中，又通过高价诈骗的手法，从印度攫取了剩余价值。由于印度已经被抵押给苏联了，社会帝国主义者才能如此为所欲为。

早在一九七一年，印度国防部长贾·拉姆就承认，苏联建造的企业控制了印度钢产量的百分之三十，发电量的百分之二十，石油加工的百分之三十五，发电设备生产的百分之六十，电动机产量的百分之七十五，铝产量的百分之二十五。毫无疑问，这些数据如今已过时了。苏联经济“援助”的绝大部分是

用以建立整套工业企业，而这些企业又是在苏联工程师和监工的指挥下建造的。甚至印度议会的一个委员会也不得不批评苏联人的“盛气凌人的态度同政府过去所责备的美国人的态度一模一样。”社会帝国主义分子把设计图纸和工程师牢牢抓在自己的手中，从而使印度进一步依赖于苏联。不应忘记，苏联人在一九六〇年就是用撤退工程技术人员和带走图纸来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讹诈的。

除了给国营企业贷款以外，苏联还发现印度是一个现成的军火市场。苏联向印度供应军火的确切价值还没有官方数据可查，可是所有的估计都认为有几十亿，这又进一步加重了印度对苏联的债务。

苏联对印度的钳制一年比一年紧。一九七一到一九七二年这一财政年度里，印度又向莫斯科借款两亿卢比，尽管当时它已经欠了四亿卢比的债！到一九六八年，“偿还债务份额”已占印度出口收入的百分之二十八。这就是说，印度在全世界销售商品所获得的钱，其中有百分之二十八纯粹是用来偿还苏联债务的。情况如此严重，以至于一个对苏联有好感的印度作者也写道：“完全有可能，今后得向苏联借新款还旧债，而借款所得只意味着印度出口收入将主要用来支付进口货物和国债利息，这就正如借东家还西家以维持家庭生活一样——先从银行借钱，再另外借钱偿还银行。这进一步证明了印度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屈从。

几年前，苏联对于从印度攫取原材料和农产品一直感到很满足。可是近几年来，苏联从美帝那里得到启示，开始设立“逃迁工厂”为苏联生产成品。

一九七二年，印度对外贸易部长米希拉说道：“印度愿意

为苏联承担劳动强度大的加工项目”，并说：“印度还能根据苏联的要求专门在某些方面和某些项目进行生产。”一九七二年六月九日《商业日报》报道，印度同苏联正在谈判进行四项转换交易，根据交易，印度工厂将加工进口的苏联原材料，然后再把成品重新出口给苏联。这正是不折不扣的“逃迁工厂”！这种情况同美国纺织工业和电子工业的一些公司在美国-墨西哥边界一带设立的吸血组织极其相似。此外，苏联在印度建立的另一一些工厂生产商品再卖给苏联，其中包括“典型的”苏联提供资金建造的钢铁厂生产的钢材，也包括外科手术器械。

一九七二年二月《远东经济评论》报道，苏联还正准备把工业品卖给印度的私营经济。此后，一九七三年苏联杂志《共产党人》写道，“经办合股企业”对苏联说来已成了“优先考虑的事项”。这种企业就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对美国跨国公司的响应。这些合股企业使苏联人能在印度的资本主义企业中直接分享所有权，并使社会帝国主义者能够直接掠夺印度工人生产的剩余价值。帝国主义的胃口真是无底洞，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也是一样。

苏联对印度的控制远远超越了单纯的攫取财富。印度已被抵押给苏联这一事实，还产生了许多其他后果。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引用了一段德国资产阶级刊物的话：“在缔结这种国际契约时，债权人几乎总要占点便宜：获得贸易条约上的让步，开设煤站，建设港口，得到利益丰厚的租让，订购大炮。”如今苏联人已经占到了便宜，他们采用的手段就是变印度为苏联在亚洲的主要军事盟国。无论印度还是苏联都竭力想把自己装扮成世界和平的拥护者，可是事实证明恰恰相反。这一点在“孟加拉”事件中得到了最富有戏

剧性的说明。

印度反动派利用了东巴基斯坦群众的不满情绪，在苏联人的全面支持下，炮制了一场虚伪的“民族解放”运动。他们武装渗入东巴，同时挑起边界事端。一切部署就绪之后，印度向东巴发起了全面进攻，结果，巴基斯坦部队很快就被打败。仅在入侵的前几天，印度同苏联签订了一项“友好”条约，其实这完全是一个军事条约。其中一项条款规定当遭到“攻击”时，两国应相互支援。印度反动派的主要喉舌《印度时报》写道：“很明显，如果（没有）同苏联签订的友好条约，印度就不可能解放孟加拉。”印度“解放”了孟加拉之后，苏联人迫不及待地赶来，也向该国提供“援助”。

在社会帝国主义的计划中，印度次大陆和印度洋都是极其重要的。老沙皇梦寐以求要把沙俄版图扩张到印度洋沿岸，新沙皇正在企图实现这一美梦。苏联人在阿富汗支持了军队中亲苏分子发动的军事政变，在阿富汗和印度洋之间显得碍手碍脚的正是巴基斯坦，而苏联人又在阴谋继续肢解这个国家。

正如在孟加拉事件中的所作所为一样，社会帝国主义者还在企图用民族解放的招牌，来掩盖其帝国主义扩张活动。其计划是在巴基斯坦和伊朗交界处建立一个“普什图尼斯坦国”，在近阿富汗沿线处建立一个“大巴鲁契斯坦国”。一九七三年二月，巴基斯坦政府发现了偷运入境的大批苏制武器和装备。这些武器和装备是专门提供给在巴基斯坦活动的、由苏联人训练的“游击战专家”的。

人们可能会想，既然苏联在印度的渗入及其在这一地区对其他国家的侵略性政策如此明显，社会帝国主义者一定会避而不谈这一问题。可是正巧相反，他们写了连篇累牍的文章，宣

称他们如何如何帮助印度“发展全面经济”。一九六七年，他们在苏联杂志《国际生活》中写道辛“在印度掌权的是民族资产阶级和地主。”可是到了一九七一年，正当印度侵略巴基斯坦的时候，英迪拉·甘地把印度银行收归国有，苏联称赞这是向社会主义迈开了一步！

印度人民群众正逐渐开始看透苏联的花言巧语。今年，一九七四年，印度铁路工人爆发了声势浩大的罢工。那位据说正在采取“走向社会主义步骤”的英迪拉·甘地，竟然调遣用苏联装备的军队来镇压这次罢工。七千多英勇的工人遭到逮捕。与此同时，印度统治阶级也狠毒地压迫农民。由于帝国主义的掠夺，印度农民正面临着大批饿死的局面。

一九七四年六月，印度反动派爆炸了一颗原子弹，说是为了“和平的目的”。几天后，他们威胁说还要发展氢弹（难道也是为了和平的目的？）。印度已经有了核武器，社会帝国主义者就很有可能进一步利用印度来达到其帝国主义的目的。

在社会帝国主义不断加强它在印度的权势和影响的同时，美帝并未袖手旁观。苏联在印度的据点的出现，是对美国在南亚力量的一个挑战。正如我们在前面所指出的，美国起先想通过对印度进行经济讹诈来阻挠苏联的闯入。这一政策失败了，美帝内部的矛盾（尤其是美国针对其他帝国主义国家政策的全面利益和那些在印度彼此竞争的美国各公司的个别利益之间的矛盾）使苏联人有机可乘，插手进来，装扮成印度“独立”的救星。此后在六十年代以及七十年代初期，社会帝国主义能够得以长驱直入，而美国却在越南、老挝和柬埔寨搞得“晕头转向”，军事上陷入了困境。

如今美国的一些公司，在印度的私营经济中仍拥有很大的股权。可是美国的全面影响已是日薄西山了。因此，美国的决策者曾想在巴基斯坦取得立足点，以抗衡苏联在印度的控制。

然而，这项政策只取得了部分的成功。例如，在孟加拉战争中，当时处于主导地位的尼克松-基辛格政策，主张小心翼翼地支持巴基斯坦，尽管一开始就很清楚，这里不是势均力敌。这引起了特德·肯尼迪（即爱德华·肯尼迪——译者）之流的其他资产阶级发言人的大量批评。可能肯尼迪代表的是那些仍在印度有着重要利益的美国公司，他的计划似乎是支持印度，可能是借助于亲美的买办阶级甚至部分民族资产阶级，以抵制苏联在印度的影响。这一着可能是美国政策从苏联人那里学来的一个新花招。

苏联已经能够利用印度这个基地，加紧军事活动，特别是在印度洋的海军活动。苏联海军力量在这一区域已占了优势，它的舰船可以到印度港口加油和修理。印度洋是世界上最有战略意义的海上通道之一，它是欧亚两洲海上交通的必经之路（包括油船的航线）。它本来是美国从英国那里继承来的一个据点。可是现在美国不得不接受苏联越来越严重的挑战。因此，美帝像苏联人一样；花费了一番心血把斯里兰卡（从前的锡兰）争取了过来。更重要的是，美国正计划在印度洋中央一个叫做迪戈加西亚的无人居住的小岛上建造一个庞大的、非常重要的战略海军基地。这个基地能够同美国在阿拉伯石油酋长国以及在伊朗的据点连接起来，并有助于保护这些据点。

美苏两个帝国主义，一方面在印度以及印度洋争夺势力和控制权，而另一方面却又相互勾结共同对付这一地区的人民革命浪潮。美苏两国怂恿并支持印度反动派镇压群众斗争。这两

个超级大国都不允许日本这类小一号的帝国主义染指这一地区。

然而正如在世界各地一样，两个超级大国在印度还是以争夺为主。在某种意义上，印度正是这种争夺的一个缩影。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是当今世界上最“贪婪”的帝国主义国家，它在全世界到处向美帝挑战，它运用的手法，也正是在印度曾经用过的那些手法。在世界各地，美帝都在抵挡它的挑战，不论在经济上、政治上或是军事力量上。

苏修在印度所搞的政治活动反映了印苏两国之间的经济联系。在掌权的国大党内部，苏联支持的是买办资产阶级。虽然大部分的苏联“援助”是供应国营企业的，可是在某些苏联提供资金的工业项目中，印度私人资本占了百分之二十五的所有权，因而社会帝国主义同苏联卵翼下的印度买办资产阶级之间有了直接的非官方的联系。在掌权的国大党内部，苏联支持的那一派买办资产阶级，既包括印度的私营资本家，也包括国营资本家。

在工人运动内部，社会帝国主义所起的重要作用，也有利于苏联的渗入并继续剥削压迫印度人民。苏联在印度共产党内的影响，巩固了印共在修正主义阵营中的地位。印共领导推行社会和平主义、破坏罢工。在最近被镇压的铁路罢工中，有七千工人，其中包括许多共产党员，遭到逮捕。印共领导阻挠了印度的反帝革命运动的发展。

三、苏联和中东

在两个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中，中东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战略地区。尤其重要的是，中东国家是世界最主要的石

油供应者，它几乎能满足欧洲和日本需要的全部石油。因此，控制中东的石油可以作为对欧洲和日本这些帝国主义国家进行讹诈的一项重要武器。在发生战争的情况下，控制中东的石油更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中东位处亚、非、欧三洲的交通枢纽，在地理位置上也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同时还由于其他种种原因，中东一直是各个帝国主义之间激烈争夺的一个地区。苏联自从变成帝国主义国家以来，竭尽全力在中东向美帝挑战，企图在那里称王称霸。苏联向第三世界赊贷的全部军事“援助”的一半以上以及整个经济“援助”的四分之一都是提供给埃及、伊拉克和叙利亚的。

阿拉伯国家同以色列之间最近爆发的两次战争，即一九六七年战争和一九七三年十月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是这两个超级大国在中东争夺控制权的反映。

苏联渗入中东是从埃及开始的。埃及几十年来一直是英国的属国，由一个封建王朝统治着。它主要为老牌帝国主义国家提供棉花和苏伊士运河这两样东西。英帝使埃及处于发展迟缓和落后的状态。这就造成了埃及在本质上是单一化经济的社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帝被削弱了，埃及民族觉醒起来了，由纳赛尔领导的一些埃及军官于一九五二年夺取了政权，并在阿拉伯世界建立了第一个“激进的”国家。纳赛尔是民族资产阶级中最有魄力的领袖之一，在一段时间里，他为了打破帝国主义强加在埃及身上的桎梏而进行的斗争，曾获得了不少的胜利。因此，他在阿拉伯各族人民中间深得人心，尽管他还算不上是个真正的群众领袖。

一九五六年发生了两起事件，这两起事件注定将改变现代埃及的历史。赫鲁晓夫作了一个臭名昭著的“秘密报告”，并

开始使苏联倒退到资本主义；英、法和以色列为了夺回一年前纳赛尔收归国有的苏伊士运河而发动了对埃及的入侵。在西方国家及其傀儡国以色列进行干涉之后，纳赛尔开始竭力寻求一条途径来冲破西方帝国主义对埃及的束缚，从而可以使埃及落后的单一化经济有所改善。

掌握着那少量工业企业的埃及老牌资产阶级，不愿意也无法为力为迅速发展经济提供必要的资金。主要是因为他们感兴趣的是投资后可以立即赚到钱，而不是建设国家的长远计划。于是纳赛尔就同印度的尼赫鲁一样，企图建立起国营经济。起先，他并不是很认真地考虑，是否要向某些第二流的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如西德）要求贷款，可是，后来他决定试试苏联的诱饵。特别是苏联提出愿意为建造工程巨大的阿斯旺水坝提供资金，这个水坝的建成将能使埃及增加三分之一的耕地。

水坝的建造和由苏联提供资金的其他项目的建设，确实给埃及资本主义的发展（特别是促进了国家资产阶级的发展）以一个暂时的刺激。可是，这一点丝毫未能消除埃及对外国的依赖。五十年代后期到六十年代初期之间，苏联为了使自己能以超级大国的姿态登上世界舞台，它在提供援助时，愿意以索取政治上的代价为主。阿斯旺水坝成了苏联对发展中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友谊的“活生生的证明”。然而就在这最初的几年里，苏联人也还是通过垄断埃及的棉花生产而在经济上获得了好处。

埃及的国家资产阶级一直在玩弄着脚踏两头船的手法，让各个帝国主义国家相互争着向它贷款和出售小麦等。可是，苏联逐渐地占了上风，把埃及划入了自己的“势力范围”。

苏联特别通过贩卖军火使埃及在财政上处于极为拮据的

地位。埃及军队变得完全是由苏联装备、训练和组织的。好几千苏联“顾问”遍布埃及，指挥着武装部队。随着军火买卖的不断增长，埃及积欠苏联的债务也与日俱增。到一九六七年，埃及欠苏联的债务高达五亿埃镑。在纳赛尔掌权的整个期间，棉花生产始终停滞不前，可是粮食进口，却由一九五六年的三十万吨不断上升到一九六七年的三百万吨，在十年多一点的时间内，增长了十倍。每年进口苏联粮食的花费，竟相当于埃及全部棉花生产的价值！这就是苏联“援助”给埃及带来的“全面发展”经济的后果。

可是，社会帝国主义者对此还感到不满足。在苏联杂志《对外贸易》上有人写道：“众所周知，多年来苏联一直是埃及棉花的主要买主。可是最重要的特点……是苏联购买埃及商品货单有了根本性的扩充。现在的货单上……包括……棉纱和棉织品、针织品、大米、芝麻、花生、蔬菜、水果等等。”苏联的“购买”是社会帝国主义强加在埃及身上的控制和剥削的经济关系的一个组成部分。社会帝国主义者不仅抢走埃及人民的棉花，他们简直看到什么就抢什么！

苏联供应给埃及和其他国家军火一事，恰恰有助于保证苏联对这些国家的控制。这些军火供应的内容，主要是高技术水平的武器系统，这就迫使受援国只能打老一套的战争，不利于真正动员群众进行防御。同时，这也保证了只有苏联能够提供零部件来补充装备军队。

一九六七年六月战争中，埃及在军事上遭到了惨败。埃及要求苏联补充它在战争中损耗的武器，从而加深了对苏联的依赖。苏联人作出规定：只有在以色列再度发动突然袭击的情况下，才可以使用苏联供应的武器，这些武器不能用于进行收复

失地的战斗。在埃及人民以及整个中东阿拉伯群众的压力之下，纳赛尔的继承人安瓦尔·萨达特不得不撵走苏联“顾问”，并准备为收复领土跟以色列打一仗。

埃及并不是被苏联看中进行渗透的唯一中东国家。除了埃及，还有另一个面临以色列侵略危险的“前沿”国家叙利亚。此外，苏联人还把注意力集中在伊拉克。伊拉克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这一地区的产油国之一。苏联同美国一样，是一个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石油和天然气尤其充沛。以天然气为例，据估计苏联的蕴藏量有美国的七倍多。尽管美国地下石油藏量极为丰富，美帝还是需要不断地到别处（如委内瑞拉和中东）去开发比较便宜的资源。由于受着追求最大限度利润的规律的驱使，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也是同样的情况。

六十年代后期，伊拉克把外国石油股权收归国有，西方技术人员全部撤离回国。伊拉克政府发觉自己处于困难境地。这时，苏联就乘虚而入给予“解救”苏联提出愿意向伊拉克提供它所需要的技术援助，条件是签订贸易协定，规定苏联能以固定的价格购买伊拉克的石油。现在几乎全部的伊拉克石油都是以大大低于世界的价格卖给苏联的。

从这一地位出发，苏联逐渐地加强了它对伊拉克的控制。同样，它主要还是通过军事“援助”来达到这一目的的。伊拉克把这种军事“援助”用于防御邻国伊朗——美帝的一个亲密盟友。

在中东，美苏两国之间关系的基本性质是争夺霸权，可是它们也一起策划镇压革命。它们还试图推行“不战不和”的政策，这可以转移人民群众的注意力，使他们不要进行革命，同时也保证了中东国家依赖其中的一国的军火供应。整整六年都

处于这种状态之中。到了一九七三年十月，包括埃及、叙利亚和伊拉克在内的一些阿拉伯国家，为了收复自一九六七年战争以来一直被以色列占据的领土，同以色列进行了战争。

在这次战争中，苏联大发横财。同一九六七年战争不一样了，这一次苏联提供的军火要用硬通货支付。苏联人坚持要美元，而这些美元来自几个阿拉伯主要石油出口国，它们向“前沿国家”提供这些钱，作为它们对阿拉伯事业的献款。据《金钱管理人》杂志报道，苏联把这些美元抛到欧洲美元市场，贷给欧洲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利率高达百分之十，甚至还要高些。这本杂志指出，一九七四年第一季度，国际银行发放的欧洲美元中期贷款创造了一百零五亿的最高纪录，为一九七三年第一季度总额的四倍。（21）这清楚地表明了苏联在最近那次中东战争中，向阿拉伯国家提供的军火数量之多是如此惊人，同时也清楚地表明了，社会帝国主义者们的厚颜无耻竟然到了如此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他们很快就用这些军火收入去放高利贷，赚了一大笔钱。

十月战争以后，阿拉伯产油国家立即团结起来，运用石油禁运作为武器去对付美帝。然而，苏联却借此机会进一步渗入西欧石油市场。据英国《每日快报》报道，苏联迫使伊拉克向它出售价值六百万英镑的石油作为购买军火的部分付款。在阿拉伯石油禁运的几个月中，这些石油很快以一千八百万英镑的价格转售给了西德，一转手就赚了百分之三百的利润，这种手法真使洛克菲勒之流也为之望尘莫及。

自从十月战争以来这一段时期中，阿拉伯产油国以及第三世界其他产油国，团结起来提高出售给帝国主义国家的石油价格。可是，大多数出售给苏联的石油价格已被贸易协定钉死了，

这些贸易协定都是在石油价格极为低廉的时候签订的。据《太平洋流域报道》所载，“苏联根据某些合同以相当于三美元一桶的价格买进原油，一转手在欧洲就以三倍的价格抛售出去。”就这样，苏联不但不支持产油国提高石油价格的正义斗争，反而利用过去签订的合同以低价获得石油，然后在欧洲高价出售，以此获得好处，而欧洲的高价也正是由产油国采取一致行动所造成的。科威特《舆论报》直截了当地指出，苏联“又一次企图以石油作为桥梁进入欧洲，而在这同时阿拉伯国家正在利用石油武器支援阿拉伯的事业。”

十月战争以来，两个超级大国在中东的争夺日益加剧。代表着美帝总利益，特别代表着洛克菲勒财团利益的“基辛格外交”，是针对苏联在几个阿拉伯国家，尤其是在埃及的控制权进行挑战的一个尝试。在一九七四年六月的中东“使命”中，尼克松竟然答应向埃及提供核技术，声称是为了“和平的目的”（虽然尼克松现在已经下台，但这项政策仍然有效）。

另一方面，苏联也试图打进以色列。当十月战争进行得最激烈的时候，苏联居然允许大批犹太人，尤其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和有技术的犹太人移居以色列，这样就向以色列提供了最迫切的需要，即更多的士兵和受过高级技术训练的人员。

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们还无法预计美帝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日趋疯狂地争夺中东控制权将会产生怎样的结局。不过有一点还是清楚的，即苏联将从埃及和以色列签订的和平协议中获得很大的好处，协议规定重新开放苏伊士运河，使苏联从黑海港口到印度洋的航程缩短了九千海里。可以肯定地说，超级大国之间日益加深的矛盾，一方面只会增加继续发生战争的危险，而不是“保障了和平”；而另一方面，它又确实造成了

一个动乱的局面，而这个局面是有利于该地区人民的革命斗争的。

正如他们在印度所做的那样，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者，煞费苦心地用“社会主义”、“和平”、“民族独立”这样一些甜言蜜语，来美化他们的掠夺。社会帝国主义的“理论家”们喋喋不休地侈谈“国际分工”。这个理论的实质是，在“分工”中，有些国家只能生产棉花和石油；而另一些所谓“先进的”国家（应该读成帝国主义，特别应该读成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就可以集中发展工业等等。这同过去英帝所鼓吹的“英国是世界的工厂”的“理论”真是如出一辙。这些谬论，都是用来为使世界广大地区继续处于贫穷和落后状态作辩护的。

苏联杂志《经济问题》写道，“形成并加强社会主义国家同发展中国家之间在燃料和原料部门分工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同一篇文章中又写道，“粗略地比较一下苏联开采石油和天然气的费用，以及从某些发展中国家进口石油和天然气的费用，可以看到，在有些情况下，这种进口甚至是对苏联有利的。”尽管苏联的所作所为同老牌帝国主义根本没有什么两样：即向全世界扩张，企图垄断原料资源并从第三世界国家身上攫取超额利润；但却千方百计地为自己涂脂抹粉。

苏联在天然气的交易上，同石油交易的情况完全一样。正如上文所指出的，苏联拥有惊人的天然气蕴藏量。然而作为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它不仅满足于找到天然气，还要追逐利润。苏联已经同阿富汗和伊朗达成购买天然气的协议，并正在修筑管道把天然气输入西欧和东欧。这就是苏联所指的“燃料部门”的“国际分工”。

苏联对中东的渗入，在军事上也有很重大的意义。在一九

六七年战争以前，在地中海里很少看见苏联的舰队，现在它的舰队显然已成了这一地区占优势的海军力量。美国的第六舰队只有在希腊和意大利受到欢迎；如果它出现在土耳其，就会引起成千上万人的示威。最近在塞浦路斯爆发的战争，是这两个超级大国在地中海进行疯狂争夺的又一个典型的例子。战争以后，美国在希腊的影响，似乎也削弱了不少。与此相反，苏联舰队如今却能进入地中海、波斯湾以及红海的许多港口。苏伊士运河开放以后，将会大大加强苏联在这一地区的军事力量。苏伊士运河将把苏联在地中海的舰队和它在印度洋的强大海军部队连接起来。

在争夺欧洲霸权或世界霸权的任何战争中，控制中东石油资源具有关键性的意义。苏联计划铺设油管线，把中东的石油和天然气通过苏联直接输送到欧洲，这将是苏联用来同美帝争夺控制欧洲的一项重要武器，同时也保证给社会帝国主义带来巨额利润。事实上，欧洲正是两个超级大国争夺的关键性地区，对欧洲的争夺给两个超级大国在中东的角逐增添了新的非常重要的内容。已经可以预计，到一九八〇年，西德天然气百分之十的消耗量将来自苏联，其中大部分是在中东生产的。意大利已同苏联签订了协议，苏联将向意大利供应它所需要的天然气的百分之二十五。

阿拉伯人民以及中东其他各族人民正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他们必须同两个超级大国斗争——苏联虽然标榜自己是阿拉伯人民的朋友，而事实上却是一个凶狠的帝国主义剥削者。

四、苏联掠夺第三世界国家的其他事例

我们集中分析了苏联在印度和中东所扮演的角色，因为这

两个地区使我们最清楚地看到社会帝国主义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剥削和掠夺。然而苏联并不满足于把它的渗透只是局限于这两个地区。在世界的各个角落，苏联都在试图同美帝争夺资本输出的市场和原料来源，并企图把别国变为它的“势力范围”。

在整个第三世界，苏联一直在扮演着军火商的角色。根据瑞典政府收集的数据，苏联在五十年代后期平均每年贩卖的军火是九千五百万美元，占世界军火贸易总额的百分之十一点三，到了七十年代初期，已增加到占世界军火贸易总额的百分之三十七点五左右。仅仅在一九七二年，苏联就贩卖了价值二十二亿美元的军火。近年来，苏联改变了它对第三世界掠夺的某些方式，从“经济援助”改为“军事援助”。例如，一九六六年的“经济援助”是“军事援助”的三到四倍，可是一九七〇年的军火出口，达到了“经济援助”的四倍。

正如前面所说到的，苏联的“经济援助”和“军事援助”并不是用来帮助受“援”国的。社会帝国主义的这种“援助”只能起到阻碍这些国家自力更生地发展本国经济的作用，并束缚住这些国家的手足，好让苏联统治者在他们身上无止境地榨取利润。苏联一方面在战争中大发横财；而另一方面，又虚伪地大念其“和平”经。在二十八届联合国大会上，他们建议所有国家的军事预算，都一律要削减百分之十。这一建议遭到了广泛的抵制。大家都很清楚这完全是宣传性的骗人鬼话。

甚至在拉美这一美帝传统的“基地”，苏联也正在那里加紧同美国争夺。苏联人向不少拉美国积极提供了“贷款”，社会帝国主义者们在侵占他们的美国对手的地盘时，几乎总是先从这方面着手的。苏联对南美沿岸渔场的掠夺尤为粗野。苏联人拥有世界最先进的捕鱼船队，他们的拖网渔船一网捕得的鱼

的吨数，比美国最大船只所捕的要多好几倍。他们在南美沿岸渔场捕鱼，给这些国家带来了极为严重的困难，造成了许多当地渔民的贫困。这些渔民根本没有能力同帝国主义，尤其是苏联的现代化的大规模的捕鱼船队进行竞争。

因此，拉美人民和政府要求，把他们的领海权扩大到两百海里。这一正义要求，得到了第三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支持，也得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强有力的支持。然而，苏联和美帝以及一小撮其他海洋强国合成一伙，企图反对两百海里界限，而把十二海里界限强加给第三世界国家。

苏联还建议巴拿马运河“国际化”，这同巴拿马人民坚持收回运河主权，反对“国际化”的要求是背道而驰的。在亚洲，许多对苏联商船和海军活动关系重要的海峡，也成了“国际化”的目标。苏联反对第三世界国家掌握本国海底资源和海峡的要求，因此它发觉自己处于日益孤立的地位。在最近举行的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上，两个超级大国都遭到了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的严厉谴责。

像美帝一样，社会帝国主义也对其他国家进行经济讹诈，并在世界市场上推行“倾销”商品的恶劣政策，全然不顾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因他们倾销商品而遭到严重的破坏。苏联同马来西亚的关系是这种讹诈的一个典型例子。据《远东经济评论》一九七二年报道，“今年开始谈判签订一项技术合作条约的时候，俄国人企图对马来西亚进行讹诈，威胁说将更多地使用合成橡胶。由于苏联早就成了马来西亚天然橡胶的最大买主（每年购买总产量的百分之二十五左右），其弦外之音昭然若揭。”苏联的仆从国印度也曾经在背后吃过它这样的一刀。据报道，

苏联“用卢比以慷慨的价格买进印度产品，然后再拿到印度的传统市场上去折价卖出，赚进硬通货。”

社会帝国主义还利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修正主义政党来达到他们的目的。众所周知，一九七一年苏丹的未遂政变，正是他们企图在苏丹共产党支持之下，建立一个亲苏政权的精心作品。在另一些国家里，只要有助于实现他们的帝国主义计划，他们竟然命令“共产”党解散，例如在埃及就是这样。在智利，亲苏的“共产”党跟着社会帝国主义一唱一和，鼓吹所谓“通向社会主义和平道路”的谬论。实际上，智共领导人和社会帝国主义所追求的，不过是把美帝卵翼下的傀儡国，“和平过渡”为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控制的傀儡国而已。由于智利“共产”党的破坏，给那里的革命运动所造成的悲剧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正如前述，两个超级大国之间是以争夺为主。但并不排斥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同美帝以多种形式进行勾结，其中竟然包括给美国的公司保险，这种保险业务是提防美国公司财产被第三世界国家政府没收而开设的。苏联参加“分保”业务，风险较小，但却有外快可捞，同时，还有助于镇压真正的革命斗争，这正是社会帝国主义同美国所共同关心的事情。

美国政府的私人海外投资公司是用来保护美国垄断资本免遭没收危险的。该公司于一九七二年四月披露，苏联正在帮助给美国公司保险，提防在七十个发展中国家遭到没收。苏联国家保险机构国家保险管理总局的子公司，即伦敦黑海波罗的海保险公司，正在为私人海外投资公司在伦敦劳合作名下的二千六百万美金的部分投保额承担再保合同。因此，在阻挠第三世界国家没收美国公司中，苏联是有着直接财政利害关系的。

如果在这些国家里苏联确实能设法占到上风把美国排挤出去的话，他们偿付保险费的损失肯定会在其他收益中得到补偿，并且还会绰绰有余。社会帝国主义者就是用这种方式从两方面保护着自己的利益。

在从事再保险这个问题上，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丑恶面貌的大暴露是对柬埔寨朗诺反革命政权的支持。

美国支持的柬埔寨政变，废黜了合法的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柬埔寨人民和越南、老挝两国人民紧密团结，进行了英勇的民族解放战争。在整整三年中，苏联拒不承认西哈努克领导的合法政府（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尽管西哈努克政府控制了百分之九十的国土，解放了三分之二的人口，并获得了世界上大多数政府的承认。

相反，苏联在外交上却承认了龟缩在金边和其他几个城市的朗诺集团。一九七三年秋天，在一次不结盟国家会议上，七十多个出席会议的政府一致要求承认西哈努克政府为柬埔寨的唯一合法政府，这使苏联人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直到这时，社会帝国主义才作了应变的退却。他们向西哈努克发了一个照会，然而仍未明确声明承认王国民族团结政府。苏联至今仍然把柬埔寨人民的斗争描绘为“骨肉相残”的战争。他们企图以这种方式抹煞柬埔寨解放斗争的性质，即它是一场受到绝大多数柬埔寨人民拥护的、反对美帝和一小撮卖国贼的人民战争。

然而苏联对柬埔寨的叛卖远远超过了它对朗诺集团在政治上、外交上的支持。据美国参议院一个小组委员会和《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杂志的调查披露，朗诺集团的保险公司（国家保险公司），得到了苏联的国家保险管理总局和其他六个外国保险公司的再保险。因此，英勇的柬埔寨人民流血牺牲，力图

阻挡从南越沿着湄公河运来的汽油、军火等物资，都是得到苏联保险的！真是令人作呕。

五、社会帝国主义怎样从第三世界国家榨取剩余价值

我们举例说明苏联是怎样掠夺并干涉第三世界国家的，不过是为了要证明这一点，即苏联的外交政策完全出自于它已经变成帝国主义国家这一事实。列宁在他的经典著作《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所分析的帝国主义的规律同样支配着苏联。列宁所阐述的帝国主义的特征中有许多方面今天依然影响着帝国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之间的关系（垄断市场的需要、重新瓜分世界的斗争等等），然而所有帝国主义的最主要的特征，即迫使其不得不推行侵略和掠夺政策的特征，却是帝国主义要向世界各个角落输出资本并榨取超额利润的迫切需要。

列宁指出，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出现了大量的‘过剩资本’……”他进一步指出，在帝国主义制度下，以贷款工业设备、铁路等形式的资本输出取代了国际资本主义的传统剥削形式，即资本家主要通过贸易向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出口工业品换取原料。

帝国主义为了输出资本掠夺财富而去征服其他国家的那股劲头，完全不同于这国或那国政府或商人想取得一点经济特惠的愿望。他们那股劲头，正是构成包括苏联在内的所有帝国主义国家的外交和军事政策的推动力。

当然，苏联的新沙皇们并不会自称是帝国主义者。他们煞费苦心地“证明”他们不可能是帝国主义者。例如，有这样一篇名为《苏联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合作》的苏联宣传品，就企

图证明这一点。在这篇文章中，苏联辩护士B·里马洛夫写道：“苏联以信贷形式为亚、非、拉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大量的资金和物资，这并不是因为苏联在这方面有所过剩。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这种过剩的资金和物资，在国内（不能）有利可图地加以运用……在苏联没有，也不可能有必要向国外输出过剩的资金和物资……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每一个卢布，都能非常有效地运用于满足国内经济发展和进一步改善人民生活的需要……苏联向不发达国家提供的贷款和帝国主义国家提供的贷款，有着本质的区别……苏联贷款并非资本输出，而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向其他各国人民提供兄弟援助的一种形式。因此，这些贷款发放的条件，在本质上不同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条件。其主要不同之处是，苏联贷款有利于在以前的殖民地附属国建立一个独立的民族经济；而资本主义国家的财政‘援助’却使这些国家永远保持着在经济上，而归根到底还是在政治上，依赖于帝国主义。”

作者还进一步指出，苏联贷款只有百分之二点五的利息，可以在十二年内偿还，等等。除了声称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并不是帝国主义国家之外，里马洛夫还为他的论点所能提供的唯一真实的证据，就是苏联贷款的索价，确实是低于苏联进入资本输出市场以前西方帝国主义的索价。但是，里马洛夫根本没有让我们看一看苏联“援助”的全貌。他避而不谈的正是揭示出这种“援助”的帝国主义性质的东西。

首先，他忘了告诉我们，所有的苏联“援助”，正如我们在本章前几节中所指出的，是限制性的，即只能用来购买苏联生产的商品（有时也包括苏联东欧傀儡国的商品）。这些商品主要是资本货物，即成套工厂设备、重型机械等。他们不是按

照世界市场牌价，而是根据贸易协定价格出售的。

许多研究资料揭露了苏联索取高价的情况。据一项资料披露，一九六五年，苏联向工业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出口的六十五种商品中，有五十三种是以高价售给这些“有幸”得到苏联“援助”的国家同样一种商品，卖给发展中国家的价格要比卖给工业国家的价格，平均提高百分之十三。最近中国公布的更多数据表明，这个价格差距已上升到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三十。很明显，这种不等价交易给苏联带来了巨额利润。

有人会急于指出，帝国主义在发展中国家，是通过资本输出而不是通过不平等贸易来获取利润的。他们并以此作为根据，表示不同意那种认为事实上苏联正在输出资本，并从第三世界和其他国家榨取剩余价值的说法。

然而，这一论据实际上是空洞的。毛泽东写道：“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表面上看来，苏联投资赢利率是非常低的，尽管这是通过不平等贸易赚到的。但是问题的实质在于：苏联正是通过不平等贸易来实现资本输出所产生的剩余价值。实质上，究竟苏联是以获取利息的形式赚回利润，还是从销售获取超额利润，在贸易协定将这种销售和资本输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时候，这只不过是一个记账方式而已。

也许下面这个事例会有助于阐明这个问题。假设有这样一个煤矿，所有的工人都被迫居住在一属于煤矿公司的城镇里。公司对食品、房租以及其他所有生活必需品都规定了价格，比方说，都是市价的两倍。很明显，如果要了解煤矿资本家从矿工的劳动中榨取了多少剩余价值，只看他们的工资数额，那是

太肤浅了。我们必须了解矿工的工资，即他们用工资所能购买的商品和劳务的数量。

这并不意味着，这些矿工既作为工人又作为“消费者”受到双重的剥削。问题在于，煤矿资本家以两倍的价格出售商品赚得利润，只不过是入账的一种方式，而这种方式是用来掩盖他攫取的剩余价值来自矿工的劳动这一事实。由于煤矿公司的绝对垄断，矿工被迫不得不按大大高于实际价值的价格，在公司所属的商店购买商品。

在本质上，苏联就是运用着这种方式掩盖了它在那些国家中，特别是在它输出资本的第三世界国家中，所榨取的剩余价值的总额。这是因为，再重复一遍，苏联同接受其“援助”（资本）的国家之间的贸易，是通过规定了偿付贷款方式的条文进行交往的，这种贸易的性质完全是根据苏联和受“援”国之间的关系，即帝国主义国家和被剥削国家之间的关系所决定的。

现在让我们再来仔细看看里马洛夫用来“证明”苏联并非帝国主义国家的一些其他论点。他说在苏联“每一个卢布都能非常有效地运用于满足国内经济发展和进一步改善人民的需要。”我们已经看到了苏联经济的可悲状况，在下一章里，我们将看到更多的这种迹象。

很明显，苏联的生产并不是用来“满足人民的生活”的，否则，我们就不可能看到苏联生产会作出这样重大的变动，即从劳动人民基本日用必需品的生产，转到伏特加和时装之类更为有利可图的生产了。那种认为苏联正在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利益而作出“牺牲”，以及苏联输出的资本原来是可以用于苏联国内生产的论点，是根本站不住脚的，这正如我国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和修正主义的“共产”党所提出的，只要我们

把军事费用和海外投资“移作他用”，就能消灭国内的失业现象的论点，也同样是站不住脚的。这种论点意味着，帝国主义者仅仅是出于个人的意愿才输出资本，把世界瓜分为相互竞争的势力范围的。可是，不能把帝国主义者简单地说成是坏人或蠢人。是客观的生产关系迫使他们这样干。如果他们不这样干的话，那末，他们也就不成其为帝国主义者了。

针对这种见解，列宁曾作过这样的阐述：“用小资产阶级观点来批评资本主义的人，就常常提出这种‘论据’。但是这样一来（即消除工业与农业之间的不平衡并提高群众生活水平——“革命联盟”注），资本主义就不成其为资本主义了，因为发展的不平衡和民众的半饥半饱的生活水平，是这种生产方式的根本的、必然的条件和前提。只要资本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过剩的资本就不会用来提高本国民众的生活水平（因为这样会降低资本家的利润），而会输出国外，输出到落后的国家去，以提高利润。”

列宁对老牌西方帝国主义的论述，同样也完全适用于社会帝国主义。为什么苏联不去开发自己在西伯利亚的丰富天然气，却要向伊朗购买呢？为什么苏联要在工资每天只有十六美分的印度建造工厂，然后进口这些工厂的产品，而不把这些工厂建造在莫斯科呢？这正是因为“‘有利可图’的投资场所已经不够了”，而不是像里马洛夫所说的那样“发展（其他国家的）经济”。难道社会帝国主义者真期望人们会相信他们的掠夺只不过是“兄弟般地援助”吗？很明显，他们永远也无法使苏联人民或遭受社会帝国主义剥削的其他国家的人民相信，苏联农业的落后和经济停滞的状态，是由于苏联出于对发展中国家人民的“热爱”，而作出了“牺牲”！

在苏联《经济问题》杂志上，JI·泽文阐述了苏联是如何帮助第三世界国家“发展经济”的。他写道：“同社会主义国家合作，能促进发展中国家形成一个以现代技术为基础的合理的民族经济综合体；能导致消除过去遗留下来的不完整的经济结构以及对外界因素的单方面依赖；能发掘潜在的资源；能促进生气勃勃的经济发展；并能使发展中国家有能力在不损害本国经济进展的情况下，用不断增长的国民收入的一部分偿还外债。”

但是事实胜于雄辩。在现实的世界里，而不是在苏联辩护士幻想的宣传的世界里，印度这个接受苏联“援助”最多的国家，已在苏联的债务中越陷越深，根本不可能“在不损害本国经济进展的情况下……偿还外债。”埃及是另一个苏联“援助”的受惠国，它仍然不得不进口千百万吨的粮食，同时集中种植棉花，用来偿还给苏联，作为进口粮食和建造阿斯旺水坝的代价。难道这就是泽文所写的“消除过去遗留下来的不完整的经济结构”吗？就我们所能看到的，接受苏联“援助”的第三世界国家中，唯一的“生气勃勃的经济发展”，就只是更大的剥削有了更快的发展。

就在同一篇文章中，泽文竟然厚颜无耻地引用列宁的话。列宁曾经说过，西方的无产阶级在取得胜利以后，就会帮助东方受压迫的各族人民向机械化、向减轻劳动强度过渡，向民主和社会主义过渡。然而，社会帝国主义根本不是按照列宁的教导去做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事实上是有助于发展中国家加强本国的经济独立的，尽管这种援助并不能代替发展中国家的人民解放自己的国家和解放生产力的革命斗争。但是，苏联的资本输出和真正的社会主义援助毫无共同之处。苏联在印度

建造工厂，并不意味着减轻印度工人的劳动。远远不是这么一回事。苏联在输出资本的同时，也输出了资本主义的剥削和苦难。

帝国主义确实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修建了工厂、铁路等等，在这个意义上，所有的帝国主义都为受害国“发展了经济”。但是，帝国主义阻碍了这些国家生产力的实际发展。特别是帝国主义在农村保持了半封建的生产关系，它阻碍了国内市场的实际发展，它使几百万农民处于饥饿状态，并且它还提供了无穷的工人，他们随着机器的运转而被榨尽最后的一滴血汗。

受饥挨饿的印度，是一个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它使我们看到社会帝国主义并不是在帮助印度“发展经济”，它只不过把资本主义剥削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经济结合起来了，丝毫也没有对生产关系的实质作任何根本性的变革。几十万人正受冻挨饿而死去，但与此同时，却以印度钢产量有所增加（其中大量是出口到苏联的）来证明“发展经济”，这种作法，简直是下流无耻。可是，这却正是修正主义者企图向世界人民贩卖的货色。

同社会帝国主义在“援助”的幌子掩盖下的掠夺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真正社会主义国家的无私援助，这种援助支持了第三世界国家反对超级大国的控制和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及其反动帮凶的斗争。其中一个很突出的例子，就是中国援助坦桑尼亚和赞比亚修建的一条铁路。这条铁路将连通两国，促进它们相互之间的贸易，并使赞比亚可以不依赖罗得西亚种族主义政权，就能把它的主要产品，特别是铜，运往海岸。

当这两个国家要求帝国主义帮助的时候，他们得到的答复

是：修筑这条铁路不合算、没有必要。很明显，坦赞铁路将会成为由帝国主义修建的并为帝国主义利益服务的原有铁路的一个竞争对手。然而，中国承担了这一项目的援助。中国不仅提供了经济上的援助，并派遣了技术人员参加修建工作，他们同坦桑尼亚人民生活在一起，并在修建铁路的过程中，给予非常宝贵的援助。此外，坦桑尼亚和赞比亚还派遣学生到北京学习铁路技术和铁路管理。

这条铁路计划在一九七六年后期完成。它的完成，将不仅有助于坦桑尼亚和赞比亚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斗争，还将加强对非洲各国解放运动的援助。坦桑尼亚总统朱利叶斯·克·尼雷尔一九七四年三月访问中国时，对这项援助发表过如下评论：“世界上的富国都讲援助穷国。其中少数几个提供了援助，但是大多数企图利用‘援助’来掩盖进一步的剥削。中国不是一个富国，它什么都没有讲。它直截了当地使我们有可能修建一条连接我们两个独立的非洲前线国家的铁路，而没有利用我们的困难去谋利，甚至没有就此大做宣传——尽管你们完全有理由这样做……这条铁路对于我国和自由非洲将有极大的价值。但是，在铁路上担任技术人员和教员的中国同志艰苦奋斗和忘我服务的榜样，对于坦桑尼亚未来的发展可能是同等重要的……我相信你们把对坦桑尼亚和非洲解放运动的帮助，作为对世界革命事业的一项贡献。我们对你们的最好感谢，就是使这一事业在我们自己的地区获得成功。我向你们许下诺言，我们将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中国提供真正援助的政策和苏联以“援助”作为剥削手段的做法，是由于这两个国家在当前世界上所起的完全对立的作用而产生的。这一情况归根到底是由两个国家的不同的社会制

度的性质所决定的——中国是工人阶级统治的社会主义国家，而苏联的统治者却已复辟了资本主义，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变成社会帝国主义的超级大国。

近年来，逐渐形成了一个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为首的、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统一战线。在整个第三世界，人民从过去的痛苦经历中，了解到只有同两个超级大国进行斗争，才能使他们的国家赢得民族独立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各个国家的主要敌人各不相同的这种说法是正确的。例如印度支那人民把主要火力集中在美帝国主义身上，而近年来社会帝国主义已成为印度的主要敌人。

在某些情况下，利用超级大国之间的矛盾，采取各个击破的策略是适宜的，甚至是必要的。但是在任何时候，最重要的是要看到，在战略上无论是美国还是苏联，都是世界人民的敌人。如果不能作出这样一个正确的估价，那将是非常危险的，将会导致以一个超级大国的统治来取代另一个超级大国的统治，从而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

有些人，其中包括许多真心实意的革命者在内，指出苏联在世界各地支持解放运动，因此认为苏联的所作所为不是帝国主义的行径。当然，苏联除了煽动并支持一些反动的“起义”运动（如孟加拉和前述其他例子）之外，它确实也支持过某些真正的解放斗争。但是，这并不会改变已经证实了的事实，即苏联是一个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的）国家；也绝不会由于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支持了解放运动而显得自相矛盾。特别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为了同美帝国主义争霸，对解放运动提供了一些军事和经济援助，那不过是苏联人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在同美国的争夺中多占点便宜而已。

美帝国主义同其他强国进行帝国主义争夺时，在许多场合下，也曾经这样做过。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曾经同印度支那、菲律宾以及其他地区的解放运动进行过一定程度的合作，甚至还对它们进行了援助，因为这些解放运动的矛头是指向日本的。然而菲律宾的例子也表明，尽管在有的情况下，它同某个帝国主义国家进行一定程度的合作是必要的、正确的，同时却存在着一种危险，即不能十分了解并教育人民群众认识帝国主义的本性。

菲律宾共产党没有能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大战以后立即使自己的党员以及菲律宾人民认识到，一旦日本被打败，美国就会从暂时的盟友变成菲律宾的主要压迫者，并在菲律宾重新建立起它的统治。结果菲律宾革命运动遭受了严重的挫折。

当然，正像美帝国主义一样，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妄图控制并利用这些解放运动斗争来达到其帝国主义的目的的做法，是永远不会得逞的。帝国主义的愿望是一回事，可是，这些愿望能否实现，那又是另一回事。在当前世界上，两个帝国主义超级大国之间的争夺在左右世界事务中，起着如此决定性的作用，形成了天下大乱的复杂局面，其特点是既给人民的斗争造成了有利的条件，也带来了极大的危险。为了抓住这个有利条件，迎着危险向前进，我们必须紧紧掌握住苏联的帝国主义本性；并了解到，归根到底是帝国主义的规律决定了苏联在世界上的所作所为。

六、苏联和它的东欧殖民地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在世界各地加紧谋求霸权，与此同时，

还采取行动加强对后院——东欧的控制。除阿尔巴尼亚以外的绝大多数的东欧国家，原来都不是依靠自己革命运动的力量来发展社会主义的。这些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将要结束的时候，都是由于苏联红军的英勇挺进才从纳粹的枷锁下获得解放的。苏联军队在所有这些国家都被当作解放者而受到欢呼。战争结束以后，苏联的友谊和社会主义的来临也受到这一地区各国人民热情洋溢的欢迎。这些国家的反动阶级（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以前基本上同纳粹为伍，或者完全听命于纳粹。随着同盟国的胜利，这些势力的合法性和权力也就丧失殆尽。

于是，这些国家就有可能在一九四五年以后开始社会主义建设。在这里，工人国家采取的形式绝大多数称为“人民民主国家”，因为，鉴于这些国家当时的特殊情况，无产阶级的专政都以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工人阶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各阶层这三者之间的民主联盟为基础。这些国家同苏联一样都遭受过战争的巨大创伤，他们在独立和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依靠苏联的兄弟般的合作和援助，着手重建遭到严重破坏的经济。

战争期间，美国曾保证帮助这些国家和苏联进行重建，以“感谢”这些地区的人民对反法西斯事业作出的巨大牺牲。但是，当后来美国提出马歇尔计划时，这种援助所附带的政治条件是不能接受的。东欧国家处于严重困境。尽管苏联也面临着恢复经济这一无比艰巨的任务，斯大林还是提出了互助合作、互相交流的方针。斯大林的总目标是促进东欧国家经济的独立发展，但是在这同时，他也提议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尽可能地进行合作并使其经济一体化。经济互助委员会（经互会）就这样诞生了。

但是，经互会从一开始就由于沃兹涅先斯基（他又显露出

丑陋的头角了！）的所作所为而遭到破坏。他作为苏联的首席经济官员而被委以管理该组织发展的职责。尽管当时的情况人们不尽了解，但是，沃兹涅先斯基显然在某种程度上把经互会引上了助长苏联统治的歧途。虽然在一九五六年以前，这种统治从未成为经互会在行使职能过程中的特征，但它的真正的弱点即使在沃兹涅先斯基死后仍继续存在。

斯大林在战争结束时，决定暂时将社会主义阵营的总发展从属于苏联的恢复，这一决定也部分地助长了苏联对经互会的统治。随着美帝国主义不断地推行侵略扩张活动（比如在希腊），炫耀原子武器，对苏联的威胁不断加剧，因此尽快地建设苏联的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是生死攸关的。这对于那些人民民主国家的安全也是极为重要的。但是，斯大林这一政策的目的并不在于造成任何长期的组织结构上的依赖性，而只是在于暂时给苏联的需要以某种优先考虑。这在当时是一项必要的并且总的说来是正确的政策。

由于东欧国家主要是从外部获得解放的，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并不十分强大。尽管许多共产党员曾经是英勇的反纳粹地下战士，尽管共产党在绝大多数国家中是很得人心的，东欧的共产党却并没有坚实地在群众之中扎下深根，他们的革命经验在许多方面也是有限的。因此，这些党有时，甚至在他们总的说来仍然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时候，还会犯严重的错误，这也是不足为怪的。这种错误在五十年代初给美国和西欧帝国主义以可乘之机，在东德和波兰挑起反动叛乱。

一九五六年，帝国主义设法利用匈牙利共产党所犯的错误，在这个国家煽动了反革命叛乱。这一叛乱从匈牙利共产党内部的某些修正主义分子那里得到了帮助。那时，所有真正的

共产党人都承认，在匈牙利许多正直的人都受了蒙蔽，但是他们决心不让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遭到帝国主义的破坏，尽管那时赫鲁晓夫已经开始将苏联引向修正主义道路。

在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世界各国共产党的建议下，赫鲁晓夫把军队派进了匈牙利。如果在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尚未在匈牙利煽动那些最为反动落后的力量之前，赫鲁晓夫就能果断坚决地及时采取行动的话，流血本来是可以大大减少的。

匈牙利叛乱不仅仅表明了东欧共产党的脆弱。这个叛乱实际上是由于赫鲁晓夫几个月以前在苏共二十大上的发言，特别是他对斯大林的攻击所引起的。这一反革命攻击使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混乱，削弱了许多执政的和在野的共产党的地位。情况表明，匈牙利共产党出现了极为严重的动乱，帝国主义分子则立即抓紧时机利用这种形势。

如果赫鲁晓夫没有对斯大林、对马列主义和对无产阶级专政发起攻击的话，如果他没有把苏联共产党和其他许多共产党拉上修正主义道路的话，匈牙利共产党人是有可能改正自己的错误的，他们也许还不至于像当时那样在通向修正主义和在匈牙利复辟资本主义的道路上滑得那样远，匈牙利事件也可能在依靠群众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上获得解决。然而，情况却不是这样。相反，赫鲁晓夫却采取威逼利诱、软硬兼施的手法，把当时已经相当虚弱、动摇不定的东欧共产党完全拉进了修正主义的泥坑。这些党听从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指挥，复辟了资本主义制度。

绝大多数东欧共产党事实上都没有在群众斗争中经受过充分的锤炼，唯独阿尔巴尼亚是例外，这一点是举世闻名和鼓舞人心的。由于这个原因，这些东欧共产党就轻而易举地成了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牺牲品。进驻匈牙利，在当时大体上还是正确的，因为它确实阻止了当时的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落入帝国主义的魔掌。但是，它使东欧领导人由此感到恐惧，而屈从苏联，这是它的反面作用。几乎所有的东欧共产党都附和苏共二十大的修正主义论点，唯独恩维尔·霍查同志领导下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杰出地对这些论点进行抵制和谴责。

但是，在修正主义把苏联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演变为一个帝国主义超级大国的同时，它却使东欧国家沦为在苏联帝国主义面前卑躬屈膝的仆从。今天这些国家无疑地是苏联的殖民地，其中包括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东德和波兰。

有些人争辩说，这是不可能的。他们指出，有些东欧国家，例如捷克斯洛伐克，在某些方面工业比苏联更为发达。情况确实是这样。但是，老沙皇帝国的情况也是这样。不管其工业如何发达，东欧国家中没有一个是能在军事上同苏联对抗。即使将其所有的经济能力加在一起，这些国家也没有足够广泛的经济基础能同苏联的全部工业能力相匹敌。这样，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他们要么继续充当苏联人的仆从，要么设法投靠美帝国主义及其西欧伙伴以得到保护和统治，如同捷克斯洛伐克人在一九六八年试图做的那样。

当然，还有第三条道路。可以相信东欧国家有时可能通过谨慎地挑动一个超级大国反对另一个超级大国或通过其他方式，坚持自己的权利而赢得某种程度的民族独立。南斯拉夫运用这种策略取得了一定的成功，社会主义国家也鼓励这种独立，正像它们鼓励美国的许多傀儡同其主子讨价还价，赢得让步。

但是，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坚持像阿尔巴尼亚在东欧成

功地奉行的那种真正自力更生、真正独立自主的长远政策。在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掌握着政权，它的领导阶层在马列主义革命科学的指引下，敢于发动广大群众为捍卫独立和社会主义而斗争。只有在工人阶级能自由地发挥作用，推动经济全面平衡地发展的国家中，只有在党和群众紧密团结、相互汲取力量的国家中，才有可能保持完全的民族独立。这种情况是苏联在东欧的那些傀儡领导人连做梦也难以想象的，因为他们本身就是资产阶级分子。即使他们真的梦想到这一点，他们也会称之为噩梦。

今天，我们知道苏修炮制了“国际分工”的拙劣“理论”，为他们对东欧和其他地区的掠夺辩解。根据这种理论，每一个东欧国家都要为苏联新沙皇的利益作出特殊的“贡献”。正如保加利亚《国际关系》杂志指出的，“国际分工”“将在各国的发展过程中，大大滋长片面性和依赖性”并将“加剧各国之间的不平等”。

苏联对东欧进行经济统治的主要工具是经互会。沃兹涅先斯基的在天之灵如果知道他的得意门生柯西金也像他一样精通这门修正主义课程的话，他一定会洋洋自得的。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者声称，所有的经互会国家都必须承认苏联的“领导作用”。他们公然说，某些国家，比如保加利亚和蒙古（经互会的非欧洲成员国，也处在苏联统治的铁蹄之下），不必“发展某些工业部门”，因为苏联已经“建成了这种工业部门”。这些国家因此奉命向苏联提供原料，甚至像保加利亚那样，提供廉价的劳动力。

每年有好几万名保加利亚伐木工人进入苏联，在科米的森林里砍伐木材。今年，据报道说，大约有二万多名保加利亚人

在苏联阿尔汉格爾附近从事一家巨大的造纸和纤维素厂的修建工程。难道这些工人不能对保加利亚经济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吗？

当然，在保加利亚，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者也推动了诸如瓦尔纳等黑海休养地的发展。但这是供工人享用的吗？很难这样说。这里的海湾已成为专供苏联和东欧官僚度假的禁地，并且越来越向西欧和美国的旅游者开放。

在经互会中，即使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地区，经济发展也是畸形的。例如捷克斯洛伐克，如果它的经济是全面发展的话，它现有的先进机床工业的发展，早已大大超过了目前的需要。捷克斯洛伐克机床工业的方向是满足苏联的需要。它的整个经济失去平衡，完全依赖于对外（主要是苏联）贸易。在波兰，符合苏联统治利益的专业化造成了波兰产品品种的减少。那里的批评者指出这种情况怎样在“技术进步、原料和投资方面起着不利的影晌”。

不仅如此，在“兄弟般合作”的借口下，苏联垄断了对东欧的燃料和原料供应。这是进行控制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手段。据统计，东欧经互会各成员国“现在从苏联进口几乎全部石油，百分之八十到百分之九十的铁矿石和木材，四分之三的石油产品、金属材料磷肥以及五分之三以上的棉花、煤和锰矿石。”

我们在上文已经提到过，苏联常常以很高的价格出售这些原料，而这些原料是印度、埃及、伊拉克等第三世界国家为偿还信贷而以低廉的价格卖给苏联的。通过提高这些原料的价格，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者使东欧国家财政拮据。在一九六·年到一九七〇年十年间，仅捷克斯洛伐克就被迫向苏联提供价值二十亿卢布的贷款和投资。保加利亚抱怨说：“它动用了农业

投资中的一部分资金以偿付从外国进口原料的货款，这将放慢它本国农业的发展。”

在复辟资本主义的过程中，东欧国家也充当了社会帝国主义的马前卒。苏联在复辟资本主义的过程中，提出的许多“改革”，往往先在几个东欧国家进行试验，特别是在匈牙利和东德。

我们革命联盟的人员尚未完成对东欧问题的研究，目前也还没有充分了解这些国家资本主义复辟的细节情况。我们也没有全部了解苏联统治这一地区的种种伎俩。但是，我们了解的情况确实足以使我们相信，这些国家已经沦为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

同样重要的是，要注意东欧国家正在抵制苏联的控制。一九六八年，一个不同类型的资产阶级集团接管了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这些人相信，捷克资产阶级如果越出苏联轨道就可以找到更加有利的前景。他们在修正主义分子杜布切克的带领下，对捷克斯洛伐克经济提出了若干“改革”。杜布切克及其追随者一面喋喋不休地侈谈民主，并对群众作出某些细小的让步（几乎全是对小资产阶级作出的），一面企图按照他们称之为“市场社会主义”的路线重新安排经济。从理论上说，这不过是柯西金“改革”的极端的、竞争性的资本主义变种而已。但是它的真正的目的却是在于使其经济向西方的投资开放，以下事实就足以证明这一点：当时捷克人正在采取措施把他们的以卢布为基础的货币制度改变成可以直接兑换美元的货币制度。

但是，这是苏联不能容忍的。苏联统治者并不真正担心捷克人是否在试验一些新的资本主义经济“改革”。事实上，苏联也乐于让捷克人试验任何一种可能为苏联带来最大利润的

资本主义方法。在“理论”问题上，苏联修正主义者也并不十分担心捷克人在马克思主义的伪装下更加公开地提倡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这些努力，尽管在这里，我们应该强调指出，东欧傀儡党对苏联政策的政治上忠诚是一项重要利益，那是苏联领导不愿丢失的。但是社会帝国主义者对捷克斯洛伐克主要担忧的是，可能会将这个国家“输给”美国和西欧帝国主义。这一点是勃列日涅夫及其一伙所不能容忍的。因此，他们在一九六八年八月对捷克斯洛伐克发动了野蛮的入侵。

这一入侵不同于九五年对匈牙利的干预，因为时至八年，苏联已经成了一个羽毛满的帝国主义超级大国。虽然札布切克政府并不代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利益，但社会帝国主义的坦克却代表了一个更为凶横的敌人。人民当然认识到这一点。的确，尽管杜布切克政府立即投降，并敦促群众消极地放下武器，但是，捷克斯洛伐克人民还是自发地、勇敢地进行反抗。共产党人严厉谴责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是帝国主义的强盗行径。我们深信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总有一天会再次奋起斗争，并最终从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和一切帝国主义的干涉和统治下获得解放。



一九六八年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入侵捷克斯洛伐克

东欧国家横遭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践踏，受尽了苦难，尖锐的、不断恶化的矛盾越来越使这些国家动乱不安，激起了日益高涨的群众性反抗。迄今规模最大的斗争于一九七〇年到一九七一年在波兰发生。社会帝国主义的统治造成了波兰经济的畸形发展，并由此带来了严重的经济困难。面对着这种情况，波兰政府在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三日宣布大幅度提高许多基本日用必需品的价格，从而触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工人反抗斗争。十二月十四日格但斯克爆发总罢工，当地的共产党总部遭到袭击。十二月十七日斗争波及什切青，十八日又蔓延到埃尔布隆克。政府立即出动坦克，并枪杀工人，但无法制止骚乱。后来，以双手沾满了人民鲜血的走狗哥穆尔卡为首的政府和党的领导被迫辞职，哥穆尔卡集团被以爱德华·盖莱克为头目的新政治局所替代。军队撤了下来，但涨价的决定依然有效。

最后，在一九七一年一月二十五日盖莱克终于同意会见还在继续罢工的工人。作为苏联的忠实走狗，他对工人的第一个要求就是“停止攻击苏联（我知道他们在散发这种攻击材料）。”真是原形毕露！

盖莱克经过许多让步，最后总算设法使工人复工。他同什切青的瓦斯基造船厂工人谈话的节录刊登在一九七二年英国《新左派评论》杂志上。这些节录是很有启发性的，它清楚地表明了波兰工人阶级正在更加坚决地同盖莱克之流的修正主义者及其莫斯科主子进行斗争。

波兰人民和全体东欧国家人民具有丰富的斗争传统，他们必然会团结一致推翻新沙皇的统治。

七、西方资本剥削苏联工人

苏联重建资本主义的后果之一，就是西方资本家可以随意剥削苏联工人和掠夺苏联的原料。这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极为丑恶的一个方面。

随着十月革命的胜利，苏联人民使他们的国家摆脱了沙皇及俄罗斯统治阶级的帝国主义制度，结束了帝国主义对他们国家的控制。而现在，随着资本主义复辟，苏联在新沙皇的统治下，又回复到帝国主义并且为外国帝国主义的剥削大开方便之门。

这一切到底是怎样发生的呢？既然苏联声称“生产资料归全民所有”，我们怎么能说苏联工人阶级正在遭受外国资本的剥削呢？这难道不是像修正主义者所声称的那样，仅仅是平等贸易吗？让我们来看看事实，并且听听那些更了解情况的人的

评论吧。

由于修正主义者在加速重建资本主义的事业中，越来越变得野心勃勃，他们并不满足于目前发展的速度和规模。况且，修正主义者已把苏联经济搞得一团糟，没有能力为人民提供基本的日用必需品。他们缺乏资金，特别是因为很大一笔资金已用于军火工业。因此，他们转而求助于西方，他们在那里发现了一些急于竞争的西方资本家正在为其资本输出寻求新的市场和投资机会。美国报纸登满了关于这种苏联和西方资本家做交易的报道：菲亚特汽车公司在苏联建造了一座汽车厂、西洋公司的天然气合同、联合开发西伯利亚资源（石油、木材、铀矿）的计划，等等。

但是，始终在追逐超额利润并力图对投资取得控制权的西方帝国主义，竟然会投资在那些法律禁止传统形式的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国家里，这难道不是自相矛盾的吗？

这确实是资本家在同苏联和东欧国家进行大笔交易之前所感到担忧的一个问题。但他们很快就发现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纽约时报》组织东西方贸易问题专家举行了一次圆桌会议，在这次很能暴露情况的独特的会议上，进行的讨论摘要如下：

《纽约时报》：“你们怎样经营才既能满足跨国公司要求充分控制企业的愿望，而同时又符合共产主义制度关于财产所有权方面的理论？”

亨德里克斯（代表一百四十五家公司）：“通过从心理上改变处理问题的方法。法基特先生（匈牙利国家银行的副总裁）有一次开玩笑时指出，东欧是世界上最安全的投资场所，因为

对一切东西都已实行了国有化。这就是说，我们只需要改变我们处理问题的方法。同我们合伙的是政府，你谈判一笔笔交易，而对这些交易的控制并不依赖于所有权。”

讨论接着指出许多东欧国家（匈牙利、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已经修改法律使外国公司对工厂、矿山等的投资合法化。苏联还没有做到这一点。一位专门研究东西方贸易的国际著名的律师塞缪尔·毕沙参与了西洋公司的那笔交易。下面一段他说的话说明了即使苏联目前还没有做到这一点也是无关紧要的：“从理论上讲，同外国人均等地分享所有权是同马克思主义或列宁主义背道而驰的。共产主义国家不允许资本家在生产过程中进行剥削。但是，让我们来看看有什么办法可以绕过这一点。美国公司谋求些什么呢？第一，寻求控制权。这是不是说他们可以在苏联或匈牙利或波兰控制住董事会呢？不可能。不管怎么样，在今后许多年内是不可能的。但是事实上，这也没有必要。如果你和一家共产主义的国营公司合办一项工程，在合同里写上关于联合管理委员会的条款，这并不是不可能的。反正共产主义的董事会并不会行使多少权力，并且他们对国际上的生意买卖也一窍不通。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不排除一个由若干美国人和若干东欧人组成的管理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可以不触犯共产主义的教条法律而设计工厂，使其投产，进行质量监督并扩大销售范围等等。有那末一天，真正意义上的均等会成为可能。”

这一点说得非常透辟，但利润问题又怎么解决呢？怎样才能取得利润呢？让我们再听听毕沙是怎样说的：“我记得有一笔大交易，从事这笔交易的美国公司本来可以得到均等的所有权，或者如果得不到均等的所有权，也可以得到合同规定的那

笔利润。但是共产主义哲学并不允许这一点。结果这家公司得到了比均等的所有权和利润更为宝贵的东西。它得到了专利权，得到在这项交易营业总额中享有一份的权利，并且被付给硬通货。”

至于菲亚特汽车公司，它在苏联建造了一座完整的汽车厂，这就是说，苏联工人每生产一辆汽车，这家意大利公司就得到一笔回扣。这也就是说，苏联国家垄断资产阶级和外国资本家分摊利润。菲亚特的例子特别清楚地表明了，引进资本主义的工厂对苏联工人阶级来说意味着什么。因为，意大利菲亚特工厂的好几万名工人，多年来一直在为反对增加劳动强度和非人的劳动条件而激烈斗争，而现在菲亚特公司却将它在意大利经营的工厂照抄不误地搬到了苏联。（菲亚特工厂曾多次未经工会同意就爆发了罢工，其中有一次罢工时厂方狡辩说：“我们不知道工人究竟在抱怨些什么，这儿同我们在苏联建造的工厂不是以同样的方式在进行工作吗？”）修正主义者竟然赐予苏联工人阶级以同样的命运，这只能说明他们正在自掘坟墓，因为苏联工人阶级必然会奋起反抗这种压迫并彻底推翻整个新资本主义制度。

菲亚特公司所代表的这种投资方式以专利权的形式获取利润。除此之外，另一种投资方式正在变得愈来愈重要，即西方银行向苏联提供贷款，利率约为百分之六。一九七二年九月十二日《泰晤士报》报道说，西方银行家很高兴地看到苏联和东欧国家“正在回到债务市场上来”，因为这为他们提供了从苏联工人阶级创造的成果中牟取利润的另一条途径。

正如这份《红色文件》在其他章节中分析的那样，仅仅国家所有制本身并不能保证生产成果归工人阶级所有。问题的要

害在于：谁掌握政权？哪一个阶级的人管理国家？让我们再听听毕沙的讲话，他确实深知其中的奥妙：“很明显，我们现在不能通过占有企业而达到控制生产资料，因为我们都知道，这种占有是不允许的。可是为什么我们不能这么做呢？为什么我们不能对东欧人说，你们的国家将是这些装置、这些设备的所有者。我们只是向你们租借，比如说，借五年、十年或十五年。你们占有企业，我们在社会主义国家无权拥有这些生产资料，因为列宁和别的许多人都说我们不得拥有。可是在我们租用这些设备的时候，随着负责管理同时而来的就是我们控制所有一切实际的东西，比如生产、装运、计量等等。”

事情就是这样进行的。西方帝国主义者对生产资料所有制采取什么法律形式，半点也不在乎，但是他们对“控制”生产、利润、市场等“实际的东西”却大有兴趣。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实际的东西”中的一部分就是苏联工人阶级，他们也被“租借”出去供外国资本进行剥削。当然这就是利润的唯一源泉，这一点我们在第一章中已作过说明了。

苏联修正主义者企图为上述情况进行辩解，他们说，列宁在提倡新经济政策时也是这样做的。但是，正像第二章所分析的那样，这仅仅是苏修掩盖其真实意图的借口，因为一九二〇年的苏联和一九七四年的苏联情况大不相同。当时，在有限的范围内，在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和无产阶级国家的控制下，这样做是为重建遭到破坏的苏联经济服务的，是为了帮助建设社会主义。今天这样做，是为苏联新统治阶级的野心服务的，它丝毫无助于共产主义，而决不是像某些参议员、劳联-产联的乔治·米尼以及苏联“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所声称的那样有助于共产主义。

苏修使用的另一个论据可以归结为一种对“毛泽东主义力量”的谴责，这种谴责认为“毛泽东主义力量”反对对外贸易，奉行“闭关自守”政策。这真是弥天大谎。

今天，中国和一百五十多个国家有贸易关系，但它和苏联的对外贸易关系迥然不同。中国的对外贸易建立在“平等互利和互通有无”的基础上。我们不妨举粮食进口的例子来作说明。中苏两国都进口小麦，但原因不同。美苏之间的大宗小麦交易是苏联农业歉收的结果，后来引起世界市场价格上涨，苏联乘机把这些小麦中的一大批转售给其他国家，赚取中间贩卖的利润。这笔交易在美国国内也造成了价格上涨和粮食不足。

但是中国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国家，它进口小麦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能向第三世界国家出口，往往是无偿赠送更多的谷物，特别是大米。中国既无内债，又无外债，进出口平衡。相比之下，苏联负有债务，并且存在着严重的支付不平衡的问题。

中国外贸部长李强的下述一段话表明了中苏之间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区别。他说中国人民遵循毛泽东制定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接着他又说：“中国决不会像某个超级大国那样，打着‘社会主义’的招牌，吸收外国资本或和其他国家联合开发国内外天然资源。它决不同外国搞什么合伙经营，更不会像那个超级大国那样向外国乞求贷款。”

确实是这样，中国人民把帝国主义拒之门外。贸易，可以。剥削，不允许。我们坚信，苏联人民在推翻新沙皇以后，正像他们在推翻老沙皇以后一样，一定也会再次把大门关上的。

第五章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

统治下的日常生活

马列主义者还不过刚刚开始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活动进行调查。前面的分析只是该项调查的一部分。我们也认识到，我们的解释还有许多不完全的地方。我们还认识到，这一基本分析虽然是必要的，它清楚地表明苏联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而不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这个分析本身还有局限性。我们必须更具体地了解资本主义复辟对苏联人民的日常生活意味着什么。

一、生活水平在提高吗？

在面对这个问题时，我们对苏联的“社会主义”不应该抱有幻想。社会主义虽然给苏联的劳动人民带来了巨大的利益，使他们的劳动性质和生活起了质的变化，但是社会主义并不是乌托邦。阶级斗争继续存在，在苏联的具体条件下，特别是在关键时刻，人们还必需作出巨大的牺牲。这样，工人阶级才能掌握住政权，保持工农联盟这个无产阶级政权的基础，并为人民的利益建立一个合理的计划经济的基础。

在斯大林的领导下，这个社会的大部分资源被用在两个方面，对国防和对将来的投资。大力建设工厂和生产机器、拖拉机等，也就是说，生产资料的生产优先于日用必需品的发展，将重要的物资转用于国防武器的生产（但不是用于建立今天那

样巨大的帝国海军)。这在帝国主义包围、纳粹入侵和“冷战”的严酷现实面前是必要的。因此，美国人（包括许多工人在内）认为当然应该享有的东西，苏联人民常常是没有的，而且也只能这样算了。*

因此，如果我们只是伸出指头谴责社会帝国主义，要它注意苏联国内现在确实存在着住房不足、食物或耐久消费品匮乏的问题，而不承认这些问题在一九五六年前也存在，那就有点不太客观了。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些问题存在于今天，其情况同以前是迥然不同的。

我们对不少苏联公民今天享有似乎比较高的物质生活水平当然没有什么不满。我们也不会从小资产阶级的道德观出发，趾高气扬地说这种生活上的改进本身就是“腐朽的腐蚀人心的”而轻视他们生活上的改进。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并强调：经济进展造福劳动人民，决不是出于社会帝国主义的宽宏大量，而是共产党、列宁、斯大林领导下整整一代的苏联工农传给今天苏联公民的艰苦奋斗、忘我劳动精神的成果。

并且，我们充分相信，在社会帝国主义的统治下，劳动人民总的生活水平的任何提高只能是暂时的现象。早在一九二七年，当资产阶级经济学者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的稳定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奇迹”欣喜若狂的时候，恰恰是斯大林指出了这些“奇迹”的虚弱本质。他精确地预示了“大

* 显然，这个政策基本上是必要的、正确的。但是在今天看来，或许是比较过分地强调了发展重工业，致使消费品生产和农业生产受到了不必要的损害。在今日的中国，各类轻工业同更为生气勃勃的重工业是同时发展的。但即使在中国，为了国防和今后发展的长远利益，作出牺牲仍是必要的。

萧条”和帝国主义新战争的来临，并指出：“从局部稳定中产生出资本主义危机的剧烈化，日益增长的危机又破坏着稳定，——这就是现今历史时期资本主义发展的辩证法。”今日，就社会帝国主义和它所大吹大擂的“胜利”来说，情况正是如此。

其次，苏联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极端不平衡的。实际上，这种提高在最重要的一些方面所表现的是向后倒退。在斯大林时代，不平等现象确实是存在的，马列主义者也认为这种不平等是非常广泛的，包括熟练工同非熟练工之间工资上的巨大差别以及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的高薪。但那时经济的全面发展还是根据广大人民的利益实现了，日用必需品的定价，也是尽可能的低。那些供应不足的地方，分配制度可以减轻最贫穷的人的苦恼。

在那时，集体事业和社会事业的发展比个人的消费品生产来得重要。因此，生活水平不能用国民生产总值或其他资本主义方式的生产指数来衡量，而必须同时也以社会产品和服务的分配方式来衡量。

在今日的苏联，财富的分配愈来愈不平等，统治集团不论从哪一方面来看都是一个特权阶级。随着收入差距愈来愈大，社会服务事业却遭到削减。对某些人来说，虽然物质享受水平可能有所提高，但生活水平真正提高了的只是资产阶级，工人充其量不过得到一些残羹剩汁而已。

二、不平等现象的增长

以往，苏联在生产上是很注意那些关系到广大人民利益的各个方面（如戏院、公共交通等）的改进，但今天，生产上强调的主要是那些只供少数人享受的奢侈品。这一现象的存在，

可能有利于维持图表上的生产不断上升，但对苏联广大人民毫无贡献，并且反映出苏联人民无权控制生产。为了生产更多的奢侈品，日用必需品的价格急剧上涨。上文提到，在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五年之间，十五种主要消费品的价格上涨了百分之四十二，甚至《苏联贸易报》这一政府刊物也不得不承认，商店中只备高价的衣着，许多顾客对缺乏廉价的秋冬服装颇有怨言。

这些现象或多或少说明了，苏联的资产阶级越来越喜欢夸耀他们在赶“时髦”方面层出不穷的新发现。勃列日涅夫的十四辆华贵小轿车所反映的不仅仅是他这个人的个性。我们还可以指出，新兴的苏联时装工业是多么卖力地在模仿狄沃斯和圣劳伦兹，步它们的后尘。

苏联新闻界也注意到了官员们购买“乡村别墅”越来越盛的风气。这些别墅在沙皇时代原是贵族的产业。阿塞拜疆加盟共和国一位集体农庄主席造了一所有十六个房间的别墅，在全区中可算得“美奂绝伦无出其右”。更近一些时日，社会帝国主义者之间的带有政治色彩的吵架迫使叶卡捷琳娜·福尔采娃夫人的事情暴露了。这位赫鲁晓夫从前的老相识，也是苏联的一位高级领导人，她盗用国家资金建造了一所豪华官邸作为她私人的乡村别墅。

至于涉及到直接剥削劳动力因而最能暴露问题的，可能是许多专家和官员的家庭开始雇用女佣这一现象。这些妇女，像她们的美国同行那样，所得工资极微，受到的待遇极为恶劣。同美国的情况一样，女佣常常是被压迫的少数民族和刚来自农村没有受过技术训练的人。

以前，这些妇女，在获得训练加入工业大军之前，往往被

安插在街道清洁、托儿站等等社会服务部门工作。但今天，她们只得迎合她们的新主人的需要。毫无疑问，苏联的资产阶级在抱怨缺少“好佣工”时，同西方资产阶级唱的是一个调子。

苏联一位出名的女诗人蓓拉·阿赫玛杜莉娜的故事是一个尤为突出的例子，它说明了苏联的资产阶级是如何以苏联工人的血汗来过他们“养尊处优的生活”的。她是著名修正主义诗人叶夫根尼·叶夫图申科的前妻，现在改嫁给作家尤里·纳齐巴尔。根据《纽约时报》对她进行私人访问后的报道，她是一个“百万富翁”。她雇了一个全天工作的女佣，还有一个男管家。她有一辆最高级的汽车，由司机驾驶。当然，她还有乡间住宅。苏联的领导人却自称他们在“建设共产主义”，建设那种根据需要来分配财富的制度！对此，我们无需多加评论了。

但是，公然夸耀财富只能到此为止，因为苏联的统治者还必须挂出工人阶级统治的招牌。这样，官方的贪污形成了另一种方式，使规章制度成为笑柄。例如，苏联的公司经理们向他们的西方阶级弟兄那里学习：将费用开支项目作为不断地捞取油水的隐藏的财源。法定的费用开支在苏联是很小的。但经理们和官僚们自有办法。他们互相给对方单位，而不是给自己单位开报销单！显然，在名胜区有那么一些单位，它们之所以存在，看来就是为了给其他单位的经理们提供便利，为他们的游宴作乐开报销单。例如，在黑海之滨索契（游览胜地）的第二工程公司，为克拉斯诺达尔南方贸易建筑公司经理A·B·孟维列安和他的一位女友（不是他的妻子）的一次进城访问，付出了一千三百卢布作为额外费用支出。

这不是什么稀奇的事。让我们来看一下，譬如说，他们是怎样利用“业务会议”的。《共青团真理报》报道：克拉斯诺

达尔的一家公司在索契开了三天业务研究会，取得了一纸三千四百卢布（将近五千元）的账单，但是，却没有迹象能表明他们确实开过业务会议。账单里面有餐馆账、观光费、雇用一位女打字员和女速记员的支出（这笔支出后面又掩盖着什么？），就是没有会议议程和会议记录。

对索契乳品企业的一次生产会议（有一百八十个在郊区的代表参加），我们又将会作何感想呢？根据《共青团真理报》报道：“会后除了发现会议通过的一个决议外，没有看到任何其他件。而这个决议早在会议前两个月已经印好！”

当然，这些例子不过暴露了那些经理和技术专家随心所欲已经到了怎样程度。但是，正像我们以前指出的那样，真正当权者是国家的高级官员，他们构成了新的国家垄断资产阶级。

这个统治集团虽然有时出于他们自己的利益也揭发下属的“漫无节制”，这部分是为了不让他们做得太过分，也为了平息一下愤怒的工人们的情绪。但不管怎样，贪污已成为苏联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一个组成部分。巴库一个出租汽车司机为一个美国记者作了总结：在苏联“你想要得到任何东西，你必须要有朋友，否则你得有钱”

但是工人怎样呢？他们的遭遇怎样呢？统治集团虽然对有些工人作了一些让步，给了较高的工资，然而大部分工人却在人身安全、工作条件和生活上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我们在前一章叙述了资本主义复辟在车间里给工人带来的一些影响，它造成了劳动强度的提高，遭到解雇等其他灾难。除此之外，在工厂外面，工人的地位也已经急剧降低。

首先，我们应该注意到，在工人阶级掌权的那样一种社会

里，当个工人是光荣的，受人尊敬。这在中国、阿尔巴尼亚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就是如此。但在苏联却不是这样。

一九七一年六月，在苏联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曾举行过一次选择职业的调查。这些毕业生是从头至尾完全在修正主义统治下培养出来的第一届毕业生。他们普遍认为，科学家、外科医生、工程师、作家等小资产阶级的传统职业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最高。至于工人的职业中，那末车工和磨工最热门，因为是技术工种。可是在新西伯利亚的调查中，车工和磨工的名次却是第三十九和第四十名。在科斯特罗马这一工业城市，它们的名次更降为第七十五和七十六名。这证实了斯维尔德洛夫机器制造联合企业经理格奥尔基·库拉金的话。他在《文学报》发表的文章中抱怨说，一九六七年以来，青年人不愿当工人，认为这“有损于他们的尊严”。

经常阅读苏联报纸的人，一般不会认为苏联有任何失业问题。报纸上满是对劳动力不足（主要指熟练工）的抱怨。这种抱怨在美国和其他资本主义社会的报上（特别在招聘栏）也可以找到。一九六七年设立的那些劳动力利用局多半就是这一问题所引起的反应。这些局的任务是在工厂和工厂之间合理分配熟练工，不让有成就的厂超额抢雇。它们只是勉强地担当了一些属于正式职业介绍所的工作。

但是，至少部分地是由于工人这种职业的声望降低，以及熟练工同那些资产阶级职业之间的收入差别越来越大等原因，青年人已经变得不愿在技术上求进步。毕竟当一个人可以有更高的目标、可以指望成为一个工程师，为什么要去当车工或木工呢？当然，困难在于工程师现在已经太多，而补充的新工程师基本上限于特权阶级，因为新资产阶级已经把篱笆扎紧了。

同时，非熟练工的人数却在不断地增加。由于苏联的统治者采取谢基诺试验方式，解雇非熟练工，最大限度地攫取剩余价值，这就发展了非熟练工不断增加同对他们的需要不断减少之间的矛盾。此外，使这个问题更尖锐的是，资本主义复辟给修正主义者带来了农业上的严重破产，促使完全没有受过训练的年青人不断地、越来越多地从农村流向城市。例如，在一九五九年至一九七〇年间，莫斯科附近地区的农村人口就减少了百分之二十五。

对熟练工不足的问题，无产阶级的反应将会是在政治上动员群众进行技术训练，消除专门知识同实践之间的脱节现象。但是工人阶级如果不掌握政权，这当然是不可能办到的。苏联资产阶级采取的办法是通过增加物质刺激，鼓励人们成为熟练工。在帝国主义统治下，国外投资所得的巨额利润，可以用来收买一个小小的熟练工阶层。这样做对资本家还有一个好处：他们可以在工人阶级内部培养帝国主义的社会基础。

因此，在苏联已经出现了一种类似存在于美国、但还没有那么严重的情况。在美国，几乎人人都知道官方发表的失业数字掩盖了成百万久已放弃寻觅工作机会的人。总的说来，这些人组成了一支劳动后备大军，资本家利用它来更有力地压制在业的和失业的工人。在美国和苏联，当许多没有技术的普通工人在挨饿的时候，熟练工的位置总是有一些还空着的。

尽管社会帝国主义者还不承认失业问题的存在（我们认为这一问题在苏联还不像在某些国家那么严重，在那些国家里，资本主义存在的时期更长，没有受到过社会主义的“干扰”），但在苏联的报纸上，已经有迹象表明失业问题在发展。最引人注目的证据当然是那些同失业的劳动后备军结伴而来的偷窃、

行乞、酗酒等等罪行的显著增加。我们不久就将谈到这些问题，但最令人不能容忍的是我们看到的一些类似一九七一年六月十六日《共青团真理报》的报道：在这一天的报上，一个名为阿·波里亚特科夫的青年工人叙述了他如何为了找寻工作，长途跋涉到几百哩外的卡马去。在那里，苏联人正在用福特汽车厂的大量援助兴建一所世界上最大的卡车厂。他到达卡马后，当地的共青团组织对他说，这里找不到工作。显然，同他处境相同的人很多，因为不久他就听说这样地来了又去的人，每天有二百个左右！”

报纸的编辑对这件事并不怀疑，但他自己加上一个骇人听闻的故事。他描绘了八个乌克兰青年妇女如何为了找工作，花尽了她们的毕生积蓄到西伯利亚北部雅库茨克去。她们没有找到工作，在归途中只能沿途干零活，依靠所得的微薄报酬，勉强地回到了家乡。最为使人毛骨悚然的是编辑对这两件事的评论。他提问是谁造成了这样的混乱现象？”答复是：“我认为主要罪犯就是那些没有受到召唤、贸然自己去的那些人的轻率和考虑不周。”

资本主义复辟也意味着工人们所必需的社会公益服务减少了，因为这种服务越来越为资产阶级所垄断。据说在立陶宛，专供党和国家高级官员作为俱乐部用的蒸汽浴室，已经用公款盖起来了。主要为特权阶级服务的保健设施也在办起来了，而地方设立的诊疗所却正困于经费不足。

三、再一次成为“各民族的监狱”

列宁称沙皇时代的俄罗斯为“各民族的监狱”。解放一切被大俄罗斯压迫的民族，争取民族间的完全平等，曾是那里革

命斗争的一个重要内容。沙皇、资本家和地主被打倒后，苏联在人民自愿联合并保证以前被压迫民族自决权的基础上，成立了一个多民族国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虽然苏联的民族政策有过一些错误，但在消灭民族不平等现象方面的进展迅速。这有力地说明，只有在工人阶级的统治下才有可能彻底消灭民族压迫。对殖民地的千百万受到民族压迫的人民以及全世界的工人阶级和被压迫人民来说，苏联是他们在争取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中的一个巨大鼓舞和力量。

但是，在新沙皇的统治和资本主义复辟的情况下，事情已经完全倒过来了。对苏联国内各少数民族权利的越来越多的非难，引起了少数民族人民和苏联全体人民的普遍的、强有力的抗议和反抗。

起初，以赫鲁晓夫为首的修正主义者在民族问题上所采取的政策的一个内容是，怂恿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倾向，以此作为策动苏联社会中一切资产阶级势力的一项阴谋活动。在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七年期间，赫鲁晓夫为了分裂苏联人民和共产党，一直在利用并煽动民族分裂（但即使在这个时期，赫鲁晓夫也绝不犹豫在适合他的需要时，采取俄罗斯化的政策，象在哈萨克干的那样）。

但是到了一九五八年，赫鲁晓夫已经放弃了以前的民族政策。这可能因为他在同其他修正主义者的权力斗争中，靠这种政策在战术上已捞不到多大好处。因此，这时流行的提法就变为民族“接近”甚至民族“融合”。从一九五八年直到现在，苏联领导人一贯执行的是“民族和睦”政策，它的实质就是强迫同化，就是在被压迫民族俄罗斯化形式下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

一九六一年，苏联共产党二十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正式纲领最全面、最充分地表达了这个政策。这一纲领提倡“各民族进一步接近”：“苏联境内各加盟共和国之间的界限愈来愈失去原来的意义……全面展开的共产主义建设，意味着苏联民族关系发展的新阶段，这个新阶段的特征是各民族进一步接近和达到完全的一致。”

社会帝国主义现在的官方观点仍然反映了这个立场。勃列日涅夫说：“共产党认为阻止各民族接近、用任何借口对此加以妨碍、或人为地加强民族孤立的一切企图是不容许的。”

一九七三年，党刊《共产党人》宣称，苏联正在进入“达到各民族完全统一的阶段”。在同一篇文章里，作者还指出：“现在有可能更加具体地设想达到民族和睦甚至一体化的过程。”根据社会帝国主义者的说法，在苏联，“一个单一的社会主义民族正在形成”。

只要把修正主义者的立场同真正的马列主义者的立场对比一下，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前者的那些观点不过是在为强迫苏联各少数民族俄罗斯化作掩护。正如新近一期《北京周报》概括的那样：“民族融合，民族消亡，从长远的历史发展来看，是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首先是阶级消亡，随后是国家消亡，而后才是民族消亡。列宁指出‘人类只有经过一切被压迫民族完全解放的过渡时期，……才能达到各民族的必然融合’。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斯大林在谈到列宁对待民族问题的态度时指出，列宁从来没有说过，社会主义在全国范围内胜利以前，在一个国家内，民族差别应该消失，而各民族的语言应该融合成一种共同的语言。恰恰相反，列宁说过一些与此完全相反的话，他说：‘各民族间和

各国间的民族差别和国家差别……甚至在无产阶级专政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以后也还要保持很久很久。’”实际上，斯大林强调指出：社会主义的胜利“为以前受沙皇帝国主义压迫……的各民族的复兴和繁荣造成有利的环境”。

在今日苏联，只有最恶劣的民族沙文主义者才会认为，“各民族接近”或“一体化”的条件已经存在。这些条件，即使在以前大俄罗斯民族历史上享有的优势还没有完全消失的社会主义时期，也并不存在（虽然那个时期，在达到真正的、具体的民族平等这一方面有了很大的进展）。由于苏联今日不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当然决不是处在一个“全面建设共产主义的阶段”！），提倡“民族和睦”只能意味着提倡民族不平等、民族特权、俄罗斯化和民族压迫。

实际上，苏联关于“建设共产主义”的全部虚伪宣传的目的，不仅在于掩饰苏联社会的资本主义实质，也是为了要在苏联人民中，尤其在大俄罗斯人民中，促进狭隘的自身利益，特别是要促进民族沙文主义。这种宣传告诉人们：“我们正在向共产主义（被说成是基本上就是更多地生产，提高生活水平）的最终目标迈进。为了要达到这个目标，我们所做的任何事情，即使意味着对国境内外各民族的压迫或掠夺，都是这个过程中一个必要的和正当的部分。”当然，苏联在“建设共产主义”的掩盖下复辟了的资本帝国主义，给整个苏联人民，特别是各被压迫民族带来的不是什么更好的生活，而是更多的痛苦。（绝对不是带来了共产主义！）

在转向今日苏联国内民族压迫的一些具体例子之前，我们花一些时间概括地研究一下苏联几个主要理论家在这个问题上的工作是有用的。社会帝国主义的那些发言人为了掩饰他们

的民族政策的沙文主义实质，竭尽全力歪曲和否定马列主义。

一个权威性刊物《历史问题》在一九六六年至一九六七年以“讨论民族概念”为题，主办了一次学术讨论会，其中一个重要的座谈会对民族政策进行了详尽的讨论。一位曾经研究过这次学术讨论会各种文件的美国资产阶级学者说：这次学术讨论会“是自从党的纲领通过以来，为迅速‘打破民族之间的界限’提供理论根据而作出的最认真的尝试。虽然会上发表的各种文件被说成是同志式的学术思想交流，但是某些考虑使我们联想到这次学术讨论会可能是有政治动机的，它得到了那些惧怕非俄罗斯民族主义、主张加速少数民族同化的权贵们的支持。”

这次学术讨论会上出现了两个动向。主张民族迅速融合和修正民族的定义以利融合是主要的动向。另外一个少数人的动向。那些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保卫了马列主义立场，但这是出于他们为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辩护和打后卫战的机会主义态度。他们攻击苏联在斯大林时代执行的基本上正确的民族政策的事实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这些人倾向于把多民族联合推迟到遥远的将来，使其成为一个抽象的、唯心主义的概念。

但是在这里，真正重要的还是那个“同化主义者”的主要动向，因为这一路线的代表人物所提出的意见，总的说来同社会帝国主义领导人的意见是一致的。这一意见在《历史问题》这一刊物的喉舌是巴维尔·罗加契夫和马脱维伊·斯维尔特林两院士（一个俄罗斯人，一个犹太人），巴维尔·谢苗诺夫（俄罗斯人），苏连·卡尔塔赫钦（亚美尼亚人）和尼古拉·阿南钦科（乌克兰人）。

从思想意识角度来说，这批人竭力用几乎完全是经济学上的用语来重新给民族下定义。这些修正主义者说，这样做可以使民族具有资本主义时代所特有的、最狭义的形式，从而在社会主义来临时不会有阻碍“民族接近”和“民族融合”的物质基础存在。（当然，真正的马列主义者也认为民族基本上是属于资产阶级的范畴。这就是说，从资本主义到完全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它仍具有资本主义的机能。但是他们认为民族起源于资本主义前存在的社会形态中，在资本主义被推翻后，还将长久地存在。）

苏联修正主义者的路线同列宁所抨击的（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帝国主义经济主义”的论点基本上是相同的。列宁指出，这个机会主义的立场是“因为社会主义将为政治上消灭民族压迫打下经济基础，所以我们的作者不愿意表述我们在这方面的政治任务！这简直是可笑的！”像他们的机会主义前辈一样，苏联现代修正主义者不承认社会主义意味着以前被压迫民族的发展，它促使各族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

如前所述，列宁一再强调共产主义的最终实现意味着民族消亡，但这并不是意味着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目标就是消灭民族。正像共产主义意味着阶级和国家的消亡，但并不是指在社会主义时期就要取消无产阶级统治和无产阶级专政一样。恰恰相反，在社会主义时期，无产阶级国家必须加强，正像各族人民的权利和发展必须继续予以维护一样。这样做就是为了最后消除阶级和民族之间的差别，并最终消灭阶级和民族这些范畴。但是，同列宁时代的机会主义者不同，他们的后代，在今天的苏联挖掘出老机会主义的货色，为当权的修正主义和社会

帝国主义新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

社会帝国主义的那些辩护士（例如斯维尔特林和罗加契夫）持有这样的观点：“必须……注视这样一个事实：总的说来，民族融合在苏联必须比在世界其他地区实现得早一些。”早在一九六一年，谢苗诺夫就宣称，“……民族间相互同化，实质上使那些民族的地方自治机构，甚至加盟共和国，失去民族地位，它使苏联社会从这个观点向前发展到另外一个观点，即融合民族成为一个国家，在可预见的将来就能够实现。”

为了给这个沙文主义的政策辩护，那些作者拒绝接受斯大林在一九一三年给民族下的马列主义定义：“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我们可以看到，苏联和美国的民族问题在某些地方虽然不完全相同，但有相类似之处。因此，扼要地探讨一下这两个超级大国如何对待民族的定义，以及在他们的国家里民族如何发展，会是有益的。

对美国革命运动的某些势力来说，革命联盟对苏联修正主义者否定斯大林所提出的民族标准的行为加以批判，可能会看成是奇怪的事。这是因为在说明今日美国黑人这一民族并不严格地符合斯大林所下的定义时，我们已经作过不少分析并进行过漫长的论战（例如在《红色文件》第五和第六期中）。但是我们的分析和阶级立场，同苏联修正主义“理论家”们在民族问题上的分析和立场，完全相反。

他们的目的在于取消民族问题，为强迫民族同化这一帝国主义政策效劳。而我们的目的是：支持民族革命斗争，具体分析今日黑人解放斗争的特点和物质基础，并驳斥美国修正主义者托洛茨基分子和其他反动派关于黑人解放革命斗争不再有

（或者从未有过）基础的谬论。

我们的论点的本质是：在美国内战和复兴后的这一时期中，黑人已形成了像斯大林所解释的那样一个民族。这个民族虽然已经同它历史上的故乡分离，而它的组成也已经从以农民为主转变为以工人为主，但是黑人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从未停止，反而更为有力，同争取社会主义的全面斗争也结合得更加紧密。黑人这一民族，虽然今天同以前相比，同世界上大部分其他地区特别是第三世界相比，它是生存在一种新的、不同的条件下，虽然解放并控制南方“黑人聚居地带”的问题不是黑人斗争的中心问题或最高表现，然而他们必须坚持民族自决权。在美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任务中，必须击败强迫同化政策，以团结这一多民族的无产阶级。

我们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包括斯大林的著作在内，作出了这个分析。斯大林指出：“民族和民族语言的特点是具有非常的稳定性以及对同化政策的巨大抗拒力。”即使它们在被反动统治“摧残”和“蹂躏”的条件下也是如此。另一方面，斯大林强调说，在总的意义上来说，民族问题从属于无产阶级革命问题，“民族问题并不是始终具有同样的性质，民族运动的性质和任务是依革命发展的不同时期而变更的”。

机会主义者（他们以马列主义外衣掩盖资产阶级路线）离开了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这在某些场合表现为教条主义，把民族问题看成是“某种独立自主的和永恒的、在历史进程中基本上不变更自己的方向和性质的东西”。在其他场合，则表现为修正主义，公开反对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阉割这一主义的革命精神。不论机会主义表现的形式是教条主义还是修

正主义，在民族问题上，它总是宣扬一条取消的路线，跟帝国主义同流合污。

修正主义者不但用赤裸裸的修正主义，而且还用教条主义的办法来攻击马列主义处理民族问题的方法。例如，美国共产党主席亨利·温斯顿指责中国共产党是大民族（汉）沙文主义，说它违反了列宁主义的民族自决原则，处理民族问题的方法不同于苏联，不采取单独设立民族共和国的形式而只有少数民族自治区。同时，美国“共产党”辩称，黑人已不再是一个民族，黑人解放的革命斗争并无根据。他们的主子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者也争辩说，斯大林给民族下的定义以及马列主义对于民族问题的整个态度是不正确的，一直是不正确的。

苏联修正主义者的目的在于破坏苏联国内非俄罗斯民族的团结，破坏国外受到新沙皇压迫并抵制新沙皇的其他民族的团结。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极度轻视民族（或种族）的心理、文化因素。例如斯维尔特林和罗加契夫拒绝承认“民族特性”概念和斯大林握出的共同心理构造这一标准。这些修正主义者只承认“民族的亲密忠诚关系意识”，他们指的是，就像在填人口调查表格时那样，只要简单地承认一个人的所属民族就行了。因此，他们所否定的，正是共同联结成为民族的一个主要形式。

根据同样的论点，卡尔塔赫钦提出了这样一个定义：“民族是一个社会和历史现象，它在社会发展的资本主义阶段，逐渐形成一个稳定的人民共同体。民族的主要特征是这一共同体的领域，人民的语言和经济上的纽带。”在这个小丑看来，斯大林不懂得“维护一个共同体或者一个民族内人民心理上的稳定，必然能促使一个对抗性社会内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稳定，

而这意味着把民族看成为一个自然的、永恒的，而不是社会和历史的共同体。”这种说法当然是胡说八道。马克思主义者一贯认为在任何民族内阶级斗争始终存在。列宁甚至提及在现代一切民族内，“两个民族”同时共存。斯大林在断言存在着明显的民族心理和民族文化时也认为是这样。他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一书中指出：“在同一民族的雇主和工人再不能互相谅解的时候，根本就谈不到民族的‘文化共同性’但这同我们那些修正主义者的态度毫无共同之处，他们的态度本质上是单纯经济观点和机械唯物论（因而是唯心主义的）的态度。”

马列主义者的论点是，归根到底心理和文化是由阶级斗争决定的。在任何民族中，资产阶级的心理和文化同无产阶级的心理和文化之间，必然存在着根本差别。马列主义者认为，它们的发展形式决不是到处都是相同的。在现实世界中（毕竟一切都是同它有关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资产阶级跟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在特定的民族环境里得到发展，而那些不同的民族环境对两个阶级及其心理和文化都会产生影响。

例如在今天的中国，无产阶级正在对孔丘的反动思想进行伟大的斗争。在这个问题上，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世界观同无产阶级的唯物主义世界观截然相反。资产阶级的反革命路线要为孔丘辩护，而革命的无产阶级则要消灭孔丘思想的一切残余。

这个斗争在形式上是中国所独有的，但它的内容却具有普遍意义。在整个地球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为了无数这类问题，每天站在对立的立场准备厮杀。在民族文化的每一个问题上，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和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在每一个国家里都存在。但在中国，由于它的人民的确有着一个在共同文化

中表现出来的共同心理，因此孔丘（不是柏拉图、耶稣、真主等）这一特殊问题突出来了。可以这么说，中国的状况提供了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例子，它是站在不同立场上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斗争的战场。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的下面一段话中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他们指出：“如果不就内容而就形式来说，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首先是一国范围内的斗争。每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当然首先应该打倒本国的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统治下的阶级斗争因此显示了它的国际性质，也显示了它的民族性质。在每一个民族里，确实也出现了表现在共同文化方面的共同心理特点。当然，资本主义在发展中有一个打破民族界限并取消心理上和文化上差别的强烈倾向。但这个过程是不平衡的，它的发展还要以包括民族心理和民族文化因素在内的民族特征和差别为转移。

如果不是这样来认识，那实际上就是采取了托洛茨基分子的立场，认为阶级斗争只有国际性，它的发展阶段到处相同。这种立场以唯心主义的政治和经济相分离的理论为基础，实质上也就是那些苏联作者的立场。它尽管通常披上了“左”的外衣，但仍然再一次暴露了托洛茨基主义的实质，在民族问题上，如同在其他问题上一样，充满了修正主义。

社会帝国主义的“理论家”们企图否定资本主义消灭后民族有继续存在的任何基础。这些修正主义者否定不同民族在心理上和文化上的特征，企图取消民族问题，促进为时过早的同化，使少数民族回到遭受沙皇压迫那样的日子里去。

实际上，斯维尔特林和罗加契夫这两个作者甚至声称，各民族之间的友谊在沙皇时代已“非常巩固”！他们宣称资本主

义被推翻后，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会自然而然地使苏联公民结合为一种“苏联民族”——一种新的、包括所有苏联各民族在内的种族共同体，它是介于民族不统一与“无民族”社会之间的一种过渡形式。

这一观念在苏联的宣传人员和辩护士中是共同的，也是社会帝国主义领导人所正式接受的。勃列日涅夫在一九七一年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的发言中声称：“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年代里，我们的国家里出现了历史上一种新的民族共同体——苏联民族。”为了掩盖他的真意，勃列日涅夫又强调说：“这不等于要消除各民族间的差别，漠视各民族的特征、语言和文化。”但是，尽管他支吾其词，显然这一新概念是为了企图消除同它对抗的民族概念而炮制的。例如《苏联民族学》杂志说：“民族概念和种族概念将越来越被苏联民族这一概念所取代。”

卡尔塔赫钦给民族下的定义使他作出了更加荒唐和沙文主义的结论。他甚至指责斯维尔特林低估了“苏联的真正民族文化共同体和民族特性。”（当然，我们且不管卡尔塔赫钦曾因斯大林用了他认为不正确的“民族文化”这一词而加以指责）。他争辩说：“随着社会对抗的消失，民族对抗在苏联也消失了。”当然，社会对抗（阶级对抗）在苏联并未消失，而是再一次在资产阶级统治和资本主义体制下存在着。同时，社会主义时代一直存在的民族之间的矛盾，在帝国主义统治条件下也已经再一次成为对抗性的矛盾。

我们为这些卑劣的理论家花这么多的笔墨，不仅是为了阐明社会帝国主义者的“理论”是多么荒谬，重要的是应该认识，民族压迫的复活不是简单地由于现在的统治者是俄罗斯人或

者是坏人（虽然他们两者都是）。更确切地说，民族压迫复活
的直接根源是修正主义者在一九五六年采纳的政治路线，这条
路线的一个关键部分是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攻击——包括对
斯大林在民族问题上的伟大贡献进行攻击，并为苏联共产党抛
弃无产阶级专政制造根据。

这一沙文主义路线造成的具体后果是显而易见的。为了加
速“融合”各民族，社会帝国主义者在整个苏联国家范围内分
散了许多少数民族和被压迫民族的人民。根据一九七〇年苏联
人口调查，在这以前的十年中，占摩尔达维亚人口百分之十四
点六的三十九万以上的摩尔达维亚人被迁离摩尔达维亚加盟
共和国。占乌克兰人口百分之十三点四的五百万以上的乌克兰
人被迁离乌克兰加盟共和国。

这样的政策确实使人口增长停滞不前，甚至彻底消灭了一
些较小的民族。一九七三年苏联出版的《多民族的苏联国家在
形成和发展中的理论问题》一书中说：“随着每一次新的人口
调查，统计所涉及到的民族数字不断减少。”这样，在一九五
九年至一九七〇年间的人口调查中，一百二十六个民族减少到
了一百十九个。此外，在这些年里，卡累利阿人减少了两万一
千人（约占总数的百分之十三），维普人减少了八千八百人（约
占百分之五十一），蒙德维尼亚人减少了两万两千人。在人口
数字上完全没有变动的民族有拉脱维亚、埃文基、亨季、阿列
岛、以及乌杰格伊楚。

在强迫少数民族迁出的同时，社会帝国主义者又通过俄罗
斯人和其他斯拉夫人的大量迁入少数民族地区，实行了俄罗斯
化。这导致了就业上越来越大的差别待遇。只要举两个例子就
够了，在一九七二年，十七个党龄都是在二十五到三十五年的

拉脱维亚共产党员，给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写了一封信，抗议这个小小的民族内几乎全部拉脱维亚族官员都被撤职。信中还指责大群俄罗斯人继续不断地迁入拉脱维亚，优先就业，而拉脱维亚人常常长时期找不到职业，或者被雇用做低于本人才能的工作。

也是在一九七二年，乌克兰共产党员伊凡·久巴出版了他的《国际主义还是俄罗斯化？》为题的著作，尖锐地控诉在乌克兰实行俄罗斯化。在这一著作中，久巴举出了社会帝国主义者民族政策如何进行活动的一个例子：“让我们用修建乌克兰大型建设工程之一的基辅水力发电站作为一个例子……一九六三年底，在这个工程使用工人最多的时候，劳动力中乌克兰人占百分之七十到七十五，白俄罗斯人占百分之二，俄罗斯人占百分之二十，还有为数不多的其他几个民族的人，……这个水力发电站主要是乌克兰人修建的，可是工程的一切高级职务（工程领导人、总工程师、处长、科长）几乎全由俄罗斯人充任。他们在一般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中也占多数。俄罗斯工人中的高级技工的比重比乌克兰工人中的比重要高得多。许多乌克兰工人在工程将近完成时被解雇。在工程主要设施管理部门中工作的一百二十七名俄罗斯人中，只有十一人在乌克兰出生，其余都来自俄罗斯。”

苏联领导人越来越依靠“专家”去促进经济的发展，因此，移入少数民族地区的俄罗斯人也越来越多。由于移民主要是俄罗斯人，这就不能不导致民族特权的永久存在。如果苏联正确地采取社会主义政策去消灭“专家”和工人之间的差别，问题就不会那么严重。

但是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在某些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共

产党的彻头彻尾的资本主义路线阻碍了它们实行自力更生，当地的一些领导人就宁可放弃发展经济而不愿看到外族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的蜂拥而来。据报纸报道，在格鲁吉亚的阿扎尔自治共和国，“一些最高级的领导人力劝党组织拒绝修建新工厂、发展游览区和旅游业的建议。他们的理由是：这种发展会使这个共和国对其他共和国人民的移入大开方便之门。”

当然，这只是那些被社会帝国主义者挑选为进一步发展经济的地区的一个问题。苏联领导人全神贯注于资本主义经济的“效果”，向“纵深”发展而不是向“广度”发展，这就导致他们集中投资于经济已经获得发展的“欧洲中心地区”。他们无视人口增加最快的是中亚细亚和阿塞拜疆的那些比较不发达的地区，也无视这些地区由于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的移入而加剧的劳动力日益过剩的情况（有人估计并预测这些地区的人口在三十年内将增加一倍。另据一九七〇年的人口调查，在中亚细亚的四个共和国和阿塞拜疆，二十岁以下的人占人口百分之五十二至五十六，而在西部的一些主要地区则占百分之二十九至三十八）。

在苏联的社会主义时期，制定经济发展计划时要考虑到投资效果、对外政策和地区间的平衡等因素。事实是：在苏联的全面发展中，那些当初最落后的民族共和国的经济指数增长得突出地快。这主要是由于动员了那里的人民并对他们进行了培训。但是，象有一位学者指出的那样，“地区间平衡发展的倾向看来从一九五八年以来已经倒过头来了。”

教育阵地是社会帝国主义者的沙文主义政策和斯大林时代共产党的政策形成鲜明对比的又一领域。在社会主义时期，苏联儿童学的是被压迫人民的传统和他们的真实历史。但今

天，却对儿童灌输一套俄国人炮制的否定少数民族文化遗产、冒充无产阶级历史的谎言和被歪曲了的事实。苏联刊物《统计评论》透露了这一点，它在一九七二年宣称，“成百万的各民族各部族的人民都以俄罗斯文化为自己的文化。”

苏联对待哈萨克人民的历史的态度是一个突出的例子。我们只要把官方发行的《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历史》一九四三年版和一九五七年版对照一下，就可以看出他们是怎样篡改历史的。一九四三年版是这样对待沙皇并吞哈萨克这一事实的：“哈萨克的沦为殖民地，标志了哈萨克民族独立生存的告终和纳入军事封建的剥削体系，这一体系是沙皇为统治其‘民族监狱’里的一切被剥削民族而建立的。”

但一九五七年版却这样说：“俄罗斯并吞哈萨克对哈萨克人民在关键时刻的历史命运有着进步的意义……它使哈萨克人民在准噶尔封建头子的奴役下得到解救……并吞哈萨克最重要的成果是：俄罗斯人民和哈萨克人民在对沙皇统治和俄罗斯地主资本家以及哈萨克封建头子的共同斗争中达到了团结。”

更加令人震惊的是这一刊物对待克涅萨里运动（哈萨克人在一八三七至一八四七年反抗沙皇统治的民族革命运动）前后态度显著地不同。

一九四三年版是这样说的：“在那十年中，三个哈萨克游牧部落的大部分牧民，在他们的首领克涅萨里·卡西莫夫的领导下为争取解放而起义，同俄罗斯殖民者和他们的那些苏丹统治者代理人进行斗争。这次起义是以前历次运动的综合，就其范围和意义而言，是在俄国沙皇整个殖民政策时期内哈萨克人民最大的一次起义。哈萨克人民用他们热爱自由和战斗的精

神，有力地、明确地表明他们不会轻易地放弃民族独立。”

现在，让我们看一看修正主义者在他们一九五七年版的历史中是怎样诬蔑这次光荣起义的。根据这一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者修订的版本，克涅萨里运动是“反动的、具有封建和君主色彩的，它的目的是阻止哈萨克人民前进，加强封建和家长制度，使哈萨克疏远俄罗斯和俄罗斯人民。”够了，我们不需要再多说了。

当然，从教育这一方面来说，篡改历史只是社会帝国主义者民族压迫政策的一小部分。更值得注意的是少数民族语言教育所处的地位越来越下降，因为社会帝国主义者企图使俄罗斯语言成为苏联的唯一语言，这显然是同列宁所阐明的政策背道而驰的。列宁一再谈到决不应该有强迫性的法定语言。而勃列日涅夫及其同伙今天却规定了“（非俄罗斯族的）每一个公民应该掌握俄罗斯语言。”社会帝国主义者剥夺各被压迫民族自己的语言，就是为了要消灭这些民族。有一本苏联教科书公然声称，“居民共同体改变了他们的语言后，最后也通常改变他们的种族（民族）出身。”

革命前的教育实际上只用俄罗斯语言，从而阻碍了那些不讲俄罗斯话的民族的文化、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苏维埃政权致力于纠正这种情况，并“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民族语言学校网。此外，苏联学者们苦干了好几年为那些只有方言的民族创造了前所没有的文字。这一方式在三十年代末和四十年代初得到了更为广泛的发展。但根据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布赖恩·D·西尔弗教授所说，“尽管仍然缺乏系统化的入学数字，现在已经积累的十分可靠和有说服力的数据充分说明，那些非俄罗斯族学校的入学率在六十年代显著地下

降，这不仅在赫鲁晓夫任第一书记的时期是如此，在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当权时也是这样。”入学率下降是赫鲁晓夫一九五九年教育“改革”的直接结果。他的法律名义上授权家长们为自己子女的学习选定一种语言，但是大多数观察家认为，这一着是为了便于那些在进行俄罗斯化工作的官员对儿童的家长施加压力。这一观点得到了证实。

在一九五八年，甚至在正式宣布“改革”之前，卡累利阿人被完全剥夺了教学民族语言的权利。卡巴尔达人和巴尔卡尔人在一九六五至一九六六年遭到同样的命运。卡尔梅克人教学民族语言的期限在一九六二至一九六三年从四年被减为三年，到了一九六八年已整个被取消。在伏尔加地区，到了六十年代末期，几乎所有非俄罗斯族学习本族语的只能学到初级课程。这些只不过是几个例子。

事实很清楚，这些变更是为了加速使那些被压迫民族俄罗斯化。一个苏联教育家说：“对小学生的教学改用俄罗斯语言，在教育领域是一个重要现象，它具有巨大的进步意义。”

共产党员的目标一贯是在平等和互相尊重的基础上，通过增加交往和交流，在各族劳动人民中发展合作，增强团结。因此，苏联用俄罗斯语言作为在各民族之间进行交流的一种合乎逻辑的语言，并不特别使人震惊——虽然我们应该注意到这一点：俄罗斯人在苏联的人口中现在不过占半数略多一些。但是，谋求俄罗斯语言迅速代替各民族语言，并以此作为加速推行民族“接近”和将来“融合”的政策的一个部分，当然是大国沙文主义。

可是在一九五六年，即赫鲁晓夫获得胜利的那一年“在那些自治共和国、自治州和民族边区的国家机构和其他组织中，

俄罗斯语言已代替了当地语言作为通讯和业务活动的工具”。我们认为这不仅仅是巧合。

当然，我们还可以叙述好几百个，甚至成千个例子来说明起源于苏联资本主义复辟的民族压迫。但是这样做会显得啰嗦，实际上，说明民族压迫复活的最令人信服的证据正是被压迫民族自发的、日益增长的各项运动，这些运动有时已经发展为暴力起义。我们将在下一章再谈这方面的问题。

但是在这里，我们还必须提一件事。这是一个典型事例，说明了赫鲁晓夫的轻率的“垦荒”运动如何夺去了哈萨克人几乎一半以上的家园。我们相信这种轻举妄动是现在苏联领导阶层无情地漠视民族权利的缩影。叙述这件事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原因：其中的罪魁之一正是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本人。

事情是在一九五三年九月斯大林逝世六个月之后的一次苏共中央全会上开始的。那时赫鲁晓夫第一次提出了他那使人感情冲动的垦荒计划。这个提议大胆冒失，过于野心勃勃，并且计划得很糟糕。它要在哈萨克及西伯利亚西南部一千三百万公顷（即五万多平方哩，超过路易斯安那州的面积，相当于英国的面积）荒芜贫瘠的土地上种植粮食。扩大耕地面积算不得是什么新奇的想法，也完全是切实可行的，但是赫鲁晓夫计划规模之大必然会给苏联的财源和物力带来极其沉重的负担。一位历史学家指出：“这个计划充满了无法估量的因素和数不清的冒险。”

没有人比茹马巴依·沙亚赫米托夫更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沙亚赫米托夫担任哈萨克共产党第一书记已达八年之久，他是担任这一高级职务的第一个哈萨克本地人。他和其他哈萨克领导人指出这个计划太过分了。虽然他们也渴望为了全体苏

联人民的利益而开发哈萨克的资源，但他们都认识到，赫鲁晓夫提出的野心勃勃的计划只会给当地的哈萨克人带来悲惨和不幸。

实施这一计划需要几十万俄罗斯人定居在这片土地上进行耕作。哈萨克人是传统的牧民，他们将会以极快的速度被赶出草原，以致只有极少数的人能来得及学会耕作。哈萨克的语言和文化将遭到威胁，所有得到宪法保障的哈萨克自治的痕迹也将一概受到威胁。

但是赫鲁晓夫是不会接受否定的回答的。他幕后牵线，暗中指使，企图削弱沙亚赫米托夫在哈萨克的权威，同时又到处物色一个言听计从的人来取而代之。他看上了当时任苏联海军政治部主任的勃列日涅夫。但是事情遇到了麻烦。当时赫鲁晓夫尚未独揽大权，党的其他领导人，特别是赫鲁晓夫的主要敌手马林科夫，也要安插他们自己的亲信。因此，勃列日涅夫起初没有被委以主管职务，他的名义上的上司名叫潘捷列伊蒙·波诺马连科，是以前日丹诺夫的同事。尽管如此，人们都一致认为勃列日涅夫是操纵这出戏的主要角色。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马林科夫被迫“辞去”总理职务时才发生变化，那时波诺马连科突然被送到华沙担任苏联驻波兰大使。于是勃列日涅夫就一手掌管哈萨克事务了。

一九五四年一月三十日，沙亚赫米托夫和其他哈萨克政治局成员被召到莫斯科去晋见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波诺马连科以及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人员。沙亚赫米托夫及其副手伊凡·阿福诺夫被解除职务。一个星期之后，勃列日涅夫和波诺马连科到达哈萨克首都阿拉木图。接着哈萨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他们替代两个遭到革职的领导人。

在不久之后召开的哈萨克共产党第七次全体代表大会上，沙亚赫米托夫被斥以“官僚主义、文牍主义领导”的罪名而放逐到哈萨克南部某地担任区委书记（该地区不在垦荒计划范围之内）。一九五五年六月，在勃列日涅夫亲手策划下，又撤去了沙亚赫米托夫的区委书记的职务。

现在反对势力已经清除，勃列日涅夫就着手执行赫鲁晓夫的命令。到一九五六年，五十多万名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其他民族的移民来到哈萨克，新建起五百多个国营农场。到一九五九年，哈萨克人仅占他们故乡人口的百分之三十还不到。哈萨克的欧洲移民人数超过了在非洲的全部欧洲人。

垦荒冒险的规模之大确实是骇人听闻的。初期计划要求运进五千台联合收割机和收割机，一万辆卡车，六千台中耕机，三千台耙土机以及五万台以上拖拉机。还要铺设一千二百哩铁路。也许如此宏大壮观的计划不可避免地会遭到困难的。

设备运到了，但火车站没有机械能将沉重的拖拉机卸下。年青的共青团员渴望工作，但没有训练计划。卡车运到了，但缺乏燃料。第一个收获季节因缺乏麻袋而损失了无数吨粮食。至于住房，尽管向新移民（当然不是向当地的哈萨克人）许了愿，但始终连影子都不见。第一个收获季节过后，百分之七十五的移居者只能在临时帐篷内挨过冬天。

总之，对于成千上万名志愿者来说，哈萨克的现实是，“由于没有提供卡车或贮藏设施，粮食大批腐烂，收割机的驾驶轴损坏了但没有零件替换，夜间在帐篷和地洞里冷得发抖，缺少肥皂还缺少水，缺乏手套和暖和的靴子，望穿了眼也盼不到家信，因为没有人会自找麻烦去送什么信。”

尽管情况糟到如此地步，但是，由于一九五四年取得了好收成，垦荒计划还是被认为获得成功。这却成了勃列日涅夫成功的标志，于是他很快回到莫斯科去荣获高升了。至于哈萨克家园被搞得乱七八糟犹如经过了一场浩劫，至于由于将大批设备和人力运往东方使传统的乌克兰和南俄粮仓的农业完全陷于混乱甚至险遭毁坏，至于一九五四年以后由于连续干旱、计划不当和劳动力斗志涣散而一再出现歉收（哈萨克所遭受的灾难尤为深重），所有这一切都全然不必在乎。

时至今日，对哈萨克人民的掠夺还在继续。现在，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等等还在继续不断地向垦荒运动中开垦出来的农业地区移居。但是很少人留在那里。苏联的研究材料表明，一个典型的移居者在乡下只呆两、三年，然后就迁入哈萨克共和国的居民已经过分稠密的城市或工业地区结果，近年来农业停滞不前，而哈萨克的新兴城市里却人酒为患，到处是求职者。

当然，毫不奇怪，好的工作绝大多数都落到了那些移居者手里。从理论上说，这些移居者是被派到农村去定居的。与此同时，当地的哈萨克人被赶出他们放牧的地方，在城市里徘徊，并日益成为城市里受剥削的半失业甚至全失业的少数民族。

四、劳动妇女的“双重负担”

社会帝国主义的统治还恢复了资本主义社会对妇女的那种压迫和歧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男女平等的思想受到广泛宣传，妇女被吸收参加各级生产。妇女作出了很大的成绩。即使在今天，妇女构成了苏联医生的大部分和其他专业人员的相当大一部分。在工业部门，妇女仍然占据整个劳动力的一半左右。

但现在，社会帝国主义者由于没有能力发展经济从而使所有的人都能从事生产性的劳动，就吵吵嚷嚷地说什么现在苏联妇女已变得多么“男性化”了。他们这样做是为了重新把苏联妇女关进家庭的牢笼，给她们套上资本主义赖以生存的种种旧风俗、旧思想的枷锁。修正主义诗人伊里亚·赛尔文斯基不久以前曾写道，妇女应该学会走路时举步轻盈而优雅。他说：“不幸，我们很多女郎都并不十分注意自己的步姿身段。”接着他又抱怨说，“我们需要一种对女性美的崇拜，不仅在艺术上，而且在家庭中都要发展这种崇拜。我再重复一遍，有必要将女人‘理想化’。

苏联妇女当然不愿意让赛尔文斯基之流的无聊文人把她们当作“花瓶”陈列起来。普通的苏联妇女无心，也无暇为了取悦于赛尔文斯基那样的丑老头而考虑什么“举步轻盈”。她们无论在家里还是在工作单位，整天辛苦操劳，忙碌不堪！

苏联女社会学家卓娅·A·扬科娃认为，在繁重的家务劳动上，苏联妇女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花更多的时间。这是引起埋怨儿童保育设施不充分的一个因素。事实上，据一九七一年七月十七日《真理报》说，在过去十年间，苏联没有一个州建造的日间托儿所达到原定计划数量！仅仅在轻工业部门，目前申请日托的母亲达十五万之多。

家务的负担对女工来说尤为沉重。一九六九年对列宁格勒劳动妇女的一个调查表明，百分之七十的妇女在工作时间感到疲惫不堪，生病率为男工的两倍。当问到她们：“你们得同时应付家庭的责任和车间里的活，能受得了吗？”百分之四十四的人回答说“可以忍受”，百分之三十一的人说“难以忍受”，百分之二十五的人说“简直受不了”。两位苏联研究人员得出

结论道：“把妇女从‘双重负担’下解放出来的可能性只是在很小程度上得到了实现。妇女参加生产，结果有利有弊：体力衰竭，精神疲惫，影响夫妇和家庭生活，限制社会和文化交际。”

减轻劳动妇女家庭负担的办法之一就是增加廉价家用器具的生产，并伴之以夫妇分担家务。社会帝国主义者年复一年地许愿要将苏联变为“消费者的乐园”，但并未见诸行动。

像美国一样，苏联生产的重点在于炫耀技术上的奇迹，而不考虑经济实惠。一个恼火的苏联经济学家在总结这种情况时抱怨说：“我们早就不需要那种‘经济奇迹’了。我们需要价廉耐用的器具，不是供展览观赏，而是供家庭使用；不是为了工程师和主张一切为未来的人，而是为了家庭主妇！所有这些总而言之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社会帝国主义者企图将妇女逐出劳动大军，将妇女变为接受施舍、甘受压迫的管家婆和“生男育女的人”。尽管苏联妇女身受巨大压力和重重困难，但是她们必须工作，就像一个铁路工人说：“我家有五个小孩，家务很重，但是老婆还得工作，因为我一人的工资不够全家用。今天，工作还不是妇女精神上的需要，不是的。工作是物质上的需要。”

但是即使在工作单位，妇女依然受到歧视，即使在那些妇女劳动力占多数的部门里，妇女也难得担任有权威的领导职务。例如，尽管男人只占医护人员的百分之十五，但百分之五十的主任医生和医院领导人却是由男人担任的。同样，在工业部门中，担任工厂经理、车间主任或与此相当的领导职务的妇女和男人的比率往往只有一比六或一比七。

妇女并且还集中于工资最低微的工厂或职务。根据苏联权威 A·Γ·哈尔契夫统计，在工业部门妇女的平均工资比男子

低得多。以下的表格表明，妇女一般说来都集中在低工资部门：类似的统计还表明，在这些部门内部，妇女再一次地集中在工资等级的最底层。

然而，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是从社会主义阶段继承过来的。那时不平等依然存在，人们普遍承认，只有一方面在增加生产和发展技术的基础上，另一方面在群众中有意识地、长期地开展反对男尊女卑思想的阶级斗争，这些问题才能最终得到解决。而当时在这些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展。

一九六七年苏联劳动力部门
妇女就业情况及工资等级

部门	妇女占全部雇员%	月薪（卢布） （全体工人平均数）
科学与科学服务事业	45	122.1
建筑	28	119.4
运输	24	115.5
政府机构、经济管理部门、 合作社及公共组织	58	112.7
工业	47	112.0
全国平均数字	50	103.4
教育	72	96.4
信贷保险	75	93.3
卫生保健	85	82.2
商业	74	82.2
住房和城市建设	51	78.7
交通	66	78.1

引自洛塔·伦农：《苏联妇女》。

来源：《一九六九年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国民经济》，莫斯科，一九七〇年版第 654 页。

近年来，尽管在技术上已经达到了历史上第一次将妇女充分吸收进重工业（这一部门报酬最高）的条件，但上面谈到的妇女就业和工资情况事实上却在不断恶化。例如，教育部门（妇女占在职人员百分之七十二）一九六七年妇女每月平均工资比全国平均工资低七个卢布，而到一九七一年差距扩大了一倍多，即妇女每月平均工资比全国平均工资少十四点二个卢布。今天，一个男性官僚，成天坐着不干事，其工资却要比一个纺织女工或一个集体农庄的女庄员高出好几倍。

苏联妇女另一个深为忧虑的问题是在过去二十年中家庭稳定每况愈下。当然，共产党一贯主张充分的离婚权，并为之而斗争。每次社会主义革命之后，总有成千上万名妇女运用这一权力摆脱了老式的、压迫性的婚姻关系，心满意足地作为从事生产的个人踏上社会。成千上万件婚姻也由于双方完全出于自愿而关系得到加强。

但是共产党决不提倡由于曲解“自由恋爱”或反对家庭而要求离婚的权利。我们支持离婚权，目的是为了加强家庭的联系，因为只有在夫妇双方享有充分的离婚权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建立起平等互敬的婚姻关系。

共产党主张加强家庭，但并不把家庭作为一个和社会隔绝的掩蔽所，而是把它当作一个充分参与社会活动的单位。比如，今天在中国，尽管保障男女双方享有离婚权，离婚事件相对来说是罕见的。当家庭冲突确实产生时就要尽一切努力来解决困难。离婚被认为是最后一着，并且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意味着是一种失败。

苏联处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时候情况也是这样。但自从一九五〇年以来情况发生了急剧变化。今天，苏联的离婚率在世

界上属最高之列，并在继续迅速上升。一九六〇年全国有二十七万零两百起离婚事件，一九六七年上升到六十四万六千三百起。或者用另一种方法计算，一九五〇年每一百件婚姻中仅有三起离婚事件。但是在一九六〇年，每一百件婚姻中就有十起离婚事件。及至一九六七年，每一百件婚姻中离婚事件竟达三十起之多，十七年之中足足增长了十倍！苏联统计人员自己确信不疑地指出，离婚事件的增加只有一小部分才是同报告程序的改进和法律的某些自由化有关。

五、酗酒和犯罪：社会帝国主义的祸患

酗酒是目前在苏联议论得最多的严重社会问题之一。这个问题或许是苏维埃大家庭日益动荡不定的最主要原因。在我们对苏联社会的调查中，修正主义者统治下的这个问题的严重程度使我们大吃一惊。酗酒的蔓延已经成为当前在苏联到处滋长的一切衰败和腐朽的象征。事实上，如果我们对酗酒的发展及其有关问题作一比较详细的调查，那末在社会帝国主义的兴起对苏联工人阶级意味着什么这一问题上，我们就能有一个更清楚的认识。

当然，酗酒在俄国并不是一个什么新的现象。在革命前的年代里，国家相当大的一部分收入，即多达三分之一的收入是从酒的专卖中得到的。其结果是积极鼓励饮酒，既可作为生财之道，又可作为慰抚之用（沙皇预算曾被称为“饮酒预算”，因为它依靠酒类税收）。一个苏联记者写道：“几个世纪以来，酗酒似乎是俄罗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阴暗、单调的农民生活，加上经常发生的饥荒的威胁和劳累折骨的苦役，肮脏的城市贫民窟中的污秽和堕落，商人家中的令人窒息的空气

——这一切都成了伏特加酒应运而生的温床。‘伏特加’是驰名世界的沙皇俄国的少数几个词汇中的一个。”

这是一九一七年后布尔什维克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之一。迹象相当清楚地表明，平均每人酒类消费量在革命后到一九五〇年间稳步下降。在革命前的一九〇六至一九一〇年，每人纯酒精消费量是每年三点四一公升，到了一九三五至一九三七年下降到二点八公升。一九四八至一九五〇年的数量达到低点，为一点八五公升，比革命前明显地减少了百分之五十。

许多资产阶级观察家敏锐地指出，这些数字只包括合法的产量；另外还有长期传统性的私人酿酒没有计算在内。这虽然是事实，但不但不会削弱我们的论据，反而使它更为有力。因为在这些年代里，苏联不断地在城市化。农民迁往城市在新的工厂里工作。城市工人和农村的亲戚失去了联系（在沙皇时代，城市工人通常回农村收割的习惯在一九一七年开始消失）。而私自非法酿酒主要是乡村的活动。

当时对付酗酒的主要武器是革命政治。对酗酒的危害性进行了耐心的教育，用社会主义的热忱和献身于困难的、但又激励人心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精神取代人们逃往醉乡的愿望。例如，在二十年代里，成立了全苏禁酒协会。这个机构出版定期刊物《禁酒和修养》，发行其他科学和通俗小册子，并组织了禁酒宣传。国营企业生产的伏特加急剧下降，调整了价格以劝阻过度饮酒。此外，对酗酒者本身不是作为罪犯，而是作为需要帮助的受害者来对待。醒酒所内“有洗浴、清洁的床铺和丰盛的早餐，这一切都是免费的。”

然而在今天，情况就大不相同。根据可靠的统计，苏联的伏特加、果酒和啤酒的消费量在一九五〇到一九六〇年间增长

了一倍，在一九六六年又上升了百分之五十。据各方面报道，目前仍在上升。一九五八年开始，苏联当局对此采取了“惩治的措施”，但并不见效。问题变得更严重了，根据《消息报》报道：“由酗酒造成的危害大得异乎寻常。”

目前，典型的工人家庭花在酒类饮料的费用（每年九十三卢布）同花在电影、剧院、报纸、其他文化用品以及文化生活中的费用几乎相等。据称，一半以上的交通事故是直接由酗酒造成的。

工业部门报道，每年有几十万起由于酗酒造成的旷工和怠工。在明斯克州的若季诺，付薪金用的支票是直接转入工人的储蓄账户的，以削减在伏特加上的支出。在一条南俄铁路线上，人们对火车里喝醉酒的年轻人的抱怨如此之多，以致必须组织铁路人员中的志愿民兵分队来保护乘客。这使我们想起了乘坐美国城市的地下铁路的情况。

甚至在苏联的报纸上，也可清楚地看到酗酒已接近泛滥成灾的程度。然而最严厉的法令，例如一九六七年通过的对过度酗酒处以两年的“强迫治疗和劳动教养”，也不奏效。为什么苏联人民，特别是工人，会转向嗜酒？

早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恩格斯在他的著名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指出，工人饮酒主要是逃避在资本主义下生存的疾苦：“他必须有点什么东西使他感到还值得工作，感到明天的苦日子还能忍受……人们相信喝醉了至少可以在几小时内忘却生活的困窘和压迫。”其他作家也指出，沉闷的社会状况是酗酒的主要原因，包括伟大的作家马克西姆·高尔基

也是这么说的。^{*}

无疑地，这是苏联酗酒泛滥的主要原因。工人们对于他们不再掌握政权这一点心中有数，并且在生活的各方面感到资本主义复辟的影响。酗酒问题的发展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复辟的直接结果。

在五十年代初期，苏联报刊上最初提及纵酒问题。当时的主要的批评对象并不是工人。虽然我们还不至于把苏联无产阶级描绘成在任何时候都是禁酒阶级，然而，在五十年代初期，问题确实是集中在那些新兴资产阶级的受过教育的子女们。就因为他们的父母是党的高级官员、技术人员或大学学者，这些年轻人把自己看作是特殊人物。他们中间的一些人（虽然肯定是少数），就在公众前以纵酒来夸示他们的特权地位。

在一九五三年末，《共青团真理报》登载了一篇骇人听闻的报道，有一伙青年组织了一个饮酒联谊俱乐部。他们依靠犯些轻微的罪来资助该俱乐部的活动。在试图向警方掩盖他们的犯罪活动的过程中，其中有几个青年人可悲地成了杀人犯。当

*** 高尔基论俄罗斯人酗酒的原因**

工厂吞噬了一天的时光，机器从人们的筋肉里榨取了它所需要的精力。在一生中又毫无痕迹地被勾掉了一天，人们向自己的坟墓又接近了一步。但是，他们看到眼下还能休息和尝到烟雾弥漫的小酒馆的乐趣，也就心满意足了。……长年的积劳损害了他们的胃口，为了能吃下东西，他们就大量喝酒，用烈性烧酒来刺激食欲。……一回到家里，他们就和妻子吵闹，甚至常常挥舞拳头痛打她们。年轻人常下小酒馆，或者晚上轮流到各家聚会，拉手风琴，唱淫荡难听的小调，跳舞，说下流话，酗酒。疲惫不堪的人们，很快就喝醉了，郁积在心头的那股病态的无名火，顿时发作起来，非得找个地方发泄不可。因此，只要一有发泄这种焦躁心情的机会，人们就从不放过，为了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便会像疯狂的野兽一般互相厮打，往往打得头破血流，有时打成残废，甚至把人打死。（高尔基：《母亲》）

这案件被揭露时，发现大部分的参与者有着我们美国人称之为“从小宠坏了的浪子”的背景。

这样的报道说明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对酗酒的斗争并不是和持续的阶级斗争没有联系的。这种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不仅仅是一个内部的党派斗争。它涉及到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并发生在社会各阶层中。

然而，尽管有过这种持续的斗争，但是到了一九五六年，赫鲁晓夫的篡权，资产阶级的复辟，标志着酗酒的东山再起。为了迷惑、安抚工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为伏特加开了绿灯，任其泛滥。对放荡的特权阶层青年的批评和揭露停止了，伏特加冲向工人。而对那些经济部门的领导呢？却是回收到了利润。

一个美国观察家在分析了苏联报刊一系列广泛的有关酗酒的资料后，作出如下的结论：“商业机构和销售商对销售含酒精的饮料十分感兴趣，这种饮料在特种商店、食品杂货店和餐馆、咖啡馆内出售。经济计划的完成取决于达到这种饮料的最高销售量，因为它们占了饮食业销售计划的大部分（约三分之一）。因此，企业的经理、推销员、男女侍应生对酒类交易的兴趣特别大。此外，为了增加利润，商业部门把酒和伏特加的销售点设在大众市场附近。这并不意味着酒类只在工厂附近销售；在国内有些地方，过分积极的职员在公园和海滨推销烈酒，他们在公共场所装置了出售酒类的机器。商店精心布置了吸引人的陈列品为含酒饮料做广告，使年轻的孩子和成年人同样堕落。与此同时，电影、电视和大众宣传品都对过度饮酒的乐趣作了称颂。显然在剧院、电影和电视中经常能看到无节制

的狂饮。一位著名的法学家说：“我们看到电影内的英雄们喝得津津有味，我简直找不出一部没有饮酒场面的电影。”其他苏联评论员也支持这种看法。

这个问题在一个复辟了资本主义的国家中是明摆着的，在一九七一年致《消息报》的一封信中也说明了这个问题。信中指出，在过去，商店必须完成某些商品的具体销售量。换句话说讲，它们按照指示出售多少肉类、黄油、蛋类等等。然而，目前每一个商店规定必须争取完成总利润额，这样就使经理们去推销最容易脱手的商品，其中之一就是伏特加。写这封信的人尖锐地问：“为了要在报表上显示盈余，经济机构是多么惯常地急于从事任何只要有利可图的业务……（但是）你又怎样去计算那些破裂了的家庭、堕落的人格损失……”这个呼吁不是真实地揭露了今日苏联资本主义的丑恶面目了吗？

在苏联，酗酒之所以成为一件关系重大的事情，也正因为它同越来越普遍的道德败坏有着联系。举例来说，在苏联历史上第一次（不包括少数边疆地区，例如种植罂粟的格鲁吉亚）出现了吸毒问题。关于它的扩展情况，现在证据还不多，当然，问题还没有象美国那样严重，但肯定在滋长。

在一九六九年和一九七二年，颁布了严惩贩毒的法令。今年又制订了一条严厉的补充法令。在一九七〇年，讽刺性周刊《鳄鱼》第一次公开揭露了塔什干大名鼎鼎的毒品贩子的一生，一个名叫“骗子大王阿波罗”的近于传奇式的人物。

更为触目惊心 and 广为蔓延的是青少年犯罪的迅速增长。这同酗酒直接有关，一帮帮喝醉了的青少年无赖常常无事生非，这种情况比五十年代更厉害。例如，在哈萨克的一个纺织城中，

*由于可供利用的文娱设备减少和现有活动的费用上涨，很多青年出没于街头巷尾，漫无目的地游荡，相互传递一两瓶酒，多半是伏特加。像在美国一样，这往往是工人阶级青年唯一能得到的一种社会生活。也正如在美国一样，它能使人堕落为无赖、阿飞或小偷小摸。近年来的苏联报纸充满了对这种活动的抱怨。在莫斯科，盗窃案的增加促使警察部门开始出售一种自动盗窃探测系统，并在报刊上大登广告。

同样严重的是所谓“别嬉”（按字义讲是“讨厌的家伙”），这是一帮在边沿地区的流浪者。这些人被诱至像西西伯利亚那种缺少劳动力的地方。他们来自各行各业，包括“前银行董事、建筑师、不得志的落魄艺人、五金工人、马戏团学校的毕业生、钢琴校音者”及其他。作为被社会所摒弃的人，他们当零星的临时工，通常由当地农民以毛皮、肉类和牛奶作为报酬。然后“别嬉”将这些东西在黑市出售谋利。

在没有工作时“别嬉”就从事大吃大喝和做一般违反社会秩序的轻罪活动。尽管他们自己也是社会帝国主义制度的受害者，但他们的反抗已发展到痛恨整个社会的地步，并对多数勤

* *酗酒与犯罪

在哈萨克的费尔干纳纺织城，每年约有六百个来自周围农村的年轻妇女到丝织厂工作，又有同样多的人失望沮丧地离开了。为什么？

《共青团真理报》说，问题是酗酒。厂内的女工宿舍不时陷入被包围状态。当然，包围者是喝醉了的青年人。但是他们不是闲着无事来恶作剧的。有时妇女幸免被强奸，但是所有的人都受到了下流的凌辱和谩骂。众所周知，有一帮经常侵袭宿舍的特别凶恶的家伙，是在厂共青团支部书记领导下的！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一种解释可能是工厂同女工宿舍相隔大约有三条街之远。在其间，国家开设了不少于九家伏特加酒吧间。年轻的妇女说，她们必须成群结队并以砖头武装自己才能安全回家。

劳和受压迫的苏联人民嗤之以鼻。

苏联并不公开透露犯罪案的数字，但是当局当然知道它在增加。在公众的压力下，成立了各种特别委员会来“处理”这些问题。像在美国一样，一个完整的研究犯罪学的机构在发展中，并定期发表深奥的“研究报告”，这种“报告”只不过是用来证实一般工人早已知道的事实。尽管有很多好心人为这种研究工作和委员会服务，但其目的是转移对犯罪的真正原因和真正罪犯的注意力。

一九七一年，工会的《劳动报》刊登了访问苏联司法部长弗拉基米尔·伊·捷列别洛夫的谈话。捷列别洛夫对改善犯罪情况的前景并不乐观。他也不特别说明为什么。他对犯罪率增长作了如下的解释：“只要少年还在犯罪，我们无从盼望犯罪减少。”说得多漂亮！这个家伙真可以跟我们自己的那些专讲拙劣的双关语的两面派“领袖”们媲美。

这些只不过是近年来在苏联发展的社会问题中的几个问题。我们的意思并不说管理上的腐败、失业、民族压迫、酗酒和犯罪全部是新的东西。这些情况在斯大林领导下也存在的。但是在那个时期，这些问题代表了陈旧的、衰亡着的東西，重要的是党和国家政策的目的是有系统地从苏联社会中根除这些落后的东西。如果有时候这方面的工作的效果不大，有官僚主义或是麻木不仁，那末，我们在学习它的主导方面的特点和真正卓越成就的同时，也必须从那个反面经验中吸取教训。同当前社会帝国主义统治者相反，真正的苏联共产党人是把劳动人民、苏联广大人民、全世界广大人民的利益牢记在心的。

资本主义的复辟是我们在本章中叙述的每一个“恐怖故事”的中心内容。我们并不是像托洛茨基分子及其他所谓“革

命者”那样，抱着高兴的心情来叙述这个报道。托洛茨基之流根本不顾苏联工人阶级面临的是严重的考验和必须重新开始为社会主义而斗争，却是装出一副教皇的架势，数说斯大林（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罪状。

当然，我们这里已讲到的每一个问题都可以写成长篇文章，甚至是书。我们并不要求来一个“全面的评价”。我们欢迎别人把我们对诸如民族压迫和在苏联的妇女地位等问题所作的肤浅的调查更深入下去。然而，我们必须指出，调查工作要能为革命运动服务，就必须以马列主义为指导，并且以苏联蜕变为一个帝国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国家这一个问题为课题。

最近，一种所谓“同一化”理论在美国某些资产阶级学术界颇为流行，也在反帝国主义运动中引起某种程度的反响。这个“理论”试图为这么一种说法辩解：苏联同美国自然而然地变得更为相象，因为它们都进入了先进工业社会的阶段，也就是“新资本主义”，“后期工业社会”或“消费社会化”这种说法是十分害人的。

诚然，两个超级大国在几个主要方面（我们已提到好几处了）变得更为相似，这是事实，但它们面临的共同问题决不是什么“先进工业主义”的问题。这个“先进工业主义”被说成是历史上的一个新阶段，据说它将代替像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那样一些十九世纪“过时的”现象，说什么这一阶段有朝一日总得为中国和印度、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等国以“不同的途径”来实现。事实决不是如此。这两个帝国主义大国面临的共同问题是阶级统治的问题，也就是说资产阶级统治的问题。

财富和权力的不公平分配不是不可避免的。经济发展导致社会瓦解、幻想破灭和道德败坏也不是不可避免的。“生活特

性”的问题同雇佣劳动一样，是和社会制度的性质有直接联系的。中国在解放前的吸毒问题比目前任何一个“先进”国家要来得糟。然而在革命取得胜利后的十年内，它就消失了。目前，在无产阶级继续统治下取得了重大的成绩，这个问题也没有再发生。

在当前，苏联人民的日常生活中，尽管他们面临的问题跟他们的父母和祖父母们在一九一七年时所面临的问题并不全部相同，但却又出现了好多同俄国沙皇时期共同的现象，它们都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产生并进一步恶化的问题。正如一九一七年十月前一样，除非资本主义被推翻，再一次把它从苏联的土壤中根除，这些问题是不会得到解决的。

六、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文艺

如果我们一点也不谈在修正主义下的文化发展，那末我们对社会帝国主义统治下的生活调查就算不上完整了。

毛泽东这么讲：“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他又说：“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

在斯大林时代，苏联的艺术方针是按照这些原则贯彻的。在那些年代里，曾经不遗余力地发展并普及无产阶级形式的文艺。

当我们谈到无产阶级艺术时，我们指两件事。第一，真正的无产阶级艺术是一种教育工人的艺术，使他们懂得自己的历史、斗争的传统和取得的成就。为的是使工人阶级认清自己的

历史地位，进一步树立起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解放全人类而奋斗的决心。无产阶级的艺术是党性的艺术。它无畏地支持工人阶级的事业和领导。它拥护的是集体主义而不是个人主义，是斗争和战斗而不是和平主义，是受苦的大众而不是过去和现在的剥削者。

但是无产阶级艺术必须是为工人的。无产阶级艺术家不能对群众夸夸其谈，必须到群众中去，向群众学习，然后以艺术的较高形式把自己内心的真实感情带回给群众。为了做到这一点，无产阶级艺术必须使用群众的语言。

在苏维埃政权的头十年中，有些艺术家和作家受到革命的鼓舞，试图用艺术来表示他们对革命的支持和忠诚。但是由于他们中很多人对工人和农民缺乏了解，而对小资产阶级艺术家固有的、狭隘的世界却比较熟悉，因此，很多人走上了抽象艺术的形式主义和表现主义的道路。这在绘画和音乐方面尤其如此。

但是工人阶级是不欢迎这种艺术的。因此，到一九三〇年，党已经着手纠正这种情况。党制订了指导文化工作者的准则，使他们能更好地为广大群众服务。很多人在参加国家工业化、打败纳粹、建设社会主义的英勇道路中得到了改造。

这些无产阶级艺术家同劳动人民并肩工作，他们的作品反映了由此而产生的阶级感情。可是其他一些人却坚持他们旧的资产阶级世界观，仍然认为只有他们那样的艺术和文学上的“天才”，才是真正的英雄，才能给迟钝而又愚蠢的群众解释生活的真谛。

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文艺上的两条路线斗争从未停止

过，正如阶级斗争从整体上来看一直在继续一样。在这个时期中，一般地说无产阶级路线是统帅一切的，它是通过“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表现出来的。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概念，是资产阶级所大肆诽谤的。在本质上，这个理论主张艺术应当反映具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的现实。换句话说，革命的文艺应当从表现诞生中的新世界这一观点出发，如实地描绘社会主义的现实。这个概念同安德烈·日丹诺夫有着密切的联系。他是四十年代后期这一概念的主要倡议者。

资产阶级爱把日丹诺夫说成是艺术的敌人，是生活本身的敌人。真是荒谬透顶！我们只要指出当列宁格勒被纳粹包围、整个城市饥寒交迫、每天都在同死亡作斗争的时候，在该城的中心召开了作家会议的，正是日丹诺夫（那时他是列宁格勒党的书记）！

日丹诺夫确实是资产阶级艺术的敌人。通过持续不断的批评，他试图在苏联文化工作者中提倡这样一种态度：在文艺方面，像在生活的别的方面一样，政治必须统帅一切。由日丹诺夫支持的这个运动，是苏联共产党人给修正主义的一个有力的打击。（见第二章）

苏联工人阶级中产生了许多优秀的作家和艺术家。最著名的当然是马克西姆·高尔基，他的写作生涯在革命前就开始了。他的作品如《母亲》和《底层》是整整一代无产阶级作家的典范。其他杰出的作家有法捷耶夫，他的作品《青年近卫军》，叙述一群青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纳粹战线后方英勇作战的故事。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也是一部伟大的作品。在电影方面，有谁能否定伟大的无产阶级

艺术家谢尔盖·爱森斯坦？

然而，随着一九五六年赫鲁晓夫一伙的上台，这些人都被打入冷宫。他们的作品被扣上“过时”的帽子。起而代之的是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伊利亚·爱伦堡和叶夫根尼·叶夫图申科等人，他们这些人占了最显著的地位。帕斯捷尔纳克和爱伦堡代表了较老一代的苏联作家。他们是些抗拒自我改造的家伙。几年来工人“对他们的创造性加以限制”，他们是怀恨在心的。现在他们是自由了，可以公开发表长期来隐藏在他们脑袋中的一切垃圾。在爱伦堡写的《人民·岁月·生活》的六卷回忆录中，他大肆吹捧美国，称颂美国统治阶级取得的伟大“进步”。他公开攻击斯大林（在这一点上，他是得到了赫鲁晓夫特别鼓励的），并再次鼓吹他那一套一听即令人生厌的把抽象主义引进苏联（文艺）的号召。

更重要的是出版了帕斯捷尔纳克的反革命小说《日瓦戈医生》。这部小说是以完全歪曲历史真相的眼光来看苏联革命的，它讲一个人在历史跃进的时候却袖手旁观。难道这部小说是为了指出持这种态度是愚蠢的行为而写的吗？当然不是。这部小说的主题是，断言十月革命是一个“历史错误”和“不可救药的大灾难”它扬言在十月革命后“发生的一切都是罪恶”。说十月革命是个大灾难，这只能是资产阶级的语言！

在这个时期内，像曼特尔特什德姆、左琴柯、阿赫玛托娃等人也纷纷出场。索尔仁尼琴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和杜金采夫的《不仅仅是为了面包》都成了畅销书。

同时，叶夫图申科成了新一代作家的代表人物。在赫鲁晓夫所谓的“全民文化、全人类文化”的旗帜下，叶夫图申科声称只有他们这样的青年作家才称得上是“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二

大的产儿”。

在这些作家的作品中，污蔑苏联工人阶级的成就，提出资本主义国家是一个值得仿效的典型，公然和西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同流合污。例如，在作家格拉吉林的一本书中，他的“英雄”是一个只想在星期天驾车取乐的人。为了立刻买到小汽车，他就千方百计搞钞票。难道这是无产阶级的理想吗？

这一艺术流派对电影的影响极大。在赫鲁晓夫时期，苏联制片厂抛弃了爱森斯坦的战斗传统。苏联电影越来越从资产阶级“人性的”、和平主义的立场，而不是从革命的无产阶级立场来衡量生活。《时代》周刊在评论苏联爱情片《一年中的九天》时，特别提到过去苏联影片中的英雄都是斯达汉诺夫式的劳动英雄和艰苦奋斗的劳动人民，而在这部影片里的英雄却更像西方的资产阶级。这说明了《时代》周刊的观点：悄悄而来的自由主义已经跑得多么远了。同一时期的另一部影片《我漫步在莫斯科》，是一部极端恶劣和典型的好莱坞电影的翻版。

在赫鲁晓夫时期，苏联影片不惜改弦易辙，鼓吹资产阶级和平主义，把“和平共处”作为总运动的一个部分，更把它看成是共产主义的战略实质。例如《士兵之歌》这部电影，以“战争违反人性，和平带来幸福”为主题，在美国受到了热烈喝彩。可是这种在一切条件下和平必然会带来幸福的观点是不真实的；真实的是工人阶级的最终目标和命运是要以消灭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来消灭一切战争。同帝国主义讲和平，只能带来更大的灾难和更多的战争。但这部电影所鼓吹的恰恰是不惜任何代价追求没有阶级性的和平空想。

苏联的辩护士在回答这类批评时，常常指出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遭受了怎样大的苦难。他们争辩说，苏联人民在

遭到了两千万人死亡后，比任何人更懂得和平的真正意义。这一点当然是确实的，但是和平的真正意义却并不像修正主义者所说的那样。和平不是人民乞求得来的。人民群众不是不愿意为和平作出牺牲，但和平必须在自由、独立而最终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基础上赢得。它决不是没有阶级性的模糊的空想。

让我们把苏修如何对待战时的牺牲同越南共产党人的态度对比一下。越南人民当然遭受了同任何国家人民所遭受的一样严重的战争损害，但是他们讲过战争违反人性吗？他们只是渴望停止炮火吗？没有！因为正如胡志明宣布的那样：“没有东西比自由和独立更宝贵。”

随着赫鲁晓夫的垮台和勃列日涅夫、柯西金一伙的上台，苏修开始稍为改变了一下他们的调子。在赫鲁晓夫的年代里，艺术、文学和电影方面的“自由主义”似乎走得太远了些。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作家如索尔仁尼琴等人对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同样感到不满。当全部作家随着大流吵吵嚷嚷“揭发”斯大林和他的“罪状”时，人们开始怀疑他们是否还能够信任他们的领导。毕竟，像爱伦堡那样的蠢才如果一直懂得“真理”，勃列日涅夫又怎么能够存在？

于是新领导开始加紧控制他们的新资产阶级艺术家，而这些新资产阶级艺术家中的大部分人也就心领神会跟着走。例如，叶夫图申科觉得很容易把自己这样一个对现实不满的青年作家顺利地转变为御用诗人，不过要求准许他到国外旅行，熟悉一下西方生活作为条件。他的申请很快就被批准。其他的作家则拒绝认真从事所谓艺术“重新斯大林化”，其中的许多人今天已成为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核心。（见第六章）

对勃列日涅夫来说，特别重要的是苏联作家抛弃了赫鲁晓

夫时期的那种艺术方面的和平主义特征，因为这个主义已经过时。现在苏联统治阶级正在图谋改变美帝国主义的霸权地位，因此，更需要好战精神。

在二十四大上，勃列日涅夫要求文学作品反映“爱国题材”。在第五次苏联作家会议上，苏联作家协会第一书记格·马·马尔科夫强调指出，“文学对陆海军人员负有特别责任。”他接着又说，“必须尽一切努力来发展并加强苏联文学中的战斗传统。”

一个突出的现象是，最近的作品称颂了苏联在世界各地的军事冒险。纪录片《捷克斯洛伐克：一年的考验》竭力为社会帝国主义对该国的野蛮侵略进行辩护。它获得了“国家文艺奖”。

另一部纪录片《海洋》，它通过描写一个指挥大西洋、太平洋、巴伦支海、北冰洋、波罗的海和地中海等舰队的苏联舰队司令，大肆渲染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对全球的海军扩张。在《核潜艇闻警出动》这部小说里，局限“在自己领海里游弋”的观念受到了批评。作者写道，“在战前我们不常到海洋去，但是现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军国主义色彩越来越浓厚的作品的另一主题是歌颂沙皇时代的军事传统。文学杂志《青年近卫军》竟然公开歌颂声名狼藉的殖民主义者“爱国”英雄。老沙皇亚历山大虽然是以侵略和扩张而臭名昭著，但也由于他的“爱国”伟绩而受到了称颂，《黄金狂》这部最近出版的长篇小说，公开为沙皇侵略中国的罪行辩护，自称在不平等条约下（该条约后来为列宁所否定）从中国夺得的土地最先是 by 俄罗斯的移民开垦的。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艺术作品曾鼓舞了群众的革命战斗精神，鼓舞了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共产主义原则相联系的社会主义爱国主义。但是，这些作品对真正的“保卫国家”同彻头彻尾的侵略作了审慎的区别。这些影片是用来动员并教育群众使他们保卫自己的。

然而，现在苏联的艺术家在贬低群众的作用。像他们的同行美国一样，他们描绘技术万能而人民无能，从而把赫鲁晓夫时代的和平主义同今天的军国主义连结在一起了。它们的区别无非是：赫鲁晓夫时期是社会主义正在被破坏，资本主义复辟的进程还处在它的初期；而现在的苏联已成为一个十足的帝国主义超级大国，国内矛盾使它焦头烂额而不得不到处侵略，恣意扩张，所以它的对外侵略是全球性的。

让我们再以《驯火记》这部专门描写核优势竞赛的故事片为例。这部电影的内容是荒谬的，它的论点是一般帝国主义所共有的，即强大的核保护伞是对战争的最好防御。因此这部影片大肆鼓吹苏联火箭的“威力”。它敦促科学家为军事效劳。根据《真理报》的意见：“《驯火记》是我们的政治影片”“它具有最深远历史意义”。长篇小说《火箭轰鸣》用大量篇幅描绘了一个火箭司令的幻想：核战争爆发了，他受命用核武器去攻击敌人。他赢得了胜利，而敌人却被消灭了。

第六章苏联人民的回击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人类的全部历史证实了这条马列主义的根本原理。阶级社会一开始，人们就起来造反，给压迫者以狠狠的打击。这种打击从来就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强大力量。

今天的苏联人民继承了这部丰富的反抗斗争史的传统。在整个封建时代，俄国农奴不断起来进行规模巨大的反抗，动摇了沙皇的统治。像敢于向封建专制制度的军事力量挑战的斯杰潘·拉辛和叶美连·普加乔夫领导的伟大起义，虽然最终被反革命的暴力所镇压，但运动鼓舞了千百万农奴，鼓舞他们再次起来斗争。在列宁称之为“一八六一至一八六三年的‘革命形势’”下，他们把地主杀掉，把地主庄园烧掉。这种反抗迫使沙皇于一八六三年同意在法律上（不是在实际上）废除了农奴制。

随着资本主义和革命无产阶级在俄国的发展，这种反抗飞跃前进。由于无产阶级代表了最先进的生产关系，因此他们能够领导俄罗斯帝国的包括农民和被压迫民族在内的一切被压迫人民的斗争。以一八八五年在伊凡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和一八九六年在圣彼得堡的纺织业大罢工为起点，俄国工人很快地发展了他们的经济和政治斗争。在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下，多民族的俄国无产阶级把所有的被压迫者聚集在它的旗帜周围，并于一九一七年推翻了腐朽的专制制度，从旧的剥削阶级手中夺取了政权。

今天，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柯西金集团搞的资本主义复辟，代表着新的资产阶级的利益，这对整个国际无产阶级和一

切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是个巨大的挫折。可是苏联人民继承了他们的英雄传统，正在反抗新的压迫者的统治。这一斗争已给苏联统治者造成了严重的困难，并且使他们在世界各地经常处于狼狈的境地。如最近一期《北京周报》指出的：“今天的苏联绝非像勃列日涅夫之流描述的那样是‘稳定’和‘和谐无间’的。它充满着尖锐的阶级对抗、民族矛盾和社会动乱。”

一、苏联：一个法西斯国家

今天苏联人民正在进行的斗争必将发展成为一个推翻帝国主义和重建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只有工人阶级能够领导这场斗争直到最后胜利。苏联统治者知道这一点。他们正企图通过对苏联人民，特别是对工人，实行冷酷的、法西斯式的独裁（赤裸裸的、恐怖的独裁）来镇压这场斗争。

当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不再能使用那种主要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运用的“民主”方式来进行统治时，法西斯主义就发展了。民主的政府议会制对于资产阶级是合适的，因为议会、选举等等提供了一些机构，通过它们，资产阶级能够和平地解决自己内部的争端，也能够有效地使中间阶层依附于资产阶级，同时还可以把资产阶级专政掩盖起来，而不为群众所察觉。但是，就像列宁说的那样，帝国主义意味着彻头彻尾的反动，并且由于它在各个方面受到愈来愈多的挑战，帝国主义者常常必须求助于建立赤裸裸的恐怖和独裁。

当然，这里有一个资产阶级必须设法解决的矛盾。因为在帝国主义制度下，相互竞争着的资本家之间的矛盾增加了，而不是消失了（像有些人企图使我们相信的那样）。帝国主义只是加剧了资本主义的不平衡发展。因此，在法西斯主义下，甚

至在帝国主义统治阶级内部，一定要找到解决矛盾的新形式。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形式对多数帝国主义者来说，还不如那些较陈旧的、经过历史考验的资产阶级民主方法那么有效、合用。举一个例子，在纳粹德国，就采取了事实上由无所不知的元首裁决的形式。

可是在苏联，帝国主义并不是从竞争的资本主义阶段发展起来的，而是在将无产阶级的党转变为资产阶级的党、利用无产阶级专政下形成的国家机器来恢复资产阶级专政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不需要资产阶级议会这种形式，虽然社会主义确实意味着人民大众在历史上第一次享受到的真正民主。

而且，因为无产阶级代表了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所以，无产阶级能公开宣称它的统治事实上就是专政，但这是对一小撮旧的剥削阶级的专政，而不是对人民的专政。社会主义国家是一个高度集中和强大的阶级统治的工具，比传统的资产阶级形式要强大得多，这是因为它是、而且只能是以工人阶级的革命团结为基础。这个阶级的阶级利益决不像资产阶级那样，以本阶级内的个人或集团间勾心斗角地追逐利润为目标。

在斯大林当政时，集中的国家机器是对付形形色色的国内外反革命的极为有效的武器。但是马列主义者从来就认为，对付反革命最有效的武器是用正确的政治见解发动和武装起来的群众本身。在斯大林时代，秘密政治警察起过重要的作用，惩治性的劳动营和不同形式的惩罚机构也存在。虽然若干制裁过火的情况确实发生过，但是这个机器不是为了镇压广大群众的，而是针对那些贪污腐化的党的干部、经理、将军和军官团的其他人员、官僚主义者、外国特务等，总之，斯大林时期社

会主义国家的保安、惩罚机关是无产阶级统治的工具，而不是资产阶级镇压群众的工具。

但是，随着赫鲁晓夫集团的篡夺政权，集中的国家机器就从人民手中被夺走，而由人民的敌人掌握了。这样，苏联的资产阶级走向法西斯独裁，就不必经历由一个“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转变为法西斯独裁时所发生的各种困难。一个强有力的集中的国家已经具备，但是关键的问题是：这个国家要为哪个阶级服务，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不过，即使在法西斯主义下，当权的资产阶级也不是百分之百地依靠赤裸裸的恐怖手段，他们也要搞一些欺骗群众的花样。在苏联就是将法西斯主义伪装成社会主义。希特勒也是这样干的，但是在苏联做起来却更为容易，因为真正的社会主义确实曾经在那里存在过数十年之久。

此外，赫鲁晓夫不能马上就把手无产阶级专政的镇压力量转向工人。他第一步是攻击这个力量以破坏其有效性。这就是五十年代末期和六十年代初期的所谓自由主义时期。这时赫鲁晓夫攻击保安机构为“独断专横”、“无法无天”。他一方面抓住一些实际存在的缺点，同时又炮制谎言，以此来混淆是非和诽谤一些正直的干部。警察和惩治机关的力量大大削弱，若干机构被撤销，大开牢门释放各种各样的反革命分子。凡是警察机构没有解散的地方，那里的经过考验的无产阶级战士都由资产阶级分子所取代。

随着这种情况的发展（一九六五年以后又加快了这方面的发展速度），一个新的保安机器渐趋形成。和旧警察不同，这架机器不是针对官僚主义者或其他剥削者，而是针对人民的。作为第一个措施，由苏共中央直接控制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克

格勃)扩充了机构,并转变为一个巨大的拥有全国范围的特务网的秘密警察组织。一九六六年组成了社会治安部。两年后它又变更为内务部,并作了扩充。一九六八年,警察力量也扩大了,警察人数大为增加专业保安机关“夜间值勤警察局”、“摩托警察部队”等相继建立。

专门用来镇压群众和监视人民的现代化设备投入了使用。一九七〇年,一个以前曾被赫鲁晓夫撤销的司法部门又被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重新起用。旧的法庭加以扩充,新的兴建起来。自从党和国家监察委员会于一九六五年更改为人民监察委员会以来,又组成了另一个广泛的监察网。

近年来,社会帝国主义者也大大地扩充了监狱系统。劳动营分为“普通”、“加强”、“严加管教”和“特殊”等数种。这种劳动营有一千所以上,被囚人数超过百万人。社会帝国主义者也发展了一种声名狼藉的所谓“精神病院”网,政治犯就关在里面并不时受到折磨。根据一个民权团体“大赦国际”的报告,这些病院中的情况要“比今天监狱中的情况更为残酷”。有六所“特殊”精神病院是专为监禁持不同政见的人而设立的。其中最臭名昭彰的就是列宁格勒的谢尔勃斯基病院。*在这里,

* 谢尔勃斯基病院里的生活

“医院的制度和任何监狱的制度相似。每天一小时的锻炼,紧锁的牢房,接见外来访问者每月一次,对亲属每月可发信一封,每月接受一个包裹,同监狱里一模一样。医生们自己也认为这不是医院而是监狱,并且有时还公开这样讲。如果病人不守规矩,就要受到惩罚。

“在那所医院里很容易遭到惩罚,惩罚是十分严厉的。常用的惩罚方式有三种。第一种惩罚方式是借助医学方法。我想大家知道有一种名为,‘苏尔发净’的药剂,这是当一个病人(即监犯)犯了某种错误时使用的。如粗鲁地回答医生的问题,或者公开说医院里的医生实际上是穿着白衣的刽子手

政治犯被迫同精神病罪犯关押在一起。他们“在治疗的借口下受到肉体折磨，并被注射大剂量的会引起抑制性休克反应和严重的机体紊乱的‘阿密诺净’和‘苏尔发净’”。在这种医院里，勤杂人员实际上就是由保安人员担任的，男护士则来自精神病罪犯病人的行列。结果是，不论是真正的病人或政治犯都“天天受到监视人员的鞭笞和虐待狂的凌辱”。

这样的野蛮行径并不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所特有的。近年来，美帝国主义也采用了类似的方法，多半是为了对付多次发生的囚犯造反。例如，在加利福尼亚州瓦卡维尔城的州监狱医疗所里，正在制造各种各样药物甚至是进行精神病外科手术的试验。在“缓和”、“调整”那种“侵犯性的反社会行为”的借口下，使用这些技术，意图是为了“镇静”难于管理的被拘留者。就像在苏联那样，政治上活跃的监犯被挑选出来接受这种治疗。《旧金山纪事报》最近登载的一篇文章记述了一个美

等，一句话就足以招致惩罚。‘苏尔发净’是一种十分痛苦的惩罚药。它使你的体温上升到摄氏四十度左右，只觉得浑身发烧，起不了床，不能行动，这样的情况持续一两天。如果再次用药，药效可以持续整整一星期，甚至十天。

“第二种惩罚方式是使用一种名为‘阿密诺净’的药剂，这是治疗精神病时使用的，可能在别的国家也有。它使得病人感觉倦怠，昏昏欲睡——他可能一直睡上好几天，如果持续不断地定时给予这样的处理，他就可以一直睡下去，直到停止用药。

“第三种惩罚方式，惯常称之为‘卷起来’，它是使用长长的湿帆布，把病人从头到脚卷起来，卷得紧紧地使他难于呼吸，当帆布开始干起来时，就裹得愈来愈紧，使病人愈来愈受不了。不过在施行这种惩罚时，要略为重些，要有医务人员在场，必须保证病人不失去知觉，如果病人的脉搏开始减弱，帆布就放松一点。”

——摘自弗拉基米尔·布柯夫斯基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电视新闻中的谈话，转载于《综览》季刊，一九七〇年秋季号。

国医学代表团去谢尔勃斯基病院的访问。这就足以说明美帝国主义者热衷于同他们的社会帝国主义者对手交换经验。

二、反抗的各种形式

在这种情况下，苏联人民进行回击是困难的。何况，新沙皇还戴着那个社会主义的假面具，还能迷惑许多人并使他们丧失斗志。由于社会帝国主义者垄断了通讯工具，人们很难获得有关反抗和斗争的情报，特别是工人进行反抗和斗争的情报。但是就我们所了解到的情况来看，已足以说明反抗正在发展。

工厂是斗争的主要阵地。社会帝国主义者正愈来愈难于完成计划指标，因为工人们正在拒绝执行那些倒行逆施的恶规。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的那样，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日益增长的危机已迫使修正主义头子把愈来愈沉重的负担放在工人阶级的肩上。一九七二年一月二十六日的《消息报》透露：“劳动生产率将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杠杆。”

工人们正在通过怠工、不遵守劳动纪律的方式来拒绝拼命加速机器的运转，这是经理们和其他官员经常抱怨着的事。例如，新古比雪夫石油化工联合企业的经理写信给《真理报》，指责由于工人不满而引起的劳动力流动过高的情况。他写道，一九七一年，他的厂雇用了一千零五十四名新工人，而在同时却有八百二十五人离厂。他要求对“那些对于破坏劳动纪律、酗酒、图谋私利和不老实者采取宽大态度的人，制定严格的劳动立法以明职责。”还有另外一封信建议：原来用来分配工人工作和使社会主义经济保持充分就业的劳动记工簿，现在应该变为更有效的整顿纪律的工具。这些本子除了只是记录工作时间、工种等等之外，“还应该记载下列项目：奖励、惩罚、旷

工”。这封信说，这样做就能使人事部门淘汰那些“懒汉”和“捣乱分子”。

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一日日的《纽约时报》报道了一个有趣的情况。在苏联经理级人员中，一本题为《经理和下属》的新书很快地愈来愈受到欢迎。这本书现在已成为苏联“劳工关系”文献中的标准教材。书中有这样的一些题材，如怎样说服罢工工人返回他们的工作岗位，怎样使工人劳动得更卖力些，而又不引起“不必要的摩擦”，等等。这本书的作者公开承认，他的建议是以一本美国的同类著作——戴尔·卡内基的《处世之道》！——为根据的！

有一项独特的调查揭示了反抗日益增长的另一个生动例证。这项调查的结果发表在一九七三年十二月的《消息报》上。在调查过程中，访问了乌克兰一家规模巨大的机车厂中年龄在十八到二十五岁之间的二千九百五十二名工人。其中有百分之六十六的人公开宣称他们对工资不满，百分之七十一的人对工厂设备的状况和安全不满，百分之七十的人对工厂的卫生条件不满。五年前做过一次同样的民意测验，当时对工资不满的有百分之五十四，而在所有三个调查项目中，心怀不满的工人都平均增长了百分之十八。

工人们尖锐地批评了行政管理方面的若干做法。他们猛烈地抨击在月底、季末或年底“突击”完成生产定额的修正主义做法。他们说这不过是由于行政管理方面的失职所造成的拼命加速。还说修正主义者所搞的那些大事吹嘘的“社会主义竞赛”，“只不过是弄虚作假”而已。一位车床工人说：“那不过是纸上谈兵。许多人甚至连他们在同谁竞赛都不知道。”一位电工补充说：“就我们一伙人来说无所谓竞赛，而只有一个

你必须完成的生产定额。”自然，如《消息报》所说，所有这些怨言不过代表了“工人们由于买不到足够的他们所喜爱的商品而产生的消极情绪”罢了。

苏联人民表示他们不满和反对情绪的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方式，就是他们对斯大林怀有高度的崇敬和钦佩。根据几则不同的报道，一股强烈的、自发地潜伏在人民心里的好感在各种情况下都有所表现。例如，当斯大林在最近的一部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纪录片中出现时，观众中时常爆发出掌声（几位西方观察者可作见证）。尽管赫鲁晓夫进行了恶意的诽谤宣传，斯大林仍然是列宁以来最受人欢迎和爱戴的苏联领导人。甚至《纽约时报》的驻莫斯科记者赫德里克·史密斯也不得不承认：“斯大林在苏联人民中享有极大的潜在威信，享有比赫鲁晓夫好得多的声誉。”

美国的资产阶级常常诋毁斯大林为农民和少数民族的压迫者。然而，据史密斯说，对斯大林的感情在农村和被压迫民族中尤为强烈，特别是在一些中亚细亚共和国和斯大林的诞生地格鲁吉亚共和国。虽然老一代的工人很自然地比青年人更爱慕斯大林，但是很多年轻人也了解在斯大林领导下所取得的各项伟大成就。难怪修正主义颓废派“诗人”、赫鲁晓夫反斯大林运动中的一个喽啰，也是勃列日涅夫政权下的知名走狗叶夫根尼·叶夫图申科，当他在不久前看到共青团员在野餐中为纪念斯大林祝酒时，竟然“大吃一惊”。还有一位年近三十的女教师说，她喜欢斯大林，“尽管他是个冷酷的人。也许在那时候，他不得不是个冷酷的人，也许有这样的必要”。在宴会和社交集会上，为斯大林祝酒是常见的事。最近，一位西欧的外交家参加了一次宴会，在那天晚上的宴会上，中年的中级干部

为斯大林祝酒有六、七次之多。他们说明的一个“理由”是：他们所喝的酒来自格鲁吉亚。在格鲁吉亚当地，一位年岁较大的人强调说：“在格鲁吉亚的任何宴会上，我们第一次和最末一次的祝酒总是为着斯大林的。这是我们多少年来的习俗，我们也没有更改过。”

在斯大林的诞生地格鲁吉亚的哥里城，斯大林博物馆由于公众的要求而仍然开放着。馆长说：“人们来这里，因为他们热爱斯大林。”有人问一个农妇：为什么把斯大林的像放在他们起居室中显眼的地方？她的丈夫，一个集体农庄的庄员回答（这张画像从来就在我家，我不能没有它。我为出生在斯大林的诞生地而感到幸福，我要永远把他的形象留在家里。”

就连那些所谓“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尽管他们对斯大林的攻击也不比赫鲁晓夫和托洛茨基对斯大林的攻击差，但是，也不得不承认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是完全脱离苏联人民的。一位六十多岁的“持不同政见”的作家写道：“斯大林确实深得人心。他们觉得是他建立了这个国家，赢得了这场战争。可是现在呢？看到的是农业紊乱，工业紊乱，整个国民经济都是紊乱，而且看不到尽头。”

这种“紊乱”所引起的并不只是我们所描述过的那种消极反抗。虽然社会帝国主义者竭力掩盖群众造反的任何消息，但毕竟也有几起事件盖不住。我们已经提到过一九六二年物价飞涨引起的抗议浪潮，特别是在诺沃切尔卡斯克和捷米尔塔乌发生的大动乱。这些事件固然标志着公众反抗的高潮，但不是造反的结束。一九六七年六月间，在苏联中亚细亚奇姆肯特城，工人们因警察凶殴一个出租汽车司机致死而举行了示威。示威者袭击并烧毁了市警察局和附近的一所警察分局。于是，当局

出动了坦克来镇压这次起义，数十名工人被杀害。（除了这起有详细记录的斗争以外，《北京周报》报道说：“同年十一月，哈尔科夫拖拉机厂成千上万的工人举行了罢工一九七二年九月，又有数千名工人罢工并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城举行示威游行。

在苏联各地进行的许多反抗斗争中，有一起事件看来十分典型。有一份工人们自己写的这场斗争的记录已被偷带出来。一九六九年基辅水力发电站建设工程（乌克兰最大建设工程之一）的工人由于住房条件日益恶化、官员们的麻木不仁而群起反抗。

工地附近的几个村庄成了工人们的临时住房。在那里，房顶漏水，墙壁开裂，“有些住房严重失修，已经无法居住”。尽管工地领导一直允诺给工人像样的居住条件，但情况始终不变。

根据工人们自己的陈述，他们曾“不止一次地向建筑工地的副领导人阿布拉莫夫申请修理，但是他只做了一件事，就是把人们从他的办公室轰出去。”从来也没有开过什么会让他们发表不满足意见。

为了应付这种形势，工人们自己召集了一个会议。此后的情况《时事记录报》上有报道，这张报是苏联“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出版的地下刊物，去年已被禁止发行。这一刊物打破了它通常对工人阶级斗争的漠不关心的态度，对这次事件做了如下的记述：

“一九六九年五月中旬，别鲁奥兹卡村的基辅水力发电站工人开会讨论住房问题：他们中有许多人还是住在活动棚屋和

火车厢里，尽管当局曾答应过提供他们住房。工人们说他们不再信任当地的领导了，因此决定写信给党中央。会后工人们拿着写上‘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等口号的旗帜游行。克格勃人员驾了兽医车赶上去，但是遭到的是群众愤怒的喊叫：‘你们把我们当作什么？狗吗？！’这些克格勃人员一面劝阻群众，一面转移目标，竭力煽起群众对事件的一个积极参加者的‘阶级仇恨’。这个人就是已退役的伊凡·奥列克桑德罗维奇·赫鲁楚克少校。他们指出他享受着优厚的养老金，为什么还要惹是生非？赫鲁楚克同意说他的养老金数额大得不适当——事实上，他已经把它捐赠给一所儿童之家有两年之久了。况且，他是通过正当的劳动维持生活的，跟克格勃人员不同。第二天召开了一个正式的会议。会上有些发言人企图给赫鲁楚克抹黑。但是他们一下讲台，工人们老实不客气就对着他们啐口沫。工人们派了一个代表团去莫斯科，带着一封约有六百人签名的关于住房问题的信。六月底，伊凡·赫鲁楚克在莫斯科被捕。工人们又写了一封信，要求释放赫鲁楚克。”

这第二封信曾在西方发表。在信中工人们说，在代表团回来以前，各种各样的官员先后出动来到这个居住区，（破天荒第一遭！）强行通过重选一个新的住房委员会（派往莫斯科的代表团是得到住房委员会赞助的）。当局的这种做法，意图是想宣布代表团是自我任命，因而是非法的。工人们回答说，“这个花招骗不了人。”

可是行政管理当局还是要一意孤行。“尽管遭到了所有居民的拒绝，他们还是在市中心拼凑了大约三十个未经授权的人，选举了一个新的住房委员会……然后他们开始不断地向积极参加上述会议和旧的住房委员会工作的人进行恫吓。”

六月十日又举行了一次会议。会上“群情激昂”。工人们发泄了他们一切的不满。当地的一位党的官员，拉夫连楚克上校（也是一名警官）答应他们说，“一切缺点都将纠正”，并在代表团归来时允许它在一个类似的会议上向人们汇报。工人们说：“我们相信拉夫连楚克上校，把他当作一个男子汉来相信，但是我们非常失望。”

六月十三日，代表们从莫斯科回来以后，又开了第三次会议。工人们作了如下的描述：

“在这次会议上，领导人们施展的伎俩甚至打破了他们自己的纪录。开始时他们短促地摇了一下铃，那些好容易跳进会议厅的人参加了会议，其余的人都被锁在门外……工地党组织的工作人员维卢奇科自说自话地任命自己主持会议，他宣称没有什么人派遣过代表团去莫斯科，那天也没有人要去作什么申诉的发言，……那些被锁在外面街上的人开始敲门，会上的听众也要求放他们进来。经过一番周折，人们好容易进了会场，把会场挤得水泄不通。人们要求发言，可是维卢奇科不让发言，对于来自周围的质问，他说都不‘相干’后来，当他认为一切‘相干’的问题都已提完，就宣布散会。人们不离开会场；他们要求让赫鲁楚克和代表团的其他成员发言。当受到全体听众鼓励和支持的代表们走向讲坛时，工地党组织的工作人员维卢奇科表现得活像一个恶棍。他把一个抱着孩子的妇女推开，抢走了赫鲁楚克手中的话筒，把它从插座里拔了出来。就是那位曾经答应让代表团发言的拉夫连楚克‘好上校’，派了一队民警进入会场来逮捕我们的代表。同志们！这是什么？？？谁曾见过这样的暴行？人们得到的印象是，这些骄横不可一世的所谓领导人正在煽起一场暴动。”

就是在这次会议之后赫鲁楚克被捕了。工人们拟了一份给中央委员会的请愿书，上面的引文就摘自这份请愿书。他们同时立誓将坚持罢工，直至他们的要求得到满足并撤换当地官员为止。

在这次斗争中，工人们仍保持着他们对共产党领导的信仰。虽然像拉夫连楚克上校这样的当地党的官员已经暴露出来是两面三刀的人物，工人们还是相信只要莫斯科的高级官员了解到情况，一切都会得到纠正的。在他们的请愿书的结尾，工人们写道：“我们相信上面的人不知这次逮捕的情况，我们殷切地请求带着这封信到你们里去的代表将得到你们的保护。……我们将静待你们的答复。如果我们的请愿书不能送达，我们还将一次又一次地派人将信带上，直到你们收到为止。”

这封请愿书的最后结局怎样我们不得而知，但是这使我们回想起一九〇五年圣彼得堡（列宁格勒）的工人。虽然在整个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和二十世纪头几年，圣彼得堡的工人们对他们的雇主进行过多次激烈的斗争，但是，许多人还是存在着幻想，认为沙皇本人仍然是他们的朋友。当共产党人鼓动他们推翻专制制度的时候，许多比较落后的工人就高呼“不谈政治！”，用这样的叫喊把党员压下去。这些工人认为沙皇是好人，只有当地的官吏和资本家是坏人。他们说：非把用沙皇名义干的坏事告诉他不可。

工人们的这种态度，受到警方的特务，一个名叫加庞的僧侣的鼓励。他组织了一次去冬宫的群众请愿，向沙皇递交一份请愿书，措辞谦恭得无以复加。

共产党员和先进工人对这种策略进行斗争，但是失败了。他们还是加入了群众的请愿行列。有二十万以上的人在队伍中

前进，许多人带着儿童，有些人还带着圣像和沙皇的肖像。当群众到达皇宫广场的时候，哥萨克骑兵从四面八方向他们冲来，刀剑飞舞，枪声震耳。千百个人就在那“血腥的星期日”死于非命。关于沙皇是公正的、仅是受了蒙蔽的那种幻想终于在无产阶级鲜血汇成的洪流中破灭了。这是一九〇五年革命的开始，也就是一九一七年更为伟大的多次革命的总“预演”。

从基辅发生的事件中可以看得很清楚，今天在苏联的一些工人中也存在着对新沙皇的类似的幻想。但是随着工人斗争的发展，这些幻想也将被扫除干净。就像别鲁奥兹卡村的拉夫连楚克上校和圣彼得堡的沙皇尼古拉二世一样，沙皇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的面目也将被彻底揭露——一个双手沾满鲜血的罪犯，资产阶级剥削者，他注定要被投入“历史的垃圾箱”。

基辅事件之所以重要，还有另一个原因。约在一年前，三名来自同一工地的工人由于反对社会帝国主义者的民族政策而被捕。这三个人是在基辅大学和农业学院散发抗议在乌克兰强制实行俄罗斯化的传单时被抓去的。为此，当局实施了严格的证件制度，凡是进入大学校园的人都必须携带盖有三个公章的证件。

事实上，在被压迫民族中的公开反抗是极为普遍的。一九六八年，在奇尔奇克的三百个克里米亚的鞑靼人，因为违犯了关于在纪念列宁诞辰时不得举行公共集会的法令而被捕。警察包围了示威者，并且在大规模逮捕前向他们喷射一种“毒性的液体”。根据一些报道，有几名鞑靼人冲出了包围圈，前往党的总部抗议警察的暴行。但是在那里他们也被拘留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若干鞑靼封建统治阶级分子曾在苏联政府和人民的危急关头，同进犯的纳粹军队密谋勾

结，因此鞑靼人从他们的克里米亚故乡被迁往中亚细亚。我们固然无从判断当时这样的一个激烈行动是否真有必要，但是显然危险性是早已过去了。近年来鞑靼人的遭遇每况愈下，产生了日益高涨的返回克里米亚的运动，因之他们提出了充分恢复他们民族民主权利的正义要求。奇尔奇克事件就是在这个方兴未艾的运动的背景下发生的。

一九七二年，被压迫人民的反抗达到了新高峰。其中最著名的事件发生在立陶宛的考纳斯。当地的一个二十岁的立陶宛人罗曼·塔兰塔自焚殒命，以此来抗议大俄罗斯官员的统治，为立陶宛人争取充分的民主权利。他的葬礼行列引起了整整两天的群众造反。成千上万的立陶宛人上街高呼“给立陶宛人以自由！”的口号。他们袭击了市党委机关和警察局，有两名警察死亡，也受到了宪兵队和伞兵部队的还击。

此外，《北京周报》报道，“在乌克兰的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有一万人以上的示威者袭击了区的党政机关的建筑物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大楼，还撕掉了勃列日涅夫和其他人的肖像。”

当然，这种大规模的造反在苏联还是少见，而且，这类斗争，包括被压迫民族的反抗在内，还常常是由不关心人民大众利益的资产阶级和反动分子所领导的。例如，在立陶宛，天主教教会在造反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尽管这样，这些行动确实表现了群众的愤怒，并且，即使在错误的领导下，也给了社会帝国主义者以有力的打击。像在诺沃切尔卡斯克、奇姆肯特、奇尔奇克和考纳斯发生的那些反抗，已经使新沙皇尝到了点儿味道，领教了一下苏维埃人民将为他们准备的下场。

三、冒牌的“持不同政见者”

在美国的各种宣传工具中广泛宣传的是那些所谓“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如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安德烈·萨哈罗夫、罗伊和若列斯·麦德维杰夫夫妇以及安德烈·阿马尔赖克）的反抗。这些“持不同政见者”被称为是苏联统治者在国内的真正的反对派。人所共知的反动派、冷战自由派、社会民主党人和托洛茨基分子已经结成了联盟，一致称颂他们代表了“俄罗斯性格中一切最为优秀的成分”。他们被描绘为争取公民权利斗争中的英雄、人道主义的战士、用托洛茨基分子的话来说，甚至是“社会主义的反对派”。

但是这究竟是些什么人？他们代表着什么？他们实际上代表的是些什么社会力量？这些“持不同政见者”的绝大部分是“冒牌反对派”，这个派别同苏联人民极少联系，在工人阶级中也得不到支持。“持不同政见者”各派力量是一个无组织的、支离破碎的运动，他们代表着形形色色的反动的、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党的政治观点。他们的共同之处是反对马列主义，惧怕群众，敌视中国和斯大林，追求一种凭空设想的资本主义形式——这种资本主义不得带有它的那些最明显的暴行和弊端，特别是针对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的其他阶层的暴行和弊端。

有时，这一集团的成员确实也可以站到某些事情的正面，例如，好些人批判了一九六八年社会帝国主义者对捷克斯洛伐克的罪恶入侵。但是，这些“持不同政见者”并不代表苏联人民大众的革命利益，“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只能给苏联人民提供一个死胡同。认识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完全恢复工人阶级的统治，才能解决工人阶级、被压迫民

族和苏联其他各阶层被压迫人民面临的问题。

苏联对“持不同政见者”的镇压，不论美国资产阶级报界怎样写，一直是异常温和的，虽然某些成员曾在社会帝国主义的警察暴徒的手中吃过苦头，更多的人却是相当轻易地脱了身。劳动营和监狱里关满了革命工人、学生和被压迫民族的成员，而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却能相对地自由发言。当社会帝国主义者最后对索尔仁尼琴采取制裁的时候，他的“命运”不过就是被驱逐出境，让他在一座瑞士别墅里作寓公，依靠他所写的反革命书籍在西方挣下的六百多万美元版税过活。

在某一种意义上来说，苏联领导需要这些“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因为“持不同政见者”运动脱离群众，赞同各种为绝大多数工人所痛恨的反动政策。这就有利于社会帝国主义者把它们当作替罪羊，借以诋毁一切反抗运动。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持不同政见者”才成了“官方的反对派”。

“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社会基础是知识界。知识界本身不构成一个阶级，它的地位处于工人阶级和苏联资产阶级之间。虽然这些知识分子的大多数（至少在苏联）形式上是挣工资的，他们脱离生产，工作具有极端的个体的性质，在社会中占有相当的特权，这些都说明他们是一个小资产阶级集团。

知识分子由于他们的特殊的社会地位，作为一个集团倾向于对政权和人民两者都抱怀疑的态度。虽然一方面他们常常认识到只有群众才真正能改变事物，用一位苏联知识分子的话说是他们通过辛勤劳动亲手建造了这个国家。”但是，他们还是害怕人民的，唯恐失掉了他们自己的特权。一位美国评论员曾说过：“知识分子毫不了解工人和农民面临的切身问题，下这样的结论可能是合情合理的。”

因为这些知识分子属于小资产阶级，又没有受到共产党人领导的强有力的工人运动的影响，所以他们只是用种种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来指导他们的反抗活动。

“持不同政见者”的宣言《苏联到一九八四年会不会仍然存在？》的作者安德烈·阿马尔赖克曾说：“最近十五年中，至少有三种被反对派当作思想基础的观点已经初具雏形：‘真正的马列主义基督教思想’和‘自由主义思想’。”

阿马尔赖克没有提供具体证据证明确实存在着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的反对派，而且由于他本人肯定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对这个问题的见解的可靠性是值得怀疑的。据我们调查所知，有一个通常被当作是这一集团的一员的彼得·格里戈林科将军，倒不如说他是一个进步的左倾自由主义者，他的政治哲学同革命的马列主义可以说没有共同之处（虽然他也像许多苏联自由主义者一样，被迫用马列主义的词句来粉饰他的政见）。我们知道，在苏联确实存在着真正的马列主义者，他们正在复杂危险的情况下进行艰苦的斗争。但是，如果把这些英勇战士也划入“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行列，那我们是不同意的。

然而，阿马尔赖克对其他两种倾向的分类，看来确实还是相当正确的。它们是当前“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所特有的两种主要思潮。“自由主义”纲领的实质首先是在一九七·年由安德烈·萨哈罗夫、B·Φ·图尔钦和罗伊·麦德维杰夫在他们的《苏联科学家致苏联党政领导人的呼吁书》中详加阐述的。这篇文章是自由主义运动的宣言，它发展了对苏联社会的批判，并提出了一个要求“逐步民主化”的纲领。

这个纲领和世界各地的自由主义纲领如出一辙。作者要求逐渐建立一种仿效资产阶级议会形式的政治制度。他们要求有更多的便利条件，以供“有资格的专家们”交换意见并进行革新竞赛。他们坚决反对一切不受专家控制和指导的群众卷入。他们明确提出的措施是，“大规模地设立在生产计划、加工技术、销售供应、财务人事等问题上有大幅度独立性的综合生产联合企业（公司）”（也就是乞求多给一点儿竞争性的资本主义）；建立“舆论研究所”（以便更好地操纵群众）；以及“改进对于领导人员的训练，使他们掌握管理艺术……使各级领导人员都能掌握情况，提高他们的独立自主权、实验权、辩护权及在实践中试行自己主张的权利”。（解除对经理人员的束缚——给予级别较低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以充分的民主！）

萨哈罗夫在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写的、后来在《纽约书评》发表的一篇自传式文章中，进一步强调了 this 自由主义纲领的改良主义的和唯我独尊的色彩。他已经成为这一倾向的突出的发言人。在这篇文章中，他概括了自己的政治哲学我们所需要的是有系统地维护人类的权利和理想，而不是政治斗争，因为后者会不可避免地煽动人们走向暴力、宗派主义和狂乱。我相信，只有当我们能够对其进行最广泛和公开揭露的时候，西方才会认识我们社会的性质。然后这一斗争将成为拯救全人类的世界运动的一部分。”

在对外关系上，自由主义者的立场基本上支持社会帝国主义者的政策。虽然在对于入侵一个据认为是友好的“社会主义”的盟国的捷克斯洛伐克问题上，许多人持有不同的看法，但是自由主义者仍然认为苏联对外政策根本上是和平合作的政策。”他们受到“缓和”会谈的鼓舞，虽然萨哈罗夫警告要提

防“一种虚假的、串通的或投降的缓和背后所隐藏的危险”。自由主义者在他们一九七〇年的呼吁书中附和了赫鲁晓夫，他们说：“在热核武器时代中，唯一现实的政策是导向更多国际合作，坚持寻求在科学、技术、经济、文化以及思想各方面有可能汇合起来的路线……”

形形色色的“持不同政见者”在对待中国问题上，和勃列日涅夫一伙的意见是极为一致的。一位注意“持不同政见者”的活动的英国观察家说过：“在其他方面显得是清醒明理的俄国知识分子，在对待中国问题上却变得思想模糊，感情用事，并且沉溺于一些离奇古怪的念头他说有一次碰到一个青年艺术家，后者想知道西方国家会怎样对付中国。这个艺术家说：“难道你们不知道中国人要占领西伯利亚吗？”“不知道他们在那以后还要向欧洲进军吗？那样一来就要重新出现黑暗时代了。西方国家肯定会站在我们一边吗？他们肯定会抵御黄种人、卫护白种人吗？白种人一定要团结一致。”

当然不是所有的“持不同政见者”都用这种刺耳的种族主义的语言来对待这一冲突的，尽管这种态度肯定是苏联官方报纸所培育出来的。虽然如此，自由主义者在一九七〇年的呼吁书中写着，“在道义上和物质上支持苏联对抗中国的立场，这是尤其重要的。”自由主义者认为，“中国的民族极权主义的危险，虽然在历史过程中只能看作是短暂的现象，然而在未来的岁月里却是异常严重的。我们只能通过扩大或者至少维持我国和中国目前在技术和经济方面的差距，通过增加我们在全世界的朋友人数以及通过给予中国人民以合作和援助的变通办法，来对付这种危险。”我们只要问一下，什么样的“合作和援助”会有利于扩大苏联同中国在技术和经济方面的差距？

据阿马尔赖克说，“‘基督教思想’的拥护者主张，社会生活必须回到基督教的道德原则上来，他们对于这些道德原则的解释多少带点儿斯拉夫至上论的精神，并且还提出了俄罗斯天赋的特殊使命的主张。”这一倾向与其说是一种宗教哲学，不如说是一种政治学说，它是全俄社会基督教同盟这一半地下性质的仿法西斯组织的指导精神。虽然索尔仁尼琴在某些方面可以划为这一思想的信徒，但是就其最道地的形式而言，这一新的基督教斯拉夫至上论（一种宣扬大俄罗斯种族至上的种族主义哲学，是在十九世纪由一批极端反动的分子首先提出的）是“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中一种次要的倾向。它的主要表现是往往根据“种族的”或民族的原则，愚蠢地呼吁“拯救”全人类和心灵再生。

然而，这一种思想，尤其是它的更为神秘的民族至上论的形式，受到了社会帝国主义者的公开鼓励，因而它在“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和国家官僚政治中的影响都在增强。根据许多方面的消息，保安警察的高级人员中也有这一倾向的一些拥护者。在合法的报刊中，斯拉夫至上论者在《星火》画报、《青年近卫军》杂志以及《俄罗斯文学报》中都是有影响的。这些知识分子是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坚定拥护者。有人这样说，“他们（捷克人）就得接受一次教训，也得让他们知道逃不了惩罚。”

然而，基督教斯拉夫至上论的最极端形式只出现在非法的“持不同政见者”报刊上。但是即使如此，实际上它也是受到统治者鼓励的，一则是为了使社会帝国主义者的假“国际主义”有个对比而显得体面，同时又可以为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制造舆论。虽然绝大多数的自由主义报纸和几乎所有的革命的地下报纸很快都被当局禁止发行，但是基督教刊物《市民会议》最近

却已印发了五期以上，刊登的文章则是形形色色的神秘的、种族主义的和反犹太主义的胡言乱语，受到的干涉不过是表面文章

一份流传很广的地下文件《民族呼声》，以新法西斯的粗鄙语言来哗众取宠。这一份宣言声称，民族是一切的基础。它是“一个特殊的精神的群体，它的特色是一种深奥的神秘感”，而“种族类型”则是它的决定性因素。这篇文章号召美苏合作“以便拯救白种人免受黄种人的杀戮”。这样做，一定要有心灵基础上的团结，因为“存在着上帝的仆人同魔鬼的仆人之间的分裂”。文件说，魔鬼进行“败坏人心的活动……鼓吹平等主义和世界主义（散居在外的犹太人的意识形态），因此加速了普遍的血统混杂和堕落的过程。”

一切真正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看到了这篇文章，并且知道它是受到苏联领导的暗中的鼓励而刊行的一种“反对派的刊物”，不能不对苏联统治者的叛卖行径更加深恶痛绝。这些混蛋竟敢向着两千多万英勇苏联公民的英灵啐唾沫，他们在斯大林的指挥之下，英勇奋战，慷慨捐躯，就是为了打败这一类希特勒种族主义蠢贼。

索尔仁尼琴是一个高踞在“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各派之上而有鹤立鸡群之势的家伙，他无疑是“持不同政见者”知识分子中最出名的角色。资产阶级宣传工具把他描绘成当前世界上卫护人类自由的伟大战士之一。托派社会主义工人党甚至为他“坚定地献身社会主义”而欢呼喝彩。但是，在所有知名的“持不同政见者”中，他也许是最反动的一个。正如我们在一九七四年四月份《革命》杂志中所说的，他不过是个迷恋老沙皇的骸骨，不甘同新沙皇握手言欢的家伙罢了。

索尔仁尼琴以发表反动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而开始他的“文人”生涯。这本书被吹嘘为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的劳动营制度的“暴露文学”。它露骨地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和斯大林的领导。它是索尔仁尼琴在苏联国内合法出版的唯一作品，因为赫鲁晓夫亲自把它批准，作为社会帝国主义者恶毒反斯大林运动的一项武器。

对于劳动营的问题，人们的看法很混乱。对有些人来说，只要有这种劳动营的存在，就肯定证明工人阶级的国家是“堕落”或“极权主义”的了。但是，社会主义决不会，而且在将来也决不会在“理想”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总要对付国内外的敌人。老的剥削阶级决不会不战而退，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又会从无产阶级政党和国家内部产生。虽然，在可能的情况下，改造敌人的办法当然是可取的；但是，在必须采取某种最严厉的惩罚办法时，工人阶级不能够、不许可，也不会手软。

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的劳动营，把改造和惩罚两种因素结合起来。判处在营中服刑的犯人，主要来自社会的特权阶层。例如，索尔仁尼琴本人就是在纳粹入侵最危急的关头，在军队中煽动“持不同政见者”的一个军官。他以一种典型的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方式，把他个人的“幻想破灭”置于打败纳粹匪帮的迫切需要之上。

劳动营里的生活当然是很艰苦的，但是并不比当时西伯利亚一般农民的生活更艰苦。而且在索尔仁尼琴所写的那个战争时期，营里的生活情况肯定要比前线好，当时在前线的千百万英勇的青年军人正在为捍卫社会主义而献出生命。在营里，囚徒们从事必要的生产劳动，以建设苏联的落后地区和供应部队

的需要。劳动是异常繁重的，也要求作出牺牲。但是我们要问，在那个艰难困苦的时期，哪一个苏联工人没有被要求为整体利益而作出牺牲？正像一位愤怒的苏联公民就《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一书写给索尔仁尼琴信中说的：“千百万苏联人民从事于砍伐树木的劳动并且歌颂这种形式的辛勤劳动，但是这个故事里的人物却对它感到恐惧。”

是不是也有一些跟劳动营有关的过火的措施和不必要的粗暴行为呢？有。警卫人员中是不是常有挑选不当和暴虐成性的情形呢？间或有之。也有无辜受罪的人吗？有。这些过火的情况，有许多是在当时就已被察觉的，但它们不能改变这样的事实，即设立这些劳动营是工人的国家为了保卫自己而采取的一种必要措施。共产党人一定要从这些错误中吸取教训（这是已经做了的），但是我们不能采取机会主义的态度，把一项正确而且必要的政策也否定掉。

在这里，我们应该把索尔仁尼琴的态度和那些真正是无辜受罪的人划清界线。正像过去劳动营的一位官员在给索尔仁尼琴的信中所指出的：“那些身受处罚不当的人中，没有一个曾因他们个人的不幸而埋怨过斯大林同志——他们甚至连想也没有这样想过。这是那些无辜受苦的人同真正的罪犯的分水岭。后者通常总是恶毒攻击苏维埃政权和斯大林。”

在这一点上，我们也应该把索尔仁尼琴的行为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行为对比一下。斯特朗一直到她在一九七〇年在北京逝世为止，是一位献身于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战士。她生长于美国；参加共产主义运动后，在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在苏联和中国度过了许多年。她的大量著作把苏维埃政权的真相介绍给美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这是一个重大

的贡献。

然而，斯特朗却在一九四九年被不公正地当作一个间谍而被驱逐出苏联。她被各国的共产党视为叛徒和工贼达六年之久。几十年的老朋友都不理睬她了。但是她坚持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决不动摇变节。虽然资产阶级给予她许多机会，要她开口反对苏联和社会主义（只要她肯如此这般“自白”一番，那是肯定会重重有赏的），但是她坚决不为所动。当时正是在麦卡锡的气焰不可一世，美国统治者猖狂攻击共产党和人民运动的时代，她首当其冲，遭到了资产阶级的迫害。

一九五五年，斯特朗无端蒙受诬陷的真相大白。此后不久，赫鲁晓夫发动了对斯大林的攻击。那时候她不参加反斯大林的大合唱，的确不是容易的事情。如果她以自己的遭遇去控诉斯大林的“罪行”，苏联的修正主义领导是会付给她丰厚的奖赏的。但是，她却表现出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的“胸怀宽大”的本色，写出了《斯大林时代》这本书来回答赫鲁晓夫，这本书反击了赫鲁晓夫的指控，捍卫了斯大林的领导。在关于斯大林的问题上，如何采取一种真正共产主义的立场，这本书作出了重大贡献，而且至今仍然是有价值的。

索尔仁尼琴的行为是没有一点可以同斯特朗相比的。

赫鲁晓夫被勃列日涅夫、柯西金撵下台以后，社会帝国主义者决定降低他们的反斯大林运动的调门。索尔仁尼琴的著作对他们不再有用。有些利用攻击斯大林而发迹的修正主义文丐（例如叶夫图申科），也不声不响地改变了调子，还捞到了肥厚的油水。

然而，索尔仁尼琴仍然感到不满，最近十年来继续写攻击

以前的工人国家的作品。他不只以谩骂斯大林为限，最近在他的反革命“杰作”《古拉格群岛：一九一八至一九五六》里，还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列宁。照索尔仁尼琴的说法，连十月革命的发生也是一件坏事！在他所写的《一九一四年八月》一书中，他公开为革命前的“有教养的”上流社会悲叹。而在《古拉格群岛》一书中，他的“英雄们”是这样一些人：一个叛国投靠纳粹的苏联军官弗拉索夫，因为强奸的“细故”而被“不合理地”监禁起来的两个军。

但是，索尔仁尼琴决不只是一个迷恋过去，不能自拔的人。如果他是仅此而已的话，也就决不会成为今天这样的一个角色了。对美国资产阶级来说，可以用他来“证明”“共产主义是行不通的”。而社会帝国主义者则可用他来教训人们，反对他们的统治只能是个“反动派”。

的确，索尔仁尼琴已经和世界上最公开的反动势力结成同盟。在他提名萨哈罗夫为诺贝尔和平奖金得奖人的演讲中，他攻击“民族解放阵线”进行了“证据确凿”的“兽性的大屠杀”，然而关于美帝国主义对英勇的越南人民所犯的绝灭种族的屠杀罪行和无法形容的暴行，却只字不提。

在这同一次发言中，索尔仁尼琴猛烈抨击世界进步力量对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他问道：“比方说，能不能期望南非共和国会把一个黑人领袖像格里戈林科将军那样拘留和折磨达四年之久而不受惩罚！全世界范围的愤怒的狂风暴雨早就把那座监狱的屋顶席卷而去了。”

黑人作家劳埃德·布朗对这一难以置信的讲演作出反应时指出：“自由主义者的叫喊使得索尔仁尼琴的名字在我国家喻

户晓，而受迫害的南非黑人作家亚历克斯·拉古马的名字和遭遇却默默无闻。”布朗接着指出，同一天的《纽约时报》把报道索尔仁尼琴的讲演词突出地登在第三版上，却把十一名黑人矿工被南非军队杀害的报道隐藏在不起眼的最后几页上。

当然，索尔仁尼琴作为一个在苏联境内公开代表美国和西欧帝国主义利益的事实上的外国奸细，对社会帝国主义者来说是一种威胁，因此他们把他驱逐出境。但是，如果像托派社会主义工人党那样认为，“索尔仁尼琴著作的全部影响是完全在人类进步方面的，因为它们那样强有力地反映了对斯大林主义的反抗”，那末，这就等于是向佛朗哥、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一类“反斯大林主义”的先辈欢呼致敬，把他们当作“进步力量”的朋友。这就清楚地证明了，托派分子对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憎恨，远远超过了他们对资产阶级的假想的憎恨。索尔仁尼琴也许是社会帝国主义的敌人，但是他像美帝国主义者一样，不可能因此成为苏联人民的朋友。

四、走向新的十月

除了索尔仁尼琴之流这批大名鼎鼎的“持不同政见者”以外，在苏联，屹立着人数日增的真正革命的知识分子和其他的人们，他们举起了列宁、斯大林及布尔什维克的旗帜，并且终于认识到：没有群众性的工人革命运动和一个革命的党，苏联就不可能发生真正的改变。这些知识分子已经同真正的共产党员、工人和革命干部携手，走上了斗争的道路。

当然，由于社会帝国主义统治的法西斯性质，也由于美国和西欧资产阶级不会像对待索尔仁尼琴之流那样来为他们进行宣传，我们就难以弄清楚任何有关这些革命的个人和团体的

具体情况。同时，苏联共产党从无产阶级先锋队蜕变为苏联资产阶级的法西斯党，这就意味着：这些革命人士和团体是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开展活动的，而且没有“持不同政见者”那样的自由，可以公开说话或发表自己的观点。

可是，已经有够多的消息泄露出来，因此毫无疑问，确实存在着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的反对派。在这个行列中，富有斗争性的工人已经挺身而出，为自己的阶级和所有被压迫的苏联人民开展斗争。还有一批仍然忠于无产阶级的从前的干部和官员。在六十年代末期，一个名为苏联共产主义者（布尔什维克）革命同盟的组织发表了一份八十页的宣言，号召一切忠诚的苏联共产党员走革命的道路，把分散的团体组织起来，重建一个新的革命的布尔什维克党。除了这份宣言之外，我们对这个组织不大了解，也不晓得它后来的命运怎样。但是清楚得很，尽管有着一切艰难险阻，真正的马列主义的力量正在苏联逐步发展，它们已经宣布了一场阶级战争，要同社会帝国主义者战斗到底。

俄国人民有反对一切压迫者的悠久和光荣的斗争历史；这些新的革命组织目前虽然规模还小，但是一定会发展成长，而且肯定会建成一个新的革命的共产党。苏联人民一定会推翻新沙皇。一个新的十月革命必然要发生。

第七章 文化革命和社会主义 阶段中的阶级斗争

现代社会中的两个主要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对苏联的蜕化变质作出了两种完全对立的解释。资产阶级作的大量宣传和解释，自然不是以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的阶级分析为依据。他们不认为资本主义在苏联的复辟是经历了一系列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的过程，不是从这个已经复辟的基础上去解释今天在苏联发生的一切，而是端出了他们喜爱的一套，说什么社会主义是“不切实际”的，什么它只适用于“落后”的国家，什么一旦建立起现代化的工业，它就没有生命力了，什么它迟早要和资本主义殊途同归，等等。

按照资产阶级的逻辑，当人们在贫穷和绝望的时候，即使他们被剥夺了“自由”（资产阶级所说的“自由”只能是被剥削和被压迫的自由！）也仍有可能支持革命；有朝一日达到了一定的生活水平，他们就会变得对革命不感兴趣，而只去关心消费品了；他们开始“厌倦”那种“老一套共产主义宣传”，而是需要资本主义的文化和政治（资产阶级心目中的“永恒”的政治制度）。还说什么当政党大权在手时，革命的领袖们就变得保守起来，他们抵制不住要做大亨的诱惑，而且不可避免地要变成骑在人民头上的新的压迫者。这就是资产阶级和他们的卫道文人津津乐道的一套东西。他们用苏联的经验来证明他们所说的一切和他们的“人性论”。这个“人性论”跟基督教的关于原罪的说教一样，认为人类本质上就是以我为中心的，并且永远从最狭隘的自私自利出发，这种自私自利的行动只有

在资本主义市场的活动中才能得到“公断”。

无产阶级及其马列主义的领袖们得出的结论则完全相反。我们决不认为人类永远达不到更高级的社会形式——共产主义，在这个社会里，阶级、剥削、压迫以及物质的缺乏都将成为历史的陈迹。我们考察资本主义在苏联复辟的这一深刻的反面教材，为的是更好地学习如何用各种形式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为的是使社会从野蛮的、过时的资本主义制度进步到共产主义这个崇高的目标。

苏联的经验是个反面的例子，我们必须加以研究。这里存在着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它从反面告诉我们必须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并坚持从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道路。这也正是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核心问题。

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一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决定着中国是继续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还是回到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去——在中国仍然相对落后的条件下，后者意味着它将使中国重新变成帝国主义、特别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同时中国农村的半封建关系也必将重新出现。文化大革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意义最为深远的的一个范例，用毛泽东的话说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其他革命领袖在总结苏联无产阶级专政的经验、被颠覆和破坏的教训以及一九四九年以来中国阶级斗争的经验的基础上，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一场几亿群众参加的革命斗争。什么群众不能继续干革命呀！什么革命的领袖不可避免地要变成腐败保守的老爷呀！这些资产阶级的论调可以休矣。

辩证唯物主义，特别是对立统一规律应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经验，是领导文化革命的理论基础。一九四九年，中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上升成为主要矛盾，这以后，剧烈的阶级斗争始终在进行着。

在取得全国政权以后，中国人民和共产党面临建设社会主义的艰巨任务。生产力极其落后，当时中国的工业很少。事实表明，夺取政权以后，利用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小资产阶级因素，甚至资产阶级因素，在中国比在俄国更为需要。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的直接目标不是社会主义，这一阶段的革命锋芒是指向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即大资本家，他们和帝国主义勾结在一起，并运用国家机器作为积累资本的手段），这一事实使斗争愈益复杂起来。

在这一阶段的斗争中，民族资产阶级，或其中的某些部分（那些并非完全同帝国主义分子联结在一起的资本家）站在人民群众一边，因为他们面对的客观矛盾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夺取政权以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立即开展的斗争就环绕着是把中国革命进行到社会主义阶段，还是经历一个漫长的资本主义阶段的问题。刘少奇提倡后一条道路，他的路线是“剥削有功”。

毛泽东的革命路线要求立刻开始社会主义革命，它取得了胜利，到一九五六年，在城市工商企业中基本上完成了生产资料转化为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过渡。这时，刘少奇企图颠覆社会主义并使无产阶级和共产党解除武装，宣称“在中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已经解决”。刘提出这条修正主义路线的背景，正是赫鲁晓夫上台的时候。那一年，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向马列主义发动猖狂进攻，从

背后向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捅了一刀，使它陷入一场严重的混乱之中。

仅仅一年以后，即一九五七年，在中国经济沿着社会主义路线获得基本改造之后，在修正主义据有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强大地位的条件下，毛泽东写了他的著名文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这篇著作中，他论述了在社会主义时期仍然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他指出存在着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敌我矛盾（敌人指被推翻了的地主阶级分子、一部分资产阶级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和人民内部矛盾（例如，工农之间、领导和群众之间的矛盾等等）。他强调说，人民队伍内部的非对抗性矛盾，如果处理不当，可以发展成为对抗性矛盾。

毛泽东所论述的、更有重大意义的一点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和法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些上层建筑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劳动组织的建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它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即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但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国家机构中某些官僚主义作风的存在，国家制度中某些环节上缺陷的存在，又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相矛盾的。”

毛泽东在同一篇文章的后面说：“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

毛泽东就这样直截了当地驳斥了修正主义分子，并指明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之间的过渡时期即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始终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并必须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从一九五七年到文化革命这一段时期中，在中国显著地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这使中国的革命经历了迂回曲折的道路。例如在一九五七年，许多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利用毛泽东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号召，向中国共产党，向无产阶级专政，向社会主义发动了全面进攻。他们主张“自由化”，换句话说，就是要回到资本主义去。

一九五八年和一九五九年是大跃进的年代，为了巩固和扩大农村的集体所有制，中国人民建立了人民公社。同时，并迈开大步发展工业，包括全国各地的小型多样化的企业。但正如无产阶级每一重大前进步骤总会遇到阶级斗争一样，大跃进也遭到了苏联、中国国内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的右派分子和反革命分子的拚死反抗和破坏。

大跃进同一切真正强大的社会运动一样，不可避免地会给中国经济带来某些暂时的不平衡，加上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一年的一系列自然灾害，包括干旱和洪水，严重地影响了农业产量。

中国共产党党内的修正主义分子抓住了这个情况不放，乘机跳出来污蔑和攻击大跃进。

苏联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分子更是乘人之危，趁火打劫，停止全部苏联援助，撤回数以千计的帮助中国发展工业的技术人员，以配合并支持他们的中国同伙。他们搞突然袭击，也不招呼一声就使出了这个杀手锏。他们不仅撤走工程技术人员，而且把图纸和施工方案都一起带走。苏联的修正主义分子妄想用经济讹诈迫使中国人屈从于莫斯科正在推行的反革命路线，破坏毛泽东所制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中国共产党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在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一年三年困难时期以及其后数年，中国共产党党内以刘少奇为首的修正主义势力疯狂地把中国往资本主义道路上拉。这些右派分子在发展生产的幌子下，鼓励并推行了许多苏联修正主义分子采用并鼓励的方法和政策。工厂里的奖金制度、计件工资等盛行一时，迷信“物质刺激”，管理权几乎完全落在厂长和技术人员手里的情况屡见不鲜。贪污事件也不是没有，贪污者总是要寻求并且也常常能得到刘少奇的“政权机器”里的上层人物的保护。

资产阶级分子特别注意钻进上层建筑的要害领域（学校、新闻出版和文学艺术界）。在那里他们可以阻止无产阶级世界观的进展和传播，并利用这块阵地去散布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毛泽东经常指出，任何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前总要先“造成舆论”，这确实也正是走资派加紧在干的事。

毛泽东尖锐地批评了文化部，那里是刘少奇手下的修正主义分子统治的地方。毛泽东说：“如不改变，就改名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国死人部。”他还说，卫生部应改名

“城市老爷卫生部”。

文化革命的直接先导是一九六三年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开始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这个斗争中，刘少奇竭力镇压群众运动，实际上把斗争的焦点集中在反对毛泽东的路线和无产阶级。一九六四年年底，在中央委员会的一次总结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方向的会议上，毛泽东写道，“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毛泽东第一次直截了当地指明，主要目标不只是那些老的地主分子或老的资本家，而恰恰是共产党内部的、尤其是处于领导地位的资产阶级势力，因为这些人妄图复辟资本主义。

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内的革命派已经看得一清二楚，中国革命正面临着一个关键时刻，如果不采取措施，走资派必然会篡夺政权。如同毛泽东在一九六三年写的，如果党不注意阶级斗争的话，“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

自然，中国自解放以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一直非常尖锐，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革命并没有什么特别。但以前的斗争不足以防止中国的资产阶级势力在党内和国家政权机构中增强他们的权势地位。以前中国共产党内部的两条路线斗争，总是用解除走资派职务的办法解决的。在作出这种处理的时候也常常设法通过群众大会、示威游行等方式吸收群众参加。然而也和斯大林时代的苏联一样，对资产阶级分子的镇压，即使同时也在群众中进行教育并取得他们的支持，但从不是主要由群众自己去执行。

在上文叙述苏联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章节里，我们已经看到，对走资派斗争的处理方法，主要是“自上而下”的，

没有做到让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投身到火热的斗争中去经受锻炼，并在这个斗争中彻底反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一个主要支柱，即群众不能自己管理自己的事情，而必须依靠少数“救世主”和“天才”来解决他们的问题并保护他们的利益。

“最上层”的斗争虽然能清除个别直接威胁无产阶级统治和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但不能最充分地发动人民群众经历一场在马列主义路线指导下的、有领导的斗争，并在这场斗争中认清这些反革命分子的思想 and 政治路线的实质。同时，它也没有解决如毛泽东所说的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问题。因此，在苏联，一旦像斯大林这样有威信的领导去世以后，那些资本主义分子就能通过一次政变把政权夺了去。这样一来，党和国家机器已不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而是成了镇压革命派的工具。

在文化革命的初期（一九六七年二月），毛泽东写道，“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文化大革命就是这么一种形式和方式。

它是在一九六六年以一场改造京剧、交响音乐和芭蕾舞的剧烈斗争开始的。这些东西在社会主义时期没有什么改变，基本上仍然反映资产阶级和封建主义的剥削阶级世界观。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印发了一个由毛泽东亲自领导起草的《通知》，其中规定了文化革命的总路线。《通知》号召向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展开猛烈的斗争，清算教育界、文艺界的资产阶级思想。

在这个《通知》里，毛泽东指出：“而要做到这一点，必

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因此，文化大革命从一开始，就不单纯是一场批判文化教育等领域的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运动，而是一场革命斗争，旨在推翻那些在党和国家里身居高位的人，他们实际上已在社会的许多方面窃据了大权——尽管他们尚未控制整个国家机器。

一九六六年五月，北京大学贴出一张大字报，批判学校校长，控诉他走资本主义道路。不多几天，这张大字报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把它发表在报纸上。第二天早晨，北京大学的墙上盖满了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大字报，展开各种意见的争论。在极短的时间内，这样的大字报遍及全国，在每个学校工厂、公社和机关都可以看到。

除大字报以外，还进行了“大”辩论，对文化革命的各个急迫的问题开展论战。干部中有些人实际上是反革命分子，而还有一些则是好人，但是犯了严重错误，中了修正主义的毒，他们都被叫到群众大会上，被迫回答群众的批判。

几百万革命青年来到北京，毛泽东亲自接见他们并鼓励他们继续革命。毛泽东告诉这些“红卫兵”：“对反动派造反有理”，这就成了文化大革命中激励士气的口号。文化大革命并非像那些资产阶级“学者”所胡说的，是毛泽东在党的领导岗位上削除他的对手的“巧妙的计策”，而是解放群众的力量，使他们能够向压迫他们的修正主义分子及其反动政策进行回击，并粉碎那些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叛徒们的“司令部”。

在一段时间中，中国大地显得是天下大乱。实际上，共产

党的各级干部、每个人都经受着群众的最为严格的审查。社会的每个方面都受到批判并经历了斗争。正规的教育停顿下来，许多地方的生产都瘫痪了一定时期。那些资产阶级代理人，一旦火烧到他们身边，就设法把群众分裂为对立的组织，转移群众的斗争目标，挑动群众斗群众，忠实的革命派被错误地指责为反革命分子的情形也是有的。

修正主义分子叫嚷事情搞糟了。每当群众起来斗争的时候，反革命势力总是来这一手的。早在四十年前，毛泽东在论述湖南农民运动时，就谈到了这一点：“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这一派的议论，表面上和前一派不同，但其实质则和前一派同站在一个观点上，依然是拥护特权阶级利益的地主理论。”甚至有些误入歧途的老实人一度也滑到了“糟得很”的行列中去，认为文化革命“太过分了”。然而，在这些动乱中，毛泽东和党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作出结论，认为中国的形势从来没有这样好过！剧烈的斗争，运动的反复，变成了世界上前所未有的马列主义最大学校之一。

一九六七年一月，斗争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上海的革命派成立了革命群众组织、人民解放军和党的革命干部的大联合，夺了被走资派统治着的中共上海市委的权。由人民群众直接采取行动，从下面推翻那个不再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局部的国家机器，这还是社会主义制度历史上的第一次！毛泽东和中央委员会总结上海一月革命的经验，号召革命派联合起来在全中国进行夺权，重新控制所有那些被走资派篡了权的机构。

继群众的夺权斗争之后，并且和夺权运动同时开展的，是中国人称之为“斗、批、改”的过程。这是进一步使生产关系革命化，使之更能适应于生产力的过程；也是改造上层建筑，

使之更能反映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过程。这一过程在中国仍在进行，并将以不同的方式、通过各种不同的斗争继续下去。在社会主义时期如何进行阶级斗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许多问题，中国的经验尚未作出完整的答案，或只不过是试验性地给予了一些解答。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看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

一、教育

青年的教育在任何社会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教育基本上是把资产阶级思想教给青少年，同时训练他们得到必要的技能和知识，以便为资本家服务（由于“服务”的性质不同，实际的训练形式也不相同——换句话说，不同的阶级接受不同的教育）。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教育必须有助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同时授以社会主义经济和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所必需的知识和技能。

中国在一九四九年解放时，继承了旧社会的教育制度。直到文化革命，其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大体上和解放前没有什么区别，在很多方面和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教育差不多。进大学是由考试来决定的，这种做法和我们国家一样，事实上排斥了绝大多数劳动人民的子女。

大学本身是由资产阶级“权威”统治着的，他们竭力把课程弄得比实际需要的更复杂得多，强调个人奋斗的资产阶级思想，普遍地理论脱离实际，即自然科学同生产相脱离，社会科学同阶级斗争相脱离。讲授炼钢过程的教授们，即使去过钢铁厂的话，也只是偶而有之，并且也肯定不曾在那里劳动过。讲农业课的教师，种庄稼不知道哪头朝上（这是在文化革命之后，

他们参加田间劳动的时候表现出来的)。

一般来说，学校的教员都是照着传统的资产阶级的方式办学的，尽管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如果不是大多数的话，是真心实意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这种教育制度同新的社会主义秩序完全不合辙。

学生和青少年作为开路先锋，在文化革命中一般地起着重大的作用，敢于向反动的资产阶级权威挑战，但是由于他们所处的社会地位，由于他们原来的思想观点的限制，单凭他们自己是不能完成教育制度的改造的。归根结蒂，击退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只能依靠粉碎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整个社会的群众斗争。

在文化革命的某一个时期，毛泽东号召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去管理学校。这是保卫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毛泽东所规定的政策“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直接体现。

工农兵领导学校的首要任务之一是，协助学生和革命的教职员结成革命的大联合，结束许多地方学生造反派内部进行的剧烈内战（有些内战，包括那些引起严重武斗的在内，后来查明是由反革命分子挑起的）。在毛泽东的号召下，三万个工人组织起来进驻清华大学（北京附近的一所理工科学学校），结束了那里的战斗状态。

若干工人被一些受反革命分子挑唆而陷入狂热的派性的学生所杀害，还有一些受了伤。但工人们没有进行报复。相反，他们设法把学生争取过来，说服他们停止武斗，实行文斗。而在工人们自己使用这个方法时，实际上不时地要提防着子弹或其他武器的伤害。这是政治挂帅的一个极其动人心弦的榜样，

也是为什么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有力榜样。

在工人阶级控制了清华和其他教育机构以后，毛泽东号召工人的代表们永远留在学校，进一步帮助他们实现革命化。自此以后，中国的教育制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旧的考试制度被废弃了。今天，所有的中国青年在完成中学（高中）的学业以后，都到工厂、公社或部队去劳动至少两年。能否进大学，多半是根据同申请人一起劳动的伙伴们的推荐决定的，伙伴们观察他或她对待劳动的态度、阶级立场和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把这些作为判断他或她配不配做一个大学生的主要标准。凡被推荐和最后被选中的学生都是党和劳动伙伴们认为是能够利用教育来促进社会主义革命的人，而不是为了创建个人事业的人。

学校的学习内容也起了引人注目的变化。学制缩短了，课程也简化了。今天的大学把注意力集中在和实际斗争密切联系的科学、工程、技术以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上面。像哲学、文学艺术之类的东西也是教的，但这类学科已不再是被“读书人”垄断的私有财产了。它们已成为全中国人民的财产。教育的指导方针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在培养技术人员为社会主义作出贡献，培养工人阶级接班人继续干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进一步大力克服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矛盾。

例如，现在的学生在学习给庄稼施肥的科学时，他们是通过边干边学进行学习的。从积肥到在化肥厂劳动，他们样样都干。这样，他们所获得的知识是全面的，是同建设社会主义的工人农民的需要和经验直接相联系的。

现在不仅大学生是从工农兵中选拔的，并且还有一些工人

在课堂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他们经常受到邀请，以他们切身经验体会来讲授学生们正在学习的科学技术科目。但是比这个更加重要的是通过给学生上阶级教育课，讲旧社会的苦，帮助学生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促进学生的思想革命化。

学生和教师的关系也起了根本的改变。教师在课堂上不再是学生不能向他提出疑问的统治者了。教师和学生之间的批评和斗争取代了盲目的服从。这同样是工人阶级领导教育和社会各个领域的产物和反映。

教育方面的这些巨大变化表明，在阶级斗争中，在上层建筑领域里，在生产关系方面，尤其在处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矛盾问题上，是资产阶级的一个决定性的失败，无产阶级的一个重大胜利。这又反过来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生产和科学实验的发展。而在彻底改造社会，最后消灭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阶级矛盾的长期的、复杂的斗争中，这还只不过是一个起步，仅仅是前进的一个开始。

二、城乡关系

城乡差别是在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中必须予以解决的重大矛盾之一。今天中国的城市，正如列宁和斯大林时代的苏联一样，其特点是具有比较先进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在城市中，社会主义所有制方面占优势的形式是国家所有的工业。中国农村中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则较为低级，是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每个公社占有一部分土地，它们把产品出售给国家——一种商品交换的形式。

中国农业的特点是生产力仍然相对落后；机械化虽然正以

较大的规模在发展，但仍然很少。过渡到完全的国家所有制还需要长时期的艰苦斗争，要发展农业生产力，在农村建立工业并提高农民群众的无产阶级觉悟。

要做到这一点，唯一的道路是有计划地跟城市工业的发展结合起来，跟工人们通过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而提高阶级觉悟结合起来。如前面所说，向共产主义的全面过渡，只有在克服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的基础上，当社会上每一个人都已变成有觉悟的共产主义的劳动者，社会上的阶级差别的基础已经消灭之时才能实现。

文化革命对中国农村的进一步革命化，加强工农联盟并向着最终消灭城乡差别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把大量的城市中学毕业生送到农村去，是这个方面的一个重要政策。这项措施至少具有三个重要作用。

第一，使这些青年人同广大的中国人民群众（占总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相结合，并使他们和农业生产紧密联系起来。农业生产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工业是主导），农业为工业提供原料和市场，而工业则向农业供应机械化的手段（所有这些都受社会主义计划的制约，而不是受资本主义市场的制约）。

第二，知识青年涌到农村，有助于为农村提供具有基本技术训练的人力，从而有助于农业机械化并在农村建立工业。

第三，这项政策有助于扭转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是资本主义的一个特点，它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会“自发地”存在下去，除非有意识地用社会主义计划和原则同它进行斗争。事实上，在文化革命前，这种状态在中国的确存在；但现在，中国的城市人口已经稳定下来，在某些情况

下，人口还有所减少，而农村和边疆地区的人口则按照计划的规定在增长着。

鼓励人民公社发展小型工业，是共产党自大跃进时期以来的一贯政策。但在文化革命的影响下，依靠地方的积极性和运用地方资源建设工业的进展迈开了更大的步子。大量的工厂在农村中建立起来，主要是支援农业的化肥、水泵厂，以及为农民的需要服务的小型纺织厂等。

中国医疗方面的巨大变化，一直使来访的外国客人惊叹不已。它对中国农村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对最终克服城乡之间、脑力和体力劳动之间的矛盾作出了贡献。除正规医生以外，培训了大量的、中国人称呼的“赤脚医生”去处理农民健康方面的大部分需要，医治一般的疾病，治疗骨伤，普及避孕知识，等等。医院和诊所更是转向适应农民的需要。同时，大学里培养的医生则和农民一起参加生产。用这种方法就使得资产阶级的“分工”受到“两面夹攻”——农民被训练为医生；而医生则到田间去劳动，向农民学习。

三、文学和艺术

如先前所指出的，文化革命的首要目标之一是文艺领域。许多艺术部门，包括京剧、交响乐、芭蕾舞等，实际上从解放前以来都没有改变过。古典的题材、外国资产阶级的作品和老的剥削阶级的人物统治着舞台。钻进共产党内的反革命分子竭力阻挠文艺的革命化，利用他们垄断的舞台和印刷出版机构，拼命制造舆论，复辟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对党和毛主席的恶毒攻击出现在历史作品和剧本里。

除了那些妄图对文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分子以

外，有一大批作家和艺术家，他们虽然真心实意地拥护社会主义国家，但并未从思想上同旧社会决裂。修正主义分子阻挠作家和艺术家的改造，企图利用他们作为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

文学艺术领域中的斗争是文化革命中具有关键性的斗争之一。通过这一斗争，已经创造了一些新的文艺作品。这些作品真实地为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工农群众的利益服务。像《智取威虎山》和《红灯记》这样的京剧，像《红色娘子军》这样的革命芭蕾舞剧，都是按照无产阶级世界观改造了的艺术，它们用真实的工人、农民和解放军的英雄形象代替了原来舞台上的古老“英雄”，即皇帝、地主、美人和死鬼。地主、资本家和反革命分子仍然在这些无产阶级样板戏中出现，但他们不得占据“舞台中心”。他们是作为群众所不齿的、仇恨的、为人民的革命斗争所打倒的对象而出现的。

文艺方面的变化，也可以从艺术和人民生活的进一步结合中看到。目前，交响乐、体操队、剧团和其他文艺工作者都积极地到群众中去，在工厂、公社、公园等处演出。文艺工作者在演出的过程中也参加生产劳动，向劳动人民学习。

同时，工农队伍中出现了新的作家和艺术家；劳动人民自己的文艺小分队正在全国蓬勃发展，同专业的文艺工作者并肩前进。这也是进一步打破“职业”艺术家和人民群众之间的界限的一个步骤。

但是，在文学、文化和艺术领域里的阶级斗争，总的说来，仍然是非常尖锐的。资产阶级企图以这一种或者那一种方式在这个领域里重新施加它的影响，并且妄图把无产阶级赶出这一领域。这一方面的阶级斗争是尤其尖锐的，因为文学艺术在任

何一个阶级手里都是表达它的世界观和制造舆论的强大武器。资产阶级可以利用文学艺术兜售它的反动世界观和政策，以隐晦曲折的方式散布它不能明目张胆宣传的种种反动思想。

无产阶级如果在文学艺术方面没有领导权，就不可能按照自己的世界观统治和改造社会。早在三十多年前，毛泽东在他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已经阐明：“人类的社会生活虽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虽是较之后者有不可比拟的生动丰富的内容，但是人民还是不满足于前者而要求后者。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虽然两者都是美，但是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政治，不论革命的和反革命的，都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不是少数个人的行为。革命的思想斗争和艺术斗争，必须服从于政治的斗争，因为只有经过政治，阶级和群众的需要才能集中地表现出来。”

这一切说明了：为什么今天中国在文化领域里的阶级斗争仍然是非常尖锐的：而且在阶级和阶级斗争消失之前，文化领域将继续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关键战场之一。

四、“抓革命，促生产”——生产方式进一步革命化

工人阶级一旦夺取并控制了生产资料，生产力同生产关系

之间的矛盾就完全不存在了，这就是苏联以及其他国家的修正主义者的主要理论武器之一。我们在前面的几章中已经看到，苏联的走资派，在斯大林逝世前后，都是不断地提出这一论据的。

斯大林在他逝世前一年出版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有力地驳斥了这条路线。他在答复修正主义经济学家雅罗申科时写道：“我国现今的生产关系……完全适合于生产力的增长，推动生产力一日千里地向前发展。但是，如果以此自满，以为在我国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不存在任何矛盾，那就不正确了。”斯大林在这里所说的基本上也就是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所写的，——即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既相适应又相矛盾的。

斯大林还警告说，如果不能理解这一点，那就会导致“生产关系就可能变成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极严重的阻碍者。”但是斯大林只是暗示了这一点，而没有能像毛泽东那样作出完整的结论——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当然，毛泽东是既根据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也根据苏联的经验得出这个结论的）。

在中国，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基本上是相适应的，这一事实是解放以来的生产取得了巨大增长的原因。但是，生产关系仍然落后于生产力的发展。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矛盾，根据“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继续保持不同的工人之间的不同的工资（技术工人比一般工人工资高，重工业工人比轻工业工人工资高，等等），工人和农民之间的矛盾——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这些差别和其他差别，这些都是资本主义时代遗留下来的残余，它们仍然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

修正主义者想要抹煞这些矛盾并且否认这样的事实：即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仍然存在着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实际上是推动社会前进而且（在无产阶级占优势并且控制着社会的情况下）使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动力。修正主义者却声称，一旦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化了，那末工人阶级的唯一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实质上就是为生产而生产。但是，我们在第三章中已经指明，只有在劳动人民对生产目的和计划不断提高自觉性的基础上，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对生产过程的控制不断加强的情况下，才能建成社会主义，到达共产主义。没有这一点，而把生产本身当作目标，只能是反映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利益，并为这种利益服务。

刘少奇在中国大力推行了生产方面的修正主义路线；刘垮台后，林彪和陈伯达又曾使之抬头。他们竭力说什么在中国主要的矛盾不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而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的矛盾”。这不过是资产阶级的机械唯物论和“唯生产力论”而已，它们受到修正主义者、托洛茨基分子以及资产阶级在革命队伍中其他一些代理人的支持。

这一“理论”胡说什么生产力的高度发展自然而然地导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相反地，在生产力仍然处于相对地低水平的发展阶段的地方，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这就否认了俄国和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因为它抹煞了人民自身的创造力和革命的因素，从而也排斥了阶级斗争和革命的必要性。

这次文化革命给予这条资产阶级路线以致命的打击。它对物质刺激、一长制这类东西展开了一系列的大批判和斗争。归

根结蒂，这场斗争的矛头是针对那些破坏工人阶级管理生产的走资派的。

批判是一种破的形式，毛泽东强调过，“不破不立。”随着走资派的罢官并对他们的资产阶级的方式方法进行了大批判，工人阶级就面临着使生产关系进一步革命化的重大任务。为了更好地适应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发展现代化工农业的需要，必须推行一些管理国家和企业经济活动的新的办法。虽然通过不断的阶级斗争，这个任务还没有完成，而且只要阶级矛盾仍然存在就不可能完成；但是许多改革，确实是抓住了文化革命所要解决的问题的实质。

现在中国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都要参加集体劳动。采取的形式是每周有几天或是每年有几个月在工厂的流水作业线上或农村劳动。在党的领导和鼓励下，工人、农民对管理人员和领导所犯的错误，采取个别交谈、会上帮助或贴大字报的形式进行批评。工厂的工人可以对生产定额进行讨论，提出批评或建议修改。

作为变相的计件工资等等的奖金制度已被废除。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同普通工人之间的工资差别正在逐步缩小。更能体现集体管理的组织形式，如革命委员会或工人管理小组，已有发展，它们的成员通过工人和党委共同协商产生。工厂的规章制度已加修改，许多不合理的管、卡、压办法和“官样文章”已被铲除。

所有这些革命性的改革产生了解放生产力的效果。文化革命以来，中国工业发展的速度大大加快，产品的数量和质量都有提高。劳动人民一旦重新牢固地掌握了主动权，他们就完成了许多技术革新和技术改造。在中国的出版物中，不断地报道

了工人如何发明并从废料里制造出新机器，又如何把过去的“废品”重新制成完整的新产品的事迹。

除了工人在日常工作中提出更快更有效地进行生产的建议以外，为了发展新的生产技术，还成立了由技术人员革命干部和老工人组成的三结合小组。一旦战胜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过去从未做到过”，“在‘先进’国家里不是这样做的”等等的资产阶级思想，工人就完成了——如在三十九天内——在只有制造五千吨船只的设备能力的船台上，建成了一艘万吨轮。

所有这些和其他方面的许多进步，都生动地证明了毛泽东所提出的“政治挂帅”的社会主义原则的正确性。这对资产阶级和它所雇用的修正主义文人来说，是很惨重的失败。这些人宣称，如果不像修正主义者在苏联搞资本主义复辟那样搞利润挂帅，那就什么事情都做不成。

我们在前面的几章里已经看到，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仍然需要考虑各种企业的利润。但是，工人阶级在向共产主义前进过程中，必须经常努力限制并最终消灭它。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一般说来，企业需要获得利润以便国家能为发展生产积累更多的资金；但是，利润这个问题能够而且必须服从人民的需要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任务，这也同样是正确的。例如，为了促进农业机械化和巩固工农联盟，也许需要在一段时期内，不顾亏损，去生产拖拉机等等农业机械。

这样做法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是可能的，因为工人阶级通过它的国家政权集体地控制了社会的盈余，并且根据社会主义的全面计划把盈余分配给各个经济部门和特定的企业。但是，决不可用利润挂帅来代替工人阶级的革命的政治挂帅。因为这

样做会导向资本主义，而且会因此导致不断的经济失调和生产无政府状态。

文化革命也影响了各工业企业之间的关系，还影响到工业同全体人民之间的关系。一旦粉碎了利润挂帅的观念，工厂就能生产社会主义建设所需要的东西，即使在某些情况下这种产品“无利可图”。制造厂的工人现在访问使用厂（比方说，这个厂买了他们厂的机器），检查他们所生产的机器的运转情况并征求使用厂工人的批评意见，回厂后进行讨论，进一步加以改进。

生产消费品的工厂，现在直接向群众征求关于需要什么样的新产品、对现有产品有什么批评等意见。举一家生产雨衣的工厂为例，可以说明这一点。这家工厂的工人访问一个公社，那里的农民正在插秧，他们看到雨衣的下摆拖曳在水里。因此，他们回厂后就在雨衣上另添一副钮扣用以防止雨衣碰到泥水。这一切是在社会主义总的计划范围内，依靠群众，政治挂帅并突破劳动人民在生产过程中彼此之间的隔绝而得以实现的；从而使他们能更自觉地进行生产，对社会主义革命作出贡献。

对于文化革命以后中国工人阶级所创造的近乎传奇的业绩，也许要满满好几本书才能写得了。关键是革命，即批判旧思想、旧习惯，夺回被走资派所篡夺的那部分权力，进一步变革生产关系并开展上层建筑里的斗争。革命解放了群众的创造力，从而进一步解放并发展了社会生产力。

继文化革命而来的生产方面的巨大进展生动地证明了：“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正确地体现了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之间的关系，同时也是对修正主义的“唯生产力论”的有力驳斥。工人阶级如果掌握了政权，就能改变社会面貌，那怕在开始的

时候连一家钢铁厂也没有。工人阶级如果失掉了政权，那末一切先进的生产设备就会完全变成新资产阶级的资本，被用来剥削工人阶级了。卡尔·马克思写道：“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中国的文化革命就是生动的例证。

五、综述

这次文化革命的主要经验可以概括如下：

文化革命证明了，群众性的革命斗争和由下而上的夺取权力，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和重新在那些被资产阶级篡夺了领导权的单位、部门夺回权力的方法。

文化革命是整顿共产党的一次重大斗争。毛泽东和党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通过发动群众和支持他们的批评意见，孤立并击败资产阶级司令部，清洗反革命分子和腐化堕落分子，吸收新鲜血液，加强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的团结。

文化革命表明，工人阶级必须实行在一切领域，包括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教育、文学、艺术等等）在内的全面专政。

文化革命有力地证实了马列主义的原则，即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群众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正如“抓革命，促生产”这个概括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正确关系的口号所表达的那样。

文化革命是无产阶级民主的一次大演习，在这次演习中，群众自己通过斗争识别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对任何他们认为不符合他们利益的事物都加以批判，而且对党和政府进行监督。

文化革命对中国人民群众来说是一次深刻的教育。他们在剧烈、复杂的群众斗争过程中，加深了对马列主义的掌握。这也是培养革命接班人的阶级斗争的大学校。

最后这一点是关系重大的。中国人民群众如果当时没有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他们就识别不了资产阶级司令部，也无法把它摧毁；总之，也就不可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和由下而上地夺回权力了。

在整个文化革命的多次反复的过程中，每一个人，不论革命的或反革命的，都以毛泽东的名义讲话。但是，问题在于要弄清哪一条路线体现了毛泽东思想（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利益），哪一条路线代表了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但却伪装是毛泽东思想。

而且事实证明，这一点尤其关系重大，因为林彪、陈伯达等人利用对刘少奇进行斗争作为掩护，来建立他们自己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刘被打倒后，在一九六九年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上，文化革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巩固，对林彪及其一伙的斗争就变得非常尖锐。林彪甚至丧心病狂到企图谋害毛泽东的地步。

但是林彪失败了，阴谋暴露了，他在一九七一年九月逃出中国时坠机丧命。以后的三年中，反修斗争以及根据文化革命的经验而继续加以推进的群众运动，又以新的形式继续展开，目前集中精力于批林批孔运动。

一九七三年，党的十大所强调的，从中国革命的两条路线的斗争（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斗争，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斗争，党内的斗争）中总结出来的一条关键的经验，用毛泽

东的话来讲，就是“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从林彪这个例子可以看出，这次文化革命没有，也不可能一劳永逸地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或彻底击溃修正主义者。正像毛泽东在文化革命中一再强调的那样，今后有必要进行多次这样的革命，因为他在一九六二年已经概括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苏联的反面教训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但是，更重要的是，中国文化革命的惊天动地的正面经验以及在每一个领域继续进行的反对走资派和资产阶级的群众斗争说明了，工人阶级不仅能夺取政权并着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而且能继续进行革命，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并领导整个世界上的全体人类进入共产主义。

第八章 结论——社会帝国主义 在苏联出现的意义

本书自始至终证明了，苏联已从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蜕变为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它正在同美国争当世界人民的主要剥削者。有待说明的问题是：对美国和其他国家的革命者来说，这一事实具有什么意义呢？

任何一个国家的革命者要制定和发展自己的革命战略，就必须对世界局势和世界范围内的无产阶级革命总战略有一个正确的估计。没有这样一个正确的估计，我们必然会对任何一国中存在的特殊矛盾作出错误的分析，也就无从全面理解目前帝国主义的普遍危机，也不能使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对当前的斗争作好正确的准备。

苏联从（当时的）一个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国转变为帝国主义超级大国，这对世界范围内阶级力量的组合，对革命的全球战略和战术，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一九七一年的事例说明，对苏联的错误看法会导致对世界大事的错误估计。那年印度入侵东巴基斯坦时，有些进步人士竟会受骗上当，以为“孟加拉国事件”实际上是一个民族解放运动！同样地，不了解苏联扮演的帝国主义超级大国的角色，就绝对不可能了解中东的复杂形势。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马列主义者认为，在世界较大的矛盾中，主要的或对所有较大矛盾的动向或发展起决定作用的，是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由于导致第二次大战的各种事件以及大战本身，革命斗争的主要战场从西方移到了东

方。民族解放斗争，尤其是亚洲和非洲的民族解放斗争，变成了世界反帝斗争的主要战场。大多数马列主义者和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的进步力量，都开始认识到这一点。越南人民反抗美帝的英勇斗争，在六十年代里发展成为世界人民反帝的主要斗争，激励着世界各地革命者，尤其是美国的革命者。

马列主义者认为世界主要矛盾存在于被压迫民族和帝国主义之间，然而以苏联“共产党”为头子的全世界修正主义者都说主要矛盾在于“帝国主义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当然，他们是把苏联和其他修正主义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包括在一起的）。修正主义者散布这一种对世界形势的错误观点，其用意就是要破坏民族解放斗争，混淆革命者的视听，并掩盖他们自己同美帝争夺世界霸权的企图。尽管美国共产党也在美国鹦鹉学舌地同唱此调，幸亏它在本国内从未获得多少支持。不过，当着这两霸的争夺和勾结正在加紧的时候，揭露这条路线就变得越来越重要了。

一个比较普遍的观点就是，把被压迫民族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看作为在当前及今后永远对世界有举足轻重的唯一矛盾。这种看法是经常同否认或低估美苏之间日益加剧的矛盾连起来的。《每月评论》和最近的《前卫报》编辑部的文章就持有这种观点，他们承认苏联已“偏离马列主义”或“变了样子”，可是他们没有能够在苏联问题上应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没有把苏联看作为一个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强国。这种观点是很危险的。因为它掩盖了社会帝国主义的本质，会导出苏联可能做民族解放斗争的“盟友”的错误结论。这种观点是同全世界修正主义者所推行的那条路线一拍即合的。

目前世界形势的特点是资本主义全球性总危机的迅速加

剧，这就进一步引起了世界上所有的主要矛盾的加剧和深化。正当帝国主义者企图把危机的负担越来越多地转嫁到工人阶级身上的时候，美国和包括苏联在内的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斗争也日益激烈。从葡萄牙殖民主义在非洲的溃败中可以看出，民族解放运动正在日益胜利。从阿拉伯石油禁运中可以看出，发展中国家同两霸间的矛盾近年来也在显著地加剧。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也特别由于社会帝国主义分子对中国的战争准备而加剧。而最为重要的是帝国主义国家，尤其是美苏之间的日益加深的矛盾，和以较小的帝国主义国家如日本和法国为一方，而以两个超级大国为另一方的日益加深的矛盾。

对于马列主义者来说，重要的是要看出所有这些主要矛盾的发展和动向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还要充分理解这一点，即主要矛盾和我们的斗争方向正如列宁所写的那样，在一天之内就可能会有所变更。如果我们只看到世界上一两个矛盾，而不理解世界形势会随着资本主义全球性危机的加剧而改变，有时还会突然地、戏剧性地改变的话，我们就会被解除武装，而对当前的革命斗争毫无准备。

一、世界大战的危险

美国革命者最严重的弱点之一，就是对美苏间的一般关系理解很差，对两个超级大国间发生世界大战的越来越大的危险性严重地估计不足（尽管在某些地方相反地也有世界大战已在眉睫的看法）。列宁对革命学说的最伟大的贡献之一就是他对帝国主义的分析，对帝国主义国家如何经常企图重新瓜分世界的分析，以及他的结论：帝国主义就是战争。

二十世纪的历史完全证实了列宁的分析。两次世界大战都是由于各资本主义国家争夺原料、市场，而最重要的是争夺可以输出资本攫取超额利润的殖民地和附庸国而造成的。

“资本主义的不平衡发展”这条马克思主义规律认为，不同的资本主义国家将按不同速度发展，有的迅速，有的较缓、停滞或渐趋落后。这种不平衡发展说明，世界上被划分的“势力范围”（即资本输出的市场、原料来源等等），在它已不能反映各帝国主义国家的相对实力时，将经常发生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和人民的反抗迫使帝国主义者无法和平地瓜分世界。因此，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就不可避免地要爆发以武力瓜分世界的战争。

在今天的世界里，现有的市场“势力范围”的划分已不能反映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尤其是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经济和军事力量的真实关系。正像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独享近乎垄断地位的美国，已在世界上占有同它不相称的那一部分权力。这当然是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尤其是苏联所不能容忍的。正当危机四伏、日薄西山的美帝国主义还想拼命维持“现状”的时候，帝国主义的规律、输出资本并攫取原料的需要等等迫着苏联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对目前世界瓜分的现状进行挑战。

众所周知，两个超级大国除了争夺世界霸权之外，有时也互相勾结。无论新老帝国主义分子，他们在反对人民革命斗争这一点上是完全一致的。比如说，两个超级大国都觉得，强迫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人民接受“不战不和”的局面是有利的。两个超级大国都支持柬埔寨的朗诺卖国集团。即使在那些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分子为了同美帝抗衡而提供军事“援助”的真正的

民族解放运动中，他们仍毫无例外地企图利用这些“援助”来破坏那些争取真正独立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以便可以骑在人民头上。

的确，美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也确实举行周期性的会谈和最高级会议，而且还吹着许多宣传法螺，满嘴虔诚地念着“世界和平”、“美苏合作”和“缓和”经。遗憾的是，有些革命者只看到美苏间的合作，受了“缓和”宣传的骗。他们只看到表面现象，而不能抓住超级大国间关系的要害。他们以为美苏帝国主义能够坐在一个房间里，在反人民和导演世界大事上取得一致。

两个超级大国尽管拼命想方设法，可是他们从来不可能达成任何长久的或是有意义的协议。那些只看到美苏同谋和美苏共同利益的人，本质上已跌进了毛泽东在《矛盾论》里批判的“平衡论或均衡论”里面去了。

毛泽东引证了列宁的话：

“对立的统一（一致、同一、合一），是有条件的、一时的、暂存的、相对的。互相排斥的对立的斗争则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

毛泽东继续写道，“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看见的统一、团结、联合、调和、均势、相持、僵局、静止、有常、平衡、凝聚、吸引等等，都是事物处在量变状态中所显现的面貌。而统一物的分解，团结、联合、……凝聚、吸引等等状态的破坏，变到相反的状态，便都是事物在质变状态中、在一种过程过渡到他种过程……所以说，对立的统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相对的，而对立的互相排除的斗争则是绝对的。”

因此，主要地就是两个超级大国间的这种对立和斗争在把事态的发展推向新的世界大战。当然，事情还有另一方面，世界各国、各民族和人民为独立、解放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也反过来在大大阻碍着超级大国称霸世界，使它们更不容易发动这样一场世界战争。

世界人民的目的必须是用革命斗争来制止世界大战，或者如战争已经爆发，则在这种条件下继续革命斗争，促使帝国主义彻底崩溃。毛泽东曾说过：“关于世界大战问题，无非是两种可能：一种是战争引起革命，一种-是革命制止战争。”

苏联的宣传家同他们的美帝国主义同行一起，也在讲世界大战的危险。但是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反对革命斗争，维护帝国主义，发展他们各自的帝国主义利益。苏联说世界大战是“不可设想的”，要“导致人类的毁灭”。不用说，他们尽管讲的是和平，但为了企图在军事上超过美国，正在把自己武装到牙齿。

按照社会帝国主义发言人的说法，“保卫和平”的唯一希望是世界人民在支持苏联同美帝国主义竞争的同时，停止革命斗争，把希望寄托在苏美“缓和”上面。社会帝国主义分子声称，武装革命和民族解放战争是对世界和平的威胁。恰恰相反，归根到底能够防止两霸开战的唯一方法是打倒它们，而能够把大战的爆发推迟的唯一方法是继续进行一切形式的革命斗争来削弱帝国主义。很明显，越南和印度支那人民所进行的英勇武装斗争不但没有导致世界大战，反而大大削弱了美帝国主义和它能够掀起世界大战的力量。

正像中国人经常指出的那样，“目前国际形势的特点是天下大乱。”这个大乱从美苏两个帝国主义集团的迅速瓦解中反

映出来。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的这种动荡和混乱是对人民极为有利的，因为它削弱了帝国主义，使这些国家更不容易结成集团，投入战争。

两霸的主要角逐场所是欧洲。欧洲也曾是上两次世界大战的焦点。目前苏联正疯狂地想消灭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想和西欧各帝国主义国家签订协定。正如前面所述，对中东控制权的争夺也就是对欧洲控制权的争夺，因为欧洲的石油供应主要是依赖于中东的，进一步控制石油供应则是帝国主义发动战争的关键。

此外，社会帝国主义分子也在企图拉紧缚在东欧修正主义国家脖子上的绞索。在美帝国主义方面，它也在拼命地把西欧帝国主义国家列成队伍，同时还向东欧修正主义国家频送秋波，希望能引诱它们脱离苏联。

在今天的状况下，像日本、法国等这样第二流帝国主义国家，不可能形成在军事上跟任何一个超级大国相对抗的集团（除非它自己同两霸之一结盟来反对另一个）。因此，两个超级大国为了对其他资本帝国主义国家称霸，它们之间的争夺也日益激烈。社会帝国主义分子采用“声东击西”之术，就是说，他们虽然在中国的边境上继续集结重兵并向中国挑衅，但他们的主要目的是统治全欧，从美帝手中抢夺霸权。话虽如此，将来两霸开战时，中国受到或此或彼的打击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从列宁时代起，共产主义者一直把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作为他们纲领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列宁正确地预言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并号召参战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们利用战争的发生，起来反抗自己国内的资产阶级，把帝国主义战争变为内战。

正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坚定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使社会主义得以在沙皇俄国的土地上建立起来。在三十年代的危急岁月里，共产国际和全世界共产党在所有国家的人民群众中，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危险性进行了有力的宣传。由于纳粹对苏联的进攻，战争的基本性质从一个大体上是帝国主义之间的内部战争变为世界性的反法西斯战争。那时，各国共产党和苏联领导了世界人民击败法西斯国家的战争。紧跟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全世界许多国家的人民，如东欧、朝鲜、越南和中国等都挣脱了被压迫的锁链，建立起社会主义。今天的革命者，尤其是生活在美国和苏联的革命者，都有一个对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进行宣传和斗争的艰巨任务。但是即使这样一个战争爆发的话，它不会像帝国主义者所说的那样意味着全人类的毁灭。它虽会带来无穷的痛苦，但会使最终埋葬帝国主义的日子来得更早些。

二、反霸统一战线

根据对今天世界矛盾和各国革命斗争的发展的周密分析，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已制订了“反霸统一战线”的战略，作为在世界范围内推进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总战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率领下，这个统一战线正在形成。

反霸统一战线的战略有几个方面。它正确地认清美帝国主义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是世界人民当前的主要敌人。它使无产阶级同一切可能的力量结成广泛的同盟来抵抗这些主要敌人。在这个斗争中，无产阶级最坚定的同盟者是亚非拉的亿万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他们同工人阶级团结一致，成为这些地区里主要对付两霸的民族解放斗争的骨干力量。

此外，由于两霸的争夺和勾结，美帝国主义的削弱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对它日益加强的挑战，从而形成这样一种局面，它不但能够使这些国家中执政或在野的进步民族资产阶级，为争取更大的独立权而对两霸或其中之一进行斗争，而且还能使第三世界某些在国内实行反动统治的政府也这样做。这就使无产阶级在反霸斗争中获得了更为广泛的（即使是不坚定的）同盟者。

最后，两霸企图主宰较小的帝国主义国家的这个事实，使无产阶级有可能利用帝国主义阵营内部分裂的机会来阻止帝国主义集团的形成和团结，并同较小的资本帝国主义国家联合起来反抗两霸的控制。近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外交方面的巨大成就，再加上它对一切真正革命斗争的坚强支持，都是反霸统一战线正确战略的成果。

反霸统一战线的战略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者的总战略，也必须是革命者在本国制订革命战略战术的起点。但是光是一个在世界范围内推行革命的总战略还不够。各国真正的共产党和马列主义组织还必须对他们国内的特殊矛盾作精心分析，在把马列主义和本国具体条件相结合、在反霸统一战线总战略的基础上，发展自己的革命战略和纲领。

革命者，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的革命者，利用帝国主义之间、包括两个超级大国内部的争夺，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在这样做的时候要防止一种危险，即就战略而言，不能忘记世界人民面对的主要敌人是美帝国主义再加上苏联社会帝国主义。

同样地，在一些情况下，反霸统一战线总战略，尤其在领导世界革命运动的中国的外交政策中所体现的，看来似乎同这个或那个国家人民群众的利益有矛盾。但事实上，这种矛盾是

不存在的。例如，中国同伊朗国王订了一些协议，而后者的主要特征是残酷压迫伊朗人民的暴君，也是美帝国主义的傀儡。中国对伊朗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它利用了这位国王同社会帝国主义、甚至同美帝的矛盾（虽然这里要再重复一遍，同美帝国主义的矛盾不是主要方面）。中国的这个正确策略绝不意味着伊朗人民不应该搞革命战争来打倒国王的反动统治，或者全世界革命者不应该支持那个正义斗争。

同样地，中国想和美国改善关系的企图，并没有同建立反霸统一战线的总战略或同我们国家内的反美帝统一战线有矛盾。这一策略对美国国内革命斗争大有帮助，因为它可以消除五十和六十年代中美帝国主义煽起的反华反共歇斯底里症的影响，并带给美国人民有利的气候，使他们了解社会主义和中国的真正性质以及我们两国人民之间团结的必要性。

这样的一项策略也灵活地利用了两霸间的矛盾，冲破了六十年代中美帝国主义分子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分子共同制定的“包围中国”的政策。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谋求改善同美国的关系，但同时继续全力支持美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并在他们的刊物中，在联合国及其他场合继续揭露美帝国主义的真面目。

事实上早在一九四六年，在描述一个在许多方面同今天相象的形势时，毛泽东就制定了在今天的形势下指导各国革命者的原则。他指出，到那时候，苏联（当时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同某些反动势力，特别是美、英、法之间，可能有某些妥协，尤其在外交关系和贸易方面更是这样。可是毛泽东着重指出，“这种妥协，并不要求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人民随之实行国内的妥协。各国人民仍将按照不同情况进行不同斗争。”

三、对修正主义的党如何看法

今天在世界大多数国家中合法或非法地存在着的共产党，都是在一九五六年世界范围内出现现代修正主义以前建立的。其中有的仍然是忠于马列主义、忠于工人阶级的真共产党——例如中国共产党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但不幸的是多数早先的共产党都已放弃了马列主义，背叛了工人阶级的事业。

在那些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党已被现代修正主义腐蚀掉的国家中，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已从老的修正主义的党的队伍中和从震撼全球的群众斗争中挺身而出，建立起能够领导工人阶级走向革命和社会主义的真共产党（或为新党奠基的马列主义组织）。

一大批修正主义奸党，在社会帝国主义同美帝国主义分子争夺世界霸权的全球战略中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一般说来，修正主义党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它们鼓吹“通向社会主义的和平道路”、“马克思——天主教对话”等等修正主义破烂货来阻挡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在某些国家里，像意大利，它们已取代了老的社会民主党，成为资产阶级维护其对工人阶级专政的主要社会支柱。修正主义党的另一方面是，它们充当了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扩大其势力和影响的工具。

在第三世界中，那些修正主义的党是特别地被利用来为莫斯科的利益服务的。这样的党不论是自动解散也好（埃及），发动政变也好（苏丹），或鼓吹“和平演变”也好（智利），都同社会帝国主义对那个国家的策略有密切关系。

举例来说，直到最近，伊朗的修正主义人民党一直鼓吹国王是进步的，伊朗没有武装斗争的必要等谬论。可是一等到这

条路线不能再为他们的社会帝国主义主子的需要服务时，人民党的头子就开始号召打倒国王了。这就再明显不过地说明，第三世界革命人民和真正的共产党及组织必须防止修正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代理人的渗透，这些人就是期望把他们的国家变成苏联的新殖民地。

西欧各国的修正主义党还有些力量，它们利用的是工人阶级对社会主义的真心向往，以及利用苏联及各国共产党在三十年代不景气时期（就资本主义国家而言）和反法西斯战争时期所赢得的崇高威信。西欧的修正主义党正处于忠于它们“自己的”资产阶级和忠于社会帝国主义的两难之间。这是欧洲某些修正主义的党派间产生分歧的根本原因，也就说明为什么有时某些修正主义者会非难别的修正主义者，说他们背离“马列主义”并叫嚷要“回到列宁主义立场”。

意大利的修正主义“共产党”早已同意大利的垄断资本家握手言和。因此，当意大利的资产阶级不同意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时，它在意大利共产党内的仆从们就立即紧紧跟上。在法国，恰恰相反，修正主义的党对社会帝国主义是极端奴颜婢膝的。

美国共产党也困于两者中忠于谁的问题，这从它们在水门事件中的表演可以看出。可以设想那阵子是美国共产党发迹的日子来到了，因为它们会有机会贩卖美国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有“进步”和“反动”两翼的谬论；而且它们毕竟叫嚷“弹劾尼克松”可以解决自一九六九年来美国人民的所有问题。可是请看事实吧！美国共产党虽然在某种程度上确实继续推行它们的“问题在于尼克松”路线，但它们从未对梦想已久的“弹劾尼克松”一事表示真要干下去的热忱。这是什么原因呢？后来发

现原来勃列日涅夫和社会帝国主义统治集团颇为明显地希望看到尼克松留任！

苏联变为社会帝国主义一事，使在世界范围内揭露并反对修正主义党派的斗争成为如此重要。正像他们的前身老社会民主党一样，修正主义分子不但用“和平道路”等胡言来欺骗工人阶级，同他们自己的资产阶级勾结起来反对革命，而且还或多或少地起着社会帝国主义第五纵队的作用。在另一方面，由于这些修正主义党派面临的是忠于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还是忠于它们自己的统治阶级的两难之境，使帝国主义阵营内的混乱加剧。就这点来说，是一件好事。

作为结束，我们觉得要着重提出下列几点：

1. 资本主义在无产阶级革命第一次胜利的苏联的复辟，是现代史上具有最严重意义的一件事。革命者正确地总结苏联事件并从中作出正确结论，是一件无比重要的事情。它可以使我们吸取反面的教训，使我们更正确地掌握和运用马列主义这门科学，尤其是无产阶级专政和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理论。只有这样，才能对社会主义国家中的资本主义复辟，对所有共产党及共产主义组织内部存在的各种修正主义路线和倾向作胜利的斗争。也只有这样，才能把那些宣称苏联的经验证明社会主义不会成功的资产阶级谬论驳倒。

2.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以一个超级大国的面貌出现，它同另一超级大国美帝国主义既争夺又勾结，但争夺是主要的。这件事深刻地影响着整个世界局势和世界革命运动的过程。它增加了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性，使亿万人民面临在帝国主义的穷凶极恶掠夺之下丧生的危险。它说明世界人民面对着两个主要敌人，两个超级大国，必须在革命的无产阶级领导下建立

起坚强的反霸统一战线。

正如列宁所总结的那样：“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一个新的帝国主义国家（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出现决不能从任何方面改变这条真理。全世界的人民起来埋葬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展开人类历史的灿烂新篇章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革命联盟简介

今天，无论在美国还是在世界其他地区，越来越多的人正在日益清楚地认识到，需要进行一场革命。我们生活于其中的那种制度是由银行家和大商人所统治的，这种制度早已陷入愈来愈深重的危机和混乱之中。随着统治者对我们的压迫愈益加剧，随着他们在世界各地激烈地争夺从人民掠夺来的赃物，失业、非人的劳动强度、通货膨胀、社会腐败、社会服务事业的瘫痪、对民主权利的践踏、对妇女的歧视以及妇女的堕落、对被压迫民族和少数民族的统治、侵略战争和世界大战的威胁等等——所有这一切社会危机正在严重恶化。

但是，上述情况只不过进一步表明了，我们的这个制度是一个世界性的掠夺制度，即帝国主义制度。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反对这一制度的斗争正在世界范围内蓬勃发展。过去十年中，在美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诸如反对对少数民族的压迫、反对侵略战争、反对对妇女的压迫、反对警察的恐怖和政府的暴行、反对破坏我们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等。

革命联盟作为一个共产主义组织，以发展上述这些群众运动为其基础。不仅如此，革命联盟还以以下这一信念为其基础：对人民的压迫来自这一制度的基本矛盾，即资本帝国主义者对劳动人民的压迫；而人民的解放则在于工人阶级推翻帝国主义制度，在于工人阶级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和一切剥削制度，这种社会主义将把社会推进到完全消灭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

为了完成这一历史使命，为了团结和率领所有的人民为实现这一目标而斗争，工人阶级必须要有自己的政党的领导，必

须要有进行革命斗争的自己的总参谋部。在美国，工人阶级目前还没有这样的政党，那个所谓的“美国共产党”早已叛卖了工人阶级，并以维护帝国主义制度为其目标。当此之际，革命联盟一方面努力发展人民运动并使其联合起来，一方面则以谋求同所有坚持无产阶级利益的组织实行联合，从而建立一个新的共产党，这是它的首要任务。

创建这样的—个共产党，将意味着美国人民斗争的重大进展。也意味着，代表全人类绝大多数的、掌握着世界未来命运的国际无产阶级战胜腐朽没落的帝国主义剥削制度的日子更加临近了。